

戰後 世界 經濟 與 政治

世界知識叢書之三

著 原 James S. Allen 美
遠 志 沈

世界知識出版社 發行





世界知識叢書之三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美·艾倫·原著

沈志遠譯



世界知識社刊行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世界知識叢書之三

••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再版

作者 美 James S. Allen

譯者 沈志遠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0)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 一八四八九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十四元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著者原序

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世界經濟大危機，造成了無限量的苦難和死亡，這樣大的災禍真是太够這一代人受的了。然而在今天，戰勝了法西斯軸心之後，破壞性比剛過去的一次更要大的另一次戰爭的威脅，又在開始攪擾着世界了。

這些定期的爆炸，是我們的社會制度遭逢根本危機的徵象。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兩次企圖從反蘇戰爭中尋找解脫這一危機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武裝干涉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其次便是這一次法西斯軸心進攻蘇聯的嘗試。這兩次侵略不僅都遭了慘敗，而且又使世界資本主義的內部衝突倍增和擴大到了這樣的一個地步，以致另一次全球戰爭將造成今天無法預估其範圍的那種革命後果。

世界的不穩定和戰爭，種根於獨佔資本主義之中。最近這次戰爭，本身是資本主義體制根本危機的產物，它反過來又加深了這種危機。現在要來明確地描繪戰後時期的全部面貌或評價每一個戰爭後果的意義似當嫌過早，然而某些變化和傾向却已很明顯的呈現了。

這本書是想把這些基本傾向中的某一些傾向加以說明和分析。書中的討論大半以經濟為主題。當然，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們不能忽視兩者間的相互作用。世界政治反映着一定時期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基層運動，同時又影響着這種運動。但是戰後時期世界政治之最可靠的指標，並不在一些政治家所發表的聲明中，儘管那些聲明常常能够使人明瞭時事並且影響各國人民和各個階級的運動。我們必須主要地從這次戰爭所造成的那些社會變動過程中，從一些主要的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的勢力關係的改變中，以及從蘇聯所代表的社會主義

對世界其餘部分所站的新地位中，去窺知當前時期的世界形勢。

所以本書所探討的，大半是關於當前戰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或獨佔資本主義，以及這次戰爭如何影響了重要資本主義列強間的關係及它們跟蘇聯間的關係的情形。著者所特別注意的是這一階段中所能看得到的一些基本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地決定着德國和日本失敗以後美、英、蘇三強的內部情況和國際地位。

這樣一種研究必然要接觸到許多不同方面的國際關係，這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很困難的。而在目前這種瞬息萬變的局勢之下就特別感覺困難，因為當前情勢的變動既非常迅速，而各國內部及各國間的危機又很快地在接連着發生。要把一個發展無止境的問題放大起來考察，並且把每一個顯示歷史流變運動的新事件都加以分析，那是一個很大的企圖。但是假如把工作堅持到一個合理的長度，並且爲着當前爭取和平民主的迫切鬥爭的直接目的而進行這種工作，就得經過一度謹嚴選擇材料的功夫，而且還得在時間上確定一點作爲我們研究的出發點。這一點我們把它確定在一九四六年初，這也就是著者完成這本書的寫作的時候。無疑的，讀者會找不到某些論題，他們也會發見某些問題未能如他們所希望那樣的加以充份發揮。著者所希望的只是這本書能够相當說明目前正在進展中的一些社會變動，並且幫助讀者了解大局發展的主要方向。

詹姆士·艾倫

目錄

著者原序..... (一)

第一章 德國和卡特爾..... (一)

一 德國的第一次復興..... (二)

二 新的卡特爾結構..... (六)

三 希特勒和卡特爾..... (九)

四 戰爭期間的德國獨佔資本..... (一七)

第二章 獨佔資本在戰敗的德國..... (二五)

一 德國再起的危險..... (二五)

二 西方列強的衝突趨向..... (三一)

三 民主的改革..... (三九)

第三章 財閥的帝國..... (四三)

一 失敗的條件..... (四三)

二 獨佔的結構..... (四六)

三 財閥掌握了一切……………(五四)

四 殖民帝國……………(六〇)

第四章 戰爭以來的美國經濟……………(六九)

一 戰時工業的擴張……………(六九)

二 美國經濟的不穩定性……………(七四)

第五章 美國的獨佔資本……………(八一)

一 戰前獨佔資本的發展……………(八一)

二 戰時經濟中的獨佔資本……………(八八)

三 幾點結論……………(九五)

第六章 英美的矛盾……………(九九)

一 戰前不列顛的衰落……………(九九)

二 戰爭時期的衰落……………(一〇三)

三 大英帝國的削弱……………(一〇九)

第七章 英國的獨佔資本……………(一一七)

一 兩次大戰之間……………(一一七)

二 戰時的英國獨佔資本	(一一三)
三 英國的卡特爾政策	(一二七)

第八章 擴張主義的自由	(一三三)
-------------	-------

一 企業自由	(一三三)
二 「反卡特爾」的內幕	(一三九)
三 進出自由	(一四八)

第九章 一個美國的世界托辣斯?	(一五三)
-----------------	-------

一 通過卡特爾的世界「計劃經濟」	(一五三)
二 獨佔資本的世界統治	(一五七)
三 「進步的」帝國主義	(一六二)

第十章 蘇維埃聯邦	(一七三)
-----------	-------

一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	(一七四)
二 戰時的蘇聯經濟	(一七九)

第十一章 世界政治中的蘇聯	(一八七)
---------------	-------

一 蘇聯的外交政策	(一八八)
-----------	-------

二 經濟的合作……………(一九七)

第十二章 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二〇九)

一 自由主義的「兩難」……………(二一一)

二 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二一六)

三 歐洲的新民主國家……………(二二〇)

第十三章 世界的危機……………(二二九)

譯者跋……………(二三五)

附 錄

資本主義的獨佔與戰爭……………蘇·I·庫茲敏諾夫(二三九)

論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艾倫(二五九)

第一章 德國和卡特爾

和平的中心問題是要在德國內部剷除德國獨佔資本家，并且毀滅他們在歐洲和全世界的經濟網。假如要保障歐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免於受德帝國主義再起的危險，那末這樣做是必要的。

在某種形式上，這種目標是表現於戰爭進行期間三大勝利列強的聯合行動。克里米亞和波茨坦兩次宣言確定了完全解除德國的軍事和經濟武裝及根絕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共同政策。這種共同事業的公認目的之一，是分散德國國內托萊斯的經濟力量和毀除卡特爾體系。

在兩次大戰之間，德國的托萊斯大王們鞏固了他們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權，而且在世界獨佔事業及卡特爾體系中開始扮演着一個中心角色。在希特勒統治之下，一些獨佔領袖們變成了國家和經濟的無敵的太上皇。在這次大戰期間，實際上全歐的經濟會被組織在他們的大獨佔公司機體中了。

德國戰敗的結果，這一整個體系是被削弱到了破毀的地步。現在受了重創並且上了枷鎖的德帝國主義，是不是會像第一次大戰以後那樣的再起，抑或從此就最後地註定了滅亡的命運呢？我們現在還不能給一個完滿的答覆。這樣的答覆將從許多方面來提供，而且將由許多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來決定。但是在民主解決的道路上擺着許多的障礙，那時十分明顯的。這些障礙之一，就是德國資本跟英美各國資本互相交織的體系。這些資本的連繫是在很多年來建立起來的，而尤其是在第一次大戰中失敗後德國重新恢復到一個世界帝國主義強權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一 德國的第一次復興

德國帝國主義會嚴重地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削弱和耗竭。它的生存本身受了一九一八年革命的威脅。可是戰敗以後的十年中間，德國又恢復了它成爲歐洲一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並且以一個世界列強的資格，又列於與英美並駕齊驅的地位。不僅德國主義的內部經濟基礎已被完全恢復，而且它的全部政治上層建築也採取草瑪共和國的形式而被保存起來。

這首先由於戰後最初幾年間德國反革命勢力勝利的結果。社會民主黨領袖、獨佔資本家和參謀本部三位一體的擊敗了革命，並且挽救了德國獨佔資本主義；他們在草瑪共和國中間繼續了他們不尷不尬的同盟。在這種民主制度的外表後面，反動勢力建立了它的製造戰爭的工業基礎，把生產效能的水準不斷地提高起來，有次序地把軍火工業恢復起來，並且培育了正在生長中的納粹運動。納粹運動的主要的發動者和支持者都是參謀本部的軍官們和上層的工業家；他們組織了各種匪徒團體，在戰後幾年間鎮壓了人民的反叛。

愛斯勒 (Gerhart Eisler) 及其合著者在他們的「德國的教訓」(The Lesson of Germany: A Guide to Her History) 一書中明白地指出，草瑪共和國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出賣一九一八年革命的產物，而被擊敗革命的反動勢力同盟所支持。它的開始是給國內左派一個猛烈的打擊，而在對外政策上則走向反蘇。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不願跟共產黨結成對抗國內反動勢力的統一戰線，而寧願維持草瑪的聯合，而這一聯合是相當成功地盡了掩護恢復帝國主義德國的作用。這樣一個德國變成了歐洲反動的穩定和孤立蘇聯的基地。

德國的復興不單由內部的力量所造成。被戰爭所削弱和耗竭了的德國，假如沒有協約國列強的積極支持，絕對不能這樣快地重新爬上世界政治的領導地位。凡爾賽和約從德國手上剝奪了許多重要的領土和經濟所

有權，那些東西被協約國當作勝利品拿去了；同時對戰敗的德國又規定了許多的限制。但是爲把德國恢復到一個大陸列強的地位——使它成爲抵抗蘇聯的一個力量 and 鎮壓歐洲革命的一個堡壘——所採取的步驟，却大大地遮掩了削弱和約束德國力量的那些措施。

西歐列強間的和列強內部的各種利益和傾向的衝突，在這裏也起着作用——如企圖使德國成爲對抗法國的力量，英國均勢政策、英美兩國資本爲瓜分德國工業的鬥爭、英法美三國托萊斯爲接管歐洲及他處原先爲德國資本所掌握的地位而起的衝突等是。諸勝利列強內部戰後革命運動的高漲、勞工運動的新的戰鬥、以及全世界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的支援——這些事實，在遏止和阻撓帝國主義進攻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新的冒險嘗試上，起着重大的作用。當時蘇聯完全忙於擊敗它國內的反革命和協約國的干涉軍，它沒有可能在戰後的歐洲表演其直接的作用。

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盟並不以消除德國的權力爲目標，而主要地是用來對付俄國革命的。在西歐兩大衝突的趨向之間，即在消除作爲一個世界帝國主義勁敵的德國與實行反蘇政策這兩種趨向之間，關於那一種是最高無上的問題，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當時遏止德國的工作跟干涉蘇聯及鎮壓歐洲革命在同時並進着。從最初起，對德政策即從屬於支持反革命勢力的目的。在一個短時間以內，原先加於德國的種種束縛，有些不發生效力了，有些是完全取消了。代替這些束縛的，是迅速恢復帝國主義德國使之成爲一個反蘇堡壘，却變成西歐列強的主要意願之一了。

綏靖並不始於希特勒上台之時。協約國自招禍患的政策，是深深地種根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後協約國對反革命的支援、對蘇聯的武裝干涉、縝密恢復帝國主義德國、以及社會民主黨所演的反革命的反蘇的作用。綏靖份子及其前輩們有着一個堅固的信念，他們認爲一個反動的德國只能朝着一個方向前進，即朝着反蘇的方向前

進。他們沒有估計到他們會助其取得政權的那些勢力，還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也沒有估計到會一度喝令希特勒躊躇不前而後來終於粉碎了他的進犯軍的蘇聯的實力。

德帝國主義靠着其他資本主義列強的幫助而復興起來的過程，是很值得我們溫習的。從兩次大戰中間的二十年間，還有許多事情是值得學習的，過去促使德帝國主義恢復的那些基本力量，並沒有退出當前的歷史舞台。

人們有時設想，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遭受了更大的破壞，而且好些重要的地區從德國被割裂開來，這樣就會阻止德國的再起。所以回想一下德國第一次失敗所受的嚴重損失，是很有意思的。除去人力的極大損失外，百分之一三以上的戰前領土，和百分之一〇的人口是喪失了。在被割讓的領土中包括了戰前德國耕地的百分之一四·六、百分之七四·五的鐵礦、百分之六八的鋅礦、以及百分之二六的煤產。阿爾薩斯省歸還法國之後，德國喪失了碳酸鉀的世界獨佔權和大約一半的紡織工業。它失去了全部阿爾薩斯·勞蘭的鐵路網和其他重要的交通網。實物賠償剝奪了德國的艦隊、大部分航海的商船、四分之一的漁船隊、五分之一的內河航船隊、整千整萬的引擎和鐵路車輛以及其他無數的財產。德國所有的殖民地 and 許多國外投資也都喪失了。此外，還要加上鉅額的賠款。

這樣大的損失，却沒有影響到獨佔資本的心房，因為所有的基礎工業依然保存着，而控制國民經濟的一些康拜因（Combine 獨佔性的產業組合形式之一——譯者）巨頭依然未被觸犯。甚至對於溫和的凡爾賽和約中關於撤除軍工廠的條款，也很少有人加以注意。相反的，靠着外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的幫助，德國的軍事工廠都紛紛「復員」了；所有的基礎工業都革新和現代化了。當英國的工業繼續趨於停滯狀態，而大部分歐洲依然像戰前一樣落後的時候，德國的工業却在技術的效率上達到了新的高度的水準。它所喪失的地位，是很

快地一個接一個地恢復了。航海的商船隊是立即完全恢復了。德國的銀行和康拜因奪回了它們在海外的許多經濟地位，特別是在歐洲戰爭期間在美國被扣留的許多產業。靠着戰後通貨膨脹的幫助，一九二六年德國的輸出已經恢復了戰前的水準；到一九二九年已經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水準百分之三四。

戰爭直後如野馬奔騰的通貨膨脹，帶着被大銀行和康拜因所澈底操縱的一切痕迹。協約國的任何重要的經濟統制廢止之後，那些操縱家就能够創造新的巨富，並且犧牲中產階級和飢餓工人利益來擴展獨佔資本。德國的金融巨頭掌握着韋瑪共和國的金融鎖鑰地位，他們就有可能來操縱通貨膨脹，以達到排斥小公司、強迫中小企業合併和歸併、從國外馬克投機買賣上從事積累、以及消除他們所欠的債務等目的。根據一位專家的報告，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德國已經能够照顧到它的貿易入超、賠款支付，並從馬克的投機活動中取回它的一部分國外資產；它的這些活動，幾乎有三分之二是不費分文的。

內部加速擴張的時期，開始於一九二四年八月間所通過的道威斯計劃之下所達到的經濟穩定。賠款政策，特別是在這個計劃下推行起來的時候，大有助於德國工業的迅速復興並且奠立了外國投資源源流入德國的基礎。賠款政策遠未促成德國的非軍事化，反而加速了德國的復興。賠款是用存於德國國內的馬克來支付的，其結果是大部分賠款變成了協約國重新投入德國工業的資本。除此以外，道威斯計劃又規定了一筆首批的賠償借款二萬萬美元給德國；在這以後立刻接着又貸給它其他的借款。在通貨膨脹以後的時期，德國所支付的大部分賠款都是從外國得到的借款，而不是用它自己的資財來繳付的。依據道威斯和楊格兩次計劃，從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三一年七月胡佛發佈付款延期令時為止，賠款的支付總額幾達一百一十萬萬馬克；但在同一時期內，在德國的投資或外國給它的借款却幾達二百五十萬萬馬克。

這些借款的大部份來自美國。在一九二九年，外國直接貸給德國銀行的借款竟達二十萬萬美元之鉅。在一

九二五至一九二九這五年間，德國單從美國所得到的借款有八億四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德國成了美國一個最大的外國債務人（參閱呂伊斯 Cleona Lewis 所著「美國在國際投資中的賭注」一書，一九三八年華盛頓版）。在這些借款以外，還有美國一些大產業公司的直接投資，這些大公司中包括標準煤油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國際電信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及阿那康達公司（Anaconda）等。

依照一位歷史家的說法，德國的穩定「給予資本主義世界以一種極度的信念，認為德國變成了這一時代的資本運動的主要目標，正如美國在這次大戰以前的數十年間所處的地位一樣」。（見斯篤柏 Gustav Stolper 所著「一八七〇——一九四〇之德國經濟」一書，一九四〇年紐約版）

德國的經濟復興，是在一種高度發展的獨佔基礎上出現的，而這一個基礎實質上未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而有所改變。跟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情形一樣，戰爭前夜德國的財團資本已經非常鞏固，而生產和資本的集中也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戰爭反而使經濟力量達到更高度的集中；在一切參戰國家中，在托萊斯巨頭領導下的經濟卡特爾化，是沒有一國有像德國這樣快的。德國因同盟國的封鎖而被割斷了大部份外來的原料來源，它就被迫而幾乎完全依靠本國的資源，使它的工業達到最高度的合理化，並且發見各種新的生產技術的方法。戰爭結束時，獨佔企業已經跟國家機構很密切地結合成一體了。在戰爭期間；國家資本主義在德國達到了最高度的發展。

二 新的卡特爾結構

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歐洲革命高潮的動盪時期過去之後，當世界資本主義變成多少穩定的時候，一種新的卡特爾結構就告誕生了。這種結構大半建立在德國復興的基礎上。許多舊的卡特爾紐結是被恢復起來了，新

的紐結又在英、德、法、美各國獨佔資本家中間被建立起來了。到一九二五年時，這一過程已在充份進行中，它反映着美國獨佔資本家更廣大的參加歐洲經濟（主要是德國經濟）的事實。

當美國的大公司打進被削弱的德國工業中去，並在一些主要的托辣斯中掌握股權時，它們加入新的卡特爾關係，其範圍比戰前更為廣大。美國的獨佔資本家通過他們在德國和歐洲的附屬機構或者直接地幫助全世界卡特爾結構的再建，其中包括遠超過戰前結構的那種規模的各種組合和公司的擴張。他們直接參加了巨大的世界化學卡特爾和一九二五年形成的國際炸藥康拜因，可是凡爾賽條約的解除武裝的規定是嚴禁德國生產軍用物資的。在那一年及其後的一年，別的許多卡特爾又組織起來了，其中包括國際路軌卡特爾和歐洲鋼業卡特爾。

（註一）

通過他們的參加卡特爾，尤其是通過他們對歐洲卡特爾的支配權以及他們跟外國獨佔事業的合作，德國的托辣斯大王們很容易逃避凡爾賽條約阻止重整軍隊的各種限制。就假定當時協約國也關心到完全抑制德國的軍事工業（實際上並無其事），經驗指示我們只要獨佔和卡特爾體系保存一天，德國的產業家總比較容易逃過條約的限制。這可以從下面一些實例上得到證明。

（註一） 在一個短期間內，德國的鍊鋼工業已經充分地恢復了控制鋼業卡特爾的力量，由於有利於德國人的入口限制，德國的鋼業托辣斯很快地取得了對於歐洲各國這一工業重要部門的控制權。例如，它對於比利時鋼業的控制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德國的公司收購比利時出產的鋼所付的價格要低於比利時公司收購價格。德國鍊鋼工業能夠把每年的生產量提高到二千三百萬噸，即超過英國的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夜鋼產一倍以上。雖然美國在形式上不是美洲鋼業康拜因的一個成員，但是該康拜因的輸出政策是跟鋼業卡特爾的政策相配合的，它代表全世界五分之一的鍊鋼生產和六分之五的鋼鐵對外貿易的總額。

停戰後三年，關於軍用光學物品的卡特爾契約（包括如測遠器、潛望鏡及投彈瞄準器之類的精確的望遠設備）是在德國的蔡斯公司（Carl Zeiss）和美國的鮑雪和朗勃（Bausch and Lomb）公司之間重新成立起來了。蔡斯在荷蘭已經設立了一個製造分廠，招牌是尼狄斯科（Nedisco），以便在國外製造和銷售軍用光學品，新的卡特爾契約規定除美國外的一切市場都讓給德國公司，而美國公司所接到的一切外國的定單都歸尼狄斯科承造。因此，蔡斯公司就能維持高度的生產水準，而關於它的美國夥伴的生產活動，包括美國海陸軍的定單細節，能經常獲得充分的情報。根據這一契約，鮑雪和朗勃公司的軍用部主持人須得到蔡斯的認可。

克虜伯軍火康拜因通過歐洲鋼業卡特爾即能繼續它在國外的軍事生產。僱用十六萬工人的三大克虜伯製造廠，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公司。根據凡爾賽和約，克虜伯須暫時實行德國境內各廠的非軍事化。同時，克虜伯托辣斯把它的專利權和秘密的製造程序移交給它在中立國家所設立的公司或者跟它有密切經濟關係的公司。在荷蘭，克虜伯設立了西德留斯（Siderius A. G）公司，從事收集自德國運來的軍火；該公司變成了許多替克虜伯工作的荷蘭商行的取締公司（Holding corporation，以取締其他公司或其營業方法爲業的一種新式公司，掌握其他公司之主權或承受權利而從事營業，以分享其利潤及證券利息之一部分爲收入者——譯者）。克虜伯跟好些西班牙的軍火商行也有聯系。跟瑞典的波福斯（Bofors）軍火公司的買賣是最大的；克虜伯把專利權讓給它，作爲取得該公司抑制權的報酬，這種抑制權又通過波福斯而伸展到一大部分芬蘭的軍事工業中去。在協約國的仁慈的監督之下，德國能够把全部軍火工廠都遷移到國外去。福克（Fokker）飛機工廠是整個的遷移到了荷蘭；在瑞士設立了道尼埃（Dornier）分廠，跟它的母公司僅有一湖之隔；而容克（Junker）飛機廠則通過一個瑞典的支廠而繼續製造飛機。英國的維克斯公司（Vickers）爲了解決一次有關專賣權的糾紛，把在西班牙米埃斯（Miers）地方的一個軋鋼廠讓渡給了克虜伯。潛水艇的建造是通過一個在基爾（Kiel）

的喬裝爲政府工場的附屬單位而在荷蘭進行，德國一家傑出的U字艇（即潛航艇）建築公司，在西班牙建立了一個專事實驗潛水艇建造的公司。

化學卡特爾對於德國有特別重大的軍事意義。在一九二五年，法本（I. G. Farben）化學公司已經在輪出炸藥，這是根據復活的炸藥卡特爾的條例而進行的。在戰前（指第一次大戰以前——譯者）德國的托萊斯甚至於在美國也享有獨佔權。戰爭結束後的十年間，德國的化學事業取回了戰爭期間被敵國財產保管會（Alien Property Custodian）所接管的那部分顏料工業，並且通過跟美國廠家訂立的一連串的合約，來實現它對美國顏料和藥品生產的重大影響。基爾戈委員會（Kilgore Committee）估計德國的和與密切結合的瑞士的化學事業，開始直接控制了大約百分之四〇的美國化學產量。

國會的報告和反托萊斯協會的文件都提出了證據，說明德國如何利用國際卡特爾所貢獻的機會來重新準備戰爭。關於這個問題，人們已經寫得很多，這裏也無須再作進一步的細述。德國所以能够重整軍隊，不只是因爲國際獨佔資本的相互聯繫，而且也因爲西方列強推行反蘇政策。不管英美的統治集團如何想把他們的德國的敵敵限制在一種永遠被削弱的地位上，他們却認爲幫助德國迅速復興，使它成爲一個遏止革命的衛兵，是更重要的事情。在一九二九年，德國帝國主義的國際地位（除殖民地未收回外）已經完全恢復，而德國的獨佔事業已經變成了德國卡特爾體系中的一塊基石。

三 希特勒和卡特爾

希特勒登台以後，生產集中和獨佔聯合的過程是大大地加速了。有利於大銀行和托萊斯的國內產業卡特爾化和強迫的產業合併，比在韋瑪共和國時代更變成了國家機構的中心任務。在一九三六年底，所有國內生產的

原料和半製成品以及至少一半的工業品生產，統統卡特爾化了。德國的經濟是非常迅速地改變成爲戰時經濟。希特勒登台後不久，一位德國大托萊斯的經理寫信給他的美國卡特爾伙伴說：

講到政治形勢的話……只有一件事情是很明顯的，就是行政上和經濟上的努力的一切力量，例如各種不同的卡特爾等等，都要歸納到一條確定的努力路線上去，這條路線當然是跟執政黨的政策相符合的；而一切個人的意見和主張也均將服從這條路線。

這位作者透露在他的信上的那種率真的束手無策的表示，我們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嚴重。在當時恐怕很少人會否認德國的大實業家跟容克軍閥們共同支持希特勒，而且終於把他捧上了執政地位。不過這一點還值得再度指出，因爲這些德國的獨佔資本家，會不會被阻止恢復他們的政權的問題，至少在半個德國的領土內是尙未最後決定的。基爾戈委員會認爲必須強調獨佔資本家在希特勒德國所演的作用，它報告道：

卡特爾在幫助希特勒奪取政權中所演的作用，在委員會和其他地方所搜集的證明文件中，都有詳細的說明。克魯伯·蒂森（Thyssen）及其他德國工業舞台上的大亨們，都供給希特勒以財政的支持和政治的影響。

該委員會節錄前任法本公司董事長卡爾·杜伊斯堡博士（Dr. Carl Duisberg）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下面一段陳述，表明征服世界的計劃是如何跟德國大實業界的野心相連鎖的：

國民經濟領土的狹窄性，必須用超越國界的經濟領土來補救……爲着徹底解決歐洲的問題……一種密切的經濟聯合必須在從波爾多（Bordeaux）到敖德薩的地域內建立起來，作爲歐洲的一塊骨骨。」

一個美國卡特爾資本家的直接陳訴，說明法本及其他托萊斯在捧希特勒上台的活動中所演的作用，是當時美國獨佔產業界中所熟知的。一位杜邦公司對外關係部的代表，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從德國寫給他的上司的信裏說：

關於法本來在經濟上支持希特勒一事，在德國已經成爲普遍的談話資料。一般認爲有同類行動的其他德國產業公

司就是克虜伯和蒂森，在這種談話中究竟包含多少真實性，我們無法斷定，但是至少舒密茲博士（Dr. Schmitz）是法本公司的總經理（本人是納粹黨的一位大資助者，却是毫無問題的）。

這種談話包含多少真實性，在希特勒取得政權的時候已經明白地表示出來了。納粹政權成立以後立即組織的臨時最高經濟會議中，就包括德國財團資本的一些重要領袖；其中有如軍火大王克虜伯、鋼業托萊斯巨擘蒂森、電氣工業大王西門子、化學托萊斯首腦波雪（Bosch）、鋼鐵托萊斯首要福格勒（Vogler）、炭酸鉀大王第恩（Diehn）以及大銀行家雪羅德（Schroeder）、芬克（von Finck）及倫哈特（Reinhart）等。

在德國和國外的反納粹報紙上，關於納粹和工業巨臂的密切關係的一切報道（那些工業巨臂同時也控制了韋瑪共和國的一些最重要的金融機構），在德國戰敗後，是被每一個忠實的調查者所證實了。舉例來說，美國財政部的一位代表從法本公司一位高級職員雪尼茲勒（von Schitzler）那裏得到了一個文件，裏面敘述到一九三三年二月間在柏林舉行的一次魯爾工業巨頭會議，當時的主席是沙赫特博士（Dr. Schacht），希特勒也出席該會；在會議上決定了撥給納粹活動經費的數額。魯爾的獨佔資本家於一九三三年在杜賽爾道夫（Düsseldorf）實業俱樂部與希特勒會晤，答應給予希氏以充分的幫助；這一幕終於成了歷史紀錄上的一部分。早在一九二四年，鋼業大王蒂森和福格勒及大銀行家雪羅德已經在用金錢接濟納粹運動；這件事也已在歷史上有紀錄的了，德國獨佔資本家的精華，是在一張包括四十三位實業界領袖的名單中；一個美國政府的代理機關會編製了這些領袖們的經歷，說明他們對於希特勒制度的建立是要負責的。在德國工業中有大量投資而又跟德國人訂立卡特爾契約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們，關於上述一切（甚至更多的事情）都是很明白的。

大獨佔資本家通過他們在希特勒政府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和他們與納粹黨及參謀本部之間所建立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就能够靠政府的法令來伸展他們對於德國經濟的控制權。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的一道法令授

權經濟部強迫各個工商業部門內的公司實行卡特爾化，以便達到調節物價和生產的目的。於是站在外面的企業都被迫而參加卡特爾，而未經批准的新企業則禁止設立。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全部的貿易協會和卡特爾的組織都被置於中央政府監督之下了。在進攻波蘭不久，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政府授權經濟部強迫實施產業聯合和歸併，其目的在實現工業生產的合理化、公開專利權、建立新工廠、鼓勵輸出等等。德國的一切事業都被置於政府控制之下，也就是說置於國家獨佔資本家控制之下。

美國的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一個口號是「產業自治」，是由國家機關來強制執行的。所有商行須一律參加政府正式承認為唯一貿易或工業代表機關的貿易協會或卡特爾協會。「產業自治」實際就是托辣斯和康拜因對於國民經濟的完全控制，在希特勒統治的國家中，得到了充分的政治保護。到一九四三年，政權和經濟的混合已經達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至希特勒的政府機構和托辣斯的組織已很難劃分界線了。許多的卡特爾被解散了；它們的職務就直接交給了政府的軍事機關，這些軍事機關裏的官員就是過去卡特爾裏的要員。

高度卡特爾化的經濟是跟戰爭密切結合着的。一位德國卡特爾首腦曾經寫信給他的美國伙伴說：「卡特爾在德國國內和國外都要歸納到一條確定的努力路線上去。」這時成為納粹政府之無敵的指揮者的德國獨佔資本家（政府却變成了他們在國內國外實行強制壓迫的重要工具）就有程序和很有勁地實施他們的侵略計劃。國際卡特爾變成了他們伸展勢力的一條重要河道，他們通過這條河道來繼續加強他們的世界經濟地位和伸展他們在國外的政治勢力。獨佔經濟和反動政治的聯姻，再不能想像到比德國更有效的了。一切獨佔資本都在為奪取世界支配權而鬥爭，都想壓倒一切其他國家的財團資本的競爭集團，並且利用它們所掌握的一切政治工具來達到這些目的。但是在以納粹制度為代表的獨佔資本和政府機關的完全混合的情形之下，德國的卡特爾首腦們就

掌握着超越他們的英國和美國勁敵的極大的有利地位。因之他們就能加強他們對於範圍很廣的軍事工業（主要在歐洲）的控制，以及對於散佈在世界各部份的原料來源的控制。

德國經濟和政治的侵入，也伸展到了美國。基爾戈委員會根據它所搜集的證據，關於德國獨佔資本的侵入，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德國的工商業及金融公司在正常商業活動姿態的掩護之下，利用了它們海外的分支機構作為對美國進行經濟戰爭的德國整個計劃的一部分。這些德美結合是納粹政府得能以重要原料供應戰爭機構的有效手段。它又利用這種手段來克服美國政府阻止德貨在美國市場上傾銷的各種措施，來換取美元外匯以購買軍用品，來推行納粹宣傳以支持美國的法西斯活動，來在美進行工業的偵察，以及通過專賣特許制的種種限制來阻止美國的仿造。

這些特殊的軍事目的，主要的是通過兩條河道來達到的。一條是在美國所設置的分支公司和附屬機構網，例如基尼科 (Chemyco Inc.) 公司、法本公司的美國通訊部，專事供應德國軍用物資的海外物資公司，運用專利權以限制美國的不銹鋼生產的克虜伯·尼羅斯泰公司 (Krupp-Nirosta Corp.) 等。進行這種活動的另一主要河道是國際的卡特爾結構，德國人利用這種結構來偵察美國所發明的種種新的生產方法，同時也藉此企圖限制美國的軍事物資的生產。鋁、鋅、鎂、化學橡皮、第爾發動機及其他重要的軍用品的缺乏，至少一部分是由於受卡特爾合約的拘束所致。

在世界營業上成績最好的一個托辣斯，就是法本化學工業公司 (I. G. Farben Industrie) 是顏料工業中的獨佔事業集團。它是德國卡特爾制度的一個突出的產物，代表着許多互相關聯的工業部門混合的典型（註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一九一六年，它的前身是一個相當鬆懈的產業組合；後來的法本公司就是從這個組合改組過來的。曾經參加原先的組合的六大化學托辣斯，後來是密切地形成為一個整體了。並且還

新加入了兩個大公司。一九二五年在通貨膨脹結束之時，經過一度改組，並且擴大了規模，這是它參加世界化學巨擘卡特爾的一個準備步驟。後來又陸續增加了許多新的單位，包括一些大的炸藥和軍火製造廠。許多有關係的企業的合併，以後仍不斷繼續。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法本已經成爲包括一百七十七家德國大公司的——個龐大的混合體了。

戰爭結束時，根據美國陸軍和財政兩部的報告，法本所控制的公司商行共達三百八十家之多。它的世界組織遍佈於九十三國，包括五百家以上的公司。更有許多的公司商行是通過跟法本訂立兩千來種卡特爾合約，而參加到這個龐大無比的產業網中去。法本在下列各生產部門中享有獨佔的控制權，或重大的影響：即顏料、藥品、化學肥料、炸藥、石油、人造橡皮、鋁、鎂、塑料(Plastic)、照相材料、建築材料、人造織物、特種機械、技術設備以及其他許多工業部門等。

德國的鋼鐵托辣斯，本身是一個龐大的獨佔康拜因，它一部分也爲法本所有。顏料托辣斯，掌握着許多種原料(包括石炭在內)，並且製造各種工業和農業所需的化學品。它一方面通過世界化學卡特爾網而跟杜邦(Du Pont)維持密切的關係，同時它也還跟美國其他獨佔資本家們保持直接的聯繫。很重要的一種聯繫是通過美國的 I. G. 公司而實現的；後者又通過一個瑞士的分公司(I. G. Chemie 化學公司)而受它的父母托辣斯的控制。美國標準煤油公司的梯格爾(W. C. Teagle)和愛塞·福特(Edels Ford)是美國 I. G. 公司的經

(註二) 戰爭期間，它也充分參加納粹政權所特有的有系統的野蠻獸行。法本拿集中營裏的囚犯來作毒氣試驗；後來又用這種毒氣來消滅整個集中營的生命(例如奧雪維茲 Auschwitz 事件)。有六萬三千以上的外國奴隸勞動者被僱備於法本所屬的各工廠，約佔全部勞動力三分之一以上(見基爾戈委員會報告：「消滅德國戰爭資源」一文)。

理。在鋁業領域內，德國托辣斯跟梅隆 (Mellon) 財團也有卡特爾的聯繫，依據溫得爾·貝治 (Wendell Berge) 的報告，I. G. 參加一百六十二種跟美國有關係的卡特爾合約。

人們常常有一種感覺，以為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僅僅是受德國卡特爾巨頭們愚弄的人。他們可能在某種交易上受愚弄，這是對的。但是這僅僅是在卡特爾賭博中所難免的一種冒險。固然，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參加卡特爾顯然是爲着希望獲利，希望藉此來保護他們的國內市場並且擴張他們的世界地盤。但是假如以爲美國獨佔資本家是被更精明的德國卡特爾伙伴所欺負，那就未免太低估了他們的智慧。不祇是德國的，而且也是美國和英國的獨佔資本家，都在遵循着一定的政策，而且不祇是單純的商業政策。前面已經指出，美國的獨佔大王們十分明瞭納粹和德國獨佔資本家之間的政治聯繫。在對這種結合的效率的猜度上，在他們對於德國和蘇聯的力量對比的估計上，他們可能是有錯誤的；同時他們確實低估了被德國的威脅所激起的全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力量。但是關於他們是在跟誰做買賣以及爲着甚麼目的，他們是十分明白的。

卡特爾合約是兩次大戰之間西方列強所推行的一般政策——把德國造成爲反蘇前哨站的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合約一方面表現着獨佔集團間和帝國主義間的潛在的衝突，但同時也表現着世界獨佔資本的三大領導集團間的協調（雖然跟一切的協調一樣，這種協調也祇是暫時性和試驗性的）。由於帝國主義相互間的衝突，同時也由於反法西斯和反帝勢力的干預，這種協調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可是協調事實上却存在着。卡特爾協議是表示超越盲目的經濟勢力相互作用的一個階段；它是獨佔資本家們企圖節制這些勢力的一種自覺的努力，所以它們是在高度的政治經濟政策的領域內發生作用的。卡特爾和一般政治趨向間的聯繫，如像兩次大戰期間的綏靖政策上所表現的，其最具體的例證就是慕尼黑協定後六個月當德國軍隊正在開進捷克斯拉夫去的時候，在杜賽爾道夫舉行的英德卡特爾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國實業界聯盟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

(industries) 和德意志全國實業界協會 (Reichsgruppe Industrie 相當於美國的全國製造商協會) 之間成立了一個兩國獨佔資本家密切合作的協定。協定裏有一句話說：

兩簽約團體一致認為兩大實業界簽訂協定之後，他們的目標是在保證消除一切不健全的競爭。他們的目的是在獲致兩國實業組織間的儘可能完滿的合作。

該協定中另外一項規定是，假如別的國家的實業界拒絕參加這種協定而且用它的競爭來威脅新卡特爾合約的存在時，兩簽約團體就將訴諸它們的政府的援助。正如當時倫敦「經濟學者」(The Economist)雜誌所指出，這就是英國獨佔領袖們負責請求政府資助及其他援助去支持德國貿易以抵抗美國競爭者的義務，因為只有後者是唯一具有充分力量能够威脅和破壞新卡特爾合約的競爭者。這個倫敦金融界的機關刊物發問道：「杜賽爾道夫的空气裏是不是有着一些足以使敏感的人失去他們的理智的東西呢？關於貝茨迦敦 (Berchtesgaden) 或慕尼黑的气氛，我們也可以發出同樣的問題。」

雖然就發生的事件所證明，他們是估計錯誤了，但是這些人並不失去他們的理智。杜賽爾道夫的協定是威脅到現存卡特爾結構的改變——向着偏袒英國和德國獨佔資本家而犧牲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方向而改變。這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威脅。「經濟學者」的記載中指出，「在德國和英國的個別實業集團之間，已經存在着許多的合約」，並且發見「還有五個實業集團也已經表示原則上願意早日談判訂立合約。」它又報道說：「令人滿意的，這些談判已經在十個實業集團之間開始，並且正在進行中。」

這種在英德兩國獨佔資本家之間成立全面的卡特爾協議的努力，是受到當時張伯倫政府的保證的。在杜賽爾道夫會議開幕前一個月，英國貿易局局長在下議院中聲明說，杜賽爾道夫會議的組織，是政府知道而且予以批准的，它並且表示希望這一會議將促成英德兩國個別工業部門的公司間直接舉行談判。

很明顯的，美國獨佔資本領袖們不會預先不知道爲杜賽爾道夫所準備的計劃，並且也不會不注意到這些計劃的含義，特別是因爲那些計劃是威脅到他們自己的地位的。正如下面要討論到的，他們對於托萊斯巨壁抵禦英德獨佔資本聯合的威脅的巨大力量，寄予極大的期望。他們通過自己在德國的直接事業和他們自己的卡特爾聯繫來採取抗步驟，這也是可以想像的。

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無疑地並不完全用嫌棄的態度來看待杜賽爾道夫的活動；他們在這裏邊看出了反蘇和反民主政策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對於杜賽爾道夫協議的某些部門甚至還可能報以熱烈的響應。然而關於英美卡特爾結合中所包含的對他們自己利益的威脅，他們當然不會感覺愉快。慕尼黑和杜賽爾道夫會議之後，美國大實業界和政府方面對於歐洲綏靖政策日益表示反對，這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

四 戰爭期間的德國獨佔資本

一九三一年法本公司董事長表示得那麼乾脆的目的——形成「一種從波爾多到敖德薩的密切的經濟聯合」——變成了德國在其歐洲佔領區和附庸國裏所實施的政策方針。各種的方法都被用到了。其中包括：沒收非亞利安人的公司、敵產和國有企業；管制跟工業有密切聯繫的商業銀行；強迫那些國家的企業轉讓給德國公司；強迫它們合併於德國托萊斯；創設與別國資本家共同經營的新公司而由德國資本家來控制；強迫收買各國的產業股票乃至於直接的掠奪等等。

安東·寧巴雪 (Antonin Basch) 總結他所搜集關於德國在其佔領他國期間控制全歐經濟的新聞資料時，寫了下列一段話：

空前規模的工業財產的變動，使德國人在歐洲佔領地區和附庸國家內取得了工業和金融事業的絕對支配權。這些變

動在中歐和東歐比有西歐更爲廣大。變動最大的是在波蘭，其次是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奧地利。在西歐各國中，德國的政策及其效果大致一樣，只是在這個區域內，用所有權的直接讓渡的那種方式的侵入程度比較得差一點罷了。然而在冶煉業、化工業、電化工業以及礦業和銀行業等部門中，變化也是夠大的；在那些部門中德國也掌握了充分的支配權。強迫簽訂的卡特爾合約補充了德國對於歐洲佔領區和附庸國工業的這種控制權。

根據同一作者的報道，從佔領之初起，德國曾經殫精竭慮地企圖「造成使恢復現狀成爲極端困難的一種複雜情勢」。而有一點值得指出的，就是在納粹的一切經濟搜括的罪行中，「常常要裝着一種合法行動的姿態」。德國在歐洲的卡特爾伙伴們出來跟納粹合作了。在戰爭爆發的前夜，用「和平」手段實行歐洲的經濟佔領，已經進行得很遠了。德國獨佔資本已經在許多歐洲國家中有了很鞏固的地位；而在戰爭期間，卡特爾首腦們又在這基礎上從事建築。在他們準備征服他國以及建立新的法西斯秩序的過程中，他們主要的政治上的合夥者，是一些被犧牲國家的大實業領袖們。

法國人跟德國托辣斯合作到何種程度，是在法國共產黨的一本小冊子中說明了。它訴述一九四〇年五月以後法國大實業家如何把他們的企業奉獻給侵略者去處理，參加到跟德國托辣斯合併和聯合的許多新的產業組合中去。在顏料和化學工業方面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法國顏料公司（La Societe Francolor）。該公司成立於一九四一年，當時德國接管了法國的庫爾曼化學托辣斯（Kuhlmann Chemical Trust）。法本取得了這個新公司資本的百分之五一，庫爾曼得到的報酬是一部分法本的股票和在這個新康拜因中的一個董事職位。法國的八大汽車製造廠聯合組織成爲法蘭西統一汽車建造公司（Societe Generale Francaise de Construction Automobile），這個公司是爲了供應德國軍事裝備而組織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法國製造家公開聲明要跟德國和義大利在同一工業中的各工廠實行「密切的合作」。在這一新組合中，所有的汽車工廠都要生產四種類型

的標準化的軍用汽車而自願停止客車的生產；而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的冬天，當法國當局要求它們對法國軍隊供應軍用物資時，它們却會拒絕這樣做的。

在機械工具、冶金業、電化工業、軍火、木材、人造橡皮、紡織品、人造織物、交通工具和其他工業部門以及採礦業中，一些最大的法國製造家在合併現有工廠和開辦更大的產業組合上，都跟德國實行合作。在對外貿易方面，一九四一年法國大陸進出口公司組織了一些大規模的商行，來擴張法國跟它的殖民地 and 德國跟東歐間的貿易關係。法國四大銀行——里昂信託公司 (Credit Lyonnais)、統一銀公司 (Societe Generale)、信託銀公司 (Comptoir d'Escompte) 和國民實業銀行 (Banque National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 聯合組成法國與殖民地實業開發銀公司 (Financiere pour le Developpemen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et aux Colonies)，目的是為法德兩國企業的聯合。同時法國的一些大保險公司的資本也被用於促進法德兩國的合作，這種合作是通過一位賴伐爾的秘書和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長格拉特 (Jacques Guenard) 所組織的一個新公司來實現的。

在依據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維希政府法令而設立的組織委員會指導之下，產業集中和合併的過程，從法國的經濟中不斷消除較小的和非托辣斯的企業。一九四三年一月，依據德國佔領軍當局的佈告，有一萬個工業企業因法國經濟實行「合理化」而關門了。那本法國共產黨小冊子的作者評論道：「國家的變革是意味着百分之八〇的工業家被構成大實業界的百分之二〇的工業家所淘汰了。」

德日托辣斯建立它們對歐洲經濟的控制權，是跟軍事和政治機構建立它們的統治權一樣的澈底。這就促成了舊的超獨佔企業的擴張和新獨佔企業大規模的出現。一九三七年為着開發低級礦藏而創設的戈林採礦廠，在兩年以內變成了德國第三個大康拜因。這個康拜因的決定權操在國家手裏，而一些舊康拜因則跟納粹的權貴們

共同控制這一新的產業巨人。戈林康拜因曾經直接控制了整個軸心歐洲的一百二十八個公司，並且至少參加了對其他二十八個公司的控制。一九四一年，它控制了奧地利和羅馬尼亞的全部鋼鐵工業，至少一半的捷克和波蘭的鋼鐵生產、南斯拉夫的全部銅產，大約百分之八〇蘇台德區 (Sudet) 的褐煤，以及多腦河上超過一半的船隻。

祇有收集了更多有用的情報資料，才有可能把戰時歐洲的德國卡特爾網的全貌都描繪出來。甚至在那種場合也仍可能是不完備的，因為前面已經指出，德國的獨佔資本家及其伙伴們會費盡心力地把他們的活動「合法化」起來，並且儘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掩飾產業的實際所有權。

在西歐更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內，軍事佔領和當地政權的合作加速了經濟權集中到托辣斯手上去的過程，而這些托辣斯又變成了德國獨佔資本的附屬品。在西班牙、瑞士、瑞典和葡萄牙等這些所謂中立國家內受德國控制而在戰爭期間大大擴張起來的一些康拜因，也參加在這種歐洲卡特爾網之中。一個未曾包括戰時新的附屬企業的初步調查，告訴我們德國實業界在這四個國家中掌握或控制了六百十七個附屬企業和分公司。這裏還不包括通過專利權和其他詭計而實現的更多企業的控制權。在跟德國工業維持密切聯繫的非歐洲的中立國中，最重要的是阿根廷和土耳其。在許多工商業部門內至少有一百個德國的附屬企業存在在阿根廷。在東中歐經濟落後地區內，即在戰前工業和重要原料也被外國資本所控制的，納粹的卡特爾首腦們把大部分非德國的產業都完全接收過來，或者是通過共同經營的方式，把它們完全置於自己控制之下。這些地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被德國當作殖民地看待了。

德國完全控制歐洲的局面，雖然為時甚短，却表現着獨佔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最純粹形式的帝國主義。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寫道：「獨佔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築是從民主轉變到政治的反動。」納粹統治下的

歐洲是表示這種轉變已經完成，並且有規律地猛烈地發展到了它的頂點。

不僅在歐洲，而且也在聯合國控制的地區內，德國的卡特爾資本家在戰前已經伸展了他們的勢力。基爾戈委員會曾經援引過一個例子，即德國的鋼業托辣斯在擴張南美市場上始終能夠保持它的優勢。它所以能夠達到這種成績，是因為它用在美國所製造而通過它在美國的代理機構而獲得的鋼產去交付南美洲的定貨。在戰前，德國鋼業托辣斯會經過它對歐洲鋼業卡特爾的控制以及直接通過它自己的幾乎在南美每一國家所設立的一百七十五個分支機構，控制了南美洲的鋼業市場。在戰爭期間，德國的鋼業托辣斯不僅能夠保持它的優越地位，並且能夠甚至於勝過它的美國的勁敵們。科溫·愛德華 (Corwin D. Edwards) 在其為基爾戈委員會而作的世界卡特爾制度的研究中，引用了好些卡特爾合約的條文；根據那些合約，美國的公司同意在戰爭期間供應南美的德國顧客，並且同意在戰爭結束之後此項貿易將轉移給德國公司。他所引證的卡特爾合約是關於一些化學品和藥品以及其他軍用品如飛機灌油設備之類的合約，那些都是在歐洲戰爭爆發之後立刻訂立的。

很明顯的，這一類卡特爾合約是基於以下一種遠景而簽訂的：即在軍事緊急狀態過去後，立即恢復跟德國獨佔資本家的舊的卡特爾關係。而基爾戈委員會的報告和愛德華所引證的許多卡特爾合約，都證明在戰時停頓起來的各種舊的卡特爾協議，在戰爭結束後都將儘可能快地恢復起來。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當杜邦和法本決定停止技術情報的交換時，他們雙方同意這種停頓將只延長「到當前緊急狀態過去時」為止，而且「合同中所規定其他一切義務均將和現在一樣的有効。」一九四〇年一月在美國羅姆哈斯公司 (Rohm and Haas Co.) 致法本公司的信裏包含一個諾言說：「一旦常態恢復之後，我們將立即回到原狀。」

所以德國的某些美國卡特爾夥伴要盡一切力量來保護在美國的德國公司商行的資產，以避免被敵產管理機關所沒收。在公開的記載上，最顯著的事件就是紐佳色標準煤油公司和法本公司間的協議。(註三) 在一九三

九年戰爭爆發之後，標準煤油公司的一位職員跟法本公司的代表相晤於荷蘭，而美國煤油公司的人在一封信裏報告結果如下：

他們把兩千種外國的專賣權的讓與證交給我，用全力擬定一種臨時協議的計劃；此項計劃將在戰爭進行期間，不論美國參戰與否，發生效力。

德國的專利權是得到了保證，一位世界上最大的康拜因的代表對於事情的結局如何，表示相當的疑惑：

因為參加合約的成分是包括美、英、荷、德諸國的產業家，所以戰爭就妨礙了這種合約的完成，而且又造成了許多複雜的情勢。我們將如何使這些作戰的成員睡到一個床上去，現在還不十分明白。我們現在在研究這一方面的問題；並且我相信我們會找到一些解決的辦法的。技術科學是要繼續推進的，不管有戰爭或沒有戰爭，我們對於這些問題一定要找出一些解決的辦法來。

德商在美國的專利特許證曾被美國政府沒收，但是戰爭一停止標準煤油公司就開始進行從敵產保管機關收回這些專利特許證的訴訟。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預審時該公司聲明這些專利特許證是曾經從法本公司購得的，為這件訴訟案專誠從德國飛來的該公司的一個代表供證說，特許證的轉移僅僅是一種戰時的權宜之計。

這不是記載上所有的唯一的例子。一九四〇年一月有許多美國實業家（這些都是法本公司的美國朋友）來到了瑞士的巴斯爾（Basle），和德國化學托萊斯的代表們討論一旦美國參戰如何避免政府攫取通用苯胺膠

（註三）標準公司在德國石油業的一切領域內都有投資；通用汽車公司跟標準煤油公司共同領有艾梯爾汽油公司（

Ethyl Gasoline Corp. 生產飛機汽油的）；前者在德國也有極大的投資，在戰前生產半數以上的汽車。標準和法

本兩公司訂有包括人造橡皮和石油的密切的卡特爾合約；根據這一合約，標準公司同意不生產這些商品作為法本不在美國從事石油事業的交換條件。珍珠港事件以後，美國就發覺自己缺乏因天然橡皮來源斷絕而需要的生產人造橡皮約各種條件。

片公司 (General Aniline & Film Corp.) 的辦法。該公司是法本在國外一個最大的子公司，它是法本在美國的一切照相、顏料和西藥事業的一個綜合機構。爲了保護法本的事業，它的美國夥伴們同意把那個公司進一步的「美國化」，並且除去跟法本的瑞士子公司 I. G 化學公司的任何外表的聯繫。後來被人發現，當這一計劃在同盟國佔領德國以後被揭露的時候，它是依照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法本公司的法律處會議上所擬定的一個總計劃產生的。根據這一計劃，法本在美國的資產遇戰爭爆發時即將轉移給它的美國夥伴和中立國人士，並且約定在戰爭結束後不論何方勝利即將恢復原有的關係。

當聽取關於消除德國作戰資源的報告時，參議員哈萊·基爾戈追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給美國的商行曾在鋼板事業上效忠於克虜伯，而且注意到經過一次調查或者可以發見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的大企業公司也已經準備爲了利用它們的特許專利權而效忠於德國的夥伴。

另外一個例子說明美德獨佔資本的關係甚至在戰爭期間是如何保持着的，那就是目前的鋁業卡特爾——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在巴斯爾創設的同盟鋁業公司 (Alliance Aluminum Compagnie)。跟德、法、英三國公司一齊參加這個卡特爾的是托期多鋁業有限公司 (Aluminum Ltd. of Toronto)，美國的鋁業公司曾經把它的國外資產轉移給它。

訂立卡特爾合約如何造成了美國軍用物資缺乏的情形，前面已經講過了。但是人們還發現了許多事實，證明即在戰爭期間，美國的卡特爾資本家還是在幫助軸心國家的。因爲雷明敦軍火公司 (Remington Arms) 堅持遵守它跟法本公司的契約，弄得英國在一九四一年缺乏貼特拉辛 (tetraene 是一種用於引發機關槍。來福槍和手槍的重要化合物) 的供應。美國鉛業公司所控制的鈦產 (titanium) 卡特爾，被美國司法部告發它幫助日人從印度獲得一船的鱈苗，破壞英國的禁運條例，並且幫助法本隱匿它在美國的資產等罪名。

假如托辣斯的國際關係即在戰爭期間亦須維持，又假如不管有戰爭或沒有戰爭，技術科學必須繼續進行，那末我們可以設想到，這些考慮在獨佔資本圈子裏在未來的和平時期中也將是絕頂重要的。

第二章 獨佔資本在戰敗的德國

雖然德國是戰敗了，而且國內遭到了普遍的破壞，但是從準備另一次戰爭的觀點來看，德國的經濟却並沒有受到損害。不僅是大部分重工業和軍事性的工業都還相當完整，而組織嚴密的工業機構的所有權，也仍然操在德國一些規模巨大的康拜因之手，至少在英美盟軍佔領區內是如此的。德國在軍事上的慘敗和希特勒主義在政治上的失敗，都大大地削弱了德國的獨佔資本主義，使它瀕於滅亡的邊緣。但是獨佔的基礎還不會被毀壞。只要它能存留下去，德國帝國主義就有恢復的力量和可能。

一個已被割裂然而尚有侵略性的德國之東山再起的危險，已經由下一顯著的傾向而提高了：那就是德國西部企圖欺瞞或取消三強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曾經決定的使德國完全解除武裝和根絕納粹主義的連貫政策。戰爭結束之後，反動的政治勢力立刻就想恢復在兩次大戰期間所最流行的那種政策，其目的就是使德國再度成爲反對蘇聯及民主穩定的歐洲的一個堡壘。

主張這一政策的人們遇到了許多新的困難，而且他們又陷於自己國內和西方列強間的許多矛盾之中。但某些條件却是有利於他們，在戰爭結束後數月之內，這種傾向已經變成非常有力，而且成爲對於戰時盟國所約定的和平的一種嚴重威脅了。

一 德國再起的危險

德國工廠的絕大部分，特別是重工業，都是在西部盟國佔領區內。所以，德國的工業和獨佔資本的前途如

何，大半有賴於美英法諸國之執行波茨坦協定了。

按照戰前德國全部工業產品的價值來估計，那末英國佔領區內大約佔有德國工業的百分之三五，美國佔領區內百分之二五，法國佔領區內百分之十。不到三分之一的其餘部分，則在蘇聯佔領區內，包括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和波蘭控制下的東普魯士。

英國佔領着最重要的工業區。位於威斯特發里亞與萊茵二省的魯爾盆地，是德國重工業的心臟和獨佔資本結構的基地。在戰前，它出產鋼鐵總產量的百分之七〇，和百分之八〇以上的硬煤。德國純鋼總產量的三分之一是來自魯爾，位於魯爾區並依賴其基本產物而建立的整個工業區，形成爲歐洲最大的和組織最嚴密的康平拿(Combinat)。通過獨佔的康拜因，約佔德國鋼產百分之十二的法國控制下的薩爾鋼產，就和魯爾區緊緊地聯在一起了。

其他的基本工業分佈的比較好一點，雖然大部分仍賴魯爾爲原料供給地。按照戰前的地理分佈情況而言，蘇佔區和英佔區各佔機器製造業的三分之一，而美佔區僅佔百分之二五，法佔區則佔百分之十。化學工業在英美蘇三佔領區內的分佈(註一)是差不多相等的(除非在戰爭期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幾乎有一半的電氣工業集中在四強共同佔領的柏林區，而美佔領區佔有這一工業的五分之一，其餘部分則平均分佈於英蘇兩佔領區內。在紡織工業方面，蘇佔區的份額多一點，約有百分之四〇以上的生產是在它這一區內。另外百分之二五落於英佔區，在美國控制下的佔百分之一五，法佔區只有百分之一〇。

(註一) 據美國駐德軍政府的一位官員報道，戰爭結束時，法本的財產按價格計算，在各個佔領區中的分佈情形如下：美軍佔領區，佔總額百分之九·七五，英佔區——一·一五，法佔區——二〇·二，蘇佔區——五八·五五。(見基爾戈委員會報告書：「德國軍事資源之消除」)

至於蘇佔區內的工業，特別是在西里西亞和薩克森的（註二），不是不重要的，可是單只對於它們的最後處置和控制，還不能除去德國帝國主義再起的危險。假如魯爾區充分恢復舊觀，它就能成爲德國西部和南部帝國主義機構的有力基礎。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危險，因爲這一區域的富源，生產力和工業組織是在幾年之內全部恢復的。

對於德國投降後的殘存軍事潛力做了初步調查以後，對外經濟管理局的「對敵處」得出了如下一個結論：「假如我們聽任德國自由發展，而我們不制定一種解除德國經濟和工業武裝的計劃，那末德國的作戰準備可能在五年以內做得比一九三九年時要好得多」，戰敗以後，德國工業的軍事潛力的驚人跡象是表現在下一事實上：在一九四四年底德國的生產水準打破了它的全部歷史紀錄。雖然有嚴重的軍事破壞和受了無數次空襲的影響，它竟仍能達到這一水準。

實地考察的結果，證明戰爭期間關於軍事工業被空襲所毀壞的報告，是過於誇張的。當空中轟炸藉破壞交通系統以切斷生產與原料的流通，並且摧毀了幾個鎖鑰工業單位，但是大部分的重工業工廠只要稍加修理，即能進行生產。工業生產力的全部戰時損毀估計起來不會多於百分之二〇。德國煉鋼工業具有二千五百萬噸的戰時生產力，它的絕大部分都立刻能够恢復工作。龐大的克虜伯製造廠在戰爭將結束的時候，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生產力在工作，而且它的經理說，只要盟國願意的話，它可以全部開工。根據工業調查，一個工業家表示，像化學用品、淡氣、煤焦、人造纖維、橡皮和鋁等戰略上的軍用物資，可以在相當短期內完全以戰時速度重新生產起來。只要戰俘一回來，軍隊完全復員，世界上最優良的一些煤礦，就立刻很容易地可以全部開工。

（註二）也許戰前德國鋼鐵工業的百分之一八和硬煤生產的大約百分之一六，是在西里西亞境內，其中大部分爲波蘭人所控制。薩克森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區，特別是機器生產、化學工業和紡織工業。

因爲有高度發達的機器工具製造業，所以那些被損毀的工業，可以在相當短促的時期內修復起來，或者，假如必要的話，可以完全重建起來。一九三九年，德國現成的機器工具和它的製造量都高於美國。戰敗以後，德國軍備機器的規模僅次於美國。由於這樣大的生產能力，曾經大部分被盟國空襲破壞的人造汽油廠，可以在六個月之內一律重建起來。

除了這些豐富的國內資源和可以工作的工廠外，德國獨佔資本家至少還可以運用一部分廣泛的國外投資和各種卡特爾關係，這些卡特爾關係已經建立了很久並在戰爭期間是大大地擴張了。除了這種交織着的公司利益關係網以外，德國工業資本家還想拯救其他大部分的利益，當他們看清德國勢必失敗的時候，他們特別努力地把他們的資產及技術人員輸出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用過的方法又被利用起來了，其目的是把資產保藏在安全的「天國」，藉此保存一種隱蔽的力量來準備另一次征服世界的企圖。基爾戈委員會曾經發見在中立國和一些戰時被德國控制的國家內，德國的利益仍然很穩固地保存着，而且「美國本身就可能成爲德國資產最重要的一個安全躲避所」。在德國投降前夕，曾經訊問過一些德國鎖鑰工業家的一個見證人，向該委員會報告說：「這些領袖很自信地期待着一些有力的英美朋友們能把他們從眼前的悲境中拯救出來，因爲那些朋友以前都是他們卡特爾的成員。」

從前德國復興時所熟知的那種佈置又有重現的徵兆。差不多在戰爭結束的前一年，當德國顯然已經不能獲勝的時候，就已經預備好了戰後鬥爭的許多計劃，一九四四年八月德國獨佔資本家的領袖們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會議上，納粹黑衛隊上層領袖謝德博士(Dr. Seid)對他的黨羽們說：

從現在起……德國工業界必須瞭解到戰爭是不能獲勝了，它必須準備戰後商業競爭的步驟，每一工業家必須跟外國的公司接觸攜手，但是這必須個別地去進行，而不要引起任何的猜疑。並且必須打定一個金融基礎，以便在戰後能從外

國債到一筆可觀的數目。

在另一集會上，德國軍備部的一個代表通知一部分卡特爾領袖們說，政府將把大宗款項分派給工業家們，以便他們能在外國建立起一個戰後的基礎。它已經做了特殊的準備來分散托萊斯的研究機構，並把有關新武器的計劃以及使他們能够繼續軍事研究的其他情報，交那些機構去處理。工業家們必須趕快盡可能多的輸出資本並繼續資助納粹黨的地下工作。

美國國務院又發見了豐富的證據，證明德國在預測到失敗的時候，納粹和他的伙伴們就計劃好要在外國繼續其廣泛的活動，來準備德國帝國主義的再起。這些計劃賦與德國托萊斯在國外所掌握或控制的大工業康采恩及國外的研究實驗廠以發展新的工業製造方法和新武器的重大任務；賦與那些受津貼的學校以散佈大日耳曼主義的任務；又賦與那些德國控制下的國外報紙和無線電以同樣重要的任務。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們運用了各種巧妙方法將資本轉移到國外去，其中包括出賣掠奪來的藝術品，積疊起在外國銀行裏的利潤和債權，與非德國的資本實行聯合投資，以及把大量的技術設備出賣給在別國的附屬公司等等。

美國財政部的一個代表（他曾就關於戰時他們在歐洲掠奪的情形盤詰過一部分獨佔資本家）揭露了德國獨佔資本家和他們的國外同僚們寄託在「共同利益」上的高度希望。下面就是那位代表所報告的一段話：

當我們盤問他們關於這些活動的時候，法本的高級人員以及其他人們更不時的表示很憤慨的樣子，他們的共同態度和希望是這樣：戰爭已經過去了，現在我們應該協助他們，使法本和德國工業恢復舊觀。他們中間有些人公然地說，在他們看來，這種訊問和審查只是一種短期的現象，因為一到局面稍稍安定下來，他們就可以希望英美的朋友們跟他們一起來幹。所以他們說，他們的朋友將設法停止類似這種調查的行動，而且將看到他們獲得公正的待遇，並且幫助他們來重建他們的工業。

德國的工業家考慮到許多卡特爾協定僅在戰爭期間暫時宣告中止，一些美國的和許多英國的獨佔集團會想

恢復這些卡特爾契約，可是他們却不像別人所希望的那麼純樸。助理大法官溫得爾貝治 (Werpell Berge) 對基爾戈委員會說：

我得承認在本國和同盟國內，一些存有卡特爾心理的工業家們已經有過許多的陳述，舉行過許多次會議並做了許多事情——這一切都給德國卡特爾家們以一些勇氣和理由。

他又說，「德國人希望重建他們的工業，並將他們企業中的股份送一部分給英美工業家，以便保持他們在外國的投资。」

在跟他們的英美對手進行任何類似的交易時，德國托辣斯大企業家總掌握着比重極大的一份資產。那是一小部分上層大企業家所掌握的對於德國基本工業的高度集中的支配權，也是他們在歐洲及其他地方的新的戰時掠奪品。儘管東歐諸新民主政府沒收了他們的產業，在德境蘇聯佔領區內，工廠被拆毀，工具被沒收，雖然在同盟國境內被發覺的德國資產已為盟國敵產管理局所掌握；但是德國獨佔資本家們仍然有着他們獨自能夠處理的廣大的國際公司企業網。這還是比較次要的資產，他們手中更主要的資產是魯爾區的工業機構和技術設備。這些資產是他們手中的強有力的武器，只要他們的財產不再被充公，盟國不再有任何行動來分散他們的工廠。但是他們的國際經濟侵入，跟他們在西部德國的生產機構的主要所有權連結在一起，引誘着想擴展自己經濟利益的英美獨佔資本家們的胃口。

集中在魯爾區的鋼鐵托辣斯的地位，是一小部分上層康拜因嚴密控制經濟的例證。相當於美國鋼鐵托辣斯的聯合鋼鐵公司 (Vereinigte Stahlwerke) 在一九四三年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鋼鐵生產力，還有其他十一個康拜因則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他們的控制是從鋼鐵工業一直伸展到了其他許多重要的生產部門。不下於百分之七十的煤產是受着鋼鐵康拜因的控制的。他們供應大部分的煤氣，在水泥和電力工業中又演着領導的作用。一

些新的人造石油廠也都是鋼鐵康拜因的附屬物。

有些康拜因企業更是重要，如製造軍火、機器、發動機和機器工具等的企業是。德國有兩個重要的超級康拜因聯合鋼鐵公司和 I·G·法本，在戰爭期間甚至聯合得更密切，並且開始控制了龐大的戈林托辣斯（Hermann Goering Trust），這一托辣斯是納粹組織起來用以容納在歐洲掠奪來的一切工業的。

這樣，在西方盟國的佔領區中，有着一個現成而強固的金融工業的集團，如其政策這樣制定，它就可以併入西歐獨佔和卡特爾的系統，而作為新的侵略勢力聯合的核心。這分明是德國獨佔資本家的政治動機。而這在英美法的有力集團中，也並非是完全不歡迎的。

二 西方列強的衝突趨向

波茨坦協定的主旨是在防止德國的工業力量和政治力量恢復到在歐洲的支配地位。其目的在於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走過的道路，那就是以完全復元的德帝國主義為中心而走向歐洲暫時的反動的安定道路。這裏不僅包括解除武裝、解散軍隊和參謀本部，根絕納粹黨及其制度，並且還要取消它的大部分重工業，把它的機器製造業和別的工業生產力分散到別的歐洲各國去，沒收大的獨佔企業，以及實施能夠保證永遠消滅獨佔資本力量的那種經濟統制。

佔領一開始，在波茨坦決議的實施上，立刻發生了利益與旨趣的尖銳衝突。很顯明的，盟國的資本主義列強和他們統治下的獨佔資本集團，均將因作為歐洲和世界的競爭者的德國工業之永久削弱而獲得利益。這種利益跟蘇聯有着共同的投合之點，因為蘇聯的政策是要阻止德國侵略力量的恢復，並且在歐洲根絕法西斯主義的源泉。它也完全與解放歐洲反法西斯運動的目的相吻合，這類運動的目的是要循着大眾民主的路線來改造大陸

和消滅獨佔資本家對於他們各國的統治。

但是資本主義列強多半由於兩組矛盾而趨於分歧。其中一組在性質上是經濟的和帝國主義國際間的，主要是英美間的競爭，法國也從中起一點作用。另外一組矛盾（並不一定排除第一組矛盾）則發生於戰爭結束時英美反蘇反民主國策之顯著的趨勢。

一個主要的因素是戰爭結束後居於顯要地位的美國獨佔資本的擴張傾向。然而奪取從前由軸心國掌握的經濟地位並侵入到英國的和其他同盟國的世界帝國領域中去的企圖，並不意味着恢復德國的獨佔力量。這是政府的和許多大企業的發言人所公認的。有效的解除德國武裝是被視為消滅一個有力的競爭者並使美國企業能够代替德國的經濟侵入（不僅在美洲並且在歐洲）的一種手段。這種態度當然要反映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的美國政策上，在那兩次會議上，美國的提議被採用為最後決定的根據。當美國政府簽署克里米亞和波茨坦宣言時，它已經在極力主張向一切市場和一切國家「自由出入」的經濟擴張計劃了。有效的消滅那作為歐洲和世界的重要因素的德國重工業，是這一計劃的一部分。

這種觀點很明確地表現在基爾戈委員會反對德國獨佔資本及其領袖們的堅定路線上。聽取了一連串的關於卡特爾制度情報之後，這個委員會不僅主張從速消滅納粹領袖和軍閥，並且還要消滅德國的工業領導權，以便「永遠摧毀德國帝國主義，並允許一個和平民主的德國之興起」。它強調以下幾個步驟的必要：（一）從內部摧毀德國獨佔資本和卡特爾，（二）建立一種國際權力機構來接管以前操於卡特爾家之手的控制權，和（三）不僅要肅清軍火工業，並且要剝奪和解除歐洲被蹂躪國家的「主要的間接軍火工業，包括冶金業和化學工業。」該委員會又催促聯合國採取合作行動來摧毀德國在解放國家和中立國家內的經濟關係。它要求編製一份完備的德國國外財產清冊（包括那些已用瑞士、荷蘭、南美及其他公司化名喬裝的產業），為的是要沒收這些財產。

委員會又認為賠償政策不應對德國的重工業或卡特爾制度有所鼓勵。

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和對外經濟管理局所提出的搜索和接管德國國外財產的一些計劃，也持類似的立場。例如，副國務卿克萊頓（William L. Clayton）所擬具的一個更龐大的計劃，它要揭發一切德國的逃亡軀本，不論它們躲避在什麼地方，它要驅除依舊躲藏在拉丁美洲的德國利益，並且還要阻止德國獨佔資本家恢復他們的獨佔關係。爲了配合波茨坦協議，他力主由軍事當局解散一切德國國內卡特爾，以免它們參加國際卡特爾。他更進一步指出，必須打破德國托萊斯和康拜因對國內經濟的控制力，因爲它們是國際卡特爾系中最重要參與者。除這些辦法和提議外，助理國務卿還擬具了各種步驟來攫取德國在戰時研究出來的新發明和新的製造方法，以用於美國和英國。

關於產業和政治的類似的重要意見，或者要算巴魯區（Bernard M. Baruch）在基爾戈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得最爲簡明了。他力主把德國在歐洲的統治一勞永逸地予以摧毀。爲着這個目的，它的作戰潛在力必須予以消滅，它的許多製造廠必須分別移往東方和西方的友善國家中去，它的一切重工業必須摧毀，容克大地產必須破壞，進出口貿易必須嚴格統制，全世界的德國資產和商業組織必須根絕。關於最後一點，巴魯區堅持不許欺騙。他也同樣地堅持德國的重工業必須解除工業化武裝。他知道在德國工業中有大量直接投資的美國康拜因能起來反對這種辦法，所以他提議他們在德國的及在其附庸國的財產，都可以由美國取得的德國財產中獲得償還。他的建議的目的是在降低德國的超越一切的工業能力和技術能力，並且建立一個新的均勢，在這一均勢中，德國是不再能側身於佔支配地位的列強中了。

巴魯區又主張對蘇聯取得充分諒解，作爲消滅德國獨佔資本勢力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他的建議如下：

「這一套處置德國的辦法，應該用來作爲在重大和平問題上與蘇聯締結一個內容廣泛的協定的基礎。立即而迅速地

解決蘇聯心上這一重要問題——制止德國再起的安全——我相信我們能夠跟蘇聯達到一種充分的諒解。假如這是不可能的，那末我們愈早知道愈好。」

可以看得出，在這種立場中，並非完全沒有「巨棒」(Big stick)或更時髦的所謂原子外交的影子。德國問題是被用來做爲跟蘇聯談判中討價還價的題目。在這整個路綫中隱藏着對德採取完全不同的別種政策的威脅。鑒於德國侵略蘇聯的長期記錄，巴魯區認定有允許蘇聯採取特別安全措施之必要。由於對德國的久遠命運缺乏共同的政策，他深恐蘇聯懷疑到盟國的政策是「由重建德國爲反蘇緩衝國這一願望所領導的。反之，西方民主國也會猜疑蘇聯打算赤化德國」。他認爲反蘇緩衝國的德國和赤化的德國都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要求一種能夠防止任何意外事件的政策。他主張要有「一個堅定而持久的準備計劃……在將來能使我們的國家在最快的速度下轉進任何可能發生的戰爭狀態中。」

作爲一個上層獨佔集團的代表，這位老政治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一個卓越的政府顧問。他的觀點可以當作大企業領袖們的權威表示來看。很顯明的，這些政策不能也不會與美國帝國主義和獨佔資本的擴張目的相衝突。

在實業界的高級管理機構中，沒有一個爲這一政策的發言人被人認爲是要求摧毀在德國的和在別處的獨佔資本主義的熱烈主張者。他們所關心的是阻止德國恢復其帝國主義的領導地位。同時，他們想跟蘇聯成立一種能夠盡量阻止蘇聯勢力增長的臨時妥協，以便使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能盡量擴充而不跟蘇聯直接衝突。這種觀點是承認在戰爭中所形成的新的列強關係，包括新的政治利益和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內，但同時它並不放棄任何一個美國獨佔資本的主要目標，而且容許任何意外事件，如另一次戰爭的發生。

自然，獨佔資本家們是躲在幕後進行活動的。他們的代表們則在華盛頓的政府機構裏和在德國的軍政府中

執掌着鎖鑰的職務。假如他們不自盡力保護他們在德國工業中的鉅大利益，不運用他們所能獲得的新發明和技術方法，那就會和一切以往的和現在的經驗相抵觸了。

根據財政部的估計，德國工業中的美國直接投資是頗大的。一個初步的不完整的調查顯示出來，在一九四三年由一百七十一個美國公司所佔有的德國工業中的利息，總額約在四億二千萬美元以上。這一初步的調查表只記載着那些公司投資所代表的主要利益。大部分的美國資金是投於製造業，特別是在汽車工業，機械工業和石油業方面。這樣看來，很大的投資是放在隨時可變為軍事工業的部門裏，而這些部門，按照波茨坦決議是都應予以完全消滅或有效統制的。

不值是保全自己在德國工業中的這種直接的財產利益的意圖，抵消了消滅美國托辣斯之競爭者的德國重要工業部門的願望。直接投資的價值又在它能作為進一步經濟侵入和擴張市場的基礎。在戰前，美國資本之日益增長的傾向，是通過直接投資於現存的康拜因和建立分廠的辦法，把它的勢力伸展到德國和歐洲各地方去，同時又參加到各種卡特爾裏去。對於一個競敵，他們可以用消滅的方法，也可以用掌握其大部分產業的方法去制服它。這種介於消滅競敵的德國托辣斯和用掌握的方法去制服它們的兩個方針間的衝突，是反映在美國對德政策的矛盾上。一方面，美佔領區中的 I·G·法本所屬諸製造廠，是由軍政府接管了，雖然這些製造廠和 I·G·法本在德國其他地區和在外國的廣大資產所有權的最後處置問題，現在都還是一個懸案。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強烈的傾向，企圖限制毀除製造廠並恢復較波茨坦條約所規定為高的生產水準。

這種傾向可以在美國的經濟使節團的報告裏找到例證。這個使節團乃由美國軍政府所任命，而以胡佛教授 (Prof. Calvin Hoover) 為領導的。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向蘇英法提出的這一報告，無疑地，對於當時正在倫敦集議的第一次外長會議的破裂，盡了極大的作用。它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說波茨坦關於賠償和解除武裝

的協議，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很難做到的；同時顯示着它與作爲美國在波茨坦與蘇聯協議的基礎的美國立場，是離開得很遠了。

委員會（包括美國鋼鐵業與汽車業獨佔資本的代表們在內）主張允許德國有相等於戰前水準的輸出量，爲的是使它能夠維持與歐洲其他各國相同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以實物供應賠償，並支付佔領費用。有半數的輸出品須由機器化學產品和精確的光學儀器等物所組成，而所有這些都是可以變成軍用品的東西。這就必須保持一個規模可觀的重工業機構。重工業的限度可以鋼業爲例。蘇聯要求鋼的出產每年限於三百萬噸，等於一九三二年德國國內的消費量。最初，美國支持這個數目字，但是專家委員會却提議每年一千萬噸，這個數目已經接近於英國的鋼業生產水準。而這已超過戰時德國鋼產的半數，是能構成恢復軍事經濟之必要基礎了。

上述經濟使節團的報告還顯示了一種脫離三巨頭已經決定的賠償政策的傾向。當時的政策，是要把機器和勞動力都遷到被德國蹂躪的國家去，這樣可以減低德國工業生產能力而增加其他歐洲各國的工業潛力。但是專家們想以半製成品和製成品形式取得賠償，這就會促成德國工業藉外國資本之助而恢復它的全部生產能力。很清楚的，主張把德國輸出量恢復到戰前水準的那種建議也是指向同一目標的。

波茨坦決定和美國專家們意見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把德國的有效解除武裝和根絕納粹作爲首要任務，而其他一切都是附屬的，但是後者却把維持德國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和對外貿易的平衡作爲主要的目的。波茨坦條約可以削弱德國而不使它成爲一個工業強國和歐洲安定的可能的中心；但是美國專家們的意見（假如見諸實施的話）其結果必將恢復德帝國主義在歐洲的支配地位。除開這一計劃的反蘇的一面不談外，它顯然滲透着恢復德國市場、提高其經濟能力以吸收美國產品和爲美國投資服務的觀念。

跟英國競爭，在決定美國政策上也有不小的作用。英國對魯爾區德國重工業中心的控制，使英國的獨佔資

本處於有利的地位，來保護和擴展他們在西歐的利益及在可能興起的任何國際卡特爾組織中的利益。但是由於英國地位的衰落和美國地位的大大加強，這一有利情勢是因需要從美國獲得經濟和金融的幫助而相對地削減了。

在英國，及在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的領導集團中，有一種強大的勢力想把魯爾工業區合併成爲一個西歐的經濟布洛克。法國的獨佔結構一向是跟德國康拜因密切連鎖着的，而且由於軍事佔領的結果，就更加密切交織在一起了。戴高樂將軍就以主張西歐「合作」的第一個發言人的姿態出現。因爲英國控制着魯爾，也因爲它在萊茵河流域諸國的優越影響，所以對於創造這樣一個布洛克，英國有着決定的發言權。

在英國的大企業圈子內有一種佔優勢的傾向，是想在任何地區盡可能恢復由英國統治的戰前的區域經濟布洛克，並且想在歐洲和別處尋求一種新的區域結合，作爲一個抗禦美國的經濟侵入的屏障（別的作用姑置不論）。這並不必看作是在某些重大的政治和經濟的國際爭端上可能跟美國成立協定的兩不相容的政策。不論跟美國的關係將如何發展，區域布洛克始終被視爲英國大陸政策的一個永久特徵。

這一觀點大半反映在對德政策上，尤其是反映在恢復和利用德國重工業的政策上。主張在西方布洛克結構內恢復德國工業的最徹底而坦白的代言人，便是倫敦的「經濟學者」雜誌。它是一個極有影響的英國金融機關刊物，因爲它過去反對過英國的卡特爾主義，以及它對慕尼黑政策的批評，曾經博得了「自由主義」的美名。雖然如此，「經濟學者」却變成了英國上層社會中主張對德採取「溫和」政策的流行見解的代言人了，這一政策的要點如下：

第一，對德國人民要有不超過五年的懲役時期，其條件可依各人所願的嚴厲規定。第二，對德國民族自由的唯一限制（在五年的懲役期以外）應爲完全解除武裝。第三，除去關於限制製造軍火一點以外，不應再把造成政治和經濟的無

能的束縛加諸德人之身，尤其是領土的改變應保到最小限度。

波茨坦會議後，這種論調在「對魯爾的政策」一文中，表現得更為有力。在這裏給布洛克政策提供了具體的經濟內容；工黨政府上台後立刻用各種形式贊揚布洛克政策，並且受到法國戴高樂派的支持；這種政策是邱吉爾在戰爭前期倡議英法永久聯盟時所確定的。

波茨坦政策被視為「絕對的神經錯亂」，是對歐洲和德國具有毀滅性的政策。「經濟學者」認為下面的情形是一種真理：西歐的繁榮一向有賴於魯爾區大規模的工業集中，現在西歐的恢復也有賴於魯爾的復興和維持其在西歐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依照這種見解，歐洲各國人民吃蘇美兩國對德問題的態度的虧已經不少，關於這一問題「不幸蘇美人士的意見正相符合。」正如「經濟學者」所推論對於魯爾的絕對控制，既被強制規定在波茨坦協定裏，使英國倒有機會來推翻波茨坦。

現在成為魯爾的掌握者之一的英國所能提出的另一主張，就是魯爾區的資源應當立刻用於重建西歐……假如英、法、荷、比首先建立一些實際的技術的互助機構來監督工業的復興，排除各種困難，按照邊際效用的原則分派供應，那末魯爾的資源就可以有一部分被利用起來了。至於魯爾的行政機構，現在還沒有改變的必要；現在來改變它既費時又費力，而效果却減少。所以監督魯爾對於歐洲互助計劃的貢獻如何，就成為英國的責任了。（一九四五年美國參院報告）

這樣，從前是「英國卡特爾化」的反對者，現在却來主張建立一個各國政府和私人企業的超級卡特爾，以恢復魯爾並把它併入一個英國支配下的布洛克中去了。這樣一種冒險的嘗試也可以大大地用於直接或間接由英國控制德國重工業所必須輸入的多種原料上。德國的鋼鐵工業幾乎完全依賴含鐵混合物的輸入；三分之二的鐵苗需求也是來自外國。在戰前，這許多原料是從大英帝國各個部分和政治上或經濟上或於英國勢力範圍內的各個國家輸入的（註三）。所以西歐布洛克的計劃，是假定不僅美國托拉斯會同意英國對於魯爾工業和歐洲卡特

爾網的支配權，並且也會同意英國對世界各地的重要工業原料之繼續獨佔。

用美國的合作來換取在這種冒險事業中的實際利益和帝國中的其他讓步的可能性，不是沒有的，尤其是假如反動和反蘇的傾向在美國佔着優勢的話。

這些就是西方列強在德國糾纏着的一些矛盾，但是歐洲的未來和德國獨佔資本主義的命運，並不單單決定於這些衝突的結局，別的政治因素也有決定的作用。

三 民主的改革

消滅德國獨佔資本的工作，只有從德國內部，並且靠德國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澈底完成。當軍事失敗的時候，德國的反納粹力量早經大大地被削弱和被耗盡了，而法西斯思想却已深入於德國人民的心中。可能發揮一種決定的政治作用的勞工民主運動，不能立即興起。在這種情形之下，諸佔領列強在他們佔領區內的政策，尤其是在佔領的初期和轉入正常時期，對於局勢的發展是有決定影響的。

三巨頭中的每一個都面臨着關於實施共同決定的政策的三重考驗：

- (一) 他們會如何有效地當作一個共同事業而又在他們各別的佔領區裏實行克利米亞與波茨坦的協定？
- (二) 他們如何有效地從德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肅清納粹領袖及其負責的同夥？

(註三) 戰前和戰時的鐵礦輸入，大部分來自瑞典，但也有來自西班牙和法國勞蘭省的。南非洲供應戰前鐵礦輸入的

大部分，土耳其與南非洲則供給大部分的鉻礦。戰爭期間，巴爾幹各國代替了土耳其的供給。在戰前，錫砂是從中國和印度輸入的，戰時則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供給。戰前錫的輸入來自加拿大與荷印，戰時則由芬蘭、挪威與希臘供給。

(三) 他們是否會鼓勵日耳曼民族中的反納粹力量和民主力量，或者是否他們本身變成了這些力量發展的障礙物？

我們已經指出在西歐活動着的諸趨向，那些趨向阻礙了三強協定的執行，它們是因英美政策在德國的矛盾、不定和猶疑而造成的，此外我們還要加上另一個重要因素——惟恐普遍反法西斯的和民主的運動變成一種行動，結果就產生一種藉德國人裏面的反動力量和保守力量之助以進行一個「自上的革命」的努力。因此，找出一個能够徹底控制而且能够阻止普遍民衆運動的爆發的政治結合，在形式上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民主黨一樣，便成爲西方盟國政策的主要任務了。

在三強之中只有蘇聯堅守着共同決定的政策之精神和字句。這種情形也適用於政策的一切方面，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在蘇維埃社會內，沒有獨佔康拜因要在德國強求它們自己的利益。在蘇聯與其他列強之間，不會有爲市場、爲伸展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或者爲統治卡特爾機構而進行的競爭。蘇維埃政策需要安全，它是建立在與歐洲民主國的友善關係上，建立在與其他戰勝列強相互平等的合作上。蘇聯以生命和社會主義財產的巨大代價打破了戰前的敵意封鎖後，它明確地決定不再允許對它自己形成新型的封鎖。

顯然地，它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阻止帝國主義侵略的德國之再起。在嚴格地執行波茨坦條約，及依照克里米亞宣言支持整個解放歐洲的反法西斯運動的政策中，蘇聯要奠立一個歐洲民主改建(reconstruction)的基礎，在這樣一個民主的歐洲，德國不再能發生支配的作用。蘇聯的積極參加佔領，本身阻止着具有希特勒時代以前的經濟和戰略的有利地位的帝國主義德國的再起。

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內，蘇聯及時消滅了法西斯反動的中心。特殊的環境需要堅定的自上的控制來保證整個納粹帝國主義結構的毀滅，在同時，蘇聯又鼓勵了反法西斯的和民主的民衆運動。當這些步驟開始進行並聲

言要求德國社會的民主改建時，蘇聯當局就允許實行一切反法西斯改造的革新和措置。這樣，長久衍期的土地改革，容克大地產（這是德國反動勢力的主要源泉之一）的分割，不久就都開始了。職工會和反法西斯的政治黨派，很早就以合法的姿態出現，並且在國家改建中發揮了他們的作用。反法西斯德人的第一個民政機關是在蘇佔區內建立起來的。一經剷除了納粹殘餘並採取充分安全的措施來根絕新法西斯及其組織，蘇聯就從下層去促進並鼓勵這種運動。

遠在西方列強開始第一步毀除德國軍事工業的很久以前，蘇聯軍政府早就從它自己佔領區內的製造廠中移去了大量的機器。反法西斯的政治黨派主張實行托萊斯工業的國有化，而且已經在這方面採取實際的步驟。蘇聯不怕根本的民主改革，所以它能够而且準備盡量贊助一切不使私人獨佔組織在它區域裏恢復的措置，並且要推動全德國都採行類似的措施。

在蘇區內所執行的政策，尤其是當它們促進了民主運動，並且使反法西斯政黨復興起來的時候，這些政策的實施就不能不影響到德國其餘部分的運動。

因為基本的重工業都集中在西區，所以毀滅德國獨佔力量的問題，不能單靠蘇區內徹底解決。然而，作為三強之一的蘇聯堅持消滅德國工業中的軍事潛力。波茨坦協定中標明蘇聯不僅可以從它自己的佔領區內以賠償的形式取得它所願取的機器，而且還可以從西方佔領區內取得百分之二十五的拆卸的工廠。自然，這是依據預先假定在西部德國的重工業必須拆毀，而波茨坦條約必須要執行的。

另外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影響沒收西部托萊斯化的工業。依據國外經濟管理局的精密調查，德國掌握着一些領導的獨佔康拜因中大量股票的所有權。這一統制及於德國一半以上的鋼產。納粹建立的赫爾曼戈林超級康拜因的一切股票，都操於第三帝國之手。聯合鍊鋼公司的最大股東是第三帝國，當它沒收了蒂森的股票之後，它

一共已佔有百分之三十九的股票。據估計，在一九四二年德國國家掌握有佔百分之四十產量的硬煤煤礦。甚至於假若按照公認為資本主義財產觀念，來採取純粹「合法」的方法從事，盟國管制委員會就要被命名為全德國的最高當局來取得從前由德國國家掌握的主要利益，並按照波茨坦協定來處理各個主要的康拜因。

然而，在開始的時期最值得考慮的是製造廠的實際佔有問題。每一個佔領區內的列強可以決定什麼是要拆毀的，什麼是要拆卸了移往外國的，也可以決定對於經濟統制的程度。但是當一個勞工運動或民主運動在戰敗德國的政治生活中發生更多的作用的時候，別的力量就要進來參加決定了。當戰爭要結束時，德國國內反法西斯運動的微弱並不意味着在幾年之內不會有一個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發生出來，不僅對經濟統制和賠償問題起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對德國大工業所有權的基本問題也要發生影響。

解放歐洲新力量的興起，迫使整個大陸關係有一個根本的改造，並且也直接影響到德國未來的地位。東普魯士，特別是工業化的西里西亞和別的東部地方從德國分離開來，更加以波蘭長大起來成爲一個主要的歐洲列強，必將使東歐的戰略形勢改變得不利於德國。在中歐和巴爾幹，民主國家之興起，可能永遠地結束德國的勢力伸入到這些國家裏來，並且一般地限制獨佔資本的勢力範圍。在解放運動建立起自己的政權的那些國度裏，都已採用了有效的步驟，藉沒收德國托辣斯及其同夥們的所有權，以根絕德國的利益。

在法國還有許多問題須待決定。我們還不能預先論斷，說托辣斯的二百個家族將把它們的國家變成爲反蘇集團的中心。在法國，反對舊秩序的運動是太有力了，對於托辣斯國有化的壓力是太強韌了，對蘇聯友善的感情是太深入人心了。短短十年間的慕尼黑和維希，似乎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忍受得了的。

德國不僅是歐洲的而且也是世界力量的一個漩渦。在這裏世界的三強會合了。但是解決德國問題的結局，其影響所及將越出歐洲大陸而達於全世界。

第三章 財閥的帝國

七十年來，日本的寡頭統治控制了東亞和東南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遭了第一次的大災殃。

依照戰爭的一切規律和現實，日本是失敗了。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上一次顯赫動人的受降典禮中正式地認可並簽了字的無條件投降的文件，就是證據。我們還有一個補充的證據，那就是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戰敗後四個月宣佈說，「最後的罪惡根源」已被拔除，他已發出了重要的指令，要在日本建設一個新的民主體制。

當這位最高統帥提出了這一千古不朽的主張時，外部的日本帝國就此完蛋；但是天皇、他的應有的尊榮、金融資本財閥、以及舊的國家官僚體系，却都依舊存在。由上面以仁慈的姿態來賜予的改革，用意是在安撫憤激的人民而阻止成長中的反戰爭製造者和天皇制度的民主革命。

日本的寡頭集團既經失敗，他們就不得不在戰勝者的手上忍氣受辱，並且還得忍受一些實在的損失。一部分比較著名的軍閥和侵略主義者，不得不以戰犯的身份束手就擒；另外一部分則悄然退出了公開的政治舞台。所謂實在的損失，就包括殖民地的被剝奪、軍隊解除武裝和經濟的非軍事化的充分實行、以及把政權和控制權分給美國人來掌握。但是寡頭統治依然保存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基礎很少被觸犯到。建設一個民主的非侵略的日本的重任，還有待於將來。

一 失敗的條件

日本失敗時的情況跟德國投降時的情況成一個尖銳的對比。在歐洲戰爭結束時，消除德國帝國主義權力的條件，已比較要成熟得多。當時德國的軍隊已被完全擊潰，國土已被一切重要盟國的軍隊所侵入和佔領，而內部分崩離析的情勢已經非常嚴重。作爲一個中央政權的納粹政府，已被充分剷除，而代之以一個聯合的軍政府。在蘇軍佔領區內，舊統治的地方行政機關及其官員，亦被清除了。所有這些情況，都是大大有利於德國的民主改革的。

在佔領日本的最初時期，人們就立即明瞭美國政策的既定方針是要單獨管制日本，目的是在保存這一東亞的帝國主義鎖鑰地位，作爲美國侵入遠東的一塊階石和反對蘇聯的一個堡壘。爲着這些目的，就要求不觸犯日本獨佔資本主義的重要基礎，不論政治機構可以如何改變。在這一點上，在懼怕民主革命的日本寡頭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者之間，迅即成立了利害的一致。

這種一致的利害關係，對於日本投降的時間和條件，有着極大的決定作用。當日本將被美國和蘇聯的聯合進攻所擊敗的趨勢已經確定時，寡頭集團就令日本從戰爭中退出來了。日本的統治者除了做到本國領土的免於遭受侵襲及其軍隊在完全潰敗以前退出戰爭兩點外，他們還能够在紅軍尙忙於擊敗東北境內的強大的關東軍時，跟美國從容磋商投降的條件。這樣就避開了美蘇對日的聯合佔領和共同管制；而這樣的佔領和管制將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假如蘇聯軍隊參加了進攻日本本土的話。在投降以前須得爭取的最重要的一着，就是承認寡頭集團在戰敗的日本的統治權力。在八月十一日國務卿貝爾納斯的牒文中，立即提供了這個保證；該牒文承認「在盟國最高統帥指揮之下，天皇與日本政府有統治國家之威權」。這一着既經贏得之後，迅速投降就變成「舊的一夥」繼續保持政權和抗拒企圖推翻這政權的內部民主勢力的一種手段了。

不但寡頭集團保持了政權並避免了蘇聯的參加佔領和管制，而且日本的司令官甚至在戰敗以後還被邀請去

跟西方戰勝者共同進行鎮壓亞洲各地民主獨立運動的軍事行動。當一部分日本軍事領袖正被認作戰犯而受着審判時，另外一部分軍官却率領了他們的軍隊，在中國和東南亞洲跟美軍、國民黨軍、英軍、法軍和荷蘭軍隊，共同担任着警衛工作。假使說日本的統治者被迫而放棄他們所攫得的帝國，那末當他們發覺戰勝的帝國主義列強並無意於毀滅殖民地制度時，他們也就會感到滿足。日本侵略者用來稱呼他們的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是喪失了；但是殖民地勢力圈本身，不管它是如何被重新劃分和分配了，只要它是繼續保留着的話，它就會對經濟和政治侵入的新努力提供機會，或者甚至於對不遠的將來發動新的軍事冒險提供機會。

如已經所指出的，世界列強各自對於戰敗的日本的態度，也跟他們對於戰敗的德國的態度不同。跟在德國所實行的共同佔領的政策有別（雖然這裏也還有許多沒有做到的），美國對日却立即捷足先登實行單獨管制了。這是一種既定政策，在太平洋戰爭進行期間，美國的戰略任務是要保證它在勝利中的主宰地位（縱使犧牲聯合作戰亦所不惜）；當時這種政策就已很明顯了。假如說關於美國的政策製造者企圖使美國穩固地立足於日本這一點，曾經有人存過懷疑的話，那末這種懷疑因日本投降後四天——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杜魯門總統所批准的國務院和陸海軍部的聯合指令的發佈而立即消散了。當時美國一面同意用「協議的方法和設置一些適當的顧問團體」來確定能使其他同盟列強也滿意的政策，一面却斬釘截鐵地聲明「同盟列強間遇到任何的意見分歧時，就應以美國政策為準繩。」

關於日本的國內制度問題，該項指令的態度也是同樣明顯的。美國佔領軍最高統帥會奉令「通過日本政府機構以行使其權力」。「通常的政府職權」則交由日本政府執行。美國的政策製造者既給日本寡頭統治的恒久生存提供了這些實質的保障，並且小心提防着國內和國外的民主反對派，他們又喚起人們的注意說「這種政策是在利用日本現存的政府形式，而不是要支持它。」

美國政府的這一基本政策，並未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而受到影響。假如一些新成立的盟國共同機構能够很恰當地發揮作用，那末美國對日的單獨管制，也許會多少受到一點限制。一個遠東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決定對日政策；一個盟國管制委員會是作為東京最高統帥的顧問團體。從華盛頓到東京的美國的軍事指揮鎖鏈，作為傳達政策的唯一路徑而受到特別周密的保護。蘇聯在上述兩機構中均派有代表，如中英兩國一樣，但是美國不論在政策的決定上或在其執行上，仍然保持着主宰的地位。

要從日本消除侵略勢力，決非統帥部發佈幾道命令所克有濟；必須採取一些超過命令的實際步驟方行。因為這些勢力是深深地種根於日本的社會和國家組織的。祇有從內部來一次民主的改革，這些勢力才能有效地被根除掉，而決不是單靠一個外國司令官所指揮而由應被剷除的那些勢力自己來實行的一次「自上的革命」所能奏效的。

少數軍閥領袖和極端派的退隱，和舊的寡頭集團繼續執政，僅僅有助於維持一個非軍國主義的外表，而在這個外表後面侵略勢力將會重新集合起來。日本軍閥從舊的封建階級發展成爲一個集團，而他們個人也和寡頭集團的其他分子混合在一起；除非這些統治日本國家的反動階級被摧毀了，這些軍閥是不能永遠被消滅的。財閥、大地主和天皇國家的官僚集團的聯合統治日本，將使軍閥們復活起來發動一次新的侵略戰爭，除非這一聯合統治被永遠廢止而被一個人民的民主政權所代替。所以這不是一個逐步改良的問題。日本從來不會有過一次民主革命，除民主革命外，沒有其他辦法能够解決當前的問題。

二 獨佔的結構

從某些重要方面看來，日本獨佔資本家在他們的國家戰敗的時候要比一九三一年進兵東北開闢了侵略的新

階段的時候，強得多。果然，他們喪失了他們的工業所必需的許多種原料的控制權，并且也可能喪失他們在殖民地上的大部分資產。但是這種損失已爲財閥在日本國內鉅大的戰時利得所補償而有餘。

從瀋陽事變到一九四五年戰敗時爲止，這一期間日本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產業改革。它從一個輕工業佔優勢和生產集中程度相當低的國家，一躍而變爲一個經濟高度集中和受高度控制的重工業化的國家。一九三九年，紡織工業的生產僅佔全部工業產量的百分之二〇，而一九三一年時却佔百分之四〇。一九四二年，單單化學工業的產量就佔全部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二〇。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間當軍事生產已經佔着壓倒優勢的時候，軍火工業的膨脹達到了頂點。戰爭結束時，日本的重工業估計起來也許已佔全部工業產量的五分之四以上。

雖然遭過多次B-29轟炸機的空襲，大部份重工業並未被損害或者只受到輕微的損失。美國賠償委員會委員艾德溫·鮑萊 (Edwin W. Pauley) 經過一度調查研究之後報告道：「在鋼製機器工具及其他鋼製機械方面，根據日本自己的數字報告，它目前所有在工作中的此類機械設備要比一九三一年侵犯滿洲時所有的多出一倍以上。一鋼的產量會達一千一百萬噸，而其他軍事工業的生產能力也還是令人可驚的。」

新的軍事生產是控制在財閥手中，尤其是在所謂老資格的或「溫和的」財閥手中，雖然有些新的份子須得容納到這個圈子裏去。摩爾根 (Morgan)、洛克弗勒 (Rockefeller)、杜邦 (du-Pont) 和梅隆 (Mellon) 這幾個家族的權力是很龐大的，但是他們對於美國公司結構的控制力，大雖然大，却比不上日本四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所掌握的權力。即使在他們獲得鉅大的戰時利得以前，這四大財閥控制了日本全部股份公司投資的百分之六〇；單三井一家就佔百分之二五。這四大財閥跟澀谷和川崎的銀行事業合併計算，他們掌握了銀行、信託公司和保險公司全部基金的百分之五七。單單前三大財閥就至少控制了一半的銅和煤的生產、

空部倉庫物的半數、全部商船噸位的半數、以及全部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三三，在他們中間三井和三菱建造了半數以上的輪船噸位、控制了全國的造紙工業、百分之七〇的麵粉工業、全部的鍊糖業、以及大部分的化學工業，三菱財閥控制了航空工業和玻璃板的生產。除此以外，大財閥還跟政府共同控制了銑鐵、鋼和合金生產。

在大戰開始時，財閥控制了主要的工業和金融部門，到大戰結束時他們却變成全部經濟（而經濟本身已經擴張了很多）之無敵的主裁者了。靠着政府統制措施的幫助，財閥們通過一連串的強迫併吞和合併的方式，吞食了許多較小的公司。這種過程原為獨佔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但在日本，它在一種堅苦戰爭的威迫和專制主義政權的領導之下，發展得特別快罷了。當戰爭發展到最高點的時候，這種合併的過程便更大為加速了。在一九四〇年，企業被合併和改組的公司有二一六家，其資本總額達三十六萬萬日元。但在一九四一——四三年間，工業合併達一、三五四家公司，其資本總額則在一百九十萬萬日元以上，主要的是紡織、化學、機械和工具製造等部門。在一九四四——四五年戰時工業動員的最後階段上，這種合併運動無疑地達到了頂點。

在金融領域內也發生類似的運動，這裏銀行、信託公司和保險公司的合併也包括着它們所控制的一些工業企業在內。一九四一年，五大保險公司幾乎佔了全國保險業的百分之七〇。在一九四一年中期，日本共有七十二家儲蓄銀行，可是到一九四四年只剩二十九家了。經過一連串的合併之後，只剩了七家大信託公司，其中五家是屬於大財閥的。大商業銀行的併吞情形更可驚人，這裏包括日本三家最大的私人銀行。其結果帝國（三井系）、安田、三菱、三和與住友等銀行，在一九四四年中擁有全部私人銀行存款的百分之七〇，全部貼現、貸款和墊款的百分之七八，以及抵押資產的百分之六一。在這一期間，私人銀行的總數從二百四十五家減少到八十八家。在戰爭將近結束時，合併的規模是更大了。一九四五年三月間，最大的九家儲蓄銀行合併成爲一個中央銀行，其存款總額達八十五萬萬日元。

戰爭結束後，根據東京盟軍總部的報告，四大財閥擁有營業資本一百二十萬萬日元，控制銀行存款和銀行資產一千一百一十萬萬日元，另有實業公司三百二十家，並且在其他許多企業中掌握部分的所有權。按照戰前的兌換率，他們所掌握的股份總值約達三百萬萬日元，這差不多等於戰前美國二百家最大的實業公司的資產總額之半數。單單三井一家直接投資的公司有一百七十三家，其中有許多家設有自己的附屬公司，有一家的附屬公司竟達一八五家之多。父母公司及其二十二家重要的附屬企業的流轉資金，超過七十萬萬日元。它所掌握的股份包括礦業、化學、陶器、纖維、紡織、機械和工具、紙張、造船、交通運輸、五金、森林、農業、漁業、福利事業、商業和銀行等企業。

裕仁的財富使他列入最高的財閥集團。根據日本政府對盟軍總部所提出的報告，這位富翁的財產（金條銀塊珍奇珠寶之類還不算在內）大約有十六萬萬日元。他掌握有二十九家公司的股份，而且似乎他對於大銀行的投資有更大的興趣。這種財富的積攢還不包括十四個皇族的財產，也不包括皇室所有的廣大的地產在內。

保全這些龐大的財產和保護與此相應的權力，很自然地成為戰敗後日本財閥的主要目的。爲着這個，他們就得事前好好地準備，他們是精於玩弄所謂「溫和派」的把戲，精於在國內外散播一種幻想——彷彿他們在全部侵略期間曾盡了抑止軍閥的力量，他們的附和侵略是被軍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所逼迫成的。他們能够更不費氣力地玩弄這套把戲，因爲在英國和美國（尤其是後者）佔支配地位的那些政治和經濟集團，對於這種無稽之談的永久保存，也感覺到極大的興趣。爲了這種緣故，日本的舊財閥跟新興財閥如理研托辣斯和日產公司（他們在殖民地擁有大量財產）不同，他們能有希望提供一個力足控制「自上的革命」和保證外國資本自由進出日本的政府。

這樣使用「溫和派」這個名詞來表示寡頭集團中令人滿意的一部分人，實際上是與維持日本現狀的計劃同

意義的。按照英美政策製造者和日本統治集團的解說，這種「溫和派」營壘裏不僅包括着舊的財閥，而且也包括皇室及其制度，以及戰前各政黨的領袖（那些政黨過去都是為三井三菱所控制的）。在這幅畫圖裏所缺少的惟一的要角就是軍閥。這批軍閥被認為把日本拉進擴張主義冒險戰爭中去的極端派；他們的行動彷彿是違反了天皇及其顧問的意志，違反了舊的大財閥和官僚集團上層的意志而進行的。從這種歪曲的觀念就產生了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剷除了極端派的軍閥就足以保證一個不侵略的、和平的日本。

日本的國家是以各統治階級的一切組成份子的密切交織為其特徵；在這一點上它比任何其他現代國家都顯著些。在日本近代史中，甚至在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一八八九）或在二十年代的所謂議會政府時期內，這種寡頭政治從來沒有被一次民主運動所嚴重地損傷過。民主革命在日本從沒有過去過。正如諾曼氏（E. Herbert Norman）在其所著「現代國家日本之崛起」（*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中寫着，日本這個國家是封建階級和商業及金融資本家的聯盟所構成的。在明治維新時代，當現在這個天皇制度被建立起來的時候，國家的統一是由金融貴族和一部分封建領袖聯合而從上面促成的。天皇制度被這些勢力從相對的黑暗中挽救過來作為專制主義的國家統一形式的樞軸。一八八九年的憲法，以普魯士憲法為範本，是一種天皇賜與人民的禮物，精密地保護着寡頭集團的一切特權，包括軍人在國家中的特權地位在內，同時又容許成立一個權限甚小的國會。

農民的暴動、失去社會地位的武士羣（他們是替封建領主作戰的軍人殘餘）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的騷擾，促進了舊的封建制度的削弱。但是明治維新實質上是一次官僚的「革命」，它革除了某些束縛性較大的封建設施，但是把封建階級依然保留在一種新的政權的結合中。這種工商業和銀行資本家跟大地主和貴族的聯盟所形成的國家，經歷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時期。現代的工業結構是建立在半封建土地制度基礎之上，並且主

要地是通過對農民榨取過分的田賦、高額的地租和高利盤剝而建立起來的。產業的發展沒有經過一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及與之相應的民主自由）的過渡時期，也沒有造成一個明確的與地主和銀行家完全分開的工業資產階級——被迫要求摧毀封建束縛和為現代國家的政權而奮鬥的工業資產階級。

大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一開始就是一種國家獨佔的事業，也就是說，是一種銀行家、大地主和軍閥官僚共同的獨佔事業，那些人的事業是通過天皇政府而得到種種便利的。日本的工業化，是為着軍事的需要，為着防禦一些老的、強大的、深入亞洲和向日本伸展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日漸增長的壓力，也為着防禦那些依舊頑強的門閥和持異議的封建份子，而開始實行的。這樣發展起來的許多軍事工業，後來轉入了財閥之手，這是隨着每一次戰爭和每一次開拓殖民地而發生的一種慣例。

一種強大的擴張主義傾向，就立刻表現出來了。日本只是一個很有限的市場。早在明治時代所規定的一種過分的、現款支付的田賦，作為實現國家軍備和工業計劃的經費來源；這種措施促成了大批自耕農的迅速破產。這些握有土地的自耕農，從事着小規模的經營，負擔着高額地租、苛重的捐稅和高利貸的盤剝；他們就很快地變成大地主經濟的犧牲品了。結果產生了普遍的租佃制，而且是共分收成的半封建型的租佃制。日本的地主往往同時是一個軍人，一個商人，一個將脫胎的資本家，或者是一個政府官僚。日本的工人階級，是從這種赤貧的、無地的和債務累累的農民大眾中不斷得到補充的。地方居民的貧困，在工廠區域內由於極度低微的工資水準而加倍嚴重。凡此種種基本情況，結果造成了一個貧乏的國內市場；那些情況在工業化的全部時期內是很少改變過的。

不僅如此，日本國內缺乏現代工業所需的原料，促使寡頭集團去到亞洲大陸，特別是到朝鮮、東北和華北攫取這類資源的控制權。尤其是當別的帝國主義列強已經侵入了大部分殖民地世界，當獨佔的殖民地勢力圈的

建立引起了它跟這些企圖打開日本門戶的列強間的鬥爭時，它更要這樣做。因此，大部分出身於舊時氏族社會的傳統武士階級的軍閥，就變成了日本寡頭統治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構成分子。他們原來不是做由別的階級決定政策的那個政府的僕役，而是做寡頭統治的其他份子的伙伴和盟友，因他們跟貴族、地主或資本家有着共同的利益。

所以，擴張主義的傾向是深深地種根於日本的社會結構和天皇制度中；甚至在獨佔資本主義充分發達以前已經有了這種傾向。獨佔資本主義的發展不過進一步地加以鼓勵罷了。日本的侵略勢力更因一八九四年的對華戰爭和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的兩次勝利而受到鼓勵。那兩次戰爭的結果，日本建立了它在東亞的第一個重要的勢力圈，攫取了好些重要的資源的控制權，因而它就能够不但擴張工業生產，同時也擴大海陸軍備。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當時其他列強正在別處埋頭從事戰爭，日本就擴大了它在太平洋區域的地盤，並且更深深地侵入到中國內地。它曾經企圖藉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武裝干涉去伸展勢力於西伯利亞而遭了失敗，同時它又從中國革命方面遭到不斷的反抗。

這些早期的勝利刺激了內部經濟的發展。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九七，而美國在同一時間只增加百分之七〇。雖然日本的產量比較其他列強爲小，可是財閥的權力却因這種擴張而大大地加強了。從一九〇九到一九二七年間，資本在五百萬日元以上的公司由三十八家增加到六百八十七家；這些公司的資本總額則從四九五萬萬增加到八、〇〇〇百萬日元以上；而大公司的資本在全部資本中所佔的比例，從百分之三六·二提高到百分之六四·二（見諾曼氏「現代國家日本之崛起」一書）。這種工業的發展增加了財閥在寡頭統治集團內的比重，而使他們在控制國家的統治份子中處於中心地位。在世界經濟大恐慌和促成這次大戰的十年侵略的前夜，財閥已經成了日本寡頭統治中最有勢力的集團。

然而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軍閥集團的力量也同時增強了。許多海陸軍領袖個人都跟大財閥有關係（註一），而軍官團中却滲入了許多從中產階級和中等地主出身的新份子。這些少壯份子表現着一種大眾的但是含糊的對獨佔資本的反對態度，而同時又跟出現於三十年代的一些侵略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團體有着聯繫，他們就在軍隊中替統治階級的極端派形成了一個新的基礎。早在一九三一年的瀋陽事變中就表現了這一點；那次事變是日本軍閥在其他統治集團未能充分說服冒險嘗試以前所鼓動起來的。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軍事政變失敗（這是極端派爭取政權的一種最嚴重的步驟）之後，某些特別急進的份子是被革除了，而軍閥領袖和統治的財閥之間成立了新的妥協，因為現在財閥們也認為實行更大的擴張主義計劃的時期已經成熟了。這一新的勢力均衡就引起了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大舉對華侵略戰。

這種爭地位爭權力的內部鬥爭，並不表示軍閥和財閥之間（或在寡頭集團的其他部分之間）因不可調協的利益而發生尖銳的裂痕。在一切集團內部都有「溫和派」和「急進派」，不論在軍部方面或在財閥方面，在國家政機關裏或在司法機關裏，都存在着這兩派，不過軍部中的冒險份子較多而已。假如說某些老財閥在擁護跟其他列強作戰的態度上要稍微緩和一點，那是因為他們想要充分利用一切「和平」手段去侵入亞洲大陸而主張等到其他列強深深陷入別處的戰事時才採取軍事行動。同時他們也受到自己跟英美資本的經濟關係的牽累，受到他們在對外貿易和非軍事工業中的重大利益的牽累，尤其是因為他們對於戰勝一些頭等帝國主義列強的前途沒有把握。對珍珠港的襲擊不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和德國軍隊打到莫斯科大門前之時開始，這是值得注意的。日本曾經在兩次不宜佈的戰爭（一九三八年蘇滿邊境的張鼓峯之戰和一九三九年外蒙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諾門坎

（註一） 依據一九四二年「每日年鑑」所載，三井聘用了十三個退伍的海陸軍將官，三菱聘用了十一個，住友八個。

之戰）中試探了蘇聯的力量；可是那兩次戰爭日本都吃了大虧。因此，他們寧可向抵抗力最小的方向實施進攻，而希望立即獲致最大的利益。

然而，「溫和派」在大規模戰爭以前的謹慎將事，未能阻止軍閥們發動一九三七年（當時執政的倒是一個所謂穩健的內閣）的對華戰爭。他們也未能利用每一次的軍事勝利而在每一次侵略過程中提高他們自己在日本的地位。他們跟軍閥共同做着大東亞帝國的夢；他們是跟德國訂立軍事同盟的策劃者；這個政府是老財閥和「溫和派」所控制的政府，它在東條接任首相開始進攻珍珠港以前，發動了對華戰爭並作了對英美作戰的各種準備。但是「溫和派」在任何時候都在玩弄一套謹慎而比較遠見的把戲，他們跟軍閥維持權力的均衡也是這套把戲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保證自己即使在戰爭失敗之後也能保持政權。

日本財閥玩弄手段的技巧是很高明的。戰爭結束時，他們對這個天皇國家的支配，比過去二十年來任何時候都更為完密了。他們利用軍事失敗的機會，把海陸軍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加以削除，在從失敗中產生的種種限制以內，他們準備以溫和的帝國主義的姿態去追求帝國主義的目的，而跟美國擴張主義求取互利的協調。

三 財閥掌握了一切

日本獨佔資本家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取得帝國的全部支配權的情形，在皮森（T. A. Bisson）所著「日本戰時經濟」（Japan's War Economy）一書中敘述得頗為精細。大戰要求重工業的急速擴張，這就引起了國家採取干涉經濟的非常措施。在美國和英國，解決類似的問題的辦法是把鎖鑰性的統制職務交給一些重要的獨佔專業，並且用保證高度利潤、政府資助擴大生產及保障戰後利潤等辦法來爭取獨佔資本家對戰爭的支持。但在日本，財閥和軍部之間立即發生了尖銳的爭論；所爭的關於如何運用國家的統制和由誰來執行這種統制的問

題。這種爭論從一九四〇年中到一九四三年十月間頗為激烈，但自此以後，財閥利用戰爭的不利形勢，完全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統制政策。

一九四〇年，一個「新經濟組織」的運動作為大戰準備的一部分工作而開始。當時的政治「革新」運動伴隨着外交和軍事的準備，包括着解散工會和建立一黨統治。進攻珍珠港以前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急速擴大的戰時經濟的統制中，如何規定財閥和軍部的相對地位。除了關東軍的少數急進份子外，軍部領袖們都贊成一種中間性的政策路線，包括實行有限度的政府干涉以保證軍事需要的辦法在內。獨佔資本家歡迎一種較大的經濟的完整性；他們并不反對進一步的政府干涉，因為他們相信在任何時候他們都能完全掌握和利用政府威權來實施在他們控制下的經濟卡特爾化。關於戰爭計劃，財閥和軍部之間並無基本分歧。這只是一個寡頭統治的各種成分間的權力均衡問題。當統治集團為着維持政權和保證戰爭的勝利而有達到內部協調之絕對必要時，這種分歧也就不重要了。但是不管戰爭的結局如何，財閥是決心要保證他們自己的支配地位的。

財閥的統制計劃跟其他國家的獨佔集團所擁護的計劃沒有什麼區別。他們要求在他們自己節制之下的經濟全部卡特爾化，而允許軍部和政府官僚機構的最少限度的干涉。這一運動的先導是日本經濟同盟——日本卡特爾組織的尖端。一九四〇年五月該同盟以建議書的形式向米內內閣提出了關於「新經濟組織」的一個財閥的計劃，這計劃最後是被政府採納了。他們的中心目的是說得很明白的：

「為消滅官僚統制的這一切缺點起見，現有的私人經濟單位都應當統一起來，並且加以調整，以便改組成為各重要工業部門中的一些強大的卡特爾。而這些卡特爾應被賦予範圍廣大的統制權力，以便鼓勵私人企業表現他們的創造力，並且加強對於他們自己的責任的獨立控制權。」

這種「私人企業」自己節制的計劃是跟海陸軍部的「完密防衛國家」（“perfect defense state”）的計

劃相衝突的，因為軍部要求用卡特爾來加強國家的統制，而財閥則要求用國家的威權來強迫獨立企業參加卡特爾，而那些卡特爾是要實行完全「自治」的。財閥們獨立地依照這些方針以完成他們的卡特爾組織。在一九四〇年中，日本經濟同盟在每一重要工業部門中均已成立了許多的卡特爾會議，每月舉行集會兩次。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統制，並且宣布們將要替卡特爾會議的各種決議取得政府的批准。在該年年尾，他們已經贏得了跟軍閥的第一次回合。內閣的「新經濟組織」的計劃大綱，承認政府對於私人企業的管制只允許在特殊的場合施行，而私人企業似將成為新經濟制度的基礎。在東條上台的一個月以前，政府所公佈的「重要工業協會條例」正式成為法律（一九四一年九月）；那些條例把財閥所提出的計劃的大部分內容包括在內了。

根據這個法律，在每一工業部門中得設立統制協會，對於生產、分配、勞力、原料和投資等等均有統制之權。每一協會的主席握有極大的權力，但是選擇他的方法是以保證實現每一工業部門中的領袖財閥的指示為標準的。在這個時候，參加卡特爾會議的大部分工業都已經組織了自己的統制機關，而這些機關現在就變成新法律下的統制協會了。

卡特爾組織一經形成之後，那些弱小的效能低的企業就很快地消失了。這一次被淘汰的範圍，可以從政府的一次「指導和訓練」一萬二千個工商業者的運動的宣佈上看出來，而那批工商業者都是從「新經濟組織」中被排除出來的。從一個卡特爾會議的特殊計劃中可以知道，還有更多的工商業者接着被淘汰，那就是「促使小工業家加入重工業」和建立「對輕工業中的管理和一切分散機構統制」的計劃。這一計劃藉「產業革新條例」的公佈而獲得了政府的批准；該條例賦予內閣各部以命令公司合併某些特殊商行的權力（與其他各種權力並存）商務大臣說，「製造商的數目必須減少，沒有他們，國家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在太平洋上日本節節勝利的第一年中，這些措施很足夠的。在這一時期內，日本財閥在國內完成了他們的

卡特爾帝國。新法律所批准的那種完整的卡特爾體制，一九四二年末在工業、貿易和金融等領域內被建立起來了。戰前的卡特爾會議已經變成了重要工業統制協會總會。對外貿易統制協會和全國金融統制協會（都是財閥所控制的）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內進行工作。但是獨佔資本家們還沒有實現他們的全部計劃。

這要求一個統一的中央統制機關，它對於各種工業和各個經濟部門中的卡特爾將有完全的控制權力，同時對於其他一切政府機關，包括內閣的計劃在內（它還被軍部控制着）也要有控制權。當一九四三年，當日本在太平洋戰區的失利，要求對於造船和飛機的生產實行高度的集中管理時，這種機會就到來了。這種改革在內閣各部和各個工業協會的互相抵觸的統制中，遭遇了許多困難。爲要實現所需要的改革，東條就提出了獨裁權的要求。當他取得了比過去任何軍人首相更大的權力時，財閥就反過來要求戰時經濟的完全控制權作爲答覆。

首先，財閥要求東條接受組織一個內閣七人顧問委員會的建議，他們所提的七個人都是實業巨擘。這個內閣中之內閣的任務是關於一切政策問題做政府的顧問，而且可以斷定不得到政府中的這個財閥特殊機關的同意，政府將一件事也不能舉辦。同樣重要的是成立一個軍火部，它形式上以東條爲主腦而實質上則受財閥代表的控制。除了造船和大砲製造業仍受海陸軍部管制外，這個新的軍火部則掌握對於一切軍事工業的管理權。它直接管制在日本國內的五百七十四個指定的軍火公司和在朝鮮及台灣的一百個軍火公司。它有管制軍事工業的生產、裝備、勞力、原料和投資等權力；它還可以命令各個公司的合併。此外過去在內閣內受軍閥控制的計劃局是完全廢除了。

這是財閥的實際的勝利。東條雖是掌握空前權力的「軍事獨裁者」，可是他不能夠制服財閥；相反的，軍部却被獨佔巨頭們所制服。關於這一點，皮森說：「東條首相並未建立一種對實業巨擘的軍事或政治的獨裁權。一些統制協會的主席，即日本的。獨佔資本領袖們已經提高了他們的權力。他們現在已經在內閣中鞏固了他們

的特權地位……這實際上是日本的實業巨擘和軍閥在共同掌握行政權力上的一種聯姻。可是在影響日本本國工業的各種設施上的過去經驗所指示，誰將成爲這一適當婚姻中的主體是不言而喻的。」

財閥既在內閣中升到了主導地位，他們就利用這種地位來保證自己避免戰爭失敗的後果。他們動議實行所謂軍事工業的國有化，特別是飛機工廠和其他美國轟炸目標的國有化。這種財閥領導的軍事工業國有化運動發生於一九四五年初，正當B-29密集轟炸日本的時候。獨佔巨擘們手裏緊緊地掌握着國家的統制機關，他們要求政府受理軍火工廠，作爲一種保證國家賠償財產損失的手段。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要求更嚴密的管制勞工，因爲後者在戰爭達到頂點時是愈來愈顯得不穩了。軍火工廠在戰爭期間算是「租給」政府的。私人工廠的政府管理權是通過一個財閥所控制的管理機構而實現的。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在「溫和的」鈴木內閣之下，這種財閥控制的國有化是大大地擴張了。戰爭的損失由國庫負擔，而財閥的戰事利潤却照常得到保障。

董事室裏的財閥和據內閣要津的財閥對於工業的這些上下其手的聰敏技巧，暗示着戰敗以後對於「廢除」大取締公司（Holding Company）以取締其他公司爲業之一種新式公司，掌握其他公司之主權或承受權利而從事營業，以分享其利潤及證券利息之一部分爲收入者——譯者）所採取的步驟的一種比較。在麥克阿瑟指導之下行使統治權的幣原內閣，是一個「溫和」透頂的政府，它裏面已經沒有最可憎的軍閥，而舊財閥則被極勝任地代表着。一種類似的「自動」改組，也會發生於一些重要的財閥公司中；通過這種「改組」，那些公司裏的領導人員是被很小心地重新安排了位置，以表現一種完美無缺的「溫和」面貌。在十一月六日麥克阿瑟諭令日本政府實行工業「民主化」的命令發佈之後，幣原內閣則下令解散四大取締公司，同時小心地加以解釋，說財閥已經自動從事此項工作，並會「請求」政府幫助。政府公佈的計劃是發行一種十年爲期的政府公債，作爲償還諸公司的公共資產之用。

同時，美軍總部又佈告政府將替「公衆」掌握財閥的股份。同時大企業組合（大公司）又被禁止再行參加國際卡特爾，而佔領軍最高統帥對於清算委員會的決定，保留有最後裁決權。政府會告知「公衆」，說將不採取過早的行動來出售那些公司財產。是否容許外國資本家來購買財閥的大量股份，那是「同盟國間的政策問題」——美軍總部的一個文件裏這樣說。在這種決定懸而未定前，由財閥政府充任財閥資產的監護人，而各工廠除已決定解散的軍火工廠外，則仍一律由獨佔資本家管理。然而大多數製砲廠和大部份鍊鋼廠一樣，均為政府所有之產業。因此，關於解散軍火工廠，關於轉移工廠設備作為賠償，或者關於限制某些工業部門的生產，不論採取何種措施，這些事情都是直接跟分配財閥股份和攫奪海外日本資產相關聯的。

雖然對於外國資本家購買財閥股份一事早有限制在先，可是我們可以設想，美國獨佔資本家事前早已向財閥的帝國提出過要求了。在日本的術語中，「公衆」一辭是當作大公司解釋的；因而關於「政府將替公衆掌握財閥的股份」的命令，亦當從這種意義上去了解。

戰前美國的大公司在日本已經有了若干成就。可是美國在日的投資總額即未曾超過五萬萬美元；其中六千一百五十萬元是美國大公司直接投於它們所控制的企業的，一萬七千八百一十萬元是對日本企業組合的投資，其餘部分則係貸與日本政府機關的借款。有了這些投資在日本，美國公司和日本公司之間就很自然地發展起來一些卡特爾的和特許專利一類的協議。根據東京佔領軍當局的一次較早的調查報告，戰前日本資本和英美資本間存在着廣大的「姻戚」關係。美國製鋁公司通過它的加拿大支公司，掌握了住友製鋁廠的百分之三〇的股份。國際電訊事業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跟威士—豪斯（Westinghouse）電器公司一起，與住友五金工業訂有關於磁性鋼的專利契約。威士—豪斯公司也握有三菱電業公司的股票。國際電訊事業公司的一個附屬公司，握有百分之二〇的住友電器工業的股票，並保留有選出四分之一董事的權利。泰德華特

合業石油公司(Tidewater Associated Oil Co.)跟紐佳色標準煤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有密切聯繫的，在三菱石油公司中握有值二百萬美元的股份，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且經常以粗油供給三菱。日本五大銀行和美國銀行事業間，也會存在着密切的關係。其他跟日本產業有關係的美國企業公司，尙有如李貝——奧文斯——福特公司(Libbey-Owens-Ford)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紐佳色標準煤油公司等(註二)。英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企業，則在調查報告中沒有提到。

這是美國大公司不會輕易放棄的立腳點。相反的，它們將無疑地企圖攫取日本財閥產業中的最大部份，因為現在日本已經向美國的資本滲入開着大門了。正如德國的情形一樣，這將造成維持日本重工業及獨佔資本組織的後果。美國的參加財閥的事業網，將不會減少後者的侵略性。一切「罪惡的根源」，祇有內部發生一次人民大眾的民主運動(通過一次民主革命——這一革命現在尙未發生)，才能被清除掉去。

四 殖民帝國

假如說美國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維持它在日本的帝國主義地位，把日本作為美國大公司的一個特殊的「獵場」，那末我們可以斷定美國也將企圖取得日本財閥在亞洲的利益的一大部份。這種企圖能否成功，主要

(註二) 這個報告是不完全的。舉例來說，依據向參院基爾戈委員會所提供的證據，全國鉛業公司，一個美國的大企業公司，跟德國 I.G. 法本和一家法國公司相聯合，在日本的化學工業中有着重大的利益。一九四一年三月，全國鉛業公司會幫助它的日本夥伴避開英國禁運自印輸日的鈹，而把本國的七百噸鈹運往日本，這時這一重要化學原料，美國也正感缺乏呢。大家也知道，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在兩家日本電器康采恩中有投資關係。

得看中國和殖民地的民主獨立運動的進展情況而定。殖民地制度的變動也將影響到美國侵入的形式，就是說將影響到它在這一「事業」上將選擇那些列強和勢力作為自己的盟友。

從各帝國主義者爭取在亞洲的獨佔勢力範圍的競爭中，日本財閥可以希望藉與某一帝國主義列強勾結的方法，來挽救他們在中國和殖民地中的一部份產業。美國的資本家享有佔據日本經濟基層的重大利益，從這一基層中他們能够設法操縱財閥在亞洲的經濟網。他們也享有在一個新的和廣大勢力範圍內進行活動的便利，這種勢力範圍美國正在中國建立中。

日本在亞洲的公司網是日本本國高度托辣斯化和卡特爾化經濟的一種附屬品，它的任務是在替日本軍事工業控制原料的來源，發展為征服亞洲所需要的交通和國防事業，以及剝削各地的土人。日本最老的殖民地朝鮮和台灣，基本上已經變成了日本的糧食倉庫。除米以外，台灣還供給整個日本帝國所需要的糖，六個日本的大公司壟斷了製糖工業和類似的企業（包括鐵路在內）；還有一個大公司單獨控制了全部電力生產和幾個製造廠。台灣的全部公司財產（一九三九年共達三五七百萬日元）中，日人控制了百分之九〇。台灣的經濟是如此完整的合併於日本，以致它的輸入只有百分之五來自日本以外的地區，而它的出口只有微乎其微的一點是被允許輸往他國的。

朝鮮處在日本帝國的最內圈中，而且是處在對中國和對蘇聯的戰略地位上。所以日本特別注意朝鮮的工業發展和開發軍用資源，特別在進攻東北之後，朝鮮主要地依舊是一個穀倉，而且日本人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日益苛重的負擔加在朝鮮農民身上；由於日本國內的工業膨脹，他們特別注意到某些軍事工業部門的發展。朝鮮北部和沿海一帶建築了新的鐵路；改進了許多港口的建設；擴大了許多礦產，尤其是鐵路和煤的開採。工業的發展集中在電力、五金、化學等部門和一些新的企業——大部分是為供應朝鮮和滿洲市場生產的紡織品和食品

企業。在侵華戰爭以前，朝鮮工業化的程度可從工廠中所雇用的工人數量增長上看出來：一九三一年約有十萬人，至一九三七年已增加到二十萬以上。在一九一〇和一九三八年間，工業生產的總值從三百萬日元增加到一、一四〇百萬元。在戰爭期間，工業、交通和礦業都有着更大的擴張。

日本財閥緊緊地掌握住朝鮮的經濟。一九三八年，除政府企業外，朝鮮百分之八十九的公司企業控制在日本人手上。三菱控制了鐵礦和銑鐵的生產，日本的新財團之一日產公司，控制了朝鮮的金礦。但是在朝鮮的最重要的托辣斯叫做野口的，也是日本的新興財團。它獨佔了朝鮮的肥料、人造石油和電力等等生產，同時也在礦業中掌握一大部分利益。朝鮮人的份兒不斷地減少下去：一九二三年，朝鮮人所掌握的約佔全部股份公司的資本百分之二一，可是到一九三八年已跌落到百分之一一了，日本獨佔資本家接管了三個為朝鮮人所有的電力站，而朝鮮人的銀行從有資本一千二百萬日元的十二家減少到僅有五百萬日元資本的三家了。

在最近奪取的領土內，除東北外，日本的政策幾乎完全集中於最高度的開發原料出產地和現有工業企業及交通體系的運用。在中國的佔領區內，日本掌握了世界上最豐富的煤礦、重要的銑礦和工業用鹽的來源，後者是人造絲和化學工業所必需的原料。他們的勝利品中會包括華北和華中的棉紡織工業、大部分的中國麵粉工業、全部的小麥收穫、一部分繅絲工業、以及半數的烟草工業。他們也曾佔領了所有中國重要的港口和交通線。中國的抵抗運動阻止了有效的利用，可是大量的有價值的資產却都一度落入了日本人之手。然而這一地區的利用大半還是一種軍事性的活動，而發展經濟的事情則由半官性的開發公司所担任，而那些公司是跟軍隊密切合作的。

在最後佔領的東南亞領土內，日人很少時間來有效地利用豐富的資源。在這些地區佔領後的一年內，要維持這裏跟本國的交通線已頗感困難。可以免除從帝國內圈中輸送機器和裝備來生產的，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的造

船業和鐵礬土、鉻、鎳、鉛和鋅等原料的開採。然而日本財閥也會企圖伸手去抓更重要的產業。例如三菱財閥曾攫得了越南老撾的磷礦，並且在陸軍監督之下掌握了新加坡的運輸業和造船業。三井財閥在菲律賓接管了動盪的銅礦和其他礦產資源，在香港接管了造船設備。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已經有五十家日本商行在菲律賓活動了。

日本帝國的珍寶是中國的東北。它提供了一個殖民地經濟的獨無僅有的標本；在它上面安置着一座成爲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高度集中經濟之伸展的龐大的工業上層建築。殖民地制度範圍內的這種不平常的發展，主要的是一種戰略性的佈置，一種企圖控制「大東亞」的重要的準備步驟，同時日本人還希圖藉此以克制蘇維埃的遠東。東北的經濟發展雖較原來預定的龐大目標差得多，而它的佔領卻變成了一塊爲國內資源和軍事工業所支持的強大的軍事根據地。它除供養本地的工業外，還大量地供給日本國內工業所需要的原料。此外，東北的軍事工業變成了日本戰時經濟的一個重要的補充；根據一種估計，東北約佔日本工業生產的三分之一。

在其他任何一種意義下，偽滿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奴役當地人民、嚴厲統制落後的農村經濟、及日本完全壟斷每一經濟部門，這些都是最具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典型表現。在許多方面，偽滿的發展是表現着日本寡頭集團力圖在一個有最大戰略價值的殖民地領域內再度製造一個日本特有的經濟形態——建立在半封建基礎上的一座現代工業上層建築。

除此以外，天產豐富的東北，從侵略者的眼光看來，是處於進攻蘇聯和中國本部的理想地位。蘇滿邊界長達二千哩，深深伸入蘇聯遠東土地最肥沃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遼闊的滿洲平原，三面與蘇聯領土接壤，內部滿佈着鐵路交通綫，一直四射到西伯利亞的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一位蘇聯的評論家寫道：「由於地理條件的關係，任何一個控制這個地區的侵略國家，享受着進攻蘇聯的極大的便利。……使滿洲可以作爲進攻俄國（

指蘇聯——譯者）的極端重要的地區之陰謀活動的基地和中心，這種局勢必須永遠消弭才行。」

但是這却是日本開發東北的終極目的，這種目的因日本的廣大而周密的軍事準備而更形強調了。許多新的交通線，包括鐵路和公路，伸展到了蘇聯的邊境。堅固的防禦工事、飛機場、電話綫和各種的軍事佈置以及二十萬日本「農民」的移植，都發生在這一地區內。舊的海口是擴大了，新的又建設起來了。到一九四一年底，至少有一百萬日軍駐紮在東北，附有坦克一千，飛機一千五百架。軍事集中達到了這樣的高度：駐偽滿的關東軍佔有日本全部砲兵的半數，近乎三分之二的坦克和全部日本騎兵的四分之三。

這種大規模的軍事集中，是靠滿國內的軍事工業來支持的。假如日本人的報告是可以相信的話，那末偽滿的煤炭生產達五千萬噸，而在日本佔領滿洲以前只一千萬噸，這就使偽滿居於世界產煤國家的第六位。然而根據比較嚴正的估計，東北的煤產僅約達日人報告數字之半。日本在偽滿建築了許多新的電力站，使偽滿每年的電力生產幾乎達到與法國相同的水準。在一九四四年，本地開採的牛鐵產量可能達到每年三百萬噸之數，而鋼的生產只超過一百萬噸。在佔領時期內，鐵路線從三、四六〇哩增加到九、三〇〇哩，超過了中國本部的全部鐵路線的長度。依據日本人的數字，汽車路從二、〇〇〇哩增加到四、〇〇〇哩。

在瀋陽兵工廠周圍建設了大規模的軍火工業網，包括製造飛機、汽車、機械和火車頭的種種製造設備。此外化學和水泥工業也有極大的發展。偽滿工業化的廣大規模可以從日人投資的增長上看出的。在一九三二和一九四三年間，投資的數目從十七萬萬日元增加到七十一萬萬日元，政府的企業還不算在內。控制着大部分重工業的滿洲實業開發會社，在一九四四年其投資總額達二十九萬萬日元。和其他日本公司的投資合計起來，僅僅工業中的資本總額在一九四五年可能已達五十萬萬日元，這等於英國在印度一切事業中的私人投資的總數（即包括農業、運輸、交通和工業各部門的投資總數）。在一九四四——四五五年間，當美國空軍加強襲擊日本土

時，許多工廠又從日本遷移到了偽滿。

對於偽滿經濟的統制體系，最初是在軍人直接指揮之下，依據他們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而建立起來的一些特殊的公司，是被官方派定而賦予每一工業部門中的完全的壟斷權。這些公司都受偽滿政府（實際上就是日本軍部）監督的。在一九三八年，四十一家官方指定的公司已經開始工作。這些公司的大部分資本都由日本政府所供給。但是跟普遍傳佈的印象相反，這些企業並不長期為日本政府所有，日本的歷史在滿洲重演起來了。一些私人的獨佔資本家不久就被請去參加滿洲的公司進行，正如日本工業化的初期情形一樣，國家所創設的大企業，在創辦時期過去之後就立刻轉入財閥之手了。

早在一九三八年，根據一個官方的記載，純粹的國家獨佔，僅存在於戰略性的礦產事業、動力工業、交通和鐵路等事業中，雖然安田銀行曾被允許佔有一小部分龐大無匹南滿鐵道會社的股份。前一年政府所創辦的一些大工業轉入了滿洲實業開發會社這一新公司之手，這個公司是日產托辣斯和偽滿政府所合辦的。但在一年之內，日產托辣斯的獨佔資本家通過這個公司掌握了煤礦、金礦、鋼鐵生產、輕金屬和汽車生產的支配權益。大倉獨佔資本保持了牠原有的鐵礦和冶煉工廠，而住友財團則滲入了輕金屬部門。三井和三菱掌握了石油提煉業，而且又企圖在汽車、人造石油、飛機以及甚至於瀋陽兵工廠——這個日本軍閥的至聖所（*holy of holies*）等產業中建立他們的地位。在大規模侵華戰爭爆發之後，軍閥就充分地放鬆了他們的控制權來鼓勵新舊財閥作更多的投資。

隨着太平洋戰爭的進展，財閥們擴張了他們對於殖民地網的控制，並且把它跟他們日本本國的公司結構更密切地維繫起來。日本財閥採取二條主要的途徑來開發所掠奪來的帝國屬地。一條是通過政府在「大東亞」九大殖民地區內所創設的各種開發公司的途徑。各公司資本由國家和財閥平等籌集；每一開發公司設立着各個經

濟部門的附屬公司。另外一條重要途徑是通過直接管制各個企業的辦法，那些企業或者是私有獨佔集團在這些地區內所創設的，或者是他們直接從軍人手上接過來的。但一九三一年以來，侵佔地區內的情況也不能使財閥完全滿意，因為在那些地方軍閥尚能掌握比在日本國內和舊殖民地區域內更大的控制權。

與財閥在日本的控制計劃的勝利同時，大獨佔集團又能減少軍閥對於輓近征服地區的經濟干涉。財閥們企圖擴大對於整個東亞地區的統制協會，作為取得全部支配權的一種手段；但是這裏他們遇到了軍人領袖們的反對；後者對於被許可到他們管轄地區裏去活動的實業家，要求有選擇之權，同時也要求對於他們的活動享有一般的監督權。這種反對浪潮後來是被逐漸地克服了。許多滿洲的公司都變成了日本統制協會的「自動參加」的會員。在別的地區內，經濟上的配合是通過各種開發公司如「華北開發公司」與「華中振興公司」之類而實現的。在南亞洲，跟日本國內的平行機構相聯繫的一些新的統制協會，如菲律賓的日用品統制協會、南方各區的食物統制協會和木材統制協會等，也被紛紛設立起來了。人壽保險業統制協會派定日本公司的地域是在華北和華南；另一種類似的組織又派定各個不同的地區給新聞出版事業。

最重要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間，當時日本內閣中新成立了一個大東亞省（即部），把一些舊的機構如滿洲事務局和支那事務局（這兩個機構原來都受軍部控制的），都歸併到它下面去了。這個新的部對於在日本本土、朝鮮、台灣和庫頁島地區以外的一切工商事務，掌握行政的權力。軍閥們原先的支配地位被擠掉了，而現在這個文人控制的新的部，就更直接地變成了財閥的御用機構。他們可以通過這個都來調整他們對征服區域的政策，及分配所攫奪的財產來滿足他們的慾望。大東亞省對於保障財閥控制新的殖民帝國所演的作用，正如軍火省對於日本戰時經濟所演的作用一樣。

所以在戰爭結束時，日本獨佔資本家已經掌握了全部東亞地區內的企業。這樣一種龐大的經濟體系是被一

個財閥的小集團所控制了；同一集團也就是控制日本經濟的集團。在東南亞洲，過去的所有者將無疑地重新收回許多的這類企業。在中國也是這樣，英國和中國的資本家將設法收回他們的礦山、工廠和一切的產業。然而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將要竭全力運用他的極大的交易力和由美國管制財閥資產而產生的「權利」。麥克阿瑟會得白宮訓令要得到關於在脫離日本的領土上的一切日本資產的全部估計，並且「依照盟國當局的決定來處置它們」。同一訓令又聲稱，「在日本國內外國企業機會均等的名義之下，日本當局對任何外國的企業不應給予，或允許任何日本實業組織給予獨享的或特惠的機會，也不應把任何重要經濟部門的控制權讓與外國企業。」

我們無須多加思考，就可斷定這個訓令裏邊所包藏的全盤戰略。美國人既佔據了日本的基層，他們就容易決定什麼樣的機會均等將給予日本獨佔結構的敵人們，而同時對在亞洲大陸的日本資產爭取他們自己的「均等機會」。特別是在中國、朝鮮、台灣和東北的內部，美國的大企業家必將在密切編織着的財閥的經濟網中抓取控制地位，縱然這可能意味着跟日本大資本家瓜分控制權，他們還是要這樣幹的。

這樣的企圖將很自然地激起所有這些地區的民主運動的反抗，對於世界和平尤其危險的是美國獨佔資本家，企圖繼承原先日本在滿洲的地位，和維持日本的帝國主義基礎跟這一戰略前哨的連繫，作為進攻蘇維埃西伯利亞之基地。這種發展的可能性蘇聯是無疑地早就看到了的，所以它曾經以全力粉碎了關東軍並且拆毀了滿洲的一切兵工廠和軍事工廠。中蘇協定中規定兩國共同領有和管理東北的鐵路網及其附屬企業，共同防衛旅順和大連，很明顯地理由也就在此。然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跟他們的夥伴或是跟日本財閥，共同合作進行活動，他們是不會放棄這種危害世界和平的企圖的。維持日本的帝國主義基礎跟在亞洲建立一個廣大的美國勢力範圍的嘗試，是有密切聯繫的。

第四章 戰爭以來的美國經濟

美國從戰爭中蛻變成爲一個世界上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在經濟和軍事範圍內都佔了極大的優勢。這是軸心國失敗以後，世界新形勢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種現象。

在戰爭前夜，美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強國，它在商品和資本的輸出上佔世界第一，而在世界市場上是一個最富有的部分。當別的國家遭受着戰爭蹂躪與生產性財富損失的時候，美國的工業生產却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進行着戰時的擴張。這兩種並行的發展增進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比重。同時，因爲美國在戰爭過程中變成爲一個海軍和空軍的主導強國，又因爲它參加了全世界規模的衝突，使得它躍居於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演更重大的政治作用的一個地位。

戰前的舊形勢已經過了時而不再能適應當前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實際關係了。從經濟上講，這話特別適用於重分世界市場和資本侵入範圍有關的國際獨佔資本及卡特爾的關係上。我們可以想像到美國大企業家想充分利用軍事勝利以滿足自己的利益，他們必將用最適合於每一時期之政治情況的任何方法，以圖立即在全世界上取得地位。鞏固和擴張美國世界經濟地位的基本傾向，從根本影響着美國和平時期的一些關鍵性的政治經濟政策的決定。

一 戰時工業的擴張

自本世紀初以來，美國在世界上的日益增長的作用，大半是基於它的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大規模的、有高度

效能的工業生產。在戰爭時期，美國工業的產品比平時多出一倍以上，其擴展的速度（每年超過百分之十五）超過了由三十年代初期的經濟危機轉入經濟復蘇時所創的紀錄，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增長速度多出一倍以上。對於這種空前擴張的因素加以精密的研究以後，就發現了它的偏頗不平衡的性質，並且很清楚地顯出了它的暫時性。雖然如此，它却實表現了美國經濟的偉大潛力。

當美國在和平時期已經是世界第一位工業生產國的時候，這種擴張就發生了。事實上，它的領導地位已經很高，沒有任何一個別的國家能够居於緊跟着它的第二位。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十年經濟繁榮時期裏，美國在世界經濟上所佔的相對比重如下：

(一) 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間，美國的工業生產佔世界工業生產量（蘇聯除外）的百分之四八。這是按照產品的淨值來計算的，假如按照生產量來計算，無疑的這一百分數是要比較小一些。雖然如此，美國的生產是確實已經接近資本主義世界全部工業生產量的半數了。

(二) 一個約略的估計（以美元為單位），一九二九年美國的國民收入高於其他二十三國之和，其中包括英國、德國和法國。由於美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比較高，所以實際的收入是要少些。但是這一估計確實指示出美國購買力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作用。美國確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富有的市場。

(三) 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間，十五個重要的商業國家所消耗的九種重要製造原料和食品原料的總消費量中，美國竟佔去其百分之三九。這表明了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原料消費者的領導作用。

(四)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裏，美國在輸出國中佔第一位，一九二九年，其出口量佔世界總出口量的百分之一五·六。在世界輸入總量裏，它所佔的份額是百分之二·二，僅次於聯合王國。美國是很容易取得原料輸入國的領導地位的。

(五) 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間，美國有更多的資金投放於國外，其數量比聯合王國、荷蘭及其他資本輸出國的國外投資總數還要多。

這些比較是世界經濟蕭條以前美國最繁榮時期的情形。我們必須用美國經濟極不穩定的眼光來觀察這些情形，因為美國經濟在繁榮與蕭條之間的迴旋是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經濟來得劇烈的。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以為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平滑無阻地一直向着更高水準邁進的。

美國戰時生產局的估計指出了戰時生產擴張的程度：工業品的生產量比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二二〇左右，而製成品的生產額則超出百分之一五〇。威廉·白特 (William I. Batt) 引用飛機、坦克和其他設備的高度生產數字說，在戰爭期間，美國的生產速度幾乎「等於一切盟國與敵國生產總數之和」。製造業家貨物運輸的記載（這是工業動態的最好指標）在一九四四年高達一千五百六十六萬萬美元的新紀錄（註一），相當於美國商品價值與服務價值總數的百分之八〇。作為重工業之骨幹的鋼生產，在一九四四年達於工業史上最高的紀錄——八千九百五十萬噸。這一數字超過了一九三〇——一九三六年間任何一年的全部資本主義世界的鋼的產量。

同時，跟它的軍事生產相並而進的，美國是增進平時生產的唯一國家。在一九四四年，美國人民所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在價值上比一九三九年多百分之五八，在份量上比一九三九年多百分之二十。

比貨物產量之增加更有意義的是新的工業生產力的創造。有價值二百五十萬萬美元以上的新廠和新設備增

(註一) 從一九三九年以後，裝貨的運輸設備（其中包括飛機、航船、和鐵路的設備）增加了二十五倍。電氣機器增加了五倍；其他機器，四倍；汽車及橡皮的產量，三倍；鐵、鋼、非鐵金屬、化學品和食物等，增加了二到二又四分之三倍。

加到美國的工業生產力上去了。這就把美國的全部工業生產力至少提高了百分之四〇。當然並不是一切新廠都可以認為是永久加在美國經濟中去的，其中究有若干廠要改變成爲平時生產，若干廠要廢置停工，現在尙不可知。但是新添的工廠確實是創立起來了，只舉一個例子來說，適用於工業的機器工具的數量就增加了百分之五〇。根據一個可靠的估計，美國的製造業所生產的機器工具比戰前超過了十二到十五倍之多。

還有一個更具有永久性並且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戰時發展，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效能的最好測量器就是勞動生產率，這是技術進步與勞動強度提高的共同結果。後者是被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必須消耗的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所決定的。工業上的技術改革通常總是連帶着使勞動過程進一步的合理化，尤其是在大量生產的工業是如此。例如在一種自動運轉機制度(Conveyor system)中，簡化了工作的手續，使一個工人可以勝任完成，但同時却提高了他的勞動強度。技術上的改進包含着許多因素，諸如有效地利用電力，使用新的代用品和改良的原料，運用新的理化方法，提高機械的速度與效能，以及用新的科學方法來訓練和利用勞動力等。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美國經濟發展中表現得特別顯著(註二)。而且，甚至當生產水準降低的時候，生產率還是有增高的趨勢。若以每一勞動小時的產量來計算，則一九二九——一九三九年間的生產量雖然降低，但勞動生產率却有着顯著的增長。在這十年中，製造業的生產率提高了百分之三二·三，而生產量却降低了百分之〇·五(註三)。

(註二) 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每一個就業工人的產量，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八，而一八九九到一九一四年每年平均增加一·七。

(註三) 這種趨勢在礦業和運輸業中更爲顯著。提煉石油的煤礦業中，生產率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五，而生產量却減了百分之二七；在無烟煤的生產中，生產率增加了百分之七九，而生產量降低了百分之三一·二；在鐵道的生產中，生產率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一，而生產量降低了百分之二五·八。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諸年份中，生產率的增加是伴隨着製造業工人絕對數目的減少，甚至於生產量增加的幾年裏也是如此。在一九二三——一九二九經濟繁榮的年份內，工業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二·六，每一個工資勞動者的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〇·五，但是工資勞動者的人數却減少了百分之七·六。這是美國工業史上的新趨勢：即使在生產量增加的時候，勞動力的總數却逐漸減低了。這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正如「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的一位作者所寫的一樣，「值此企業繁榮的時代，高度的生產率和生產的迅速擴展，帶給許多人以就業的和收入的不穩定。」

在戰時生產擴張中，勞動生產率更有以飛快的速度提高的趨勢。這是由下面一個事實指證出來的：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間，工業製成品的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五〇，而製造業所僱用的工人却只增加了百分之六〇、在這一時期內，每一工人的平均每週工作小時約增加百分之二〇，這只能填補就業與生產間之缺口的一部分而已。按照戰時生產局的報告，這一時期內，勞動生產率約提高了百分之二五，佔製成品產量的增加總量的三分之一，這就等於一切製造業的生產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四·二，而戰前的十年內，每年却只增加百分之三·二。人民大眾的支持戰爭，是這種現象的重要因素；軍火工業中所表現的更大的生產率即其指證。依據戰時生產局主席克魯格(J. A. Krug)估計，在這些工業部門中，從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四年四月間，每一個人的產量從百分之三〇增加到百分之三五。

因此，關於工業生產能力和勞動效率，戰時的擴張更增高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潛力作用。美國的工業生產力無疑地超過了全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一半，或者可以說幾乎接近到它的百分之六〇。此外，即使聽任物價增高，而美國的國民收入也相當地增加了，使得美國市場的容量開創了新的紀錄。在戰爭的時候，美國變成了世界上一個主導的進出口業國家。而且它還以世界上最大債權國的資格而大大地提高它的國際地位。

這種有利地位能够維持多久呢？它將利用這種地位做些什麼呢？

二 美國經濟的不穩定性

戰時的生產擴張能够持續多久，主要的是看和平時期必將到來的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深度如何來決定，也要看美國在國內和世界範圍內對付經濟危機的影響所採取的辦法如何來決定。戰爭結束時即刻表現出來的復員危機，就是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行將到來的信號，這一危機有着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危險。

因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大大地增加了，所以美國的危機必立刻影響到一切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比一九二九年的災難更爲嚴重。反過來說，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開展的政治條件，也會同樣地影響到美國經濟危機的過程。

除了戰時生產超度擴張期間所積累起來的那些危機的因素而外，美國的經濟還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猛烈波動的傾向。這在一般經濟論文中已經普遍提到了的，尤其是當它足以影響到戰後世界經濟的時候。

商務部的最近一個研究報告裏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美國工業波動的範圍和強度都比別的國家來得顯著」。例如，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的經濟危機期間，美國的工業生產量減低了百分之四六，而其餘資本主義世界則只降低了百分之二七。

美國一位權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韓森 (Alvin H. Hanson) 強調美國經濟的穩定對於世界各國的「威脅」說：

「我想美國經濟的極度不穩定，對於歐洲乃至全世界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自然大規模蕭條的本身是許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一部分是國內的，一部分是國際的；但是下面一個事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即本世紀二十年代美

國驚人的投資高潮（以及在別國內靠美國貸款培育起來的投資高潮），相繼而來的暫時的飽和，和接踵而起的固定資本財產量的激減（尤其在美國）等，都是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核心問題，而且也是主要地決定蕭條的強度與久長性的因素。：美國經濟的強烈波動是世界其餘部分經濟穩定的威脅。除非世界能用某種方法隔離美國經濟蕭條的影響，否則一個慢性蕭條的美國一定會蔓延到別的國家去。」

許多人都具有與韓氏相同的見解，尤其是在外國。懼怕戰後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以及這一危機對世界經濟之不可避免的影響）的心理支配着英國的一切經濟討論。從英國實業聯盟（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的專家們起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如威廉·貝佛烈治（Sir William Beveridge）止，他們首先着重的是美國充分就業的問題，認為這是世界經濟復興的基礎。說美國將要「輸出失業」和飢餓隊伍，這種警告是時常發生的，它不過是兩次大戰期間美國的經濟活動所促成的世界人士的深刻憂慮的一種反映。由於美國的大實業界對於為緩和戰後危機之影響所要採取的政府行動表示明顯的冷淡，人們的憂慮就更漸加深。

一位著名的瑞典經濟學者貢拿·麥達爾（Gunnar Myrdal）在一九四三年底到美國旅行一次以後，寫道：「在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將經歷一次高度的經濟不安，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美國的這種經濟發展正在對全世界造成嚴重的影響。」這位瑞典的經濟學家又用下面的一種觀察來支持這一悲觀論點：他認為美國不打算發展應付戰後這一災難所必需的政府的計劃和統制。

這種觀察已經在美國得到事實上的證明。在從德國投降到日本失敗的短短期間內，部分復員的困難已經指出了美國當局缺乏有計劃的政策來應付這一行將到來的危機。他們把大部分希望寄託在對於積累的儲蓄的假定作用上，建議中的社會保險費用的擴張上，以及以恢復和平生產為目的的戰區救濟上。但是這些因素應有的效力都被以下的事實大大地對消了，那就是在德國失敗後不久軍事定貨立即激減，日本投降後許多軍事生產率的

突然停止，正常工作週的恢復，以及許多經濟統制措施的鬆弛等。這種情形立即表現在工人工資的銳減和大量失業的開始；根據某種估計，在戰爭結束後的一年內，失業工人約達一千萬之多。恢復平時生產能夠多少恢復經濟界的情況，但是產業復員的無政府性必將縮短戰後的繁榮而加速週期性危機的到來。

雖然存在着這些明確的徵候，却有一種完全分歧的美國人意見（大半流行於美國當道者中間），認為向國外擴張必定能夠挽救危機。而羅斯福總統、華萊士、其他的政府領袖以及許多職工會的領袖們也強調應付戰後危機的公共措施之需要，甚至於他們希望美國的輸出能比戰前的水準高出三倍或四倍，藉以使美國避免戰後首次繁榮後的長久的危機。（註四）

這些計劃的一般旨趣，反映在美國資本主義向全世界範圍擴張的基本趨勢上。大家都承認，即使富裕的美國市場也不能支持其龐大的工業機構；爲了要挽救大眾的痛苦，亦有採取非常措施的必要。不過這類措施大部份是跟擴張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有關的。一般人忽略或低估了經濟不穩定所發生的危險；這種傾向至少有一部份是由於迷惑於戰時景氣，一部份是由於對美國作爲一個世界強權這一問題的成見所發生出來的。

世界市場是一個很無把握的暈，特別是因爲美國佔去了世界市場的大部份。美國國內的經濟狀況和美國所推行的對外政策是決定世界市場之可能機會的主要因素，假如美國對外政策不但不能減輕而是趨向於加強世界的政治危機，那麼民主的安定就沒有什麼長遠的前途，而這種安定本身是能保證一個擴張的世界市場的。對歐

（註四）因爲在戰時缺乏消費品，而平時積累起來的購買力在戰爭時期無法消費，所以在戰爭結束以後，大家希望在戰爭結束後有一個暫時的繁榮。但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一繁榮的程度和期限不幸就受到大批失業（尤其是在生產工業的工業部門裏）、物價繼續增高、托辣斯反對工人增資的要求、對低微收入階級徵收高額的捐稅以及強烈的世界政治危機等等的影響。至於估計到這一繁榮的期限，大約是由兩年到五年。

洲民主改革的反對，反蘇傾向的再起，對於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鎮壓者的援助，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之侵略性的擴張主義，對於行將到來的經濟恐慌缺乏有效的措施等等——這些都是阻礙世界之擴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危機的尖銳化（即使它是在若干時日內在三強互諒以維持和平的條件下進行着的），除了各地市場的縮小和加速經濟危機的到來以外，是不會有別的效果的。既不能事先採取適當的措施，則在加深的世界政治危機中所集積起來一個強烈的經濟危機，將必掃遍美國。

這種情形可以從戰時擴張中看得很清楚，因為戰時擴張把促成美國經濟不安定的諸種因素都加強起來了。這裏所說的因素，在美國經濟中表露得特別顯著的就是生產的巨大規模、經濟力量的高度集中、技術的進步以及高度的勞動生產率等。

在戰時景氣以前，美國的經濟著作中已經在強調這些主要因素的久遠效果了，特別是一九三八年國會循羅斯福總統之請而通過設立的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關於獨佔資本的研究報告中，更強調了這一點。在這些研究報告中，關於投資和國民收入之獨佔的結果，發見了「收入和財富的集中是最重要而簡單的原因，使得資本消耗量不足以維持和擴大國民收入」。更簡單地說，這種研究報告承認了利潤的高度集中阻滯了經濟的擴張和發展的事實。這一事實是由於對利潤和美國公司制度的節儲與投資的詳細研究而證實的，它的結論是，「因此，只要是收入和財富高度集中的事實存在着，就不能做到長時期的充分利用資源」。另外一個重要結論是「在現時期的收入與財產的分配方式之下，國民收入必須以適當的速度使之增加，否則就會低落下去。二者之間沒有折衷的辦法」。另一官方的研究，關於技術科學對於美國經濟的影響問題也得出了同樣「革命」的結論。它的中心論題是說技術進步的結果，一方面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另一方面刺戟財富的更加集中，使現社會走向經濟的「長期不平衡」和「基本的紊亂」。它否認資本主義能夠而且將要恢復其實質的平衡的那種理論。關於這一問題

做了一度詳細研究以後，該論文得出結論說，造成大規模永久失業的不平衡狀態可能要繼續下去，而且也看不出有什麼方法來挽救走向更大的技工失業的基本傾向。這一問題以下述異常挑撥性的結論成爲一個懸案了：

「另外從什麼地方能夠有新的刺激來呢？從戰爭嗎？假如戰爭的準備和戰爭的行爲能夠成爲技術排除勞動的效果之唯一適當的補償力的話，那麼下面一個命題就會成立：即只有通過戰爭，現時的經濟體系才能活動起來使其接近於充分就業的局面。」

今天，一種不平衡的狀態是存在的；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不平衡的狀態似乎還要繼續下去，而且甚至或者會變得更加顯著。一

技工的失業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屬性，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生產高度集中並有高度效能的獨佔資本主義機構的國家裏。在平時經濟中將以新的力量證實這種情形那是一定的，甚至於在像二十年代的經濟繁榮年間那樣的生產水準相當高的時期裏也是如此的。但是因爲勞動生產率和工業效能能在戰時大大地提高了，所以這一次的影響將是更嚴重的。依據商務部的估計，假如在一九四六年美國又回到了一九四〇年的生產水準，那末失業軍將不會是一九四〇年的九百萬人，而將是一千九百萬人。

這樣，獨佔資本和技術程度，在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的各種條件的準備上，當危機到來時，在深化這一危機和阻滯經濟復蘇上，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戰時和戰後繁榮期間大大強化了的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大量的（特別是工業品的）生產過剩，而尤以重工業產品爲然。這就是戰時擴張與缺乏足以補償戰時市場之損失的經濟和政治的因素所預示的主要危險。

戰時擴張的性質是這樣的：戰爭的緊急狀態一告結束，就準備一次生產的急劇下降。戰時產量的激增是發生於一些在平時經濟中所起作用比較小的工業部門，如飛機製造業、造船業、炸藥製造業及輕金屬業等。在這些工業部門裏，從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這一期間，其產量增加了二十至三十五倍。這些在平

時經濟中只能起較小作用的新興戰時工業，約僱用了全部產業勞動力的百分之二一。

在戰爭期間，約有百分之四〇的產業工人，受僱於那些完全被改為戰時生產的基本平時工業中。這裏，擴張的速度也是很大的。機器工業的產量增加百分之三百以上。屬於這一類的，還有鍊鋼、非鐵金屬、橡皮、化學品、人造絲和汽車工業等部門，它們的生產也擴張了一百到二百。

合計起來，戰時所擴張的諸工業部門，僱用了百分之六〇以上的戰時產業勞動力，而同樣這些工業部門在五年以前所僱用的却只有百分之三〇，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工業界所增加的六百四十萬工人中，有五百八十萬人（即百分之九〇）是因金屬業和化學工業之擴張而增加的。

後面我們還要講到的，生產的大量集中和高度發展的獨佔資本都恰好發生於戰時大事擴張的那些工業部門中，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希望平時市場的胃納能够吸收等同於戰時水準的產量，那末這些托辣斯化的工業就會不顧勞動者的福利而大事削減其生產。如果沒有强有力的政府措施強迫各獨佔企業實行充分就業（這種希望確實是很微弱的），那就什麼也不能阻止不幸危機的降臨。

這樣，美國的大企業就處於很艱難的地位了。既已達到世界列強的領導地位的美國就覺得它的主要武器、它的偉大的經濟優勢是不穩固的、不安定的。和平帶來了經濟災難的前途，帶來了新的政治危機。大獨佔資本家不得不預先採取適當的措施來對付危機，而這些措施（諸如激減生產、加強爭取世界市場的鬥爭等）將必加速危機的到來。他們也不會忽視維持龐大的軍事建設的利益以吸收一些經濟餘潤和支持他們的擴張計劃。過去經濟危機的復蘇，沒有一點是得力於戰爭的準備，特別是在各侵略國家中是如此。緊跟着戰爭結束以後，美國經濟發展的情形助長了反動和積極擴張主義的危機，特別是因為在戰爭時期中發展了巨大的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

第五章 美國的獨佔資本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托辣斯國家。在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沒有像美國那樣大規模的公司，也沒有任何地方有像美國那麼多的大公司。法國是以「二百家族」的國家聞名的。美國就有更大的權利作為一個二百家公司的國家而聞名。因為美國有二百家最大的工業獨佔企業（其中許多是互相聯繫的）在戰爭結束時，一共支配着約達一千億美元天文數字的資產。一個國家的獨佔程度，不只表現於公司規模的巨大，而且尤其表現於獨佔資本對於全部經濟的控制的程度。在這點上講，美國也該列為世界上經濟最徹底獨佔化的國家。這個「自由企業」的國家，實際是一個控制着全國金融、工業、及貿易的每一重要部門的托辣斯巨頭們的國家。

獨佔的美國作為「自由」的一個偉大的代表者。面對着被戰爭蹂躪的世界至於這所謂自由是誰的自由？爲着什麼目的的自由？只要美國大公司體系作一番研究就能幫助我們解答這些問題。

一 戰前獨佔資本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的全世界內，兩次大戰中間的時期內，美國經濟力量的集中是加速地進行的。這在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卷帙浩繁的研究和調查中有着很詳細的說明。不過這裏的材料還有待於充分的分析。爲着我們的目的，只要把一些最重要的材料提出來檢討一下就够了。

我們第一個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集中的狀況，因爲這是獨佔的最一般的標誌。大企業中的製造作業部門的集中是獨佔結構的基礎。關於這個問題，在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一個專門論著「美國的工業結構」中，提供了

許多材料。那本論著並不企圖說明對許多工廠和工業部門的控制權的集中的情形；這種集中是幾個公司的互相結合和金融上種種互相連鎖的佈置所產生的結果。那本論著所研究的，主要是關於單獨的和集合的諸製造場內的物質意義上的生產集中的狀況。因為這裏所根據的多半是戶口調查局的材料，所以只包括一般公認的集中的狀況；結果總要比實際的集中狀況估低一點。正如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所指出，「至少是有這麼大的程度的集中。」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製造業中傾向大規模作業的一種銳利的趨勢。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七年間，每一製造廠（每年產品價值在五千美元以上者）的僱用工人的平均數目從三七人增加到五一人，但是大部分工人都在大製造廠中。一九三七年，在不滿六個工人的工廠中所僱用的人數，僅佔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二；而這樣的小工廠却佔全部製造廠的百分之四一。在頂層上有九百七十八個製造廠（佔全部製造廠的百分之六），每一個僱用着一千以上的工人，而這些企業裏的工人佔全部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二六。在這些大製造廠中有二百四十一家是每家僱用二千五百名以上的工人，計算起來共佔全體產業工人百分之四。

生產集中到一些最大的企業中去，促成了許多小製造業單位的倒閉。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七年間，僱用六人以下的小製造廠減少了百分之八，而僱用六人到二十人的製造廠減少了百分之二三。這些小企業數量的大批減少是在一九二九年之後，就是說是經濟危機的結果。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說：「這一紀錄中的顯著現象是在戰爭時期和最近幾年間大工廠數目的增加，及一九二九年以來小工廠數目顯著的減少。」

在一些基礎工業中，集中的現象特別顯著。在鋼鐵部門中，僱用二千五百名以上工人的五十三個工廠，佔這部門工業的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五八，而僱用一千到二千五百名工人的工廠，佔另一個百分之二三；而在一九一四年，這兩類工廠的僱工合計只佔該部門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五三。在汽車工業中，在一九三七年僱用二千五

百名以上工人的十九個大工廠佔該部門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七〇；而在一九一四年，僱用一千名以上工人的十四個汽車工廠則佔全部工人的百分之六四。在橡皮輪胎和鍋管的製造業中，僱用一千名工人的工廠所有的工人總數，在一九二一年佔該業全部工人的百分之六〇，到一九三七年已增加到百分之八四了。製造農業工具和發動機、輪機和抽水機的企業，其僱工在千名以上者，在一九一四年佔該業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二八，到一九三七年已增加到百分之六六。在航空工業中，一九三七年僱用一千名以上的工廠，佔本業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五九，而一九二九年却只佔百分之二四。

跟這種大工廠數目的增加同時並進的，是某幾類企業中的製造作業的進一步的完整化 (integration)。戶口調查局供給了一些關於產業總管理機構的數字材料，所謂總管理機構的意思，就是一個單獨的資本集團控制或經營着兩個以上的工廠的一種機構。在一九三七年，有五、六二五個總管理處的集團，控制着二五、六九九個製造廠，佔全部製造業的百分之二五。它們僱用了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五一，而且代表全部製造品總值的百分之六一。平均每一總管理機構管制着五個製造廠；但是實際上控制的範圍要廣大得多，有一個總管理機構單獨控制到四百九十七個製造廠之多。這些總管理處包括着許多極大的製造業單位，但同時它們也包括較小的企業，把它們置於一個集中的作業管制機構之下。

從美國國內外貿易的獨佔控制的觀點看來，最顯著的數字材料是在同一調查報告的另一估計中。這裏分析了差不多二千種不同產品的生產，它告訴我們這些生產品被四大製造企業所控制的是佔着何等大的比例。這種分析的結果，對於生產集中的一般情況有了一個可靠的指標，並且比任何其他估計更充分地顯示了美國獨佔控制的高度。

在該調查報告中所研究的半數生產品中，四大主要企業在每一種生產品的總產量中竟佔到百分之七五以

上。這種控制包括消費品和資本品在內。這四大公司在食物一類的百分之五八種的生產品中，控制了半數以上的生產；在木材、紙張和石油類的生產中，控制了百分之六二；在橡膠和機械類的生產總量中，佔百分之九五。有許多生產品幾乎百分之百都被這四大公司所控制。在機械、橡膠和化學工業中，有百分之三六到百分之四〇的產品種類是集中到如此的高度；該四大公司竟控制了總產量的百分之九〇以上。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在每一個工業部門中，四個（或者更少）主要的產業公司直接通過製造過程至少控制着一半的生產總量。而在這四大生產集團的每一集團中，最大的集團控制着極大的一份生產。（註一）

這樣，這些統計數字主要的是表明製造業的規模和生產的集中的狀況。但是跟一些最大的工業製造廠的控制權的增長同時並進的，是產業公司的廣泛的合併和混合，而無須妨礙各個企業作為製造單位而存在的獨立地位。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這二十年間，由於製造業和礦業領域內的超紀錄的合併和攫取的結果，一共消滅了九五一八個公司之多。合併的運動也伸展到了別的產業部門。例如在一九二六年一年中，被合併的公用企業即達一〇二九家。在一九三〇年，差不多半數的工業是操縱在三大產業集團掌握裏，而另外十個產業集團則控制了約百分之三〇的工業。

（註一）這可以從下面的實例上看出來：四大產業公司中的兩家，生產百分之六二以上的全國的農業器具；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公司和克利斯勒公司（Chrysler）三家共佔美國全部汽車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九〇以上。在鋼鐵工業中，美國鋼產公司一家單獨掌握全國鼓風爐生產力的百分之四三以上，並幾佔軋鐵機生產力的百分之三六（一九三八年）。美國鋁產公司掌握着本部門工業的全部獨佔權。幾家最大的公司在工業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也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上：包括着二八六九個單獨的製造廠的五十個最大的產業公司，僱用了全部製造業工人的百分之二六的勞工，並且生產了全部製造品總值的百分之二八的貨物（指一九三七年）。這些大公司在非製造業部門內的生產活動，尙不包括在這些數字中。

歐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調查發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是一個「產業合併狂」的時期，與一八九七到一九〇三年許多巨大的美國托萊斯形成的時期一樣。一位政府的專家說，在這兩個時期內「組織大企業的熱忱是跟促進金融事業的活動和吸收新證券的投資市場的慾望密切聯繫着的」。由此而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說，「所以產業的控制是存在於高度的貨幣市場的控制中。基本的問題是從商業組織和公司企業的領域過渡到了金融界。」這個結論是跟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所作的結論相符合的；當時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期金融資本是經濟領域內的支配勢力，這是在一切主要國家內的銀行和金融事業的新的强有力的地位所證明的。

因此，在一國的工業所有權和一般的金融控制權之間，就不能劃出太顯著的界限來。大生產企業的控制權集中在一些大的產業公司中，而那些大產業公司又通過大的金融資本集團如摩爾根和洛克斐勒等集團的控制權而互相結合起來。在一些美國工業的大企業中的生產大規模集中，本身已經建立了高度的獨佔控制權，這種生產集中自身又附屬於更高度的和更集中的控制權。

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另一個調查報告顯示了工業集中控制的範圍，那個報告中所研究的是兩百個最大的產業公司的所有權問題。在一九三七年末，這二百家公司的資產總額達七百萬萬美元，約佔全部非金融公司資產的百分之四五，或佔美國全部公司資產的百分之二五。

公司資產總計的集中狀況可以簡述如下：約略計算起來，全國百分之二的股票所有人約掌握二百家大產業公司的普通股份的百分之六〇。而且這個數字僅僅表示產業控制權的實際集中情況的一個端緒，因為只要掌握相當小的一部分股票所有權，就有可能控制龐大的產業體系。舉例來說，杜邦、洛克斐勒和梅隆三大財團一共掌握着近乎十四萬萬美元的股權，但是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着資產總額在八十萬萬元以上的十五家大公司。換句話說，只要掌握不及百分之一八的股本就有充分的力量去控制整個的公司體系。

交互董事制 (cross-directorships)、取締公司制 (Holding Company)、財團控制及其他各種巧計，是金融資本集團在整個公司體系中爭取和保持支配地位所常用的手段。從基本上講，高度的生產集中和控制權的集中決定了托辣斯巨頭在經濟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大實業所建立的直接控制權，却超越了獨佔經濟的領域而伸展到所謂自由經濟領域裏去了。

從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從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以來，各種貿易協會成了大獨佔資本家把許多獨立企業和「站在外邊的」企業引進獨佔陣線裏去的主要河道。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政府統制以俱來的，是貿易協會的急速發達；而在以後的幾年中它們又伸展到一地、一州、乃至全國的一切經濟部門中去了。它們找到了一種共同計劃，那就是發動一種反對「美國計劃」下的公司組合的「開放」運動（“Open shop” campaign）和維護「產業自治」的運動，後者的意思就是每一工商業部門實行自治而拒絕政府的干涉。

「開放運動」和「美國計劃」是因危機以後公司組合的蓬勃生長而暫時地被擱置到後邊去了。那種公司組合的生長是依據著名的復興法案第七節 A 而實施的政府保護制所促成的一種發展。但同時大公司在貿易協會內的控制地位，在實施復興法案下的政府保證的卡特爾化之短時期內是加強了。依照商務部的報告，「復興法案計劃中的鎖鑰因素」，就是三千五百個較大的和一萬個以上地方性的貿易協會和商會。

復興法案條例中有關卡特爾的一些規定，曾經受到很普遍的注意。在復興法案存在期間，復興管理局批准了八百七十四件關於調整工商業的條例。這些條例的執行權完全操在貿易協會的手裏，並且是在每一部門的居支配地位的生產企業控制之下執行的。所有這一切條例都是調節商品銷售的種種條件的。其中大部份包括着直接和間接統制物價的條款。也有許多條例是為某一特殊部門的各個公司劃定市場範圍的。又有一些條例規定着產量的限制和將有利的業務分配給各個公司。這些條例在效果上加速了卡特爾化的過程，亦即在一定程度上

部門內是小企業服從所謂「領袖」企業的過程；這種過程在那次經濟危機時期是表現得特別顯著。

在最高法院宣佈廢除那些卡特爾條例的時候，它們已經在那些貿易協會上留下了永久的卡特爾式的印象。其中有許多條款是通過政府的節制而在大公司對於貿易協會的直接「自治」之下，在某種形式上繼續發生作用。整個的結構變成更密切的結合並且更有效的受「領袖」企業的統制。站在全部實業協會結構的頂點上的是全國製造業者協會，直到戰爭時期關於政策問題的裂縫暫時地發現在大實業界裏的時候為止，全國製造業者協會無疑的能夠搜集充分的證據來支持它的主張，說它是唯一的能夠代表美國實業界利益的組織，也就是說代表美國實業界的獨佔領袖們的唯一組織。全國製造業者協會內部實際上決定政策的集團就是它的特別評議委員會，後者是由一些最大的獨佔企業的代表們所組成的。(註二)

全國製造業者協會的一個分枝，全國實業會議(National Industrial Council)，集合着全國最重要的僱主協會和貿易協會，而為全國製造業者協會所控制的。一九四〇年該會會員包括三十五個州實業協會(其組織形式仿照製造業者協會)，一〇七個僱主協會是處理產業勞工關係的，以及九十二個全國性的製造商協會(包括輕重工業中的一些領導協會)。勞勃特·布拉第(Robert A. Brady)在他關於貿易協會的研究報告中說：「在這種或那種的代表方式之下，全國實業會議的會員成分大概近於美國全部製造業的百分之八〇。而其餘的百分之二〇，除了極少的例外，都是由小規模的和比較不重要的公司所構成的。」全國製造業者協會的另

(註二) 該特別評議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每月舉行會議一次；自最初成立時起即包括貝特利漢鋼業公司、E·I

·杜邦·德尼摩公司、通用電業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固特異輪胎公司、國際收割機製造公司、伊爾文信託公司、紐佳色標準石油公司、美國橡膠公司及威斯丁豪斯製造業公司等。一九二五年又加入了美國電訊公司，一九三四年加入了美國鋼產公司。

一產物是全國產業評議會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個替大實業界做研究和宣傳工作的機關。與它相聯繫的及有合作關係的機構中，有航空團和海陸軍的軍事情報部及兵工部等。

二 戰時經濟中的獨佔資本

在戰爭期間，獨佔資本家不僅增加了他們對於全國工業生產力（包括政府斥資創辦的新工廠在內）的控制，而且還積累了驚人巨大的利潤和後備資金。雖然一些中小企業也獲得了過分的利益，但是跟獨佔巨頭們的厚利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了。

戰爭所需要的一切基本生產早就集中在一些領導的托辣斯手裏。一些新的軍事工業，如航空、爆炸物、輕金屬、人造橡膠等部門，是被原有的汽車、化學、石油及其他部門的獨佔事業所承辦了。一個應運而生的戰時產兒，如亨利·凱塞 (Henry Kaiser) 康拜因，能夠隨處排擠一些原來的企業，特別是在如造船業和航空業這類戰時繁榮的工業中。但是大實業的壟壘却始終鞏固非常，不受新興事業的侵犯。

政府的戰時定貨合同，一些最大的獨佔企業佔了絕對的大部分。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這一時期內，全部政府定貨合同的百分之七〇為一百個公司所有，其中許多公司是有相互聯繫的。在同一時期內，在一萬七千個以上的工廠投資總額二百萬美元中，政府供給了百分之七八。舉例來說，通用汽車公司接到了值八十五萬美元的軍事定單，並且至少開設了一百所新廠及擴充了舊廠。通用汽車公司的大股東杜邦所有的工廠新設備總值達十萬萬元以上，但杜邦本身則佔了其中的百分之五。鋼鐵托辣斯在設置新廠和新設備中也得到了約十萬萬元的政府資金。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由平時生產轉變為戰時生產的最初時期內，一些最大的公司發了狂財。在這十個月中間。軍事定單總值達一百三十萬萬元之鉅，這個數目超過了一九三九年美國全部工業生產所增加的總值。在全部定貨合同中，百分之四五是供給六個有密切聯繫的公司集團；而隸屬於幾個互相結合的康拜因的六十二個公司，得到了全部合同的百分之八〇，後來，軍事定單的分配狀況僅僅稍微好一點，因為當時規模較大的產業拒絕進一步擴大生產，而政府也採取了一些吸引小公司從事軍事生產的措施。但是主要的分配比例並無很多變化。

在每一個機會，大獨佔資本家從事很熱烈地保衛他們自己的利益。參議員奧麥霍尼 (O'Mahoney) 在戰前曾經主持過獨佔事業的調查工作的，對一個參議院委員會說過以下的話：

不論在鉛產或橡膠或鋼鐵或石油等生產中，許多參加大批軍事定貨生產的大公司，都已盡了它們能力所及的一切，去阻止可能在戰爭結束後跟它們競爭的那種企業的設立。

尤其對於政府斥資創設新工廠的場合是如此。聯邦投在新工廠上的資金約達一百五十萬萬美元。各大公司投於新企業的一百萬萬美元，也不能算是私人的資金，因為這筆資金是作為流動經營費用的，將在五年之內由政府償還這筆資金。設立新廠的全部經費約等於一九三九年更換一切製造廠和設備的替換價值的半數。單單直接的政府投資一項就幾乎等於那個數目的三分之一。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政府所有的工廠至少約佔現有實際工業生產力的百分之一五，甚至於也許接近百分之二〇。政府所設立的工廠，半數由三十一個大公司所進行，而一百五十個大公司進行了百分之七七。

通過它們對於政府工廠的管理，這些大公司就有方法決定新的生產力的最後處置權，並且保持它們的獨佔地位。舉例來說，雖然社會上普遍的非難鉛產托辣斯，阿爾科 (Alcoa) 仍舊能夠完整的保持它的地位，並且

保證它在戰後的獨佔地位。鋁的生產在戰爭期間增加六倍。其中半數是阿爾科所屬各廠所生產的，而其餘大部分則為政府斥資設立而由阿爾科管理的一些新廠所生產。政府的國防製造公司 (Defense Plant Corp.) 投資百萬美元於新辦的鋁工廠；這些新工廠的百分之九六的鋁產操在管理者阿爾科的手裏。因為阿爾科曾經深恐戰後生產過剩而拒絕增加鋁的生產力，以致造成鋁產的缺乏而威脅到整個航空業計劃的破壞，因而在設立新廠來增加生產。

凡能增加非阿爾科系廠的生產的新的原料和新的方法，都被堅決地拒絕採用。阿爾科在加拿大的姊妹公司阿爾坎 (Alcan)，也從當時商業部長兼五金貯備公司 (Metals Reserve Corp.) 首腦吉士瓊斯 (Jeese Jones) 方面接受了很有利的定貨合同。新工廠所在的位置或是很不利於它們戰後的活動，或是使它們的處理權自動地在讓給阿爾科。因此，鋁產托辣斯在戰爭期間能够保持它的完全獨佔的地位。

人造橡皮工業是完全在政府保護之下發展起來的。一九四四年，它的每年生產量是八六五、〇〇〇常噸 (long tons)；這個數目大大的超過了美國的橡皮需要，而幾乎等於最近幾年和平年份的全世界的天然橡皮的產量。這個高度專門化的新的鎖鑰工業是政府斥資創辦的。在兩大人造橡皮企業 *Bunars* 和 *Burys* 中，私人資本是一分錢也沒有的。約值六萬萬美元的政府設立的橡皮廠，是國防製造公司所掌握的。這個工廠是由一些有興趣於橡膠原料或製成品的大公司代為管理的，這裏包括石油提煉公司、化學公司和輪胎製造公司。當參加這一新的人造橡皮工業的一切公司都認為處理的辦法對它們有利時，此項生產的專利權才依以下的條件而轉移給政府，即戰爭結束後這些專利權應只歸給戰時跟政府合作經營過這一生產的那些公司。

那些有興趣於橡皮的主要大公司，是立於決定這一工業的最後處置權的地位的。這對於美國托辣斯是打進舊的殖民帝國市場和投資領域中去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在戰前，所有的天然橡皮實際上都出產在遠東，大部

份出產於荷屬東印度與馬來亞。美國所消費的天然橡皮超過全世界消費量的百分之五〇，有時甚至於達到百分之六〇。天然橡皮的生產曾為英國、荷蘭、法國和暹羅諸國政府所設置的橡皮卡特爾所控制。美國的托辣斯大王們依靠他們對於美國人造橡皮工業的控制權，現正圖打破這種天然橡皮業的獨佔局面，並取得這一產業部門的一部份控制權。不論是充分利用也罷，或是讓一部分站在一旁也罷，他們是把這一產業當作取得東南亞和整個世界卡特爾結構中的新利益的一個據點看的。

大產業公司通過對政府軍事工廠的管理和它們自己的研究實驗場（由國家斥資擴充的）而掌握有關軍火生產之猛進的許多技術和科學的發明。除人造橡皮外，其他重要的新物質如塑料（*plastics* 亦譯膠狀物——譯者）與綜合化合物（*synthetics*）等也被發展起來，實際應用到工業中去。政府保證的工業研究引起了生產方法和生產程序上及新製造物的改進上的許多重大的革新。私人的獨佔企業可以利用或保留到將來利用如電子學、交通工具和放射推進法這些重要領域內的戰時成就的知識。意義最重大的戰時科學發見是在原子能方面；它的偉大的創造力和可怕的破壞力，是其他任何近代發見所無能比匹的。在這方面，一些獨佔的大企業公司也仍處於「基層」的地位（意即控制、支配或操縱——譯者）。

亨利·斯密司（*Henry D. Smyth*）在其關於原子彈的正式報告——「軍用原子能」報告書中，提到了二十多家大企業公司，直接從事原子彈某一方面的研究和製造。杜邦化學托辣斯跟原子彈的設計，有最密切的關係。一九四二年底以來，杜邦和芝加哥大學的冶鍊實驗廠共同擔任製造鐳（*plutonium* 亦譯普魯多寧，是製造原子彈所需用的一種分裂物質——譯者）的主要責任。由格羅佛斯將軍（*General L. R. Groves* 是負陸軍設計工作之責的）的介紹，杜邦被選定擔任鐳的生產所需的一切便利條件的創設工作。它在田納西州橡樹嶺（*Oak Ridge, Tennessee*）地方建設了一個小規模的工廠，並且在華盛頓州漢福特（*Hanford*）地方建築和經營了

一所大的製鑄工廠。杜邦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做了研究部和工程部的幹部人員。該托萊斯所聘用的一些機要的技術人員，會「借給」冶鍊實驗廠使用，而所有關於鑄的研究工作是都集中在這裏的。依據官方的公報，關於普魯多寧的一切重要的研究材料都會報告到杜邦公司去的；而從事於這方面工作的各實驗場則須供給杜邦以任何它所要求的消息或知識。除普魯多寧的研究和生產外，杜邦公司的人也參加從養化物產製純鈾金屬的工作，改進觸媒劑和連鎖反應鈾電堆（chain-reacting pile這是引起和控制原子分裂的所在）所需之新冷凝劑及滑潤劑的工作。

別的大企業公司也參加其他方面的重要工作。例如蒙賽篤化學公司（Monsanto Chemical Co.）的一位代表擔任了鑄的化學和冶金研究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把芝加哥大學實驗廠的工作跟洛斯·阿拉摩斯（Los Alamos N.M. 原子彈本身就在這裏製造的）的工作結合起來。威爾斯頓廠則從事於鈾養化物的純化工作及產製純淨金屬——到一九四二年底，已供給了六千磅以上的鈾。該廠也從事於鈾的同位素之高速度離心分離的工作，并與通用電氣托萊斯共同供給電氣裝備和控制這一事業的各個部門。跟這個原子彈製造計劃有關連的另一大公司是標準煤油公司；它的開發公司所屬各實驗場，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掌握了靠離心過程以分離鈾的試驗工作。標準煤油公司的科學家又監督了加拿大重水廠的建築工程。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 Carbon Corp.）則主持氣體散佈廠的工作，同時亦參加原子彈設計的其他部門的工作。

這樣，這種不讓我們偉大的戰時盟邦知道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却都被那些戰前跟德國托萊斯維持密切的卡特爾關係的大企業公司所利用了。許多的卡特爾合約，如前一章中所指出的，特別規定關於交換情報的各項協議，在戰後均予一一恢復。

與杜邦及其他公司所訂的合同，雖亦特別規定在原子彈設計過程中所得的各種發明專利權應屬於政府，可

是這些大獨佔企業却已在實驗和產製的耗費最大的初期階段上自己已不費分文而獲得了如何製造的各種知識。在現狀之下沒有東西能够阻止它們利用這些知識去發展它們自己在原子能方面的製作方法。至關於和平時期原子能的利用，它們現已控制着這一新的技術科學部門的全部，並握着力、熱、工業、運輸、醫藥和科學各方面的各種偉大的可能性。爲着實際應用的目的，它們有權決定如何把原子的分裂及其結果應用到這些領域裏去，或者把秘密收藏起來，來保護它們在既有產業中的投資。

在戰爭期間，集中的過程是大大地加速了，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這最明顯的表現在許多大工廠所僱用的工人數目的增加上。一九四三年，僱用一千以上工人的大工廠在製造業、採礦業和建築業的全部工業中佔百分之四五，而一九三九年是僅佔百分之三〇，許多的這些大工廠是處於單一的所有權或控制權之下的。這些數字或者是被其他的統計數字更能够動人，它們顯示着獨佔資本的權力在戰爭期間是如何的伸張，並且表明了獨佔資本對於全部經濟和就業的支配力量。

更有一層，戰時生產的擴張只限制在東北及中央北部諸州的舊工業區域內。在非工業化的地區內偶然出現一個新工廠，雖然激起了一般人的熱忱，但是要企圖把這種地區變成工業化誠然是過早的。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新工廠距離尋常的工業和運輸中心很遙遠的，早就決定在戰爭一結束後立即予以淘汰的。戰時生產局報告說：製造業中心戰後將依舊留在戰前的地區，而生產集中在少數大都會區域的程度，在戰時並未減輕。在一七九〇個原來的製造業中心佔有新工業生產力的百分之九三，而這些地區在一九三九年佔有百分之八四的全國產業工業。

當我們想到一些大公司的驚人的戰時利得和它們在戰爭期間所積累的龐大的儲蓄時，戰後它們要求提高物價、降低工資和減輕捐稅等運動，簡直可以算是無恥的掠奪國家的行動。在戰爭期間，雖然增加了戰時利得稅，

但是產業公司的純益在納稅以後是從一九三九年的三十萬萬增加到了在一九四四年的六十四萬萬。在五年戰時生產期間，利潤總額達二百七十萬萬美元以上。在這些年份內，利潤率從百分之六·三提高到百分之一·六。所有產業公司的生產資本增加一倍以上，替戰後復員造成了一種巨大的準備力。一九四四年底，這些大公司除了三百一十萬萬元現款和政府債券以外，還積聚了約達二百五十萬萬元的借給國庫的債權。採取股份利得稅的形式，作為在戰後利潤落到一九三九年的平均水準以下時補償損失之用。根據聯邦準備局的報告，一九四五年底，產業公司的流動資金共達四百七十萬萬美元。

產業公司的如此龐大的資本積累還要補充以同樣龐大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資本集中，這些資本也是用來幫助工商業的資金週轉的。一九四四年底，美國二十個最大的商業銀行存款總額達三百九十萬萬元，約佔全國一萬四千五百家銀行存款總額的百分之二八。

戰時定單的集中在少數大公司之手以及物資和勞動的缺乏與徵用都有使小企業加速淘汰的作用。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參議院的小企業委員會報告說，一九四〇年以來已經倒閉了近乎五十萬家的小企業，約佔全國企業的六分之一。在商業領域內被消滅的情形非常嚴重，而許多小規模的生產企業也受到很大的影響。由於美國生產規模非常巨大，所以僱用工人在五百名以下的工廠是被當作小企業看的。這樣的工廠約有十六萬五千所。在一九四三年間，僱用五百名以下工人的企業，僅得到陸軍的軍事定貨百分之一三，海軍定貨合同的百分之八和航海委員會定單的百分之一。靠着這樣小的定貨份額，許多的小企業，尤其是其中最小的一些，當然不能够生存了。

好些政府機關對於規模最小的製造廠（僱用工人在一百二十五名以下者）的專門研究指示出來，它們的生產總量在戰時依然停留在一九四一年的水準上，但是其中最小的一些工廠的產量在戰爭時期反而下降了。這些

政府機關所研究的實例是代表包括一切工業部門的六萬二千家企業的狀況。僱用工人在七名以下的小工場，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份的生產量要比一九四一年一月份減少百分之三五。僱用八名到二十名工人的小工廠的情況稍微好一點，它們的生產量在同一時期內只減少了百分之八。僱用從二十一名到一百二十五名的工廠，它們的產量和產品價值都有增加，凡是增加的比例要比全部製造業的生產增加率低得多。

很明顯的，這些小規模企業所得到的戰時擴張的利益是比較小的。這裏所調查的全部小企業的百分之五八，從事某些軍用品的生產；而只有百分之四四的小工廠，其軍用品產量佔其全部生產的半數以上。從這許多小生產企業的生存前途上講，這些數字是表示什麼意思，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上得到答復：即百分之三二的小製造廠或者沒有希望把它們的事業維持在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二年的那種狀況中，或者它們就得宣告倒閉。一般的小企業也沒有必要的復員資金，使它們能夠形成一種足以抵擋大公司壓迫的那樣的規模和復員速度。

三 幾點結論

經濟權更大的集中於獨佔資本家之手的這種基本傾向，是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有的，但在美國發展得特別快。這種傾向的發展，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加速，尤其是因三十年代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加速。

美國經濟的主要特徵，跟其他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比較起來，是在它的生產的巨大規模上。這特別是表現在美國托辣斯和獨佔企業的可怕的權力上。美國的大產業公司巨頭不僅在本國的全部生產中佔着很大的一份，而且資本主義全世界的生產也佔着可觀的一份。「自由的」或非獨佔的經濟部份被獨佔資本控制的程度如何，姑置勿論，所有托辣斯化工業的產量和它們的實際的或潛藏的生產力，是佔着全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產量和生產力的決定部分。

這種情形產生了美國獨佔資本的國內和世界地位所特具的一些重要的形相。

美國的托萊斯能够競爭得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最大的生產企業；而且在許多場合，它們甚至於能够跟好些國家的組成卡特爾的那些最大的獨佔企業相競爭。德國的和日本的獨佔資本的削弱或被控制，英國和法國的經濟衰落，加上美國獨佔資本在戰爭時期進一步的發展，大大的提高了美國托萊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比重。

利用這種良好機會的企圖，繼承戰敗國家的獨佔資本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及吸收或排斥被戰爭削弱的國家的各種產業組合的企圖，是美國侵略性的和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的推動力。這種政策的具體面貌之一，就是政府的反卡特爾計劃，而這種政策是跟產業界和金融界的大獨佔集團的利益相符合的。這些獨佔集團不再滿意於戰前的世界市場和勢力範圍的劃分。而要努力爭取全世界範圍內的一種新的部署，而使美國托萊斯能够佔據支配的地位。

獨佔企業的大量的過剩資本的戰時積累，本身就是對向外擴張的一個強大的動力。當大資本家們用一切力量來維持極高度的戰時利潤率（主要的方法是壓低工資和膨脹物價）時，國內有利投資的範圍將日趨縮小，因而利潤率就將下降。比較有利的投資場所將從國外去找，特別從經濟落後的國家去找，因為那些地方的利潤率是比較高的。這樣的一種運動會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美國的資本輸出超過了其他一切資本輸出國的資本輸出之總和。今天美國獨佔資本家所掌握的資本，比本世紀二十年代向外擴張時期要大得多，而且這種資本現在比當時的集中程度也高得多了。對於在美國的和一切其他的勢力範圍內的經濟擴張的壓力，今天同樣的比當時來得大。

戰爭期間流行着各種的理論，認為這種資本將被利用來提高美國人民的生活標準；這種理論忽視了一個簡

單的真理：即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的利用是被利潤法則所支配的。列寧在其「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當資本主義依然照現狀繼續存在着的時候，剩餘資本永遠不會被利用來提高一個國家的人民大眾的生活標準的；因為如果這樣的話，資本家的利潤就要下降了。這些剩餘資本將輸出到落後國家去以達到增加利潤的目的。」

美國經濟中的「自由」部分或非托辣斯化的部分，是在繼續日益落入獨佔資本的控制之下。這一過程是無疑地因戰爭而大大的加速了。但是這種發展的情況在美國較之在英國有着一種重要的區別。因為龐大的生產是在托辣斯的直接控制之下，一些大公司巨擘就能够保持經濟的支配地位而無須依靠大規模的政府干涉之助來迫使小生產界加入卡特爾。

那些獨立的企業，主要的是大半通過合併和通過貿易協會以實行「產業自治」的方法（而只有很小限度的政府干涉），來被帶進到獨佔資本的控制之下。除了農業和短短的新政（N.R.A）時期（這是經濟危機的產物）以外，美國政府經濟統制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像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統制那樣的完密和廣泛。有許多的戰時統制是不利於小企業的，這些統制也未趨向於形成一種政府管制的卡特爾，如像英國的情形那樣。

無疑地，反托辣斯的法律在限制國內的卡特爾和促成統一的大公司的形成上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些大公司支配着一種充分大的產量使自己能够只用最小限度的卡特爾控制就能掌握到市場的控制權。但是這並不是一個主要因素。

美國的生產規模，從最初起就利用新式技術並需要大量的資本；這樣的規模是易於促成大企業的形成和高度集中的公司控制權。利用那些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而建立的大規模的工業組合，在美國工業化的早期中

就已發達。現代企業的大規模生產也助長了生產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給了美國獨佔巨頭們在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競爭的極大便利。在這些情形之下，政府支持的經濟卡特爾化，對於美國的托辣斯並不是一種迫切的需要（除經濟危機時期外）。

特別是由於戰時擴張期間獲得了新的利益，美國的獨佔巨頭們在本國國內是力量強大無比，而對於外國獨佔資本他們又處於有利的地位，所以他們要避開可能限制或阻礙他們活動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涉。那些巨大無匹的「自由企業」絕對不需要人家去干涉它們在國內外的活動自由。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成了保障這種自由。

美國經濟是被托辣斯所支配，但是中小企業仍然佔有相當大的一份生產。跟直接受托辣斯控制的生產量比較起來，那麼非托辣斯部分的產量是很小的。但是跟別的國家的類似的企業相比較，那麼美國的許多所謂小企業，也可以算是大企業了。這些獨立的生產事業反對大獨佔資本家的併吞或消滅，經常地努力逃避托辣斯所企圖加於它們的控制，它們就成為美國反托辣斯運動的一種力量的泉源。從這一泉源發生的壓力，在政府的政策上也留下了形跡，即如羅斯福總統的反托辣斯法令和反獨佔的計劃上所表現的。

但是這不應該和政府與托辣斯的反卡特爾的要求混為一談，因為這種要求目的是在反對外國控制的卡特爾。可是中產階級的反托辣斯運動却也替美國擴張主義計劃所特殊的蠱惑手法提供了一定的基礎。美國的托辣斯借「企業自由」及一切其他的經濟自由的美名以實行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而這些自由也正是跟國內托辣斯的霸權作鬥爭的那些獨立生產家很久以來所寶貴的。因此，在政府的政策中，混合着傳統的中產階級的反托辣斯要求和托辣斯巨擘們的「反卡特爾」要求的意味。這就幫助我們說明美國的擴張主義計劃的民主色彩，然而這種計劃本質上却依然是代表獨佔資本利益的計劃。

第六章 英美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削弱了英國，加強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從本世紀初以來，英國的衰落和美國勢力的增長，已經可以看出顯著的傾向。這次戰爭加速了世界列強關係上的這種重大的變遷。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已不再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潛伏的主導國家了。不論在政治的意義上，或在經濟的意義上，它已經在積極地表演這種主導作用，儘管這種發展有時因外交政策的不相適應而模糊起來。雖然一些政治的考慮把英美兩國拉在一起，但它們中間的矛盾同時又使它們背道而馳。

軸心國失敗之後，世界上頭等的資本主義列強就只剩英美兩國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已經大大地簡單化，因為主要競爭的數目已經大為減少，主要的只剩英美兩國間的矛盾了。但是矛盾雖已簡單化，它們同時却變得尖銳化了。

美國的企圖是想掌握到跟它的力量相稱的世界領導地位。英國則企圖突圍和保護它過去所爭得的地位，而反對美國的吞食政策。一些附屬國家和次等的帝國主義國家則傾向於圍繞在某一大列強的周圍作為它們的衛星國。甚至於英國本身也有變成美國「小夥計」(Junior partner)的危險。

一 戰前不列顛的衰落

英國經濟的衰落，根本上是由於它的工業的停滯不進，而那些工業新興國家（主要是美國和德國）則發展美國在一九〇〇年的工業生產已經趕上了英國，雖然超過得並不多。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

却遠遠地走在英國前面了。在這次大戰前夜，美國的生產總值等於英國的兩倍半。（註一）甚至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美國工業的新擴張以前，英國已經開始從美洲的市場（這是世界最大的市場）被排擠出來。

同時，德國的興起對英國造成了一個更直接的威脅，因為德國國內市場的消納量較小，尤其是因為德國的製造業是專門為供應歐洲和殖民地市場而生產的；這時東方的日本也開始加強對殖民地市場的爭取。雖然競爭日趨劇烈，英國却還能保持它在世界貿易上的主導地位，以及世界債權人和投資家的地位。同時它也保持着它的殖民帝國和海軍國的領導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中，英國的工業生產開始停滯起來，而其他列強，尤其美國的生產機構繼續不斷地在擴大。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九年，美國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七〇，而英國的生產却減少了百分之一。（註二）英國從前是工業革命的可驕傲的領導者，這時却已變成技術上比新興工業國家落後了。

列寧當年在所指出的帝國主義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的各種特徵中，有寄生性和腐蝕性兩種傾向，這些傾向現在變得更顯著了。流入奢侈工業中去的投資愈來愈大了，而基礎工業中的投資却有劇烈下降的趨勢。同一傾向甚至在世界經濟大危機期間，也仍繼續發展（註三）。當國內的生產機構這樣衰敗下去的時候，英國的上層階級就愈來愈要依靠從海外得來的息金收入。

（註一） 鋼的生產超過英國四倍，生鐵超過三倍，棉花的消費超過一倍半，煤的產量幾乎超過兩倍。

（註二） 參照瓦爾加與門德爾松對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之補充材料。

（註三） 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這十年間，英國只有二千七百萬鎊的資本投入鋼鐵工業、五金工業、機械製造業及煤礦工業等部門，而在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三這十年間，這些部門的投資却達四千二百萬鎊。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這五年經濟危機期間，投入基礎工業的資本僅六百四十萬鎊，而在啤酒事業中的投資達一千一百五十萬鎊，戲院、旅館及類似企業中的投資達八百二十萬鎊。

上世紀末，英國從國外投資上的收益已經達到一萬萬鎊，超過對外貿易的收益五倍。至一九二九年，海外的息金收入超過三倍，達三萬七千五百萬鎊，超過國外貿易的收益達七倍之多。（註同二）

國內工業停滯的結果，出口貿易就衰落了。由於英國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比任何其他工業國家都大，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就日益降低。一九三九年，歷來成爲英國對外貿易中的主要項目的紡織業生產，跌落到了僅及一九一三年生產水準的五分之一；在這期間，全世界紡織品的消費却約增百分之三五。一九三二年，煤的輸出約及戰前水準的一半，生鐵輸出不及戰前的五分之一。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三三年間，英國全部輸出額跌落一半以上。

同時英國在對外貿易上對於帝國各部分的依賴也日益增加。在英國全部出口貿易中，輸往帝國領域的部分在一九一三年佔百分之三七，至一九三一年已提高到百分之四四；但在同一期間，從帝國各部分的輸入在全部輸入貿易中，僅從百分之二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八·七。這樣一來，英國日益需要依賴帝國各領域來吸收它的日趨衰落的輸出品，因而帝國貿易也就日益分散到世界各地，而對於英國本身的依賴反而減少了。對於英國世界市場的最大侵犯者就是美國。（註四）來自美國的輸入額中，帝國各地所佔的份額在一九一三年是百分之二二，至一九二九年已達百分之二六；在那一年，美國已經支配了加拿大的市場；加拿大的輸入品中百分之六八

（註四） 來自美國的輸入品中，帝國所佔的份額在一九一三年是百分之二二，到一九二九年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六。在

那一年美國已經控制了加拿大的市場；加拿大的輸入百分之六八來自美國，而來自聯合王國的，則佔百分之二五。

在南非洲，英國的份額從百分之五七降到百分之四四，而美國的份額則從百分之九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在澳洲英國的份額從百分之五二降到百分之四。而美國的份額則從百分之一四提高到百分之二五。在印度，日本的競爭是很強烈的，英國所佔的貿易份額從百分之六五降到百分之四〇，而美國則從百分之三升到百分之七。

來自美國，而來自英國的只有百分之一五。在南非洲的輸入貿易中，英國的份額在同一期間從百分之五七跌落到百分之四四，而美國的份額卻從百分之九升到百分之一八。在澳洲的輸入貿易中，英國的份額從百分之五二跌落到百分之四〇，而美國的份額則從百分之一四升到百分之二五。在深深受到日本貨競爭之威脅的印度，英國所佔的貿易份額從百分之六五跌落到百分之四〇，而美國卻從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七。

杜德 (R. Palme Dutt) 在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生產困難的根源時，說明了英國過去的工業領導地位如何變成了它的障礙：

十九世紀以前英國工業的超越地位，造成了它在世界市場上，在海運上、商業上、國際金融上、資本輸出以及在殖民地擴張方面的長期無匹的獨佔地位。十九世紀末葉，一些年輕的競敵，尤其是美國和德國的工業，開始挾其現代化的技術和組織以趕上和超過英國工業，這時依然保持着的英國世界地位的勢力和全世界各地對於這個島國的大量買納，消除了英國工業實行技術和組織的現代化的任何原動力。美國和德國的工業飛奔似地向前進，英國的工業就相對地落在後面了。二十世紀的英國資本主義愈來愈變成了一個食息金的資本主義；它依靠全世界的買納和過去積聚的成果而生活，較之靠目前的生產效果為多。基礎工業和農業被忽略了；奢侈品的貿易，國內的消費工業和各種不生產的事業却不斷地在前進。一九三七年經濟上的這種退化，達到了這樣一個頂點，致被倫敦「經濟學者」周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把「國外投資」說成「國家最大的獨一產業」了。

獨佔資本的伸展造成了英國工業的技術落後性，這是我們後面還要講到的。獨佔發展的一個副產物就是這些基礎工業的生產的受限制。在鋼業部門內，許多熔爐減少了，其結果是英國的鋼產從一九二〇年的九百二十萬噸到一九三八年只升到一千〇五十萬噸，而德國的鋼產在同一時期卻從七百八十萬噸升到二千三百二十萬噸。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三七年間由於造船生產力的降低，英國造船的噸位減少了一、八六九、〇〇〇噸，而同一期間德國的造船業却增加了九二二、〇〇〇噸；英國在世界航業中所佔的份額，從一九一四年的百分之四一

降到了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二六。在紡織工業內，由於政府實行生產合併的結果，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三五年間消毀了一千四百萬個紡錘，這個數目超過了德國紡織工業的全部紡錘。杜德稱這種生產力的消毀為和平時期英國獨佔資本家的「焦土政策」。

在兩次大戰期間，英國在經濟上一個接着一個的把自己的領導地位讓給了美國。在這一時期內，美國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商品輸出國，首屈一指的資本輸出國，同時又變成了世界貨幣市場的中心。它的海軍力量也開始與英國相接近。然而主要的由於英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進一步的擴大了生產，所以英國所輸出的工業品數量仍然超過美國。而且美國的海外投資雖已擴大得很多，而跟英國的傳統勢力範圍（甚至包括希臘在內）日益發生衝突，英國却仍能維持它的國外投資地位。英國的國外投資比美國在亞、非、澳諸洲及甚至在阿根廷和巴西的全部投資要大得多。

二 戰爭時期的衰落

英國經濟地位的削弱，在戰爭前夜已經表現着很明白的日益增長的傾向，在戰爭期間這一傾向更大大地加速了。英國的生產在戰時雖然有了顯著的發展，它的工業和生產效率依然遠落在美國之後。戰時商品的輸出猛烈減退。在長時期內積疊起來的巨大的國外投資，不能不讓與他人了。沒有很久以前，英國還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債權國，現在却變成了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債務國。寶貴的遠東殖民地的權利已告喪失。帝國的鎖鏈已見削弱，而且帝國的各單位已跟美國建立了緊密的經濟關係。雖然並非這一切損失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大英帝國的削弱却是沒有問題的了。

戰爭期間跟一九三八年比較，英國的工業產量約增百分之四〇。從工業生產力的長期停滯，國內戰時的破

壞以及輸入的激減（約減百分之四十）等事實看來，上述的成績已不算小了。美國的租借物資、殖民帝國的援助和英國本土農業生產的擴張（註五），補償了戰時輸入的減少。不過生產的增加，大半由於勞工大眾的努力和犧牲，同時也由於在戰時政府經濟計劃指揮之下，各種資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英國人民的節衣縮食是提高軍用品生產的一個重大幫助。而更大的幫助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全部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即每一工人每一小時的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一五，而在軍火工業中則倍於此。這樣看來，英國戰時經濟的上揚，可以說主要的由於在一次得到工會和人民充分支持的戰爭中的各種政治力量，而多半並非依靠技術的改進和工業的擴張。從國民收入的增加的分析中，也可以發見對於戰時生產擴大的相對的貢獻：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間，國民收入增加一倍；百分之五七以上的國民收入是用於戰爭的。據倫敦「經濟學者」的估計，這百分之五七約等於國民收入的增加額全部，其來源分配如下：得自生產率的增加的，佔百分之二五；得自消費節約的，佔百分之二六·五；由於縮減私人家庭置產的，佔百分之七·七五；由於海外資本利得的增加的，佔百分之八·二五。由此看來，戰時產量的增加百分之八〇以上，可以說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國民生活水準的降低。

但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英國的生產整個地說是提高了，但是一些基礎工業的生產，如鍊鋼、煤礦和造船諸業，甚至在戰爭的第三年還停留在戰前生產最高峯之下。一些鎖鑰工業中的獨佔領袖們展望到戰後各種可能的後果，他們拒絕用以增加生產量的一切壓力，因為深怕戰後生產過剩而無利可圖。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他們宣佈鍊鋼工業的某些部門可以暫時停止生產。獲利較厚的煤礦也被保留到戰後去開採了。在直接生產軍火的那些工業中，有着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它們的生產率的遲鈍化。美國和加拿大的大

（註五）耕種的面積新增加了六百萬英畝，戰時新開墾的又有三百萬英畝。

量租借物資的源源流入，對於德蘇戰爭長期拖延的可能性的投機，無疑地促成了英國工業獨佔資本家們的一種感覺，以爲他們從此可以不必使用全部生產力了。

英國戰爭期間生產的增加，跟美國戰時生產的發展相距甚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遠不足以趕上美國的生產率。美國每一工人每一小時的平均生產量超過英國工人一倍半到兩倍半之多。在戰爭期間，英國一個紡織工業考察團，在佛蘭克·普拉特 (Sir Frank Platt) 領導下曾經訪問了美國；該團把英美紡織工業作了一番比較的考察之後，提出報告道：在紡紗部門內，英國每人每小時的產量低於美國百分之二八到四〇；在織布部門內，英國比美國低百分之五六到六七。美國有六十萬架以上的自動織布機，而英國只有一萬四千架。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即在這一英國的主要工業部門中，它是何等遙遠地落後於美國呀！普拉特考察團的報告指出英國在紡織工業的組織上，要比美國落後二十五年到三十年。

煤礦工業是英國經濟中的基礎工業，而且成爲出口貿易的主要項目，但是它也遠落在美國之後。根據「新政治家與民族」(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的評論，「戰前美國的煤礦工每天的產量幾乎等於英國礦工的四倍。」在戰爭期間英國煤礦生產也很少改進。倫敦「經濟學者」的貿易欄編者華爾特·希爾 (Walter Hill) 在一種美國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很坦白地說出了這種情形：

在資源的利用上，需要大大提高效率，已被認爲戰後英國的中心經濟問題。英國要回復到世界上一個強大的工商業國家的地位，這就是一個主要的條件。

美國工業生產率的壓倒的優勢，在戰爭期間美國所獲得的世界貿易的利益上早就記錄下來了。從這次大戰開始到一九四四年爲止，英國的輸出在價值上降落了百分之五〇以上，在分量上則降落了百分之七〇。在另一方面，美國在三百萬萬美元的租借物資輸出以外，它的商業輸出在一九四四年中期已經開始超過戰前水準。

〔註六〕「我們不但變成了民主國家的主要兵工廠，而且也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輸出國了。」——美國對外經濟管理局的一個報告書中這樣誇大地說。

據一般估計，假如戰爭期間英國在海外的舊有經濟地位沒有喪失的話，它的輸出業的衰落還不至於如此嚴重。在一九四五年的中期，根據一個英國白皮書的報告，約佔英國國外投資三分之一的海外資產，共值四十五萬萬美元的價值，消耗到戰爭的需要上去了。而在那時，這種消耗還沒有告終。假使在這個數目之上再加以德國佔領區域內英國財產的破壞，則差不多英國投資的半數至少是暫時地喪失了。國外資產的出賣，包括着一些歷史悠久而獲利豐厚的投資（如在非洲的金礦股份、印度的鐵路權益和茶場、以及美國產業和加拿大產業中的股份）的轉讓。（註七）

英國的經濟地位由於這些損失而受到嚴重的影響。第一、英國海外股票紅利的收入在這次大戰以前超過它的對外貿易的利得好多倍，但在戰爭結束時至少喪失了一半。第二、這些海外經濟地位的喪失，使英國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處於極大的不利地位，特別是在目前遭受美國侵入的那些帝國領域和傳統的英國經濟勢力範圍內。第三、由於海外利得的重大損失（這種損失不僅包括股票紅利，也包括貿易有關的航運事業和金融事業的

〔註六〕 在一九四三年，民用商品輸出的價值達二、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每年平均對非軸心控制地區的輸出價值爲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但在一九四四年前六個月中，美國的商
品輸出已（按一年計算）高於戰前對一切地區——包括後來被軸心國割去的那些地區在內——的平均輸出額，而且每年的輸出率還在不斷地提高起來。

〔註七〕 在印度、緬甸和中東英國所出賣的資產達十四萬萬美元，單單印度一地就佔十萬萬以上；在澳洲、新西蘭、南非洲和愛爾蘭，達八億一千萬元；在加拿大，達九億另五百萬元；在南美洲是三億八千五百萬元；在美國，達八億二千萬元（對建設銀公司的抵押借款不計在內）；此數幾佔英國在美全部投資之半數。

利得)，英國要恢復它的戰前貿易水準就感覺到極大的困難，因為它在對外貿易上的大量入超，大部分是靠這種收入去抵償的。外國的貢納既經猛烈的削減，英國的產業現在要來供給大量的輸出以抵償英倫所需要的原料輸入，可是它的技術落後成了一种更嚴重的障礙。

英國處境的嚴重到了何種地步，也可以從另一事實上看出來：除國外資產的重大損失以外，英國還對它的帝國各部分負了一大筆債。英國各自治領，印度及其他英帝國各單位，由於供應戰時物資的結果，它們在倫敦銀行裏都有鉅額的英鎊存款結餘。據估計，這類存款連同其他借款，在戰爭結束時共計已達一百三十五萬萬元，而且還在繼續增加中。這個數目差不多等於戰前英國全國的純國民收入，而大大超過了現在留在英國手中的全部國外投資的總值。（註八）這些存款加上其他形式的借款，都意味着對英國的種種要求；此外還有由租借物資而發生的其他負債。

英國現在的情況要藉擴大對外貸款來恢復它過去的貿易利益還遠得很，相反的，它自己還得向美國借大債呢。這種情形劇化了經濟的競爭，英國企求增加其工業品輸出的那些對象，正是它負有債務而且它需要輸入工業原料的那些國家（包括它的附屬國）。可是恰正在這些地域內它遭遇到美國經濟擴張主義的挑釁。美國企圖通過對英的大借款來侵入到英國的舊的和現在已難掌握的勢力範圍中去。

英國主要地想用一種堅決的輸出上的努力，就是說，用為恢復和擴張它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的努力，來恢復它的經濟地位。英國的各種政治傾向的經濟學者都支持這種努力。戰爭期間，英國航空工業部長，工黨領袖之一克里浦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曾經指出，英國的生產遲早會消除龐大的外債，這就是說把輸出

（註八） 單祇印度一國在倫敦的英鎊存款結餘至少達三十萬萬美元；埃及約達十萬萬元；愛爾蘭達五億八千萬美元；其他較小的但亦可觀的結存數額則屬於大英帝國的其他單位及阿根廷、巴西、烏拉圭、葡萄牙等。

貿易的價值提高三倍。他寫道：「這意思就是說在輸出市場上需要一種審慎規劃的極大的努力，在這裏要把我們一切的技巧，我們對於消費者的需求的適應能力都運用出來。我們不能僅僅恢復到我們的戰前工業狀況，因為我們知道那種狀況曾經證明不能夠產生高度的效率，也不能夠在輸出市場上跟我們的勁敵們的最現代化的機械和組織相競爭。」

從戰後市場的觀點來看，那大部分供應英國和英帝國的租借物資，對於美國有很大的利益而對於英國却是不可避免地不利的。有了租借物資，英國在戰爭期間就沒有必要去推遲輸出以抵償輸入，其結果就遲鈍了英國的戰時輸出。在另一方面，美國却從租借法案的執行上得到了許多利益，因為它藉此擴大了它在戰後世界市場中的份額。租借物資在許多市場上產生了很大的廣告效果，而那些市場在戰前跟美國貨的接觸是很輕微的；它們在許多舊的市場上開闢了新的路線。在各個自治領和英帝國的其他部份內，它們的戰時工業化大半是依靠租借物資來進行的，而這就必然產生一種鼓勵這些地區戰後向美國購買的效果。美國商務部所編就的一個研究報告中說：「研究一下私人貿易能夠跟隨租借法案把美國商品引進英國範圍內去達到何種程度，這是很有興趣的一個問題。」

在另一方面，租借法案的計劃也給了美國一個擴張它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的有效工具。在租借協定中，關於償還租借物資的問題，僅僅只有一些很籠統的條款，例如第七條裏寫着：

接受租借物資幫助的國家，爲了報答這種幫助所應給予美國的利益的最後決定中……所規定的各種條件應當以不阻礙兩國間的商業而促進雙方相互的經濟關係和改善全世界的經濟關係爲宗旨。

雖然這個協定免除了貨幣和商品的償付，但並不取消償付本身採取「給予美國以某種利益」的形式。這一規定使美國處於一個確定「經濟關係」和「改善全世界經濟關係」的具體辦法的決定地位，它就可以考慮充分

抵償租借物資的辦法。

三 大英帝國的削弱

英國經濟的衰弱，加上戰爭期間所發生的或由戰爭所造成的政治變遷，鬆弛了英吉利和帝國各組成部分間的紐帶。這不是說大英帝國的完全分離在戰爭結束時已經見諸事實。但是在兩次大戰中間的若干年內即已開始發展的帝國內部的離解過程，是已經強化了。

在各自治領內，特別在加拿大和澳洲，工業化的速度在這次大戰期間已大大地提高了。戰爭的幾年間加拿大工業的擴大，若在平時的正常條件之下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做到。它變成了聯合國中第四位戰時供應品的大生產國。但如因此便認為加拿大已經變成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強國，那是錯誤的。

當戰爭爆發時，加拿大工商企業全部投資的百分之一八控制在美國人手裏。單在製造業中，這種百分率甚至於還更大些，足足有三分之一的工業投資為美國資本家所掌握；而在採礦和冶煉兩部門內，這一比率竟達到百分之三八之高。加拿大來自其鄰居美國方面的投資，遠超過來自英國的。在一九三九年底，加拿大的全部外人投資共計達七十萬萬美元，就中美國佔四十二萬萬，而英國資本家僅佔得二十五萬萬元。美國公司掌握了百分之八〇以上的加拿大汽車生產和半數以上的電器、橡膠品及非鐵的金屬品的出產。大概有百分之四〇到五〇的化學品、機械和非金屬的礦產，也控制在美國人手裏。戰爭期間，這種關係發生了變動，但是變動得更壓倒地有利於美國，因為英國投資者被迫而出讓他們在加拿大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股票，而政府和私人在軍需生產企業中的投資，却大大地增加了美國的份額。

加拿大的戰時工業擴張，大半發生於美國公司所控制的那些工業部門中，如航空工業、汽車工業、交通器

材和鉛產等部門是。這些工業中所發生的質的變化，對於加拿大經濟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這次大戰以前，這些工業大半只從事將美國製造的各部份機件加以配合的工作。可是現在它們都能從事完成品的全部製造了。在另一方面，大半為加拿大所控制的工業，也已在發達起來。例如鍊鋼工業和一種全新的本國機器工業即其實例，它們是在政府保證和控制之下發展起來的。

一種大規模的戰時工業化也發生在澳洲，那兒大部分也用的是美國的工業設備和技術援助。

在南非洲、西印度羣島和非洲諸殖民地，美國的侵入（或透入）也在進行中，不過程度各有不同，或者跟對其他的自治領和地區的侵入程度亦不一樣。然而在大英帝國的這些部份內，以及在中東和地中海方面的英國勢力範圍內，美國的經濟侵入之上又補充以陸海空軍基地，這些基地貢獻着戰後擴展航空交通線的一種機會，這是美國大財團公司所決不會忽視的。在南美洲的英國勢力圈內，特別是在巴西，較次的在阿根廷，戰時美國資本的擴張是特別地顯著，它曾準備在戰後拉丁美洲的南部領域內建立起一種不可侵犯的優勢地位來。

幾個主要自治領的高度工業化和戰時美國在這些自治領經濟中的不斷增長的作用，使得英國要維持一個能夠跟美國抗衡的帝國陣線，已感日益困難。由於上述種種戰時的變化，帝國內部的關係亦已大為複雜化。加拿大在世界貿易中已佔世界第三位，僅次於英國。由於國內市場有限，擴大了的生產能力迫使加拿大和澳洲去向海外尋找市場。加拿大在拉丁美洲和遠東尋求出路，澳洲則就近在東南亞洲找尋市場。因此英國要照舊維持帝國特惠制的體系（依據輸出製造品和輸入糧食和原料的原則）已日益感到困難，因為這種制度已不再能適應各自治領的要求了。這樣，從一九三二年渥太華會議決定以帝國特惠制代替自由貿易以來，英國寄予厚望的那個武器，到這時已變成無甚效力了。

當堅持帝國特惠制以換取它們所能貢獻的買賣時，英國的政策會圖利用一切次等國家中為美國擴張主義所

激起的那種共同恐懼。一九四四年初前英國駐美大使哈立法克斯爵士與加拿大內閣總理金氏（Mackenzie King）的公開交換意見，就是英美兩雄對峙的一個例證。哈立法克斯在美國發表一次顯然意在喝令加拿大政策停止其親美方針的演說中，主張英帝國全體均應「在對外關係的一切事務上遵循一種共同的政策，由帝國各邦政府來制定和執行這種政策」。對於哈立法克斯的這點意見，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加拿大總理在眾議院會議席上答覆如下：

為適應世界安全、就業和社會生活的利益計，我們不祇應與帝國諸邦相結合，亦應與一切具有同樣意向的國家攜手，假使我們的目的和理想要推行開去的話。我們對於這些重大利益的義務，必須成爲一般計劃的一部分，不論這種義務是世界性的或是區域性的都一樣。

當一些主要的自治領紛紛落入美國勢力範圍中去時，大英帝國的主要危機在殖民地領域內也發展起來了。這種危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即已開始擴展。從彼時起，特別是在亞洲，民族解放運動已經很快地成熟起來，而且是不平衡地、迂迴曲折地在蔓延開來；那些運動有着充分力量造成一個接連不斷的慢性危機。這種長期積聚着的政治危機因二次世界大戰而高漲起來；這次大戰擾亂了一切殖民地的關係。

歐洲方面德國及其伙伴的失敗，使許多次要的和附屬的帝國——不僅是義大利和西班牙所屬的帝國，而又是荷蘭、法國和比利時所屬的帝國，都頓時成爲懸而未決的問題了。日本在東南亞軍事成就的結果，會使英帝國領域可能受到經常的痛苦。包括強固的新嘉坡海軍基地在內的馬來亞以及緬甸暫時陷入了日人之手；印度也在一個時期內受到了直接的威脅。印度尼西亞雖係荷蘭所屬，但它一向是被密切地編織在英國的殖民地網以內的，當時也被日本所佔領。泰國，過去英國的一個半附屬國，也淪陷了；法國的一大殖民地越南（印度支那）也變了日本掠奪帝國的一部分。

如此廣大領土的易手，縱然是暫時的，不能不在日本戰敗以後發生重新處置這些殖民地的問題。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巨頭開羅會議的宣言裏，只說到東南亞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諸領域應自日本手上剝奪掉，而未提及如何處置這些地域的話。

在未來重新劃分這些地域的時候，美國不可避免地成爲一個主要的競爭者；它多半將按照「門戶開放」和「自由進出」這種美國政策的傳統路線侵入到這些帝國領域中去。

但這並不是說美國政策是排斥領土攫取的。它曾經提出過一個一般性的要求，要求整個太平洋區域以及非洲及其他地區建立戰略基地，那些地區大部分都處於美軍佔領之下而被當作對全球廣大部份實施美國軍事和政治壓力的立腳地的。但是這種壓力的功用還不過是當作它的經濟侵入的主要政策的輔助力量而已。它的目的是使便利自由侵入其他列強的殖民地範圍，並且作爲美國勢力新擴張（如在中國和戰敗的日本）的跳板。與以龐大的海空軍力量作後盾的經濟擴張主義同時並進的，美國在太平洋戰爭走入最後階段時也會在他所控制的殖民地實施一種政治改革，這種改革的作用是在打破英國的獨佔而讓美國參預這些地區的政治生活。

除了美國政策在中國和戰敗的日本的廣大的牽涉而外，美國在東亞的地盤的擴張還含有縮小英國遠東勢力的效用。雖然英國在中國的地位尙未完全消滅，可是美國在這次戰爭結束時在建立控制權上，却已經得到極大的進展。這樣一來，不但使英國的資本從恢復它過去在中國的影響力的觀點看來處於極大的不利地位，而且無異給了美國資本一個重要的基地，它可以從這裏出發去對整個東南亞施行壓力，至少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域內，成爲美國傳統政策的「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已經在開始實現了。並且從這裏還可以達到打開英、法、荷諸殖民地地區的門戶的目的。

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曾經盡了主要的任務，而英國在這方面的貢獻却微不足道；英國政府很快地抓取這

一機會來達到自己的利益。它首先在日本（這一個英國在遠東的早年的同盟）進行這種活動。美國負起了佔領日本的全責，並將自己的政策應用於對日本的處置，這樣，美國就在遠東掌握了帝國主義的鎖鑰地位的控制權。這種地位能够如何成功地保持下去，那還要看將來的事實。但是無論如何美國已經掌握了遠東的控制權，大大地壓倒了英國。美國將利用既得的利益來強求廣泛的參預東南亞的開發，那似乎是很明顯的了。

美國在亞洲的擴張以及它在殖民地領域內爭取更大的經濟利益的努力，成了加強殖民地世界的危機，特別是加強大英帝國危機的一個重大因素。

雖然，對於舊殖民地體系的最嚴重的威脅，還是從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來的。緊接着日本失敗之後，爆發了大規模的殖民地叛亂——在法屬越南及荷屬東印度。在過去的統治者未及恢復它們的權力以前，安南和印尼的解放運動就各自建立了獨立共和國，並且拿起武器來保護它們的主權了。

印尼有着豐富的資源，並且處於英帝國的一個戰略的十字路口上，所以它很早就被人們當作最大的殖民地珍寶看待。法國勉強能够維持對越南的獨佔地位，荷蘭却不得不跟英國共同瓜分印尼的贓物。英國人急忙地去干涉這兩個殖民地，其公然宣佈的目的是要把它們還給原主，因為後者太弱，無力鎮壓那兩地新建的共和國；這種情形充分暴露着殖民地的危機是何等普遍和深刻。殖民地世界的任何地方發生裂縫，必然要影響到每一個重要的殖民帝國，尤其是鄰近的英國殖民地：馬來亞、緬甸和印度。假如說美國是這樣快地提出了它在東亞的要求，那麼英國對於東南亞洲當然也決不會疏忽的。

通過中國軍的佔領越北，美國就已經得到了接近這一地區的機會。菲律賓的人民跟印尼人本有一些傳統的聯繫；所以美國也能够從菲律賓賓希望去影響這一前荷屬殖民地的人民。美國也就希望通過它的信用貸款和資源的運用去在這一富饒的殖民地地區取得新的立腳地，雖然大西洋憲章中所宣佈的原則前總統羅斯福會經聲明也可

以應用於太平洋，可是美國政府對於殖民地統治的重建並不表示反對。當然，美國也曾有過關於集體託治和聯合區域委員會等建議，美國希望跟殖民地列強共同參加這類機構。其目的不在廢除殖民地制度本身，而在改變殖民地統治的方式，以便打破舊的殖民地獨佔的局面。

在印度，英國受到最嚴重的挑戰。印度的獨立運動遭到一九四二年的鎮壓之後，曾經有過一時的停頓。但是進展中的深刻的政治醞釀是阻止不住的；一到日本戰敗之後，印度的獨立運動再度高漲了。戰時的經濟發展加劇了政治危機。饑荒和高度膨脹的物價刺激着農民和工人的運動大大地活躍起來，這種運動在印度獨立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軍需工業的擴張加強了印度資本家集團的力量，而美國對印的經濟侵入在戰爭期間又有着極大的進展。

印度戰時的工業擴張較之各自治領內的擴張速度要落後得多，這種擴張基本上是因它跟英國的殖民地關係而遲緩化的。印度的工業家深深抱怨：雖然存在着供應遠東戰區的需要，而英國仍不讓他們的工業按照本地資源所允許的速度發展。印度的工業生產整個的講是否超過了戰前水準是有疑問的；可是在供應消費品方面，某些部門的產品是足夠代替輸入品的：在擴充現有的工業（如鋼鐵工業），以及建立一些新的工業方面，都有着顯著的進步。（註九）美國對印度的輸出在戰爭期間也增加得很多。如果把租借物資的輸出包括在內，那末一九四二年美國對印輸出比一九三九年大九倍；單只商業運貨一項就超過兩倍以上。英國在印度的信用和投資地位的削弱，加上印度工業家地位的加強和戰時美國對印輸出的擴大，——這些都是加強政治危機的重要的輔助

（註九）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戰爭期間，印度的鋼產增加了百分之四〇；機械製造廠的數目在戰前是六百架，到

一九四三年中期已增加到近於一千五百架，其中包含二十三架新的鐵路機械廠。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工業部門的擴大和新生產品的出產，特別是在軍火方面。

因素。印度的工業家表示着一種日益傾向於跟美國實業界共同計劃戰後工業擴張的意向；而某些美國的獨佔公司也意圖找印度人（勝於找英國人）來合作以便伸展它們在印度的經濟利益。

英國用些許的讓步恐怕不足以緩和獨立運動，也不足以阻擋美國的競爭性的侵入。工黨政府執政之後，情形已很明顯；在殖民地政策上實行徹底改革以前，英國內部更根本的政治改革是必要的。同時，造成一個主要危機的一切因素正在印度以很快的速度累積着，它們深深地受着東南亞洲各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影響。

這裏留下來需要研究的還有關於軍事力量的一般狀況，這是影響英美兩國的世界地位的一個久遠性的因素。美國的軍事力量首先是決定於它的具有壓倒優勢的工業生產力。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有了戲劇式的表演。美國除了以大量軍用物資供給同盟國外，還組織和裝配了總數達一千二百萬人的軍隊，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空軍，並且形成了也許大於全世界其他一切艦隊之總和的海軍。因此，純粹從數量上計算起來（一國的軍事力量還包括其他重要的和甚至有決定性的精神因素或政治因素），毫無問題的，美國對於英國具有充分的軍事優勢。

戰爭期間英國嚴重的削弱，加上美國急速的經濟和軍事的擴張，其結果是這兩大帝國主義列強的世界地位發生了重大的變遷，這種變遷至今尚未完成，而且沒有進一步的危機，它還不會完成的。但是變化也已經够大，如果沒有這一次戰爭，可能要在更長的時期內才能造成這樣大的變化。

英美兩國在世界地位上的這種變遷加強了兩大強國的基本矛盾，並且加深了世界的政治危機。即使英國被迫而屈讓許多重要地位給美國，而逐漸降為一個衛星的地位，這也不能不激起英吉利內部的政治改革和廣大殖民帝國內的激烈變化。

保持大英帝國的完整性對於英國統治階級是一種太大的困難，他們將更多的傾向於依賴美國的支援。英國

統治階級很可能在歐洲和在殖民地世界內造成反動的堡壘，來作爲換取美國經濟援助的代價。戰爭結束時，大西洋兩岸都存在着一種尋求歐亞兩洲的反蘇陣綫的共同根據的強烈傾向。但是這一方面的發展將意味着英國對於美國的最後從屬。可是英國人民對於這種前途是難以表示歡迎的。英國的帝國主義者不經過一次強烈的鬥爭恐怕不會放棄它們的政策。但是假如它們寧願接受對美國的從屬地位而不願看見英國和整個帝國內部的根本的改革，那末英國人民勢必被迫而走另一條路。

第七章 英國的獨佔資本

英國從前是自由放任主義的古典國家，現在它已把這一職分移交給了美國，那兒托辣斯化的「自由企業」正在向全世界推行其自由，卡特爾主義已在英國變成了最佔優勢的制度。隨着英美兩國的世界地位的變動，英國獨佔資本的結構和政策，也起了重大的變化。

正如兩次大戰期間美國的情形一樣，英國也曾經歷了加速度的工業合併和聯合的運動。這是跟廣泛的經濟卡特爾化同時發展着的，它的水準要比美國的同一傾向高得多。英國的這種發展跟美國比較起來有一種特殊的區別，那就是這種產業合併和聯合的運動是以一般的經濟衰落為背景的。可是在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佔資本的擴張，是跟國內工業生產的繼續擴大和對外經濟侵入的不斷深入同時並進的。在英國，獨佔資本的發展是跟一般的工業停滯和英國的國際經濟地位的削弱同時進行的。

因此，英國的卡特爾運動就作為一種防止內部解體和抵禦外來帝國主義競敵之侵蝕的「防衛機構」而產生了。

一 兩次大戰之間

向來因為缺乏豐富的數目字，所以一般人都猜想英國工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是相當低的，因而國內獨佔資本的規模也比較得不大。但是到一九四五年，政府的統計材料根據一九三五年的生產調查而公佈出來了；這就第一次提供了關於英國主要工商業部門的資本集中的一般狀況。

跟前面所引用的關於美國資本集中的材料比較起來，英國的數目字也表現着一種最低程度的集中，因為材料的分析裏面沒有包括由各種類型的交織關係和公司控制所造成的更大範圍的生產控制。這種分析的總結顯示着英國的生產集中在程度上大體並不低於美國。英國和美國的生產規模却有不同，在英國僱用五百名以上工人的產業單位，可以算是最大的企業了。這樣的工廠在一九三五年有二二八〇所，它們所僱用的工人佔全部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五二。

這是一般的情況。但是在某些工商業部門中，集中的程度要高得多。依據每一工業部門中三個最大的單位所僱用的工人的比例來計算，就發見三十三個工商業部門中的產業集中程度，都在百分之七〇以上（意即每一部門中三個最大的單位所僱工人均佔各該部門全體僱工的百分之七〇以上——譯者），而且這裏面沒有把通過卡特爾合約和貿易協會而建立的廣大的獨佔控制計算在內。就全部工業言，集中的程度估計佔百分之二六，這就是說，在一九三五年一個普通工業部門中所僱用的大約四分之一的工人，是被該部門內三個最大的單位所僱用。生產高度集中的工業部門是化學工業（佔百分之四八），雜類生產（佔百分之四七），公用事業（佔百分之四四），工程業、造船業和汽車工業（佔百分之四二），鋼鐵工業（佔百分之三九），食品飲料和烟草製造業（佔百分之三二）等。但是假使按照商品來分析時，就發現有一百種以上的商品是完全被一兩家公司所壟斷；其中五分之一是化學品，而且還包括一些基本的軍用品，如裝甲鋼板、鎳、高級爆炸物、生銹等。很多種商品，有百分之九〇，甚至於百分之一百，為三個最大的單位所控制。

分析的結果又發見煤、鐵、鋼等工業中有很高度的集中。譬如說：十四個有鼓風爐的冶鍊工業單位，僱用工人各在一千名以上，同時也領有煤礦，它們所生產的鐵礦苗和鑛石佔總產量百分之七三。我們應當承認，這些數目字是指的一九三五年的情形。從那時以來，英國的產業發生了大規模的合併和聯合。只要舉兩個例子

就可以證明：在食品工業方面有猶尼列佛 (Unilever) 和列佛兄弟公司 (Lever Bros.) 的合併；在化學工業方面有帝國化學公司 (Imperial Chemical) 的擴大 (新吸收了十三個公司)。

一般地說，作為獨佔經濟之基礎的生產集中，其在英國的程度不能看成跟在美國的相應情況有重大的區別。美國的生產規模固較英國大得多，而英國的生產集中却已發展到極高的水準，尤其是在基礎性的重工業部門中。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英國的生產集中，跟它的一些主要競敵比較起來 (註一)，差不多已達到了和德國相等的水準，單祇落後於美國而已。無疑的，在一九二五年以後，德國經濟因美國資本的幫助而復興，結果使德國生產集中的程度超過了同一時期的英國，而當時英國一般地說已經處於工業停滯的時期了。然而數字材料確實證明英國的生產集中已經高度發展，而並不如一般經濟作品中所設想的落後於各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

(註一) 一九三〇年，在鋼鐵工業的熔冶和軋鐵部門中，在電力和機械工程業中，以及在造船、汽車、飛機及纖維等工業中，百分之五〇的工人是被有一千名以上工人的一些大工廠所僱用的。

那些精確的比較數字是不能用的，因為三個國家所用的統計方法並不一樣，而它們的工業分類法又是不同的。但是些粗略的比較數字却足以說明它們的關係。一九三〇年，在英國的全部鋼鐵工業中，百分之二五·六的工人是被有一千名以上工人的工廠所僱用。美國在一九二九年，類似的鋼鐵工廠的工人佔百分之四一·七；而德國的冶金工業的類似的百分比數在一九二五年是四一·六。在這方面，可見英國是遠遠地落後於美德兩國。但是在機械和設備方面 (這方面也可以作一個粗略的比較)，英國的情況却要好得多。按照一九三〇年的英國的分類法，機械工業中百分之三五·五的工人和電氣工程業中百分之五七·三的工人，是被有一千名以上工人的工廠所僱用。一九二九年，美國的人口調查報告運輸設備製造業的相應數字是百分之六六，機械製造業是百分之三四·八。一九二五年，德國電力機械業的相應數字是百分之三九·四，而其他機械製造業是百分之三二·六。在英國和德國的主要輸出品工業——紡織業——中，相應的數字是：英國 (一九三〇年) 百分之一七·五；美國 (一九二九) 百分之一八·五；德國 (一九二五年) 百分之一三·四。

雖然在生產集中的程度上，跟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情形一樣，各國間乃至各個工業部門間的比例是不平衡的，可是在生產集中程度的變動上，是找不出重大的區別的。重大的區別例是在英國工業的技術落後性上。正如前面指出過的，從國外廣大帝國領域內得來的豐厚的息金收入，其重要作用是促成了英國產業長期落後的傾向。這種落後性停留在高度集中的組織內，而高度集中反過來又傾向於保持一般的停滯狀態。

這就是兩次大戰之間英國獨佔資本伸展的基礎。除去化工部門和人造品部門的一些新的「實驗工業」外，英國的超獨佔事業都是建立在一種次要的工業基礎上的。兩次大戰期間的二十年內，在鋼鐵、煤礦、紡織、食品、汽車和運輸等部門中所發生的大企業的合併，以及一部分生產效率不大和技術不一定低劣而資金比較單薄的企業的淘汰，却並沒有引起一般的技術進步的結果。一般地說，資本主義獨佔經濟發展的結果，總是技術進步的遲緩化。英國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產業獨佔運動的結果，主要的是把英國產業凍結在一種低度生產效率的水準上。用倫敦「經濟學者」周刊的話來說：「高利潤和低周轉，變成英國實業界的流行口號了」。

英國的獨佔資本家不去改造他們落後的工業，而想用別的方法去保護和挽救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的日漸縮小的份兒。藉政府的干涉而日益變成強迫性的國內產業合併和卡特爾化，成爲保護國內市場和爭取卡特爾的世界市場劃分中的重大份兒的一種主要工具了。在一九三二年，當自由貿易被完全放棄了的時候，英國的產業合併和卡特爾化的運動，實際上已在英國對外貿易上廢棄了自由貿易。要限制技術落後和成本高昂的那些工業的生產而保持高度的利潤水準，就需求高度的控制集中。經濟上獨佔控制的效率代替了生產的效率。這就是英國卡特爾運動的主旨。

這種運動實質上是防禦性的；它是保護英國的經濟地位而使免於遭受其主要外國敵的侵蝕的一種措施。但是當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美國在一次工業擴張的高潮上發生着「狂熱的產業合併運動」，而這一運動又受

到瀰漫全國的繁榮空氣所鼓勵的時候，類似的運動在英國，却是一般的經濟衰落的條件下發展着的，而且是當作一種阻止英國地位進一步衰退的手段來推進的。

以促進經濟卡特爾化爲目的的政府干涉，在二次大戰以前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研究這個問題的一位美國學者，概括這一情勢如下：

英國政府和某些實業界領袖都已經相信，國際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姑置勿論——已變動得太大，以致英國的工業不可能恢復它的老地位或用傳統的個人努力去適應新的條件，特別是因爲某些國家（主要是德國）的競爭最直接地影響着英國對外貿易的地位，政府干涉的統制已經包括了極大的範圍。（見陶梅拉茨基 [Louis Domeratsky] 著「英國工業改組的最近趨勢」 [Recent Trends in British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所謂傳統的個人努力是從兩方面來被集體的的努力所代替了。在產業獨佔資本的領導之下，並且靠着政府日益增加的保證，在英國國內一種卡特爾型的貿易協會（地域性的和全國規模的）網是發展起來了。同時，依靠一些主要的獨佔事業的支持，政府通過立法手段而強制許多工業部門實行合併、聯合和卡特爾化。這一過程又藉銀行資本的集中而加速起來。除英格蘭銀行（它本身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機構）外，一九三六年英國全部銀行存款的百分之七五，是掌握在倫敦五大銀行手裏。信用的集中控制是政府和私人獨佔資本藉以進行大規模卡特爾化的一種最有效的武器。

英國的貿易協會（註二）變成了獨佔控制的主要媒介。這種情勢的發展，因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和

（註二）最近英國有一次調查（見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倫敦出版的「計劃研究」），發見聯合王國有將近二千五百

個全國的或區域的貿易協會（除以處理勞工關係爲主務的業主協會外），而一九一九年這類協會僅祇五百個。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這一運動已在充分進展中；到三十年代初，它爲應付經濟危機而再度加速發展起來。貿易協會是一種公開的卡特爾類型，它們的目的是在通過合約（或協約）以控制物價，控制分配的「河道」，調節生產和劃分市場，以及集中銷售活動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大見加速。布拉第 (Robert A. Brady) 描寫這種運動的發展情況如下：

每一工商業，不論是地方的或全國的，各有其本身的協會。對於「局外者」(Outsiders) 的壓力——促「局外者」參加協會的壓力，日益傾向於擴張每一產業協會的羅網，要把這一產業部門的每一單獨企業都爲它所包括。這些發展不斷地傾向於把所有的企業連繫在一起，首先是地方的或區域的，然後是全國範圍的工業、商業和(橫剖面的)地區的連繫，最後形成一個頂層的或中央的機構，例如英國實業界聯盟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即是。

大部份比較大而強有力的貿易協會，照例是被少數大康采恩所支配的，這也是同樣明白的事。……貿易協會成了某一單獨的或一小部份的大康采恩推進獨佔政策的一種有效的卡特爾工具。

布拉第所稱爲貿易協會之頂層組織的英國實業界聯盟(註三)，在一九二五年中就已在擁護一個經濟澈底卡特爾化的計劃。在一個專門報告裏，它主張依照以下的方針組織一個英國實業界的團體：

……(一)消除過度的工廠生產能力，以達到「供給與需求的適應」，並促進「生產集中於一些有效能而現代化的製造廠中」；(二)限制每一工業中新企業的設立，以便使生產力適應於市場的需要；(三)阻止某些交易部門中的某些商行獲得一種「不公平的利益」而不負擔它們所應負擔的一份事業發展經費(如集中宣傳和研究的經費)；(四)促進英國實業界在與外國競爭者談判時的團結一致和增進世界貿易情況的穩定；(五)從商業活動中排斥那些「永遠不能希望獲利」的商行。

當這一計劃提出來的時候，卡特爾主義已經成爲政府經濟政策的方針。英國政治經濟計劃團最近一次對於英國貿易協會的研究，發見這些協會的最重要一項活動就是跟政府進行討論和協商。政府政策和私人工商業政策的密切統一，表現於政府利用關稅這武器來促成英國鋼鐵業聯盟 (British Iron & Steel Federation) 的成

(註三) 英國實業界聯盟成立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五年已包括一百九十五個貿易協會及全國各實業部門的二千一百家個別的企業，其資本總額約達三百萬萬美元，僱用工人超過五百萬名。

立（跟着又發生這部門工業中許多企業的合併），並促使國際鋼業卡特爾來跟英國鍊鋼業訂立合約。其他工業部門中的情形也是這樣，政府施用壓力，通過貿易協會去鼓勵各部門產業的卡特爾化。政府強迫合併、規定物價及統制稅款等政策，在煤礦和紡織工業中施行得最爲完備，而這些工業受尖銳的世界競爭的苦痛也最深（註四）。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的經濟政策的重點已經斷然地向着鼓勵產業聯合和卡特爾的方向轉變了。這一轉變是在政府和實業界的聯合庇護之下實現的。英國經濟之政府保證下的卡特爾化，不會達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那樣高的程度，但是它大大地超過了美國的卡特爾化的程度。英國卡特爾化的全部傾向是被德國的不斷增加的威脅所促進的；而德國的高度獨佔和集中的經濟促成了德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

二 戰時的英國獨佔資本

一般地說，一些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統制經濟的範圍和徹底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要比第一次

（註四）一九三〇年的煤礦法案是一種強迫卡特爾化的措施，該法案規定生產限額及最低價格；過業主們無法實行合併時，授權政府強制實行合併計劃；到後來該法案更形加強時，商品銷售和繳納捐稅都集中統一執行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煤礦委員會建議合併大批的煤礦企業，這一合併的結果，企業的數目將從九五九個減少到五〇和六〇個。在棉紡織業中，類似的努力也將使這一工業集中起來。一九二九年，蘭開夏棉紡公司（Lancashire Cotton Corp.）在英格蘭銀行資助之下宣告成立。它合併了一百三十九家紡織廠，其中五十三家是完全被淘汰了。一九三六年的棉紡業法案，是促成更大規模合併的一種嘗試。它規定要「淘汰過多的紡紗機器，組織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任務，該機構有取得資產及借款款之權。」一九三九年八月間，在一個新的產業改組法案中，政府的做法更進一步，該法案的目的是要在每一個工業部門中淘汰過分的生產力，並且替一種有效能的，而且只是有效能的廠家確定價格。戰爭爆發時，這個法案的執行是擱置起來了。

大戰期間超過得多多。兩次大戰之間所達到的產業集中的高度水準和複雜的工業生產程序的不斷的完整化（integration），替集中的控制造成了更有效的媒介。

在英國，政府和私人獨佔控制的配合一致，在這次大戰前夜已經頗為發展；後來又因受德國初期勝利對於英國所造成的極度危險的刺激而更見進展。所有貿易協會是更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了；「局外者」則靠政府的行動而被網羅到貿易協會裏來了；許多工業主要地通過進一步合併的辦法而加以改組了；而全部經濟都置於更大規模的集中管制（由政府和大實業界共同掌握的）之下了。據倫敦「經濟學者」的觀察，貿易協會「已從一個有疑問的合法團體，從一個拘束貿易的陰謀集團，轉變成為一種國家所愛護的工具了。」

帝國化學協會主席麥戈溫勳爵（Lord McGowan）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在貴族院裏發言，說英國的製造業業「已經不再相信自由競爭或極度競爭之天生的優越性，而且已在實業界合作和政府集中指揮的方向上進展了很長的一段路程」；他說這幾句話，很明顯地表達了大獨佔企業界方面的支配見解。也許，並非英國的一切工業界都持這樣的見解；那些小生產家是一定不贊同這種見解的。但是這種見解却反映着戰時的情勢發展已在英國經濟上留下永久痕跡的這一事實。

英國獨佔資本家在戰時政府機關裏直接佔據一些鎖鑰性的經濟統制職位，他們利用着這種職位來強有力地推行他們的卡特爾政策，——這種情形，英國要比美國厲害得多。從內閣各部到全國性和地方性的統制機關的職位上，我們都可以發見工商獨佔企業的領袖們。兩個主要的戰時統制機關——物資供應部和糧食部的官吏名單，簡直像一張實業大亨的題名錄。

英國共產黨領袖波立特（Harry Pollitt）在其所著「如何贏得和平」一書中發問道：戰時經濟對於獨佔資本家發生了什麼影響呢？回答說：這部份人經濟上變得比小企業家更加强大了。規劃政府定貨的生產管制機

關的負責人、全國統制總局的統制官員、以及重要的內閣閣員等，都是從這一等級中招收來的：例如造船業領袖李德高爵士 (Sir Lithgow) 和鄧肯爵士 (Sir Andrew Duncan 前鋼鐵業聯盟主席) 在主持物資供應部；猶尼列佛食品康拜因的首腦們，在糧食部裏佔據着要津；帝國化學公司 (ICI =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y) 的代表人物分佈在六十一個重要的統制委員會裏；過去與維克斯 (Vickers) 和帝國化學公司有關係的安德遜爵士 (Sir John Anderson) 做了財政大臣，而這位先生的政治反動紀錄却是全世界共聞的。

至於獨佔資本家在佔據政府要職中直接監督戰時經濟的結果，杜德說了以下的话：

這樣，這種戰時組織的制度，並未糾正，反而加強了現存英國產業獨佔結構的缺陷。獨佔企業創立了自我統制的制度。這種獨佔企業家的自我管理充着公共管制而使他們有可能利用統制機構來鞏固自己的獨佔地位和保護他們的特殊利益，即令犧牲生產最高額亦所不惜。各方面的意見都批評這種制度。

獨佔集團在政府中的權力，曾得到戰時國會的支持，後者大半變成了獨佔企業公司的聚會場所。一九三五年選舉的結果，國會被二百六十五位保守黨議員所控制；根據一個來源，這許多國會議員掌握了五百十二個大公司董事的職位。根據另一個估計，一百八十一位國會議員操縱了七百七十五個公司董事職位。

獨佔資本家利用他們在政府機關中的有利地位，就能够伸展企業合併和卡特爾化的活動而把那些在戰前已經遭遇極大困難的消費品的商業也包括到卡特爾範圍裏去。一九四一年春，因為要騰出更多的勞動力來供應軍事工業和軍隊，政府曾經採取了把許多消費品的生產集中到少數工廠裏去的措施。根據這種計劃，個別的工業通過貿易協會而首先實行集中生產並服從政府貿易局的准許。但是假如某一工業不願或不能實行改組，則政府就有權通過戰時物資供應、勞動和合同的統制而強迫實施生產的集中。政府設立一個工業與輸出的專門委員會來執行這個計劃。

根據總的計劃是要建立一些核心工廠，把每一工業的生產都集中到這些工廠裏去。這些核心工廠都得給予充分的政府保護。爲了把生產集中到一些選定的製造單位裏去，曾經採取了各種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商行的合併、取締公司的建立以及促成一種卡特爾型的聯合，根據這種聯合，各參加單位就得經銷核心工廠所生產的貨物。

這一計劃得到商會聯合會（Associat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與英國實業界聯盟的充分支持；沒有這些團體的發動和支持，這個計劃就很難實現。要知道這個計劃在實際上是如何施行的，可以以棉紡織業爲例；在這一部門中，貿易局批准了一百一十個棉紡廠作爲核心工廠，關閉了六十一個廠，而又剩下二百二十九個廠，其命運尙待考慮決定。

爲了強制實行產業集中，再沒有比這更有效的辦法了，尤其是生產分散在許多小廠家裏的那些工業是如此。爲了應付對該計劃的廣泛的批判，內閣曾經允許設法保證在戰後迅速地重開被關閉的工廠。在生產已經集中進行了許多年之後，而那些核心工廠已經得到了新的生產方法和更大的生產效能之後，大部分被關閉的工廠要重新開業就很困難了。同時在戰爭期間所實現的一些消費品工業的大規模集中和卡特爾化，一定會繼續下去。

英國內部的卡特爾組織，在戰爭期間，也準備了一種强有力的和更一致的行動來爭取世界市場。在包括政府官吏和實業界與勞動界領袖的工業與輸出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實業界就得聯合起來經營出口貿易。一九四四年，英國有二百八十個出口康拜因，它們實際上是跟貿易協會有同樣的作用，這種運動本身又成爲促使原先的一些局外企業參加到貿易協會裏來的一種新刺激物，同時又能促使貿易協會進一步聯合成爲區域性的和全國性的集團。

英國帶着一種更高度卡特爾化的經濟，和完整的獨佔統制體系而走出了戰爭。獨佔資本家能够利用戰時政府統制的全部機構來擴張英國經濟的卡特爾化。產業的合併和聯合以及通過貿易協會而實施的「產業自治」，是戰爭的一種永久的遺產。戰後卡特爾制度是否繼續如此密切而直接的跟政府機關接合在一起，主要的要看英國今後政治發展的情形。

當歐洲的戰爭將近結束時，要求趕快取消政府統制的呼聲就不斷地高漲起來了。正如波立特所提醒大家：「獨佔資本家是深怕在戰後他們會受到更多的計劃的限制，假如有人提到要把經濟力量組織起來置於統制之下的話。假如他們能够在國會中再度建立起一個保守黨的大多數，那末他們可能改變他們的口氣。」但是當未來的政治局面還捉摸不定時，「他們寧可退出衙門而回到他們自己的董事室裏來，因為在這裏就沒有人能命令他們來說明他們對於國會所幹的行爲。」

無論如何，卡特爾化的經濟是爲着應付激烈的競爭（主要的爲對付強大的美國托辣斯），爲爭取世界市場和經濟侵入的範圍而組織起來的。英國的獨佔資本家是主張卡特爾分配市場和有節制的競爭作爲他們與人競爭的手段，而美國的大企業家則以四大經濟自由——企業自由、競爭自由、進出自由及貿易自由——的主角的身姿態，出現在世界競爭舞台。

三 英國的卡特爾政策

在英國佔優勢的卡特爾政策和美國所流行的政策，恰好成一個尖銳的對照。它們的主要區別點，威廉·勃特（William L. Bart）在一次對一羣美國商人的演說中有過簡潔扼要的說明。在敘述了美國戰時工業驚人的擴張情況之後，他說：

……英國走出戰爭時，它的競爭能力已遠遜於一九三九年時。……我想你們一定會明白爲什麼今天英國不像我們這樣的熱切期望全世界有着門戶洞開而自由的市場……

我們這樣地關切着一種貿易的自由流動，不祇是把它當作替我們增加一百億到一百五十億美元的國民收入的一個機會，而且也把它當作爲和平而出擊的手段（應當補充一句，這是英國也承認的一個目標）。所以這件事情具有一些十字軍的性質，而決不可漠然不加注意的。

跟我們不同，英國走出戰爭時，將變成一個受重創的國家；英國人將感覺他們至少有一個時期必須保護他們的市場，即令因此而採取一些不愉快的手段（如卡特爾制、物物交換制等）；這裏我想你們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很容易造成英美兩國意見的頂頭衝突。

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英國內閣所發表關於失業問題的白皮書中，有一段陳述，提供了英國對於美國自由貿易壓力的反響的一些證據。這是戰時聯合內閣關於卡特爾問題的少數官方正式陳述之一，其中有一段恰當的話如下：

近幾年來存在着一種不斷走向聯合和協議的傾向（不論是國家的和國際的），製造業家依靠這種聯合和協議來統制物價和產量，劃分市場和規定教育條件。這樣的協議或聯合不一定爲違反公衆利益而進行的；但是這樣進行的權力是存在的，所以政府要設法取得權力能夠知道那些束縛性的協議和聯合組織的活動的範圍和效果；政府還要採取適當的行動來阻止那些對於一部份生產事業有利而對於整個國家有害的那些活動。

在這段陳述中，並沒有改變英國政策的表示。當它說到卡特爾不一定爲違反公衆利益而進行時，就表示它承認許多的卡特爾活動（縱然不是全部活動）是會符合公衆利益的。當它建議政府應當知道卡特爾的種種措置時，這句話祇是表示這類協議的調查和登記是可能有必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內閣在這段陳述中已明白表示，假如政府採取行動的話，這將是迫使一切康拜因和卡特爾遵照國家政策而避免純爲部份利益打算的一種行動。

在戰後的英國，國家政策可能經過許多變化；這些變化中並不排除國民大眾充分參加政治和對政府實施壓力以促成國家干涉經濟而排斥獨立性的康拜因。在戰爭的中期，連邱吉爾首相也已經預見到這樣一種結局；他公開承認（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之演說）關於某些鎖鑰性的但是病態的工業（而且曾經阻礙作戰努力的）實行國有化的不斷增長的要求：

有很廣大的範圍可以實行國有而成為國營企業，特別是對於各種獨佔事業。一個現代的國家將不斷增加其對國民經濟幸福的關切，但是尤其重要的是在最初時期應當讓一種廣佈的、健全的和堅強有力的私人企業存在下去……國營企業和自由企業必須共同為民族利益服務而並肩地拉着這輛民族的火車前進。

說這段話的時候，正是邱吉爾的戰時領導地位對保守黨人和大實業界浸注着一種信念，即他們將能在戰後保持國家機關的充分指導權。在政府加強干涉經濟的條件之下，政府和獨佔資本家並肩工作的情景，將使大實本家心滿意足，當他們在政府機關中掌握着一切有決定意義的職位的時候。但是英國戰後第一次選舉造成了另一政治集團掌握政權的可能，並且使得保守黨出來勇敢地進行反對工黨一些起碼的國有化建議的鬥爭，而所用的口號却是拾納粹牙慧的「反布爾雪維克」。

不論保守黨政策的妄想和需要如何，英國的獨佔資本家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大實業界在預料可以戰勝德國的時候，它們實際上是一致的表示要擴大英國經濟的卡特爾化作為戰後爭取市場的基礎。它們在一個基本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這種卡特爾的過程應當通過產業自治而實行，也就是說應當讓每一工業部門中的獨佔資本主腦們去進行。意見分歧之點大半是關於政府機關干涉的程度，是直接干涉還是處於監督地位，以便強制執行某種中心的政策和強迫獨立企業參加貿易協會。舉例來說，英國實業界聯盟認為當然的事是，未來的產業組織應當永遠根據必須符合民族利益的這一凌駕一切的原則而由產業家自作決定。實業界聯盟因貿易協會不

能常常迫使獨立企業參加本國卡特爾而表示痛心，但同時仍小心地提防着政府為達到這一目的所必需的那種干涉。

還有一些計劃比較得不胆怯一點。英國商會聯合會贊成每一工業應當確定它自己的政策，但是它主張通過一個代表僱主、商界和勞工的工業委員會 (Council of Industry) 而把卡特爾組織跟政府直接聯繫起來，而該委員會則須得到政府貿易局的批准而成立。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使國內和國外經濟政策達到有效的和集中的配合。這個總計劃是一百二十位實業界領袖所同意的，但他們各自都發表過一個單獨的綱領叫做「全國實業政策」 (A National Policy for Industry)。他們主張給與工業委員會以更大的權力，讓它有權考慮「高級經濟政策」問題」，作為保持政府與實業界接觸的中心媒介，以及在國際關係舞臺上以代表英國整個實業界的資格出現。根據他們的計劃，勞工代表們被排除在該委員會之外，而貿易協會的會員資格是帶有強迫性的。

比任何一個計劃都勇敢的，是瓊司爵士 (Sir Edgar Jones 是 Courtaulds 股份有限公司的前任董事) 所領導的一羣獨佔資本家和一個國際白鐵卡特爾的管理處所提出的計劃。這個以世界同盟計劃 (World Alliance Plan) 著稱的計劃，目的是在組織一個全世界的統一的卡特爾網，以便完全控制生產、價格和市場。

英國大實業界的戰後計劃中，雖然存在着某些意見的分歧，但這些分歧只是關於程度的問題和強調某一方面問題。為一切重要部份的產業界所擁護的總的政策，是贊助在獨佔資本領袖的支配之下來發展卡特爾制度和集中的經濟統制。這種政策的主旨是在實行有節制的競爭 (受大實業家所節制的競爭)，這種競爭是通過貿易協會和政府機關而進行的。

英國的一般經濟政策是要加強一切防衛機構去抵禦來自美國的經濟威脅，抵禦歐洲的政治「動盪」，尤其是防止蘇聯；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產業卡特爾化的計劃。一切領導的英國的發言人，從貝佛烈治爵士 (Sir

William Beveridge) 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起直到英國實業界聯盟爲止，實際上都強調區域經濟協議對於英國的價值，例如帝國特惠制和英鎊區域的建立等，但同時又考查阻止美國通過布里頓森林會議及其他類似機構來實行經濟擴張的可能性。有一位作者在一個英國的權威金融雜誌裏把有關這種問題的意見簡單歸納如下：

在布里頓森林會議上的辯論暴露了那種願意照現狀（而不照過去的狀況）保存英鎊區域的意見是如何強烈。保存英鎊區域是進行經濟戰爭的一種工具，是用來打開那些不願開放的市場之門戶的一種破城鎚，同時也是阻擋不歡迎的貨物從不歡迎的售貨者那裏流到帝國市場裏來的一扇上了釘的柵門。……

很可能是這個國家連同大英帝國聯邦各成員及某些西歐國家會立刻結合成爲純粹防禦性的一種經濟同盟，最初或者爲防禦美國經濟過分的和可傳染的不穩定性，後來可能是爲抵抗蘇維埃國家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侵蝕作用。但是這些金鎊國家如果先採取進攻的行動，那真是愚蠢透頂的。

英國領袖經濟圈子裏的爭論，不是關於戰前所流行的區域經濟協調應否廢除的問題。所爭論的是關於如何有可能恢復的或可能成立新的協議的地方如何來恢復這些區域的協議，以及如何利用這些協議來進行爭取世界市場和經濟侵蝕的鬥爭。關於這一點，在貝佛烈治爵士的一段文章中說得非常明白；而這篇文章是英國經濟著作中所普遍引用的：

從便利交通的觀點來看，全世界範圍的多邊貿易可以比作一架昇降機，快是很快的，但是可能停止動作。區域性的多邊貿易可以比作一部樓梯，雖不很快，但是穩當而合適的。雙邊貿易可比作一扇太平門，雖然笨重，但是安全。我們可以希望在這次戰爭之後全世界將有一切現代的方便的設備來把人類爲着他們共同的利益而維繫在一起。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實現這樣一個世界，但是在建築這個新大廈時，我們不能夠放棄太平門和樓梯，直到我們有把握不讓火警發生並使昇降機能夠經常動作時。

這種對於多邊貿易的謹慎的看法，主要的是從美國的經濟擴張對於英國世界地位的威脅而產生的。區域的多邊貿易——一部分國家的實行經濟布洛克 (Bloc 即集團或聯合)——是當作一種英國利益的必要的保護手段

看的，而雙邊貿易——兩個國家間的一種物物交換和其他排外性的貿易關係——是並不排斥的。英國實業界聯盟在一個關於國際貿易的專門政策報告中主張恢復戰前的區域經濟布洛克作為一種主要的目標，英國曾經靠這種經濟布洛克來跟西歐及巴爾幹與中歐各國實行某種形式的結合。

帝國貿易壁壘和區域布洛克的保持多少是按照戰前的路線來進行；這是跟恢復戰前時期的世界卡特爾組織的計劃同時並進的。邱吉爾有一句名言說他不會變為英皇陛下下的首相來主持大英帝國的清算，這句話對於英國的經濟領域也同樣的適用。他曾經表明了英國獨佔資本家的基本態度，因為他們是決心要維持他們的地位，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每一種經濟和政治的武器來抵禦從內部和外部所發生的一切威脅。他們的政策的主要傾向是要不論在殖民地中或在帝國外圍儘可能地恢復戰前的狀態。

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種態度是表現在西方的布洛克政策中，這種政策在德國戰敗以後就立即出現；上述的態度也表現在英國獨佔資本家和官方的決心復興西德經濟作為這種布洛克的一部分的意向。正如我們前面所援引的那位金融問題作家所提示的一樣，一個西歐的布洛克可以担负雙重的任務：抵禦美國的經濟侵入和建立一個為歐洲的反動安定所需要的新基地。

西歐的特別是法國的政治發展是否會允許這樣一種布洛克的實現，則還要留待將來再看。正在努力加強對整個大英帝國的壓力的美國，是否會完全滿足於一個英國所支配的西歐布洛克，這也還不能當作既定的事實看。最後，英國工黨政府是否能長期繼續保守黨的外交政策而拖延或沖淡它的計劃中所允諾的一些內部改革而不引起英國內部的強有力的勞工和民主運動的反抗，這個問題現在也還沒有決定。

第八章 擴張主義的自由

美國的政策常常着重於企業自由、競爭自由、進出自由和貿易自由。這就是經濟擴張主義的四大自由。在真正每一個有關政府政策的文件中，都提到這些自由。在大西洋憲章中、在租借法案的協定中、在泛美洲各國的憲章中、以及在政府發言人的每一次重要聲明中，都可以找到這些「自由」的字眼。跟擁護這些自由的主張相並列，我們還常常可以見到同樣着重的主張廢除貿易的限制和障礙，不論是政府方面的或是卡特爾性質的，這些限制和障礙妨礙着世界貿易的擴張，特別是妨礙美國貿易的擴張。

美國政府公然主張的目的，是在誘致全世界各國接受這些原則。大實業界和政府正在組織一支十字軍，去迫脅各國接受這種計劃。美國所佔有的工業優勢，美國政府和實業公司所掌握的龐大債權，以及它在國際關係上所演的積極的政治作用，都是這一十字軍進行中的強有力的工具。

這一計劃的自由主義色彩，模糊了它的實質。無疑的，許多獨佔的反對者和國際合作的擁護者，未能認清這種計劃的擴張主義的內容。在英國的卡特爾政策中，很容易被人看出獨佔；可是在一大堆「自由」掩護之下的托辣斯，却難於被人看出它的獨佔性。

一 企業自由

在美國經濟問題討論中所使用的「企業自由」一語，是表示着一種意思：主張產業自治和私人所有權而反對公共所有權和產業統制。當我們用一個同義詞「競爭自由」來說明美國經濟的現狀時，企業自由這一名詞就

變成毫無意義了。企業自由和競爭自由很久以來就被獨佔所替代，後者在美國，正如它在英國一樣的佔着優勢。就大規模的實業而言，真實的問題是政府機關對於生產和市場的統制到什麼限度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按照普通的意思提出來，說是擁護還是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涉。在別的國家，某種形式的政府統制有着不斷加強的趨勢；這一趨勢，已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大大地加速。其在美國，這一發展趨勢雖不如其他國家之甚，但它的存在是沒有問題的。

美國政府參加國際商業協定，其中包括許多種的農產品在內。韋勃·波美倫法案(Webb Pomerene Act)認許出口協會和各種卡特爾型的組織，得在卡特爾化的世界市場上進行活動。密勒·泰亭斯法案(Miller-Tydings Act)准許製造家和另售商人聯合行動，以控制實物和藥品的另售價格。顧飛煤價法案(Guffey Coal Act)曾在幾年內規定煤的最低限價。石油產品在美國是嚴格分配的。在經濟大危機時期，政府所規定而由實業界自己執行美國復興法規，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允許卡特爾的活動，並且加強各國貿易組合的卡特爾化。

政府對於本國航空事業的統制非常周密，以致出席芝加哥國際民用航空會議的英國代表團團長史溫登爵士(Lord Swinton)在其向參議院作報告時怨訴說：「沒有人能夠插足到他們的國內事業中去進行競爭。」美國的國內市場是受到世界上最高的一種關稅壁壘的保護。政府對農業牛產和農產市場的節制是一種確定的事實。這些只是最近政府干涉經濟事業的少數例子，有些干涉則採取卡特爾的形式；戰時各種政府統制還不算在內。實際上，政府的干涉並不在一切場合都受人反對，甚至於可以說，干涉的原則本身也沒有人反對。問題只是爲着什麼目的和在什麼情況之下來實行干涉：爲着保護和擴張獨佔企業的權力，還是爲着限制它們的自由活動；是在獨佔資本家更廣大的直接參加國家機關的情況之下，還是在加強反獨佔運動和民主勢力的影響的情況之下，來實行這樣的干涉？

甚至最極端的「企業自由」的擁護者，也要求藉政府的干涉來保障「競爭自由」。舉例來說，美國商會的一個典型的宣傳文件，曾呼籲政府來鼓勵「自由市場」。該文件中有一句話：「沒有政府的行動，自由市場將不再自由。」世界「自由」貿易的全力擁護者，正在利用政府機關去阻止參加卡特爾，而在英國，國家的壓力則常常用於強迫參加卡特爾。在一九四四年的民用航空會議上，美國政府以全力爭取美國航空獨佔事業在全世界上的自由競爭權利，而英國政府只企圖用各種限制美國康拜因的規章條例，來保護它自己的獨佔事業。

可是一到歐洲戰事結束，美國的大實業界和政府，以壓倒的優勢來擁護限制政府干涉經濟的趨向。某幾種政府的統制和幫助，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範圍內，是受一些大實業界歡迎的或他們所積極要求的。但是整個的說，最流行的一種政策傾向是允許經濟勢力的自由活動，這在獨佔經濟內就意味着獨佔資本的自由；這種政策傾向是以一種假設為根據的，就認為這樣可以解決世界史上的重大問題；然而這種解釋常常被證明是錯誤的。

雖然這種態度在經過一次經濟危機之後又可以發生變化如像三十年代的那次經濟危機時期的情形一樣，大實業界整個地依然極端提防政府的統制，特別是採取國家機關干涉「產業自治」的那種形式的政府統制，在一種經濟危機或戰爭所造成的緊急時期中，托辣斯都被戰時利潤餵得肥了，它們依靠着自己強國的地位來維持對經濟的統治權而多半無需靠政府的幫助。托辣斯所控制的那些貿易團體，成了無需國家協助而維持卡特爾化的控制的一種充分有效的工具。

決定大資本家對於這類問題的態度，是它們恐懼政府干涉的增加會使產業的支配權落到國家掌握中去，而這樣的國家止可以成爲反對獨佔資本的有效工具，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美國的獨佔產業家費着極大的辛苦企圖保證他們對於龐大的戰時製造廠（這種製造廠是政府資助和發的）的管理權和控制

權。

生產事業的國家所有權，掌握在某一些人的手裏，可以變成束縛和抑制獨佔資本的最有效的武器，所以獨佔資本家所最關切的是在決定戰後政府對於戰時製造業的處理權，是他們應有決定的發言權。巴魯區和漢柯克 (B. M. Baruch and John M. Hancock) 在他們關於經濟調整政策的報告書中，提出警告，表示反對「政府利用剩餘戰時製造廠來跟私人產業競爭」，而同時勸告不應支持獨佔資本去參預政府財產的處理，但是希望獨佔資本事實上不參預戰時製造業的處理，特別是假如政府在最初放棄了國家所有權這一重要武器的話，那是一種空想。實在說來，政府和大實業界在他們反對國家所有權（這是國家干涉經濟的一種最有效的形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政府政策的這一態度及其背後的動機在一次對海陸軍部建議的討論中，表現得頗為明顯。海陸軍部的建議是要在航空和交通事業領域內建立單一的國家獨佔，它們認為這對於國防是極端重要的。這裏的中心問題是控制或掌握美國軍事機關和政府機關在全世界各地所設置的飛機場和各種交通設備。美國國家掌握的全世界上的飛機場當然是大大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私有獨佔企業所掌握的現存的航空網和航空設備。在電信交通方面，政府所掌握的設備或許可以跟國際電信公司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的全球電信網相匹敵。許多政府所有的電信設備，在那些美國可以當作戰略基地來掌握的地區內，將仍舊受軍事機關的控制，但是現在有大量的戰時剩餘物資是可以變作民用物資的，而且有些剩餘物資還留在那些從便利經濟和政治侵入的觀點上具有極大價值的地區內。海陸軍部建議建立一個以政府為背景的美國旗幟的世界航空獨佔企業，又主張合併一個無線電話、無線電報及其他電信事業以建立另一個電信交通方面的獨佔企業，他們主張用這些辦法來解決上述問題。

國務院反對這一計劃，倒不是因為它違反美國有效地利用戰時在全世界各地所建立的一切設置，而是因為它認為用別種方法可以更美滿地達到這一目的。副國務卿克萊頓 (William L. Clayton) 向一國會委員會所解釋，航空事業方面美國政策所追求的目的，基本上不是為着聯絡本國跟美洲各地（猶如英國的情形一樣）的關係，「而是為要把美國旅客和美國物產在我們自己的國旗之下輸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這也就是美國在全部國際貿易領域內所採行的經濟政策的正確解說。

但是克萊頓反對海陸軍部計劃的主要理由，在這點上是有特殊意味的。他認為政府監督之下所建立的一種單一的獨佔企業，到最後將變成政府的所有物。他的理由是軍事當局所追求的目的，通過「競爭的制度」，亦即，通過現有的一些航空獨佔企業（尤其是因為它們並不感到資金或資源缺乏的障礙）也同樣可以達到。在電信事業方面，克萊頓反對各個電信機構的合併，因為在這種場合，這樣一種政府指揮下的合併，也將造成國家所有權的前途。

然而在上述兩種場合中，國務院都贊成由政府實施統一的統制政策而不直接參加到任何獨佔企業的經濟管理機構中去。他認為政府和私人公司的合作，為着跟外國政府進行商務談判的目的是必要的。克萊頓這樣表明他的意見說：「我們能够保持我們所特有的美國方法的長處，而與別國進行有效的磋商，而無須採取它們那些經濟生活的體制。」他把他在這些事業上所建議的政策，稱之為「有節制的競爭」。

這種「自由」的和「有節制」的競爭之整齊的和可伸縮的均衡，並不存在於聯邦行政管轄下的其他部門。海陸軍部為着充分運用政府權力而強制實行產業合併和鼓勵獨佔以貫徹擴張主義的政策；別的部門却走相反的極端來執行同一政策。例如溫德爾·貝治 (Wendell Berge) 不但反對「政府卡特爾」，而且也反對政府對卡特爾的統制，因為「政府對於這類契約（指卡特爾契約——譯者註）的有效統制，需要對私人產業實行一定程

度的干涉和監督，這樣就會使我們自由的私有企業財產制度陷於極大的危險。」

雖然他很關心着美國國內「自由的私有企業財產制度」，他却毫不猶豫地主張用各國政府的共同行動去淘汰外國那些「不中用的和勉強維持着的」產業。就實際性質言，淘汰這類產業的建議，其主要用意是在對付英國的產業，因為英國的產業是比較上技術落後的一個突出的例子。貝治很善良地建議把國際貸款分配給那些應當順次淘汰的落後產業，這種辦法很容易被人解釋成實行全世界產業節制的一種建議。

美國托辣斯化的「自由企業」若要在世界上開闢道路，它就還須取得重要原料產地的控制權。這常常成爲反對「政府卡特爾」的幕後原因（所謂「政府卡特爾」，有時是指的幾乎任何一種的政府貨物協定）。例如英國，獨佔着好多種原料，它們的出產地都在英帝國的、荷蘭的及其他的殖民帝國領域內。英國獨佔資本家通過政府統制的卡特爾和貨物協定來壟斷那些美國或美國統治地區所沒有的物資——如天然橡皮、錳、奎寧、金鋼鑽和大部份的白鐵。因爲這些物資沒有滿意的人造品或代用品可以代替，也因爲英國的殖民地獨佔是不能侵犯的，所以美國的工業家只好依靠英國所控制的卡特爾。

爲完滿的自給自足的努力成爲美國政策的特點，這種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打破這類原料卡特爾。這裏存在着一種策略上的分歧。有些人主張消除一切政府卡特爾作爲美國經濟援助的報酬，而在這方面開闢自由競爭的門路。還有一些人對抗一般的反卡特爾政策，還有一些人則主張利用美國的各种重要原料的統制去開闢一條參與現成卡特爾道路，正如把集體托辣斯制度當作打進舊的殖民地獨佔事業中去的一種手段，後面一種見解是包含在美國對貨物契約政府政策中。主要的重心是放在以下的辦法上：就是把一切消費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跟原料出產國家放在平等的基礎上，以對抗這限制原料出產國家參加此種卡特爾契約的英國政策。美國又建議訂立某些原料的契約，那些原料的生產在戰爭期間已經大大的增加，同時它又極力主張成立一國際經濟組

總以監督一切政府的貨物契約。很明顯的，它的用意是在迫使他國重新考慮一切政府控制的原料卡特爾制度。美國政策所根據的是企業自由的主義和強調反對限制美國商業的貿易壁壘，所以它在某些方面擁護卡特爾型的契約的態度上，表現着它的充分伸縮性。甚至政府所指揮的或政府發起的卡特爾也會經被批准過，當那些卡特爾對於統制剩餘物資或取得一大部份已為別國所獨佔的原料而被證明是有用處的時候。當擴張主義在計劃要求政府的干預來「統一」政策或打破既成的獨佔時，政府的干預就立刻見諸事實。

所謂自由企業，即使把它當作一種學說來看，亦遠非一律的和不可破壞的法規。整個的說，政府的干預國民經濟是被限制在最少限度內，而那些巨大的自由企業則享受着無比的行動自由，這些都是事實。當政府干預有利於他們的目的時，它就受人歡迎；反之，當這種干預妨礙到托萊斯的自由時，它就會遭到強烈的反對。

二「反卡特爾」的內幕

假使說英國的親卡特爾政策，從它企圖恢復戰前關係這點意義上講，是靜止的和退化的，那末美國的卡特爾運動的意圖是在使卡特爾體系永遠保持戰事的破壞狀態而用一種新的制度去代替它；在這種新制度中，美國獨佔資本有取得主導地位的保證。這就是美國發動反卡特爾的十字軍的原因。一九四四年九月，前總統羅斯福致赫爾國務卿的一封信，常被援引來作為反卡特爾政策的根據。故總統主張把德國和納粹利用卡特爾以達到政治目的的道路予以切斷時，他說明他的對德一般政策如下：

納粹軍隊擊潰之後，將立即繼以消滅經濟戰爭的武器（卡特爾）。但是除了消滅德國卡特爾的政治活動之外，還須要有別的舉動。凡限制國際貿易中商品自由流通的一切卡特爾活動，均將予以剷除。國際貿易上要達到這一目的，只有依靠聯合國的共同行動。

這裏提出了兩大目標：一個是消滅當作經濟戰爭武器的德國卡特爾，另一個是限制國際貿易的各種卡特爾活動。這裏沒有說明白，究竟故總統的意思是消滅整個的卡特爾制度，還是僅僅剷除那些限制國際貿易的活動，雖然限制、統制和節制都是一切卡特爾的實質，也就是一切資本主義獨佔制度的實質。不過不論從廣義的或狹義的意思上去解釋，羅斯福的那封信是反映着美國戰後時期的基本經濟政策：目的是在排除或減輕一切對外貿易的障礙和限制（不論是政府的或私人的）而避免美國國外貿易和國外投資的擴張受到阻礙。這裏建議用「聯合國的共同行動」來達到這一目的。

這種政策具有一種運用美國中產階級的傳統的反托辣斯情緒之功用，羅斯福在他的全部政治措施上都反映着這種情緒；而同時這種政策又照顧到美國獨佔資本的基本要求。基爾戈委員會發展這一政策的方向，有着特殊的意義。它關於「卡特爾和國家安全」的報告書，概括了關於戰前卡特爾制度的種種發見，純議不僅要消滅德國的卡特爾，而且要消滅整個的卡特爾制度。它認為維持國際卡特爾制度的任何努力將幫助德國軍閥獨佔集團保持其權力。排除某些卡特爾活動或將卡特爾置於政府監督之下，這類局部的舉動是很不夠的。卡特爾制度本身應予排斥，而且還要用強迫辦法禁止本國人民參加任何的國際卡特爾。

在基爾戈委員會對於卡特爾問題的一般態度上，反映着領導的大實業界中一種流行的意見；這裏指的是他們只對戰前的卡特爾組織表示反對。基爾戈委員會對德國工業和德國工業家的態度却並非代表美國大實業界的確立立場。也不能說美國的獨佔資本家是站在永遠消滅整個的卡特爾制度。大體說來，他們是反對舊的卡特爾組織的恢復，因為那種卡特爾組織，對於日益強大的美國經濟力量已經成爲一種極大的限制了。顯然他們並不反對用政府的壓力和一種戰鬥的反卡特爾主義去爭取更大的一份世界市場和開闢經濟侵入的新領域。他們也不會太反對強迫那些頑固的獨佔資本家的伙伴們目前暫時留在卡特爾圈子外面，假使這是符合推行擴張主義的主

要目的的話。這種立場充分地表現在政府的「自由貿易」的一般政策上，反卡特爾綱領就是在這種政策範圍以內發揮着的。這可以拿副國務卿艾其森 (Dean Acheson) 向國會委員會所提供的解釋作爲例證：

假如我們容許工商企業通過相互間的合約來限制產額、劃分市場和維持市價，我們減輕生產和貿易限制的一切努力，顯然將不會發生充分的效力。」（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國務院公報」）

這樣的說法，自然並不完全投合那些依據限制產額、提高價格和劃分市場等原則而活動的大亨們的口味。但是這種說法，却不傷害任何人，因爲一些支配的托辣斯統制着國內市場，他們在國內市場上可以爲所欲爲，而對他們在別國的競敵們則大談其獨佔的罪惡。指出這種罪惡，對於在國內市場上已不受外國資本競爭的威脅而熱切企圖向國外擴張的托辣斯工業，是毫無危險的。

紐約大通銀行行長兼國際商業公會主席亞德律奇 (Winthrop W. Aldrich) 很明白地表示這種態度，他在概括他的對外經濟政策的意見時，把這種態度表達得非常簡明：

依我對於這個問題的了解，世界貿易的基礎包括排除貿易壁壘，取消國際卡特爾及國際貨物協定制，發展建設性的對外貸款政策及實現各國幣制的真正穩定。

論及卡特爾時，亞德律奇氏的立場是代表國內一些對世界市場和國外投資極感興趣的最高的獨佔集團之意向的。他說：

國際卡特爾和國際貨物協定制都跟私有資本主義和自由企業制度相衝突的。從它們的經濟效果上講，兩者都類似貿易壁壘，因爲它們或是限制對外貿易的總額或是引導對外貿易離開它的最經濟的道路……

國際卡特爾和貨物協定制是否會在戰後世界得到新的鼓勵，這大半要看美國的政策。我相信美國的政策可能是相反的一種。

雖然在貨物協定制和幣制穩定這類問題上存在着意見分歧的形迹，亞氏的這些見解可以當作代表高度托辣斯

化的工業和金融集團的立場。這個集團企圖藉它的實力來對抗以英國獨佔資本家為中心的卡特爾結合，因而也藉設法阻止這類競爭的卡特爾組織的出現，來爭取世界市場的巨大份額。

從這點意義上說，政府的反卡特爾政策既反映着傳統的中產階級的反獨佔的立場，同時也跟大實業界的最高目的完全符合的，這些政策的結果，不論它們的原因或動機如何，是促進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擴張趨向。中產階級的反托辣斯的情緒和托辣斯大亨們的擴張主義的目的二者的符合，在美國助理大法官溫德爾·貝治（他的職務是監督反托辣斯法規之執行）所著「卡特爾對自由世界的挑戰」中的一段文字上，我們可以找到最顯明的例證。在確定英美兩國採取聯合反對卡特爾的立場對於雙方都有利益之後，貝治坦率地提出了下面的意見：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相信美國的暴露卡特爾活動的祕密可以對別國的公開政策發生效果，並且可以促進共同的瞭解：大家認為某幾種活動不論在別國或在美國都應置諸法律保護之外。但是不論別國政府採取跟我們相似的政策到甚麼程度，美國實業界是無疑的能夠在跟外國卡特爾的競爭中發達起來，假使它不受到卡特爾的限制的話。美國的企業一旦解除了卡特爾的羈絆，就能很好地在世界市場上擴張勢力，而使外國的卡特爾控制失去效力。不過任何一個大國際卡特爾是否能夠沒有美國實業界的參加和合作而有效地控制世界市場，這實在是很成問題的。這裏存在着一個實在的問題：外國的卡特爾能否沒有美國的合作而長期的在許多工業中維持生存。

這裏很明顯地表示着一種信念，認為巨大的美國托辣斯和康拜因掌握着龐大的生產力並且有雄厚的資金作後盾，能夠跟世界市場上任何一種獨佔資本的結合作有效的競爭，並且迫使它們屈服。可是在某些場合，美國的工業還沒有充分地集中或卡特爾化去對付卡特爾的競爭，這一點貝治也是注意到的。他贊成依據韋勃·波美倫法案組織出口團體（實際上就是美國產業界的卡特爾）作為「在卡特爾市場上保護美國利益」的手段。他認為這樣的結合可以取得世界市場上的平等地位。但是他又主張當美國的出口團體能够被允許加入一個世界卡特爾並參加世界市場的分配，它們就應當依據休曼法案（Sherman Act）而行動。出口團體的任務是在那些尚

無充分強大的聯合組織的工業部門中，促進美國產業家的競爭能力。他寫道：

如果這種出口團體在戰後世界中是經濟上有效用的，如果它們為公共政策所容許並且為它們的創辦目的而服務，那末當美國工業的爭取世界市場的公平份額而進行跟外國工業的競爭時，那些出口團體就必須成爲美國工業的先鋒，而不要作國際獨佔資本家把美國工業拉進卡特爾協定的限制（這種卡特爾協定中包含着跟休曼法案相抵觸的條款）中去的工具。

貝治所提出的重要意見都爲考溫·愛德華（Corwin D. Edwards）所支持。照他的意見一種美國的片面政策能够阻止國際卡特爾制度的鞏固，因爲任何一個單獨的強大產業家或產業家的集團都能够應付競爭，同時就能在美國出口貨物演着重大作用的那些工業部門內，阻止外國卡特爾的穩定。愛德華認爲政府對於參加卡特爾的美國人予以接連不斷的檢舉，能迫使美國實業界執行反卡特爾的政策。他舉出四五十起卡特爾訴訟案件促美國司法部注意。那些案件，即在戰時情況之下，有些仍以判處罰款了結，有些被判放棄卡特爾合約，有些被迫訂立阻止舊協定復活的種種規條，也有些案件則被判促令一些大康采恩自動改變對外政策。愛德華甚至建議說，美國可以迫使別國政府改變它們的政策。他堅信在世界任何地方實行政府或實業界的限制政策之前，美國決不能得到滿足，並且認爲美國必須靠同盟國所認爲有效的手段的幫助，去跟這種傾向鬥爭。

在實質上，美國政府所追求的，是企圖藉用壓力迫使別國廢棄舊的卡特爾組織以實現「自由貿易」政策，同時又通過種種反托辣斯的辦法，以迫使美國產業界退出卡特爾。英國所追求的目標却是恢復戰前的卡特爾制度，所以它的政府政策，是趨向於促成英國工業更大規模的合併和更高度的卡特爾化。在這兩種場合都需要政府的直接干涉：在英國，政府促使實業界參加卡特爾作爲一種統一的和有約束的政策；其在美國，則政府強迫美國工業的一切部門（甚至於一些獨立企業）退出卡特爾。美國人喜歡稱這種政策爲「自由競爭」，而稱英

國的政策爲「有節制的競爭」。實在說來，這些稱號不過是用口號的形式表明了英美獨佔資本在重分世界市場的鬥爭中的敵對立場。

那種全力的反卡特爾政策並不爲所有大實業界和所有政府方面的人所完全主張。這些派別並不完全以爲美國托辣斯的力量已經很充分，足能在一切場合衝破一切舊的卡特爾關係（包括一些重要的工業和原料的獨佔），尤以卡特爾背後有政府支持的場合是如此。代表這種觀點的，就如前任經濟作戰局行政長米羅·潘金斯（Milo Perkins）他同時担任幾大公司的對外政策顧問所寫的：

美國的實業就算是最堅強的，要應付受政府力量支持的組織完美的外國實業的競爭，也是相當棘手的。這裏的區別就在外國政府的參加活動。我們的政府是世界上積極反對集中統制對外貿易的惟一政府，這是實在的。但是環境的壓力將迫使我們接受卡特爾制度，因爲別的國家是容許這種制度的。

當潘金斯贊成德國人支配的卡特爾制度應予摧毀，德國和日本的獨佔資本的權力應予剷除時，他並不想廢止卡特爾作爲一種經濟政策的工具。他的態度是很謹慎的，他表示要爲卡特爾制度服務同時又反對卡特爾制度，兩者可視環境之需要而並行不背。他認爲這裏的中心問題是在：「使各種不同的競爭和獨佔的形式成爲我們國內和國際政策的有效工具。」

凡是持這種見解的人，都贊成用強迫登記一切卡特爾協定的方法來實現政府對國際卡特爾政策的控制。許多大實業家對於揭露卡特爾協定的程度，意見上雖有分歧，但是他們大體上都贊成登記的建議，作爲建立最低限度的政府集中控制的一種方法，也可作爲對抗那些受別國政府支持的卡特爾的最高度的政策統一的辦法。例如由一些大的出口事業和運輸事業所組成的國民對外貿易公會（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主張向國務院強迫登記卡特爾合約，理由是國會明白確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的目的，卡特爾亦須加以尊重。

企圖跟英國結成共同戰綫的傾向是對付歐洲新民主國家和蘇聯的總政治方針的一部分，這種傾向在這裏無疑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英國獨佔事業的領袖們也使用相應的壓力來建立這種類型的卡特爾合作。關於一九三八年杜塞爾陀夫 (Dusseldorf) 所努力的事情的追憶，就是英國產業聯盟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主席一九四三年十月間致美國國民對外貿易公會全國大會的一封信。該公函內聲明：「英國產業聯盟認為英美產業界的密切合作對於戰後國際問題的解決具有極大的意義」，並且表示願意「跟美國實業界討論如何使兩國工業能夠爲着共同的任務而實行最完善的合作。」

衝突是尖銳的，但是反動的政治脅迫也很強大。大西洋兩岸都在爲着克服這種矛盾而作堅強的努力。大實業界的戰時國際集會之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紐約所舉行的賴伊會議 [Rye conference]），雖在見解上發生劇烈的衝突，但是結果通過了一個決議，聲明「維持這種卡特爾合約的利益並且避免違反任何國家的公共利益以利用這種合約的行爲。」美國獨佔事業的領袖們也跟英國的獨佔領袖們聯合發表聲明說：「對於國際經濟合作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他們對於這些卡特爾合約在儘可能廣大的地域上達到見解和行動的協調，並且規定管制這些協定在國際貿易中的條例和規程。」

大實業界裏一位反卡特爾領袖亞德律奇，是賴伊會議上的領袖人物之一，同時又是主張英美「合作」作爲解決國際和平問題之鎖鑰的最堅決的代言人。他極力反對布里頓森林所議訂的國際建設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計劃，他的主要理由是英美協調必須成爲聯合國任何一般協定的前提。他是最先擁護美國貸與英國幾十萬萬美元借款之一人，這筆鉅額貸款的報酬，是美國實業界可以自由侵入英國勢力範圍中去。以國際商業公會主席的身份，亞德律奇會力圖建立一種英美合作經營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中，英國將居於次要地位，但是它的任務是在實現美國獨佔資本的世界目的。

在工黨選舉勝利後不久，倫敦舉行了戰後第一次國際商業公會的代表大會，之後，亞德律奇向他的紐約實業界同人們解釋，說：「我們跟英國及英帝國各部份成立一種共同協調，」不僅對於我們自己和大不列顛諸民族，而且對於私有企業居支配地位的全世界各個地區，「都有極大的利益。依照他的意見，對於重建西歐，特別是對於遵循英國實業界領袖集團所熱烈擁護的路線以貫徹於對德的經濟政策，這樣的一種協調是十分重要的。照亞德律奇的解釋，這裏的問題「並不在限制德國工商業的復興，而在建設為維持德國人民生活和支持歐洲其他各國的經濟所必要的各種工業、運輸和交通事業。」

美國獨佔資本利用反卡特爾政策作為打破既成獨佔勢力的工具，去阻止跟美國托辣斯競爭的外國卡特爾的結合，以便把美國大公司組合的體系擴展到世界各地去；但同時它也並不關閉建立一個為它自己的擴張主義和政治目的服務的新卡特爾體制的門路。

國民對外貿易公會所草擬的一個關於卡特爾的詳細的法律文件，可以作為例證。有一長串的證據被提供出來證明，為着「民族的利益」，參加卡特爾比拒絕卡特爾對於美國工商業是更有利的，因為即使沒有美國的參加卡特爾反正是要繼續存在的。該文件又說明美國政府將參加卡特爾置諸法律保護之外的努力，由於美國資本參加國外康拜因和聯合公司，又由於美國公司在國外設立分公司，而那些分公司是以「外國企業」的資格參加卡特爾，所以大半是不會有效果的。國家干涉經濟的傾向在國外繼續增長中，——這一事實被該文件當作一種證據來引用，證明要改變別國的立場來適應美國人的自由貿易觀念，那是不現實的。蘇聯就是我們所不能希望它改變立場的一個例子。所以對外貿易公會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們的私有企業若要在國外繼續經營，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政府的合作，和要求國際經濟協定適應自身利益的權利。」

這裏關於採取何種手段的問題，存在着意見的分歧。一部份人主張至少在目前須完全依靠強大的美國托辣

斯的力量；另一部份人則主張同時，甚至於主要地，利用有政府力量作後盾的卡特爾這種武器。主要的目的是擴張美國對世界經濟控制權，這是沒有爭議的。也不能說包括最大的托辣斯在內的美國獨佔經濟的任何重要部分（那些托辣斯是多半依靠它們自己的公司體系的直接伸展，而對卡特爾的依賴較少）主張摒棄卡特爾，除非這種主張可以當作反對英國支配的經濟體制的一種力量。

甚至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在一九四四年底的大會上，也宣佈說，「卡特爾是違反自由企業的原則的，」接着就開始對政府的卡特爾和獨佔事業發動集中攻勢。在自由企業家的術語中，這特別是對外國支配下的卡特爾和對政府指揮本國經濟的舉動而發的。然而在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對內文件中，却常常對卡特爾表示相當的尊敬。他們承認卡特爾的制度可以因各種的壓力而在將來有所改變，所以他們並沒有拒絕卡特爾制度本身的意圖。拒絕卡特爾制度，對於全國製造商協會實際上是一種幻想，而且無異否定製造商協會本身，因為這個協會在美國統治着整個貿易組合的機構。

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其他領袖們能够使他們的見解更自由的發揮。當希特勒德國將近失敗的時候，有些自由企業家開始大為憂慮，而且對於一個民主的歐洲的前途表示惶惑。全國產業會議(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這是隸屬全國製造商協會的一個組織)主席約但博士(Dr. Virgil Jordan)在馬薩諸塞斯工業家大會上發表了一篇諷罵性的演說，其中有下面的一段：

歐洲和亞洲的政治家，正在根據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計劃着和建設着他們的戰後世界，而納粹的軍事力量是靠我們的幫助而摧毀的；這些政治家比納粹份子知道得更好或更早，他們知道世界不能在一半社會主義的奴役制和一半經濟自由制之下生存得很久。承認這一事實，對於斯大林的極權獨裁制終究比對於像英國這樣一個議會政府制的國家要迫切些；因為英國必須靠對外貿易維持生存，否則就要挨餓，並且它知道它的戰後計劃經濟，不論如何完備，決不能在世界自由市場上跟自由美國的生產力去競爭……

在一個戰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世界中，前新政（pre-New Deal）時期的經濟自由觀念，將依然成爲在國際和國內的一種破壞性的革命勢力，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布爾雪維主義一樣。

三 進出自由

「自由進出於原料產地和世界市場」，這是常常用來說明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之實質的一句話。在這口號中，包括着一切擴張主義的自由。假如說英國企圖用一種卡特爾化的和政治的統制制度來改造它所支配的區域布洛克，那末美國的關心維持跟它自己的自由貿易計劃相聯繫的區域布洛克，也不減於英國。

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間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汎美會議，提供了關於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技巧和目的的重要證據。查普梯潑法案（Act of Chapultepec）擬定了一種避免外來政治干涉的汎美洲體制。美洲各國的經濟憲章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在美國單獨控制下的經濟布洛克。這個憲章是美國所提出的；後來只在會議上略加修正而通過。這一憲章主要的是美國政策的一種陳述，它完全反映着美國獨佔資本的擴張計劃。它的目的是在建立「自由競爭」制度的不可侵犯的卓越地位，也就是說，在美洲建立一種獨佔制度的卓越地位。

在汎美洲經濟憲章中所宣述的十大原則，其要旨可概括如下：

- （一）擴大國內和國外貿易及投資以實現更高的生活水準；
- （二）對於貿易原料和商品生產，各國一律機會均等（最後一點是因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團的堅持而增加的）；

（三）在取消一切貿易障礙的原則之下，拉丁美洲各國提出了下面的附帶條件：「以適應保證世界各國人民獲得高度生活水準及各國經濟的健全發展之目的」；

(四) 各國政府以共同行動去阻止「妨礙國際貿易、抑制競爭、阻撓生產的最高效率及公正的價格競爭」的卡特爾活動；

(五) 凡「可能由經濟國家主義所造成的過剩現象」應予消除；

(六) 「美洲各共和國將與投資及資本的自由流動以極大的方便，本國和外國資本應受平等待遇，除非外國的投資違反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則（最後這一句是因拉丁美洲各國的壓力而加進去的）；

(七) 一致擁護布里頓森林關於成立國際銀行及世界貨幣基金的建議，同時也擁護聯合國的糧食和農業機構；

(八) 促進私有企業制度，「儘可能地排除阻撓或妨害經濟發展的一切障礙」；

(九) 成立包括消費國和生產國的國際貨物協定，「在一些首要的貨物發生累贅的過剩的那些例外場合」；

(十) 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在費拉台爾非亞會議上所確定的目的，須由美洲各國工人予以實現。

墨西哥會議繼續經濟憲章而通過的關於發展工業的決議，除重申這些原則外，又強調下述的見解，作為發展工業的最有利的條件：

……我們的希望是要做到各國工業無需乎經常的高度關稅保護而仍能生存，因為這樣的保護是會損及消費大眾的正當利益的。在現存工業中建設新廠的場合，對於這類製造廠的產品就無須給予更多的保護。在工業建設中，美洲各共和國將從事鼓勵私人企業而儘可能避免政府跟私人企業的競爭，除非它對於公眾利益是必要的（最後這一句是拉丁美洲諸國所增加的）。

還有一點也因拉丁美洲各國的堅持而增加到工業決議裏去的，那就是應保證各國民族資本有「公平而合宜

的參加」於新生產企業的建設和管理的機會。這類產業投資，依照這一增訂部分的決議，「作為一種通則規定，不應排擠現存工商業或其他經濟事業中的民族資本。」

可以明白看出，不論在經濟憲章抑或在工業決議中，主要的着重點都放在鼓勵私人企業和反對政府干涉經濟兩個要求上。在憲章的緒言裏，經濟自由或經濟領域內的活動自由，反復強調不下五次之多。雖因拉丁美洲各國的反對而隨處附以條件，查普梯潑的經濟文件中終究包含着擴張主義的四大自由。

某些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團所爭得的一些修正，隱約地反映着拉丁美洲勞工界和工業界中被這一計劃所激起的反對意見。雖然某些部分的民族資產階級願意在投資計劃中接受美國大實業界的條件而與之合作，但是大家都明白美國大企業公司對於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之無拘束的和無限制的擴張，對於它們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獨立可以發生悲慘的影響。墨西哥和古巴的民族工業家團體，對於上述文件採取了尖銳的批判態度。

拉丁美洲的進步份子的反對，最明顯而最有力的表現在拉丁美洲勞動同盟 (Latin American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主席托萊且諾 (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 的態度上。評論到經濟現狀和工業決議的最後修正案時，他指出這兩個文件未曾提到對於外來投資的任何重大限制，「如此不受拘束的投資，正如今天以前一樣是造成拉丁美洲不平等地位和經濟結構落後的主要因素。」接着他又說明拉丁美洲勞工運動方面的態度如下：

對於外來投資規定合法的限制，應成為保護拉丁美洲政治獨立和為爭取經濟自主的一個必要條件……而且，經濟憲章完全沒有提到規定那些成為半殖民地拉丁美洲和工業國家間的主要貿易項目的貨物的價格問題。這個問題是異常重要的。剝削拉丁美洲的基礎之一是一這樣一種事實：大獨佔企業以極低廉的價格購拉丁美洲的原料而以高價在外國賣出製成品獲得驚人的利潤。

拉丁美洲勞動同盟對於經濟憲章強調所謂私人企業和國家不干涉國內或國際經濟的原則，也表示抗議。如果承認這一種原則就無異以獨佔資本家以他們所需要的武器，來掃蕩在拉丁美洲和本國的中小工商業。

這樣看來，獨佔資本在國外的擴張，不論是取自由貿易的方式，或通過卡特爾的制度，不可不避地激一種經濟和政治的自衛運動來反抗它。拉丁美洲各國的政府憑藉着各國內部的進步民主運動的力量，並且依據各該政府實際反映民族要求的程度，它們規定了多種政府型的統治，目的是在保護民族遺產和發展國民經濟。在這些統治和限制是爲着保證寬大的民族獨立而制定時，它們純粹是用來防禦帝國主義的侵入，和限制外國獨佔企業及外來投資的自由行動。

在兩次大戰期間，美國資本家在拉丁美洲投資情況的分析告訴我們這類投資如何造成了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片面性及阻止它的工業化。在一九二九年，採掘事業（農業、礦業和石油業）佔這類投資的百分之六二；公用事業和運輸業佔百分之二五，這些事業往往是跟原料的移動相聯繫的；而在製造業中還不到百分之七。外國資本幾乎完全用於開發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家的工業所需要的各種原料，並且爲建立原料來源的獨佔體制而努力。所以克服半殖民地經濟地位的一切努力，必須包括對投資方針的統制和限制及對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的保護辦法。

拉丁美洲勞動同盟的綱領主張建立對外來投資的各種統制。首先，外來投資的領域應予明確規定，而以防止外國資本控制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爲目的，在每一有外國資本參加的企業中，本國資本應佔較大的分量，以免民族資本被擠到次要的或非生產性的領域裏去。外來投資應按照本國的需要而予以限制，並應將投資所得的利潤再投於本國，作爲改進和擴充工業之用。外國資本開發本國天然富源應有一定的限度，此種統制應以保障本國資源餘裕及民族利益爲準則。外國資本的租讓事業應有時期的限制。關於運輸費及各種國家捐稅，均應與外國投資家訂定條件，勞資集體合約應以保障公平工資及勞工福利爲原則。

這些就是政府型統制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限制辦法，這些辦法是受外資幫助的拉丁美洲各國的工業化和現代

化所必需的；因爲它們若要在國家主權完整的條件之下及爲促使民族經濟向着最有利的道路發展而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就非規定這些限制不可。在汎美經濟憲章中作爲一個完整的綱領而制定的美國「自由貿易」的建議，不僅威脅着拉丁美洲各國民族的獨立，也同樣威脅着那些受同一建議之賜的其他附屬國和半附屬國的獨立。

第九章 一個美國的世界托辣斯？

美國對於各個國家和各個地區的「十字軍」征略的形式，是隨着它所遭遇到的阻礙的性質變更的。但是這種征略的性質和方向却十分明白。這裏顯示着一個世界霸權計劃的輪廓，這種計劃主要的是以獨佔巨頭的經濟擴張為基礎，並且得到對外政策方面相應的反動措施的支持。

在德國人遭了失敗的地方，美國獨佔資本家要去實現這樣一個計劃，能夠有多少希望呢？我們已經知道，一個 I. G. 法本的資本巨頭曾經如何夢想實現一個從敖德薩 (Odessa) 到馬賽 (Marseille) 的德國大托辣斯。這種千萬萬金元資本的托辣斯夢，所要囊括的不只是一個洲，而是整個世界。美國一些大獨佔公司的董事會裏所策劃的，不多不少正是這樣的一個世界托辣斯。

至少，這將成為軸心失敗後已在公開進行的擴張主義計劃的「邏輯的」頂點。這樣一個計劃能不能成功呢？它將如何抗禦過去歷史的經驗和應付當前現實的考驗呢？

一 通過卡特爾的世界「計劃經濟」

在卡特爾圈子裏，人們關於世界經濟的「組織」或「配合」，已經談得很多。在英國的輿論中特別強調着這一點。瓊斯爵士 (Sir Edgar Jones) 的世界同盟計劃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甚至在美國「自由企業」界裏，也會有人提出過一種見解，認為卡特爾體制，在不同程度的國家監督之下，輔之以國際間的政府貨物協定，能夠替調整世界貿易與緩和經濟衝突及危機，開闢寬廣的道路。

這種見解在美國的領導代言人哈斯教授 (Prof. J. Anton de Haas)，在其「論通過私人協議的經濟和
平」(Economic Peace Through Private Agreements)一文內，闡明了這種理論。他的主要論題是說國際
經濟合作，只有靠精密的計劃化和一定形式的統制，才能實現；這種統制將使私人事業的經濟活動適合於「世
界合作的模型」。一個穩定的世界，將「在各國經濟互相配合」的基礎上被建立起來。他認為這一目標不能通
過中央政府的機構來達到，因為政府的產業統制「將不可避免地傾向於增進想像中的民族利益」，因而將造成
犧牲國際經濟和平以追求民族利益的傾向。哈斯教授說，避免這種民族限界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卡特爾的途
徑：它首先須依據國內的產業協議或國內卡特爾化而建立起來。

假使卡特爾的目的是在排除一切民族限界而自成爲一個超民族的體制，那麼它就必須規定自己的法律及種
種合法的條例。因此哈斯教授力主這一體制（或制度）的澈底合法化，建立一個真實的世界政府：它有自己的
法庭，甚至於包括一個類似國際聯盟世界法庭的卡特爾世界法庭。照這樣進行，卡特爾就會變成「國際調協」
的工具，變成一條組織穩定的世界經濟的通衢大道：這樣的世界經濟，是不會發生民族利益的衝突的。哈斯又
援引了一位持同一見解的歐洲人韓托斯博士 (Dr. Elmer Hantos) 的話，意思是說世界卡特爾就是「一種世
界經濟的原則的實現，對抗民族孤立傾向的國際經濟團結原則的實現。」

總而言之，這裏所建議的不外乎把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實業自治」計劃實施到國際間去，再加上某種程度
的政府監督，俾能保護軍事工業，並給予世界卡特爾體制以合法的結構 (Framework)。

這種理論在實質上自然是很反動的。譬如說哈斯主張改造德國的獨佔資本，并將它包括在卡特爾體系中，
使它能夠「有效地對付俄國生產的聯合陣線。」可是他的理論是值得檢討的，因為關於世界經濟互相配合的問
題甚至在某些自由主義的圈子內也以不同的形式，發揮過類似的思想。

全部理論的基礎，正如哈斯本人所說，是這樣的一個觀念：他認為卡特爾體制在調整現存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將能穩定生產。生產的無限制擴大將不復可能。實際上，這是一種阻止經濟擴張的獨佔法則。托辣斯和卡特爾企圖以降低生產去適應需求，以維持高價來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的矛盾。獨佔利潤的作用是要造成一種物價穩定的局面。所以獨佔資本的傾向是在阻止生產上的改進或變革，因為這樣的改革需要極大的耗費，特別是因為現代的大工業建設需要鉅量的投資和極其複雜的裝置手續。一切為降低成本以應付競爭的改進，都儘可能地加以避免。所以在卡特爾協定中，獨佔資本家都企圖使生產量適應於現存的生產能力及生產程序，并且維持一種高到足以補償降低產量的損失的穩定價格，藉此以保障最高度的利潤。一切資本主義的獨佔事業，即使在經濟活躍的時期，也起着阻礙生產擴大的作用。卡特爾把這一法則擴展到全世界範圍上去了。

哈斯教授跟其他卡特爾辯護人一樣，企圖把壞事說成好事，他宣稱卡特爾能够限制生產去適應市場的需要，以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當然這是一切卡特爾參加者的希望，而且歸根結蒂也是一切冀圖藉某種卡特爾型的配合計劃以克服資本主義市場之無政府狀態的人們所希望的。

在某種限度內，一定工業部門內的卡特爾，能够使生產適合市場的需要，但是這只有在有限的時間內，而且也只有卡特爾本身情況穩定的條件下才做得到。但是卡特爾天生是不穩定的。它決不能長期經受經濟和政治上的任何重大變動，也受不起世界市場上的一種突發的風潮。到了那時，任何原先大家公議的生產和價格的限制規約，都將置之不問，而獨佔事業間的競爭將重新走向無限制生產的道路。這樣，卡特爾本身是在製造生產過剩的危機，因為它們是不穩定的，是意味着一種不自在的休戰狀態，每一個都在尋找一種有利於自身的市場再分配的黃金機會。

不僅如此，卡特爾本身同時也是經濟危機的犧牲者。本世紀三十年代的那次世界經濟危機（按即指一九二

能呢？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因為實際上這是以前德國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企圖所指示過的發展方向；而它在今天又被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企圖所提出來了。美國獨佔資本家支配世界經濟的企圖，是在一種「進步的」綱領之下，在「反卡特爾」和「自由貿易」等口號之下來進行的。但是綱領的內容是明白無誤的：美國「自由企業」的「自由進出」，意思就是伸展到資本主義和殖民地世界的每一角落的大獨佔資本的統治。

跟卡特爾和中間性的獨佔組合康拜因比較，托辣斯是獨佔組合的一種最穩定的形式。大規模的生產集積和所有權及控制權集中的過程——這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特徵——是在卡特爾發展成爲康拜因和康拜因發展成爲一個單一的所有權或控制權之下的完整體的趨勢上表現出來的。這決不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它是歷史地發生起來；而在今天，它的進行是衝突和鬥爭的結果。

因此就變成這樣一個問題了：少數美國的托辣斯巨擘，受着本國經濟的強大經濟力量所支持，又有着龐大的軍事實力做後盾，它們能够藉消除或併吞較弱的非美國的獨佔企業，藉建立它們對於別個獨佔企業的控制，以及藉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設置一種互相聯鎖的所有權和指導權的獨佔組合體系，來把它們（即美國托辣斯巨擘——譯者）自己擴展到全世界範圍上去，這是不是可以想像的呢？

這祇有當作一種發展的方向來看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發展本身却決不能達到它的頂點。因爲在能達到這個目的（即控制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獨佔體系之建立——譯者）的很久以前，這種發展已將轉到它的反對方面去了。

它將轉到反對方面去，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和世界獨佔資本內部的各種矛盾，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

府性，由於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各國的民主勢力和反帝勢力的反抗運動，以及由於蘇聯的世界作用等所促成的。很明顯的，對於美國托辣斯，新的擴張主義的機會是因德日兩個帝國主義的失敗和英、法及其他次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削弱而產生的。然而美帝國主義却也不能把原先被它的敵對的帝國主義列強所掌握的那些地位，很輕易地接管過來。

這首先拿對德日本部的經濟侵入來看，就會很明白的。當美國獨佔資本在德日兩國的康拜因中掌握着日益擴大的份額時，它們就增加着它們的投資去維持這些國家內部的獨佔資本結構。破壞這些敵對帝國主義的競爭潛力的傾向，被作為美國擴張主義之工具而維持它們的傾向所壓倒；其結果是美國獨佔資本的侵入愈甚，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就愈要恢復和重建這些敵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雖然美國的目的也許祇想把它們扶植成爲美帝國主義的衛星國，可是實際上它們的復興勢必重新燃起舊的帝國主義的敵對和矛盾，後者將重新威脅到美國的霸權。

在「接管」德日兩帝國主義的企圖中，美國擴張主義者所遇到的主要阻礙之一，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及團聚在其周圍的一些衛星國家的敵對力量。英國雖被戰爭大大地削弱了，可是它並未喪失它的抗拒美國資本巨璧之蠶食的抵抗力量。在掌握或控制戰敗國的財產和利益的鬥爭中，美國擴張主義的努力足以加強兩大世界主導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

這種敵對又因美國大實業界加於英國及其帝國的壓力而加強起來。在實現世界統治的野心計劃中，制服別的帝國主義的競爭這一目的，居於一個主要的位置。英國反動派從英美聯合行動中所企求的任何政治利益——例如免除本國的基本政治變革，避免帝國的完全解體，或建立一個共同的世界反蘇陣線之類，——將因可能變成強大美國之衛星國的危險而被抵銷。

能呢？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因為實際上這是以前德國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企圖所指示過的發展方向；而它在今天又被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支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企圖所提出來了。美國獨佔資本家支配世界經濟的企圖，是在一種「進步的」綱領之下，在「反卡特爾」和「自由貿易」等口號之下來進行的。但是綱領的內容是明白無誤的：美國「自由企業」的「自由進出」，意思就是伸展到資本主義和殖民地世界的每一角落的大獨佔資本的統治。

跟卡特爾和中間性的獨佔組合康拜因比較，托辣斯是獨佔組合的一種最穩定的形式。大規模的生產集積和所有權及控制權集中的過程——這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特徵——是在卡特爾發展成為康拜因和康拜因發展成為一個單一的所有權或控制權之下的完整體的趨勢上表現出來的。這決不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它是歷史地發生起來；而在今天，它的進行是衝突和鬥爭的結果。

因此就變成這樣一個問題了：少數美國的托辣斯巨擘，受着本國經濟的強大經濟力量所支持，又有着龐大的軍事實力做後盾，它們能够藉消除或併吞較弱的非美國的獨佔企業，藉建立它們對於別個獨佔企業的控制，以及藉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設置一種互相聯鎖的所有權和指導權的獨佔組合體系，來把它們（即美國托辣斯巨擘——譯者）自己擴展到全世界範圍上去，這是不是可以想像的呢？

這祇有當作一種發展的方向來看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發展本身却決不能達到它的頂點。因為在能達到這個目的（即控制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獨佔體系之建立——譯者）的很久以前，這種發展已將轉到它的反對方面去了。

它將轉到反對方面去，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和世界獨佔資本內部的各種矛盾，由於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

府性，由於資本主義與殖民地各國的民主勢力和反帝勢力的反抗運動，以及由於蘇聯的世界作用等所促成的。很明顯的，對於美國托辣斯，新的擴張主義的機會是因德日兩個帝國主義的失敗和英、法及其他次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削弱而產生的。然而美帝國主義却也不能把原先被它的敵對的帝國主義列強所掌握的那些地位，很輕易地接管過來。

這首先拿對德日本部的經濟侵入來看，就會很明白的。當美國獨佔資本在德日兩國的康拜因中掌握着日益擴大的份額時，它們就增加着它們的投資去維持這些國家內部的獨佔資本結構。破壞這些敵對帝國主義的競爭潛力的傾向，被作為美國擴張主義之工具而維持它們的傾向所壓倒；其結果是美國獨佔資本的侵入愈甚，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就愈要恢復和重建這些敵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築。雖然美國的目的也許祇想把它們扶植成爲美帝國主義的衛星國，可是實際上它們的復興勢必重新燃起舊的帝國主義的敵對和矛盾，後者將重新威脅到美國的霸權。

在「接管」德日兩帝國主義的企圖中，美國擴張主義者所遇到的主要阻礙之一，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及團聚在其周圍的一些衛星國家的敵對力量。英國雖被戰爭大大地削弱了，可是它並未喪失它的抗拒美國資本巨擘之贏食的抵抗力量。在掌握或控制戰敗國的財產和利益的鬥爭中，美國擴張主義的努力足以加強兩大世界主導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

這種敵對又因美國大實業界加於英國及其帝國的壓力而加強起來。在實現世界統治的野心計劃中，制服別的帝國主義的競爭這一目的，居於一個主要的位置。英國反動派從英美聯合行動中所企求的任何政治利益——例如免除本國的基本政治變革，避免帝國的完全解體，或建立一個共同的世界反蘇陣線之類，——將因可能變成強大美國之衛星國的危險而被抵銷。

從內部妨礙擴張主義努力的重要矛盾之一，是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弱點——週期性的危機。美國經濟上特別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迅速擴張和急遽衰落的週期循環；而且由於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起着主導的作用，其影響所及，勢必加速和加深全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美國助長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更大的不穩定性的傾向，是隨着美國海外利益之每一度的擴張而增強，這種擴張的結果，使他國國民經濟更牢固地維繫到瘋狂擴展着的美國經濟上去。經濟危機加強着帝國主義者爭取新的市場和新的利益範圍的努力，由此造成的對外擴張，結果亦將加劇帝國主義的一般矛盾，而同時製造新的經濟危機的種種因素。

從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觀點看來，更重要的是美國擴張主義十字軍的廣大的政治反響。跟早期的帝國主義擴張不同，今天美國的推行擴張主義，是在一種慢性的世界政治危機中間，而且又是在民主和反帝勢力比從前更加成熟和更有組織的一個階段上。此外，美國的這種努力是在歷史上的這樣一個時候展開着：即在由於全球解放戰爭的結果，基本的民主勢力（尤其是在歐洲和亞洲的）正在填補德日兩國帝國主義的戰敗所造成的「真空」的時候。誰來接管的問題，現在已不再是一個純粹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問題，如像早先的情形一樣。

蘇聯的社會主義體系是完全在獨佔資本主義的軌道以外活動着的，它在阻止德國帝國主義的復活上，在抑制和抗拒帝國主義對歐亞兩洲的侵入和影響上，起着極大的作用。它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已因戰爭而大大地提高，它的戰後和平政策鼓勵着全世界的民主運動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跟它的反法西斯的和世界安全的政策同時並進的，它也設法去發展特別跟它的鄰邦的廣大的經濟合作。這就有助於那些新的政權採取獨立的措施，去循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重建和發展它們的國民經濟。

在歐洲和亞洲因戰爭而大大加强的民主運動，現在成爲爭取原先爲戰敗的和削弱的帝國主義國家所掌握的某些地位的主要競爭力量了。它傾向於阻止獨佔資本在那些過去受異族統治的地區內的自由活動。世界經濟中

的新的部分，由於民主高潮的結果，正在從帝國主義的獨佔軌道上脫退出來。自由歐洲的反法西斯運動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特別在亞洲），對於帝國主義者和獨佔資本家的侵入，設置起了新的政治的屏障。美國的十字軍征略者可以用各種方法來破壞這些屏障，有時用和平的讓步和順應的方法，有時用直接干涉的方法；但是他們的擴張主義活動是受到日益加強的民主勢力的阻礙，這些民主勢力的動向是在完全消滅托辣斯和帝國主義的干涉。

更有進者，厲行擴張主義的另一後果是推動殖民地世界（在拉丁美洲、亞洲、非洲以及中東）新的反帝運動，同時又激起資本主義各國內部人民的反對。伴隨經濟擴張主義而起的，是美國趨向於和世界上一一些最落後最反動的勢力結成政治聯盟的傾向。舉例來說，假如美國要在德國和日本維持帝國主義的結構，那末它就非得在這些國家內部尋求那些壓制人民民主傾向的新法西斯反動勢力的支持。（此處有略）再則假如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證北美財團資本的完全控制權，那末政治上它必須設法支持那些反對工業化、反對土地改革和民主運動的封建反動勢力。假如在東南亞洲美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奪取對那兒的資源和市場的更大控制權，那末美國就必須設法去維持殖民地制度，即使這一維持含有挽救英、法、荷等殖民帝國的意味亦所不惜。這一切行爲的直接結果，是激起反法西斯的解放運動的昂揚，這種運動的鬥爭對象正是美國所要維持的那些反動勢力和美國自身。

這樣看來，美國推行擴張主義的結果是激化了世界的政治危機，在某些場合是鼓勵國內戰爭，而一般地說是加強資本主義和殖民地世界內部不安定性的一切因素。這反過來又影響到美國自身內部的安定性，因為這些情勢的發展，阻撓和延緩着戰後世界的穩定，減少復興世界市場的可能機會，並且增加由一次悲慘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種種危險。

美國擴張主義政策的另一種不小的政治反響，是造成美國內部和全世界的政治困難，這種困難是與蘇聯及其他戰時盟國的戰後合作計劃的破壞所造成的（而這一計劃的破壞也是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軸心失敗以後美國的立即轉向於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搗毀了和平的基礎，並造成了另一次世界戰爭的危機。美國人民對於鼓勵全世界法西斯勢力及威脅艱苦贏得的和平的那些政策的反對態度，本身也變成美國擴張主義計劃的一個重要障礙。

不管有着這一切美國擴張主義行爲的內部弱點和矛盾，假如我們估低了這種行爲背後的力量或它的危險性，那就其愚不可及了。除非明白地看清楚了發展的方向，我們決不能進行適當的鬥爭。擴張主義的「十字軍」並非循着一條連綿不斷的直線向前進行的；各種的矛盾和強有力的反對潮流，可能促成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但是這樣一個時期，必須被視爲一個可被勞動大眾和民主勢力充分利用來加強他們在國內的地位的喘息時間。假如沒有這些勢力來日益加強其干涉，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必將繼續爲擴張主義計劃的利益服務。

三 「進步的」帝國主義

有些時候，人們把美國大公司組合和獨佔資本的海外擴張的副產物，錯看作它的內容了。結果就以爲美國的獨佔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是要比英國的「進步」些。自然，重要的差異是有的，但是這些差異却不能看作或多或少進步性的表現。美國的和英國的帝國主義都是反動的，「進步的帝國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辭。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入，把一切民族，甚至經濟上最落後的民族，拉進世界市場裏去，促進半封建或殖民地地區內資本主義產業的發展；祇是在這種限度內，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喚起了某些歷史進步的傾向（historically progressive tendencies）。這些傾向包括一個近代無產階級的出現，前資本主義的或封建的生產體制

的削弱，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

正如獨佔資本控制下的大規模生產集中，結果造成了生產社會化和一個高度團結的產業工人階級，而這些結果本身是表現歷史進步性的發展；同樣的，獨佔資本向着世界落後地區的擴張，也產生了一些進步性的副產物。然而這些獨佔資本主義發展和擴張的結果，其所以具有進步性者，正因為它們既與過去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處於對抗地位，同時亦與獨佔資本自身處於反對立場。它們是進步的，因為它們代表着帝國主義和獨佔資本主義的反對物，因為它們形成着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將帝國主義轉變為它的反對物的那種力量。

因此帝國主義擴張的副產物不可以跟它的內容混為一談。帝國主義擴張的目的，不論是英國種也罷，美國種也罷，總是在伸展獨佔資本的支配權。它的政治內容總是反動。

由於歷史發展情況的各異，國內階級關係和政治關係狀態的不同，以及各自所處世界地位的特殊形相，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差異是確實存在的。這些差異也不是完全無關重要的。它們中間的矛盾發生於它們的不平衡的發展和它們構成的特殊形相；這些矛盾是可以為着和平和進步的利益而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在它們發展的某些時期中，某些帝國主義國家比較別的更富有侵略性和掠奪性；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和日本便是明證。

講到英美兩國的帝國主義擴張，在方法上和作風上是有一些重要的區別的。英國是沉重地依靠着它很久以來所建立起的殖民地的壟斷地位，當時英國資本主義尚掌握着工業和金融的世界支配權。這一龐大的殖民帝國，成為英國分佔世界市場和資源的基礎，同時也是它進一步向較小的帝國、半殖民地各國、及較大的資本主義各國實行經濟和政治擴張的一個基礎。因為英國的世界地位是大半建立在殖民帝國的保持上的，所以它特別發揮了對於殖民地民族的鎮壓政策。

當美國以一個完全獨立和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姿態出現於世界角逐場的時候，其他較老的帝國主義

列強早已佔有了大部分有用的殖民地。直到十九世紀末止，美國資本主義主要地尙只從事於本國內部的發展，力圖擺脫自己對英國資本的經濟依賴，及克服國內市場上的外資競爭。在那個時候，它已經發展了龐大的國內資源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市場。當美國帝國主義轉向於對外擴張時，它發覺最優良的殖民地「肥肉」和勢力範圍，已經大都被人霸佔光了。雖然，當時也還剩的有少許可以佔取的；在美國實行擴張政策的初期，它曾經也用過類似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所用過的方法，取得了一個小小的殖民帝國。

主要的因為國內資源很豐富，有着一個近代的工業機構和相當富裕的國內市場，所以美國獨佔資本在二十世紀初期並不覺得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建立它自己的殖民帝國有何等重大的意義。遇必要時雖亦並不棄置直接鎮壓的方法，美國帝國主義者主要地却利用着向現存的殖民帝國和勢力範圍實行經濟和政治侵入的那種間接方法。在它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設置完美」的勢力範圍內，爲着保障美國的霸權，它也會使用過鎮壓的手段，包括武裝干涉在內。但是整個地講，在第一次的殖民地攫取以後，直接的領土擴張在美帝國主義的擴張中，却只起着顯然次要的作用。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經濟霸權已經很好地建立起來的時候，它的擴張主要地是採取經濟侵入的方式，伴隨以與半附屬國家（如拉丁美洲和中國）的反動封建勢力的各種聯盟。在對外交策上，這就表現於「門戶開放」和「自由進出」的主義和譏刺殖民地制度的官方宣傳，雖然對拍托里科（Puerto Rico）和菲律賓，它也使用過鎮壓手段。

講到美國經濟侵入的實際效果，跟其他一切帝國主義的侵入實在也很少區別。不論在拍托里科和菲律賓這樣的殖民地，或者在拉丁美洲這樣的半附屬地區內，美國勢力的侵入，結果也不外是獨佔原料，阻滯工業和民主的發展，及支持那些最落後的經濟和政治的勢力。從這方面看來，美國和英國的擴張並無根本的區別。

除殖民地方面的差別外，在兩大帝國主義列強的發展上也可以發見另一重要的區別。這一點是列寧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分析過的。列寧曾經指出那些大半靠紅利和資本輸出爲生的食利國家的發展和一個富有的剪息金券者 (Coupon-Clippers) 階級的發生時，他確定帝國主義的界說爲「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雖然呢，他又指出一般的腐朽傾向並不阻止某些國家和某些工業部門內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可能性，而在別的國家和別的工業部門內，這種腐朽傾向則更爲顯著。當他寫這幾句話的時候，他曾發見一個事實，整個地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比從前快得多了。「但是這種發展——他寫道——不祇是一般地變得愈來愈不平衡了；它的不平衡性也特別表現在那些資本最富足的國家（例如英國）的腐朽上」（見「帝國主義論」）。

我們已經知道，英國的腐朽傾向在兩次大戰之間變得更加顯著了。本國對帝國之寄生性的依賴，大半是由於不列顛經濟之相對的落後性所促成的。倘能採取國有化的堅決措施（當然不是工黨政府上台時所採取的那種虛偽的國有化，而是根本反獨佔資本的一種，它將真正成爲走向社會主義的重大步驟），也可能在英國社會主義降生以前阻止衰落的過程，這樣的機會並非沒有的。但是內部的腐朽仍然是英國的一個特別顯著的特質。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及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經濟依然表現着一種擴張的傾向，及一種不祇在生產量上，亦且在工業效率上保持壓倒其他一切國家之優勢的傾向。這不是說，美國經濟中並不同時強烈地存在着寄生主義和腐朽的過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獨佔資本支配權的增進和海外經濟擴張的加強，這種寄生性和腐朽性是變得更加顯著了。然而美國帝國主義保持着一种強大擴張的能力，而在國內國外又保持着一塊超過任何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活動地域。

使美國帝國主義在侵入別國勢力範圍和現存帝國領域裏去時能够僞裝進步或民主的姿態，主要的就由於上述兩個特點：在殖民地制度方面的特點及在其相對的經濟剛強性上的特點。在大部份拉丁美洲既經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帝國主義者就強求對別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實行「自由進出」；他們聲明反對一切勢力範

團和一切殖民地制度，而他們的真實異議是在反對英國的獨佔，而且這也祇是對他們被排斥在門外的那些地區而言的。美國的擴張主義者憑藉他們高效率的和生產力龐大的經濟機構，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期間所聚積起來的大量資本積累，他們就採取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主義（雖然他們自己依然保持着高關稅制），並且宣稱他們所要求於他們的競敵們的，祇是依據平等的原則在世界任何地區享有自由競爭的機會。

戰時的某些發展，幫助了美國帝國主義製造一副「進步的」面貌。因為美國是在從事於一種本質上自衛性的戰爭，這一戰爭消融於全世界反法西斯軸心的解放戰爭中，以致甚至於美國的某些最熱心的反法西斯力量，也會傾向於完全忽視同時在企求滿足的特殊的帝國主義目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戰時愛國主義，傾向於跟利潤追求者的戰時愛國主義相融和；人民爲着正義而戰鬥的熱忱，傾向於跟帝國主義者爲爭取由德日失敗而產生的新的擴張機會的熱忱相融和。前總統羅斯福在勞工階級和進步圈子裏的極廣大的威望（那是因爲他對內實行新政，對外推行反慕尼黑的外交政策，以及他在戰時盡了一個反法西斯聯盟領袖的任務），傾向於模糊「四大自由」之成爲一種擴張主義計劃之外衣的那種作用。這一切均有助於造成一種自由主義的空氣，彷彿美國的一切對外計劃都是帶有自由主義性質似的。

除了這些道德的和政治的因素而外，戰前政治危機時期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和戰爭本身，大有助於妥協、退讓和順應等精神，而這類精神也正是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的特質。對於拉丁美洲的善鄰政策，轉向於與蘇聯合作的外交路線，一般地強調和平的和間接的經濟透入的方法而放鬆侵略性的措施——這一切都是產生於上面列舉的那些因素的。也許最重大的原因是在德日兩國的急遽興起，和在美國尚未從三十年代那次經濟危機中完全恢復過來及軍事上尙未準備好與它倆抗衡的當兒，它倆已向全世界推行了侵略政策，以致對美國造成了許多複雜的困難。經濟危機所促成的國內戰鬥的勞工運動的興起，拉丁美洲和一般殖民地三界的反帝反抗運動的高漲，

已經變成一個世界強國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這些都是迫使美國在其國內情況和國際地位感覺困難的時候暫時採取妥協政策的一些補充的誘因。前面已經指出，並不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時期，美國已經充分發展了成爲一個主要世界強權的一切要素。

一次全球戰爭的危機，也創造了某些軍事動員的必要性。美國租借物資的供應，不祇是幫助了蘇聯和其他同盟國的作戰努力，同時也幫助了一些殖民地和半附屬國家如澳洲、巴西和甚至印度（在某種程度上）的工業化。在拉丁美洲，物資和資源的動員的最大效果，是加強各部門經濟對於提煉工業的依賴及使這些國家更緊密地受美國經濟的束縛；但同時在戰爭需要的壓力之下，美國對於這些國家的民族經濟的發展，也作了某些重要的讓步。墨西哥的一些五金工廠的設立和巴西的大規模煉鋼康拜因的創辦，都是各該國民族資本和美國資本的聯合事業；這是背離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雖然只是例外的）顯著例子。同樣的，美國給予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發展各該國經濟的政府貸款，也是一種沒有什麼一般習慣上的限制和保留的。這些和其他的背離一般帝國主義作風的舉措，是戰爭危機所促成的，而且也只是暫時的讓步，並沒有改變經濟擴張主義的基本政策；這種情形在戰爭快結束時墨西哥城所舉行的泛美大會上，就表現得很明白了。

跟這些發展相類似的，是政府所擬訂的促使各半附屬國家工業化的開明計劃。在戰爭期間已經在積極推進的擴張主義的活動中，這類計劃成了反對舊的死硬的帝國主義列強的有效宣傳工具。英國人沒有能力在國內革新他們自己的工業，而對於印度也不敢給予過多的保證；美國的擴張却能够在那兒開設新的分廠，並且跟印度的工業界領袖商討發展印度的十五年計劃。

工業的計劃化對於別的國家已經十足地變成一種風氣，美國一位處理拉丁美洲事務的官吏準備了一個詳細的報告，說在戰後第一個十年期間，拉丁美洲所需要的機械和裝備總值將達九十八萬萬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將

由美國供給。這個估計是根據一種關於美國資本能够作多少有利的投資，加上拉丁美洲資本家所能搜集的資本額的精密計算的。但是報告中沒有提到如何集合這筆資金和依據什麼條約；也沒有說出如何克服美國托萊斯和本地封建勢力對於上述估計所指示的大規模工業化的抗拒。

美國對外經濟管理局關於中國工業化擬訂了一個更具野心的計劃。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佔寫滿了不下十冊之多。該計劃建議在五年內消費二十萬萬美元以建立一全國工業化的基礎。計劃程序中規定一省一省的實現動力計劃，創設煉鋼廠、冶煉廠、製造業、化學工業和食品工業等企業，以及發展運輸系統。這計劃是一個完全技術性的研究成果。（此處有略）

美國對外經濟管理局的計劃專家們，似乎沒有關心到這個計劃將如何跟反對中國解放運動的干涉政策相調和，以及跟掌握或控制日本在東亞的獨佔資本網的政策相調和的問題。不論他們的意圖如何，很明顯的，這個計劃祇有在遙遠的將來才有實現的機會，而且它祇有採取一種很歪曲的形式以及作為美國在華建立其實行遠東的政治和經濟侵入之基地的野心計劃的一部分，而被實現出來。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在殖民地區域採取某些工業化的措施，是在一切場合都在所不免的，如像日本人曾經在中國東北發展工業作為它的軍事基地一樣。

美國擴張主義的這些技術和方法，在戰爭期間使用的範圍更為廣大；這些技術和方法曾經幫助它們的計劃穿上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並且又適應於殖民地世界對於舊式的和比較熟悉的經濟侵入計劃的日益增長的反抗。在殖民地世界獨立運動的普遍高漲時期（如像日本戰敗以後開始的那種情形），這些策略和口號要比保守黨政策有效很多倍，因為藉此可以用一些關於美國「民主的」資本主義的開明性的幻想來麻痺民主運動。

也有人可以這樣辯論，說美國獨佔資本的企圖接管其敵對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世界地位，是一種進步的行為，因為它是用來代替舊式的和更反動的帝國主義的。這種論辯應當從對卡特爾制度和殖民地制度的關係上加

以考察；對於這兩種制度，美國的計劃都表現得比英國「自由」而且「進步」。

在表面上看起來，美國的強調打破卡特爾制度是跟托辣斯的擴大世界市場的份兒的目的相符合的；這樣的強調能够最有效地有助於德國獨佔資本的瓦解。在另一方面，英國的強調恢復和擴張卡特爾制度（包括德國的在內）是具有相反的作用。可是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却能證明比英國更有效地來恢復德國帝國主義的基礎，因為當他們在設法阻止戰前的卡特爾制度的恢復，作為限制英國參加德國經濟的手段的時候，他們是企圖把他們自己直接的公司利益，遵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好好確定了的路線，伸展到德國工業中去。美國獨佔資本家因為掌握着龐大的資源，在他們所選擇的方法上可能比英國卡特爾顯貴們所用的方法更有成效。

實在說來，誰敢斷言那一個是更「進步的」——美國托辣斯支配下的一種西歐的新的公司組合制度，一種大半通過德國托辣斯而有美國資本參加的英、法、德卡特爾制度，抑或是美國獨佔資本家所控制的英、美、德卡特爾機構呢？可是從理論上講，也祇有這三種可能的制度，假如問題只涉及財團資本家，就是，沒有民主勢力來干預的話。

美國對於英帝國及其他帝國的經濟侵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成爲一種重要的趨勢，而現在則以更大的速度向前猛進；這種行爲是沒有任何進步性的。它倒是可以被民族解放運動作有效的利用；那些民族解放運動者是知道如何利用舊帝國的削弱和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競爭者的壓力的。所以，英美的敵對可以被利用來從殖民地列強方面爭取較大的讓步。只有在這種意義上（而不是在把美國當作「解放者」的意義上），美國對舊殖民帝國的經濟侵入才能被看作一種對破壞殖民地獨佔的幫助，假定，同時那兒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充分強大，能够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保持自己的獨立的話。

再有一點，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要以爲跟經濟擴張同時並進的領土攫取，將不會在美國政策中演

更重大的作用。對資本主義和殖民地世界每一角落的經濟侵入，不只是指事實上已經公開的行動，而且也表現一種美國野心和計劃；這種經濟侵入又引起一種為戰略利益的平行行動，採取基地網及其他領土攫取形式的侵略行動。戰時所取得的地位——不論是殖民地地區和委任統治地區，都是海空軍的戰略基地或者還有其他的軍事設備，那些都可以用於商業和政治上的目的——沒有一定的補償是絕不會立刻讓出來的。

戰爭結束之時，這一點已經在美國政策上開始表演重大的作用；這有下列的事實為證：長期租借英屬西印度、紐芳蘭及其他地方的基地；用談判方式要求保留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許多地方的基地；美國存着一種顯明的意圖，要把從日本手上奪來的太平洋上許多島嶼，保留在它的掌握中，作為廣大的泛太平洋基地網的一部分，同時也包括英屬、法屬和荷屬領土上及台灣、朝鮮和亞洲大陸的其他地帶的特權和基地。

美國在前一時期所確定的政策，即使當產生這些政策的各種條件已經不再很適宜的時候，還是保持着下去的傾向。譬如說，羅斯福政策的好些要點，在戰後的各種計劃中都有着反應。但是當美國採取了一個領導的帝國主義強權的新態勢時，而且當它日益積極地表現這種作用時，它在政策上就會有重大的改變。戰爭結束時，美國對於殖民地制度的態度，就表現了一種新的傾向。羅斯福及其政策支持者曾經所提出的集體託治制的建議，是作為打破舊的殖民地制度的一種手段用的，後來已經被一種相反的傾向所代替了。對於日本戰敗後所發生的殖民地叛亂，美國支持英國和其他殖民地列強的維持殖民地制度的行動，不過成效如何尚待證明。

當蘇聯宣佈它的參加聯合國組織下的殖民地託治制的意願時，美國政府對於託治制的建議立刻表示冷淡。代替它的，美國政策中就開始發展着一種顯著的傾向，準備接受英國的建議——英美共同監督某些部份的殖民帝國的建議。配合着把英國當作美國帝國主義擴張的新階段中的一個小夥計的計劃，並不排除另一政策，即美國將跟英國肩並肩地成爲一個殖民地世界的統治者，假如殖民地世界依然被人統治的話。

擴張主義者希望利用美國這種強大的債權人的地位。貸款是一種運用自如的武器，特別是在一個被一次大戰所削弱和耗竭的世界中。而美國也曾表示了企圖利用它的大債權國的地位作為從債務國取得政治和經濟讓步的手段。根據蘇聯革命和內戰以後的時期內從蘇聯方面所得到的舊經驗，美國知道要靠貸款來從蘇聯方面取得基本性的政治讓步，是不能有什麼希望的。反過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十分明白，美國給蘇聯的借款對美國也會有同樣的利益，因為這對美國過度發達的工業生產品貢獻了一個廣大而穩定的市場。

美國某些工商業界中存在着贊成貸款給蘇聯的一種輕微的傾向，但同時一種帝國主義的貸款政策正在向歐洲解放各國和英國推進着。關於東歐各國，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治改變未實現以前，美國對它們的不承認，包藏着一種全盤經濟抵制的威脅。關於英國，美國強大的貸款力量是用來作為在英國範圍內迫使英國對美國獨佔資本作重大經濟讓步的一種主要武器。最重要的是，帝國主義貸款政策有把美國的龐大資源交與全世界反蘇集團（以英美聯盟為基礎）自由處理的危險。

那些受軸心侵略最慘的國家和相當落後的半附屬國家對於經濟援助有極大的需要；在所有列強中只有美國能夠充分擔任這樣的援助。但是美國經濟政策堅持自由企業和排除限制擴張主義之自由的各種貿易及其他障礙，這種經濟政策的民主氣味，並不能蒙蔽歐洲各國解放政府或半獨立國家對於這種政策真實內容的認識。唯其如此，所以它們要堅決保持各種的限制、壟斷和政府的統制，以便保護它們的國民經濟、本國資源和政治主權，而避免受外國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的控制。

他們要盡可能避免在完全用自己的資源以從事建設和開發的嘗試中的巨大犧牲，所以他們要尋求技術的、經濟的和財政的援助，這種援助是美國所能供給的。但是假如它們對於這種借款不堅持一定的條款和條件（使它們能夠保持對於自己國家和境內一切外國經濟活動的控制權的條款和條件）的話，它們就會害了它們自己的

人民並且把民主運動拉向後退。歷史已經向我們顯示，那些新民主國家能够最好地保證社會進步，它們把自己的發展穩固地建立在對於它們的資源和工業的控制上，以及在對於它們人民創造力的充分發揮上。解放歐洲的一些新民主政府所實行的基本社會改革，如取消大土地所有制和依據民主方式而實行的工業國有化，創造了新的力量和新的發展的可能性。這種改革加上跟蘇聯的經濟合作，能够支持那些新民主國家，並且使它們可以少依賴美國的借款。

這是與四大擴張主義的自由，與基於托辣斯化的「自由企業」原則的工業化，與危害解放各國的獨立和自由的外國經濟侵入等相背馳的。假如美國的工人和反法西斯主義者不變成一個擴張主義計劃的不自覺的參加者和支持者，這在美國人民一定就如國外的民主勢力及反帝勢力一樣地能看得很清楚的。

向全世界擴展美國獨佔公司制度的行徑，是沒有任何進步性的。實際上，這樣的擴展，若不加強帝國主義的衝突，不在國內產生一種相應的反動政策，以及不在國內和國外激起強大的反對勢力，是不能長期推進的。認爲這種發展的趨勢達到極點時可以形成一個龐大的世界公司——這樣的理論是一種危險的幻想。希特勒德國的毀滅證明了這種幻想的不可能實現；當時希氏所用的方法和口號雖不相同，而他所追求的却是同一目的。

第十章 蘇維埃聯邦

社會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的完全否定。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把世界經濟中的廣大而潛力最富的一部分，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上移開來了。從許多方面來看，俄羅斯帝國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封建主義的強有力的餘孽仍舊盤據在政治、經濟的機構中，雖然在革命的時候，資本主義已經有了相當大的進展。在農業方面，跟着農奴制度的廢止，資本主義的農場是增加起來了；在工業和金融方面，也有許多大規模的資本主義企業已在開始活動。而且，俄羅斯變成了一個英、法、德三國投資的重要場所和經濟侵入的對象。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將一切工業中的生產手段收歸公有，接收了整個銀行體系，實行了土地國有化，結束了地主資本家的統治，並關斷了外來獨佔資本主義侵入的大門。

社會主義不僅是獨佔資本主義的否定而已。它是一種經濟體系，也是一種國家制度，它具有自己內在的關係和發展法則，是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和國家制度。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是蘇維埃制度的基礎；而生產手段的私有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蘇維埃制度的鞏固使得社會公有制在一切經濟部門中獲得勝利，其結果是剝削階級的清除和剝削的廢止。這樣，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新的階級關係。蘇維埃社會內只有兩個基本階級，即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他們彼此處於毫無敵意的、友善的關係中。

蘇聯的非凡發展，在世界經濟中建立了一個特異的，社會主義的部份，在這一部份內，資本主義的殘滓已被清除無餘。蘇維埃制度的超乎尋常的穩定，及其堅固的團結一致都在這次世界大戰的最高考驗中表現出來了。即在和平時期，這一制度也證實了它能够清除經濟危機、失業和民族壓迫，同時也表現了它的無比的經

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能力。

德國侵略的失敗證實了社會主義這個已經建立的、強有力的制度的堅固性和永久性。而且，它加強了蘇維埃國家，大大地提高了它對世界的影響。這些都是在世界範圍上限制獨佔資本及卡特爾制度之活動的最大因素。

從世界的發展和維持和平的觀點上看，社會主義經濟更進一步發展的遠景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不顧實際的人，仍然想盡力解釋蘇聯之所以戰勝德國是因為蘇聯在戰前和戰爭期間從社會主義退回到資本主義的原故。還有一些人認為，戰後社會主義之鬆弛和重新轉向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這次戰爭之最有一「希望」的結果，而其發生是由於假設戰時蘇維埃機體的削弱和戰後重新建設的種種「不可克服的」難題。

實際上，任憑有戰爭的嚴重損害和破壞，從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社會主義體系和蘇維埃國家的力量是大大地加強了。它準備用比戰前更快的速度重新開始和平時期的發展。

一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

在納粹進攻以前，蘇聯計劃裏所着重指出的前途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更高階段。在一九三八年開始而被戰爭中斷的第三次五年計劃，即以準備這一過渡為其目標：從當時的按照每人所完成的工作取得報酬，轉入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或者說是轉到共產主義階段，那時每人是按照他的需要取得他的工作報酬。「各盡其能，各取所值」是社會主義的一般程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共產主義的法則。

這樣的一種轉變，需要非常豐富的產品，以便能夠滿足人民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的需要。需要是相對的，它是依據形成生活水準的文化、習慣、嗜好以及經濟之發展等因素而決定的。但是他們仍有對於舒服和有

意義的生活的最低限度要求，這些要求本身是作為社會的一般水準而增高的——如像舒適的房屋、衛生而均勻的飲食、充足的衣服、高等的教育以及休息娛樂等等。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較高的生產，可以立即而且直接變成較高的生活水準；生產的水準可以從根本上決定人民需要得能滿足的程度。剝削階級已經完全被剷除了，勞動產品的所有權是屬於社會的。生產和分配都是有計劃的。蘇聯沒有像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所見到的市場問題。這裏的問題不是在市場上如何去處置產品。這裏的問題是如何生產足夠的產品來滿足人民的需要。

對於蘇聯，這就是如何達到最大限度的社會主義生產的問題。戰爭前夜，蘇聯已經是世界上工業主導國家之一，在兩個半五年計劃的短短時期裏，蘇聯已經克服了從沙皇制度繼承下來的巨大的歷史的落伍。在一九二七年第二次五年計劃終結時，工業生產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擴大了九倍，而一九一三年的水準則差不多等於一九二七年戰爭和革命後的經濟改建時期結束時的生產水準。在這十四年中，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工業只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高出百分之二〇或三〇。結果，第二次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生產總量大於英國或德國，而僅次於美國。

而且，蘇聯工業的崛起是跟以下諸事實一齊發生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生產在工業和農業中獲得了勝利，在國內肅清了資本主義的最後遺跡，並且克服了經濟上的技術的落後性。斯大林總結頭兩個五年計劃所完成的工作時，認為在經濟範圍內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新的現代技術的基礎上完全改造了工業和農業。譬如，一九三七年工業總產量的百分之八〇是由前此十年內所設立的或改建的工廠生產出來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要求工業上有如是高度水準的現代技術，在產業組織上能以現代機械實現如是完全的革新。同樣的，蘇聯的農業已經以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最機械化的方法在經營着，並且比其他任何國家的農業有更充分的現代化機械的設

備。

一九三八年工業產品祇有百分之三是屬於私人企業的，這是社會化工業的發展所造成的結果。至於農業方面，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時期內，集體農場是鞏固起來了，它在一九三八年代表着全蘇聯農戶的百分之九三以上。資本主義的剝削已經全部肅清，全部經濟都社會化了。

雖然社會主義的經濟必須供應日益增長的國防需要，但是生產的迅速提高使得國民生活水準也隨之而有着相應的進步。從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年間，工業生產增加了一倍多，在同一時期內，國民收入的增加在兩倍以上，工人和他種受僱者每年所得酬金的總數增至三倍，集體農場的貨幣收入幾達三倍，而國家在社會服務和文化服務上的經費增加到六倍。

那麼，為什麼蘇聯還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呢？這是因為雖然蘇聯在經濟發展技術現代化的速度上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而蘇維埃經濟的生產按人口平攤來計算還是遠遠地落後於別的先進國家。蘇聯的人口比美國多得多，比德國多兩倍以上，差不多等於英國或法國人口的四倍。必須有大量的產品才能按照共產主義的方式來供應蘇聯人口的需要。只有藉增加每人平攤計算的產量，在提高的生活水準的條件之下充分供應每一個人的需求，才能接近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目的。

所以，蘇聯就提出了一個目標，要使按人口平攤計算的基本產品的產量趕上並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一九三九年初，斯大林決定了在以後十年或十五年內在經濟上超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

在實質上，這意味着兩種社會制度的競爭，社會主義要在生產能力、經濟效能和生產率諸方面表現其為一優越的制度。列寧曾經說過：「最後分析起來，勞動生產率是最重要的東西，是新的社會秩序制勝的主要東

西。」現在，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們定下了一個目標（像斯大林所定的那樣），要顯示社會主義之優越是「因為它能以更多的產品給予社會，它比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使社會更為富有。」

莫洛托夫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的報告裏決定以經濟競爭為第一目標，其要點如下：

在適當的時機，我們曾經跟資產階級國家合作，而且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很有利的。我們不打算在將來拒絕這樣的合作，我們將要努力來盡可能擴展與我們鄰國及其他國家的這種合作。然而我們正在走我們的道路，資本主義也正在走它們的道路。歷史在蘇聯面前所提出的不僅是與資本主義各國合作的問題，而且還有兩種經濟制度的競爭問題——新的和舊的，蘇聯與主要資本主義諸國間爲了經濟領域內的優勢而競爭的問題。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過的，「爲了經濟領域內優勢而競爭」並不能解釋爲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競爭——爲爭剝削地盤，爲爭市場的競爭。它的真意是在爲了更多的生產、更大的效率、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更大的富裕而競爭。這種競爭的結果如何，是表現在相對的按人口平攤的一些基本工業部門的產量的比較上；而這些工業部門的最大限度的擴張，決定着全部經濟的生產能力。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末尾（一九三七年），每人平攤到的電力產量，美國比蘇聯大五倍；生鐵比蘇聯多三·五倍；鋼三·五倍；煤四·五倍；土敏土則大五倍。在消費品範圍內，情形也是一樣（註一）。爲了要趕上並超過英國按人口平攤的（生鐵它可以視爲一切重工業之基礎）產量，蘇聯要從一九三八年的一千五百萬噸增加到二千五百萬噸（一九三八年時，蘇聯的產量已經兩倍於英國）。要追上戰前的德國，蘇聯的每年生鐵產量必須要達到四千萬或四千五百萬噸；要超過美國一九二九年的最高峯，蘇聯的生產就要比一九三八年的水準再增加四倍才行。

（註一） 例如：棉織品，美國人平攤到的產量，比蘇聯的多四倍；毛織品，多五倍；皮製鞋襪等，多二·五倍；紙，九倍以上；肥皂，四倍。

若不被戰爭截斷，一九四二年即應完成的第三次五年計劃，未曾決定以完全克服這種落後狀況爲其目標。然而，那次計劃會被視爲走向這一目標的重要步驟，是蘇聯「投入蘇聯與資本主義各國爲經濟優勢而起國際競爭的競技場」的一個標記。按照那個計劃，到一九四二年按人口平攤計算的生產產量差不多可以跟英國的相等。在電力方面，蘇聯將要超過法國，並且差不多可以達到美國水準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前兩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之上，第三次五年計劃規定了使蘇聯以飛快的速度實行進一步工業化的任務。按照這個計劃所規定的程序國民收入應增加百分之八〇，這個數目是大於前兩次五年計劃所增加的數量之和。工業產量應增加百分之八八，一方面高速度地增加消費品工業的產量，同時又以更快的速度提高重工業的生產。在這次計劃下所要創辦的新建設是要包括比前兩次五年計劃之和更大的生產能力。由於世界情勢的威脅，必須避免把新工業集中在西部舊的工業中心地區，而特別注意到遠東和國內腹地的建設。

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估計第三次五年計劃的意義時，宣稱道：

第三次五年計劃在實質上是不同於第一二兩次的五年計劃。那時的目的是要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現在，社會主義社會大體上已經建立起來了。蘇聯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完成了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並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這就是現在同以前時期的主要區別。

斯大林在其論新展望的報告裏曾經說過，蘇聯具有超過資本主義諸國的一切先決條件，不過就是需要時間，需要十年或十五年的時間，在希特勒進攻的五個月以前，蘇聯曾經擬就了一個十五年計劃以繼續在一九四二年完成的第三次五年計劃。這個新計劃使全國的視線集中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集中於到一九五七年在經濟上超過美國（超過它在二十年代繁榮時期的最高水準）。

這些總的方針現在依然有效，因爲它們反映着蘇聯發展的歷史方向。不錯，蘇聯在戰爭中遭受了重大的損

夫，而美國的生產却在戰爭的五年期間加倍了。但是美國的經濟將要跌進週期性的危機中去，而且將要受到世界政治危機的消極影響，而蘇聯的復興工作和進一步的發展必將齊頭並進，生產方面將毫無阻礙地擴大起來。唯一的問題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限因戰爭的破壞而將延長多久，以及對於和平的新危險將給予這一發展的影響爲如何而已。

二 戰時的蘇聯經濟

在德國侵入的時候，蘇聯經濟的各部門都受到了嚴重的苦難。有三分之一以上或者說近乎二分之一的蘇維埃工業設備都是在侵略者頭兩年內所蹂躪到的地區內。戰爭以前，被德國人佔領的地區裏有三分之二的鐵礦產量，二分之一的煤，將近百分之六十的鋼和生鐵，大部分鋁的生產以及約佔百分之二五的機器製造業。在這些地區裏還包含着百分之四五的蘇聯的小麥和百分之四一的稈麥生產。

按照負責調查戰時損失的國家委員會的報告，曾被德軍佔領的國土在戰前有人口八千八百萬和價值四百六十億盧布的工業產品，略少於一九三七年工業總產量的一半。蘇聯國民經濟和佔領區居民的私人損失估計達六千七百九十億盧布，約等於一九三八年國民收入的八倍。

凡是他們所不能帶走的東西，德國侵略者都把它們毀壞了——其中包括一切裝置、不能移動的機械、房屋、博物館、醫院、鐵軌和學校等。據估計，德國人奪去了二千五百萬人民的住所，燬滅了曾經僱用四百萬工人的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個工業企業。此外，他們毀壞或劫走了二十三萬九千架電力發動機和十九萬五千架切割金屬的車床，劫掠了二千八百九十個機器拖曳機站，摧毀或部分的毀滅了佔領區內六十一個最大的動力站，毀壞了三百萬錠紡錘和四萬五千架以上的織布機，澈底破壞或搶走了一萬五千八百個火車頭和四十二萬八千輛車

廂。油井、鑛山、船塢設備、運河、船舶等都被毀壞或掠奪了。頭兩個五年計劃期間所建築的二十個鼓風爐中的十個就在這個佔領區內。重機器製造業中的一些最大的企業，如敖德薩的哈爾科夫的機器製造廠，都被破壞無遺。這裏我們還沒有講到他們對集體農場、村莊和公共建築物的有系統的破壞。

很明顯的，這些都是嚴重的損失。但是紅軍的偉大成就表示出，即使在戰時蘇聯也有辦法相當地彌補這種禍難。美國租借法案所帶給蘇聯的軍火、軍事生產設備和食物等，只是在戰爭的後期發生效力而有重大的幫助（註二）。然而這種幫助只是輔助的，依據一種很自由主義的估計，也不過佔蘇聯軍事生產的百分之十而已。除去基本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諸因素外，蘇聯戰時經濟的驚人成績的主要因素是：（1）機器和人員從受威脅的地區大規模的撤退；（2）第三次五年計劃之目光遠大的生產的區域分佈；（3）勞動生產率及工業效能。在戰時的提高；（4）高速度的新的戰時建設；（5）趕走侵略者以後，被蹂躪地區之迅速重建。

在敵軍侵入衝道上的工業企業中，每一件能够拆卸裝運的設備都在事前搬走了。這種撤退的規模是很龐大的。有裝滿一百萬輛以上載重車的設備和物資運送到東部去，其中包括如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兵工廠那樣的企業巨擘，它的工作規模相當於克虜伯或斯科達。跟着機器撤退的是熟練工人和他們的眷屬。這樣一個有計劃的遷徙的規模之大，可從下面的事實上看出來：單從基輔和哈爾科夫撤退出去的，就約有一百萬人（包括人口的半數）。同時，在敵寇進攻的高潮時期，靠近前線諸城市的一大部分軍火製造廠還是繼續開工的，例如當扭轉戰局的歷史性的戰役正在進行時，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工廠仍舊照常工作。

（註二） 根據經濟對外管理局的報告（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從一九四一年十月的計劃開始時起，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國給蘇聯用船運去價值八十二萬萬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租借物資並供給了價值五萬萬美元的各種服務，約等於美國供應一切盟國之總量的三分之一弱。

從戰時生產的觀點來說，除非這些遷徙的工業能够在新的地方有效而迅速的復工，這史詩般的撤退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在一般的生產計劃裏，它們需要工廠、原料、動力來源、勞動和固定的場所。就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證明第三次五年計劃裏眼光遠大的生產計劃的寶貴。這些撤退的機器和工人並不是來到了工業的處女地，而是來到了伏爾加、烏拉爾、中亞細亞和西伯利亞等新的工業中心區，這些地方在戰爭前夜的幾年中已經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起來或嶄新地建設起來了。

當德軍進攻的時候，第三次五年計劃已經進行了三年多。歐洲大戰爆發後所採取的特殊措施不計在內，單就第三次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重工業每年增長的平均速度，在生產上要比一九三八年水準增加百分之五〇以上，尤其是在機器製造業、冶金業、燃料、電力和化學工業方面速度更大。如上面所指出的，這一計劃規定要創造一種新的生產力，大於前兩次五年計劃所建立的生產力之和。而尤其重要的是這一計劃早就準備把新的生產力分佈在伏爾加的東部。

正如一九三九年三月莫洛托夫在蘇聯共產黨大會上所解釋的一樣，在遠東和內地，工業的分佈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其目的在於各共和國和各地方要在自給自足的基礎上獲得工業的發展和食物的生產。嚴格避免在西方的舊工業中心地，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設立新工廠，雖然已經在設立中的必須完成它。不鼓勵狹窄的專門化，如使國家只依賴某一單獨的企業來供應某一種產品的情形。在新計劃之下，並不太加強注意到前幾年已經發展起來的大企業。相反的，它的着重點是放在中小工業單位上，以便提高建設的速度，使工廠可能有更廣泛的分佈和增加工業的移動可能性。

他們集中努力以建設後方各地區的保衛「國家的重大利益」。例如遠東要生產它自己所需要的燃料和大量的農產品；並且盡可能地在金屬、機器、土敏土和別的建築材料和許多輕工業部門方面達到自足。工業和鐵器

建設是以飛快的速度進行着。人口稀少的遠東區域是被經營起來了。莫洛托夫說：「我們認為遠東領土是蘇維埃政權在東方的偉大前哨，我們必須用各種方法使它強固起來。」

在第三次五年計劃裏的一些重要設計中，有一個設計是在伏爾加和烏拉爾之間創設一個有七百萬噸石油產量的「第二巴庫」。在庫比雪夫（Kuibyshev）附近設立世界上最大的水電力康拜因，供應整個伏爾加區域。馬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的偉大的鋼鐵製造廠應予完成；烏拉爾中央亞細亞和遠東的新煤礦應即開始採掘。在整個後方各地都計劃着設立小規模的水電站，附帶着新的灌溉計劃，一連串的工業，在中亞細亞的諸共和國內開發新的燃料資源和原料來源。此外，這個計劃又規定要建築四倍於第二次五年計劃所修築的鐵路，供應大批的新車輛，並擴張水陸空的運輸。

這些事業連同希特勒進攻波蘭以後開始的新計劃，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已經有了很良好的進展。伏爾加以東的地區已經有了約佔四分之三的蘇聯工程製造力和大部分新的兵工廠。大量的非鐵金屬以及佔一九四〇年鋼鐵產量之半的鋼鐵生產，是在這一區域裏。在烏拉爾山脉中蘊藏極富的許多重要礦產的新資源也被發現了。人造橡皮工業也設置在這裏，超過以前工業生產力的新的製鉛工業，也很快地興起來了。

在食物生產中，區域自給也是被重視的。第三次五年計劃要增加百分之五二的農業生產，特別着重於落後的家畜繁殖。很幸運的，收集五穀的中心已經不在烏克蘭，而移往北部和東部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在一九三八年已經供應了三倍於從前作為蘇聯之主要糧食倉庫的地區的穀物。

從西方遷移到新工業中心區去的機器和人員的洪流，在那裏他們可以加入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業網，或者另建新的工業部門。在集中計劃化的制度之下，撤退的機器和工人的參加工作使有可能在改組中採用新的生產方法，增加生產效能並更廣泛地應用大量生產的方法。

勞動生產率的大大提高是使生產擴張的最重要的因素。一般地說，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顯著的發展成績之一。頭兩次五年計劃期間，生產水準已經超過了原定計劃，雖然建設的計劃並沒有全部完成。這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超出了擬定該兩次計劃時所能想像到的程度之故。例如，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時期裏，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增高了百分之八二，而這一計劃原定只要提高百分之六三。在戰爭期間，進展的速度達到了新的高度。在工人們增加戰前產量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發展成了「百分之二百」的運動，後來又轉變成爲達到「百分之二千」的努力。工人們這一偉大的努力（註三），再加上軍事工業的較高效能，結果就是生產的迅速擴張。

詳細的戰時統計還沒有公佈出來。但是我們有充足的資料可以用來說明戰時內地工業擴張的速度甚至遠超過了和平時期蘇維埃經濟所創造的非常紀錄。據估計，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作爲重工業基礎的鋼業生產，在蘇聯幾達一九三七年的產量，那時它在工業總產量上已經超過了德國。這個成就是烏拉爾東部工業之迅速擴張和一九四三年頓巴斯與烏克蘭獲得解放後恢復該地工廠的結果。一九四四年底，烏拉爾後方的鋼鐵工業，在生鐵的產量方面比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四七，鋼產增加百分之四三，軋壓金屬增百分之四五，鐵苗增百分之二二。除去偉大的馬尼托哥爾斯克工廠的戰時擴張外，在車略賓斯克（Cheljabinsk）建立了大的電冶工廠，在下塔吉爾（Nizhni-Tagil）又建立了大的鼓風爐。戰爭的時候，其他新的鼓風爐在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開工了。現在烏茲貝克（Uzbekistan）和喀薩克（Kasakhstan）也有了他們自己的第一個大鋼鐵中心，靠中亞亞

（註三） 例如，在普通的機器製造業中，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四三年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七〇——八〇；在軍火工業中，在軍隊動員時一九四二年比一九四一年超過了百分之一五；在同一年，飛機增加了百分之三〇，坦克增加了百分之三八，全部輕工業增加了百分之四六。

細亞的煤、鐵和錳的蘊藏來供應，由烏茲貝克人和喀薩克人自己來開工。

在這些新地區內，一般工業生產的擴張是可驚的。單單一九四三年，烏拉爾區域的工業產量就增加了一半。在戰爭的幾年中，像哈略賓斯克、斯維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下塔吉爾和卡門斯克（Kamensk）等工業中心的一般工業生產量增加了七倍或八倍。在東部各地開發了新的燃料和動力的來源，同時原有的煤礦和動力鋼的產量也大大地增加了。例如，在庫茲尼茨克（Kuznetsk）盆地，一九四四年的煤產量比一九四三年多二百萬噸，在別的地方又開採了兩百個新煤礦。許多新的煤產地，如位於烏拉爾的季采爾（Kizel）煤礦有年產七十萬噸的生產力，其他如伏爾察卡（Volchanka）每年有生產一百萬噸的希望。僅次於美國而居於第二位的蘇聯天然煤氣貯藏，第一次大規模地利用來補充供應城市熱力和動力的油、煤和燃燒木材。

動力生產的擴大甚至於超過了蘇聯從前利用電力所創的稀有紀錄。在戰爭的四年中，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三區工作中的生產能力超過了前兩次五年計劃所建立的生產力，其中包括如像德聶伯爾（Dniepr）那樣的大計劃。

供應摩托旋轉機、第爾爾發動機、火車頭和其他用以迅速擴展軍事工業之設備的新的重機器製造業的中心，也興建起來了。例如，在戰爭期間建立的和修復的摩托旋轉機及汽鍋工廠的生產能力包括四分之一的蘇聯的動力企業。一九四四年煤礦和電力起重機的生產，數倍於戰前任何一年的生產。

後方各地不僅供應紅軍的軍餉，而且大規模地供給了重建西部和南部受災區域所需的東西，當侵略者被逐出以後，就一分鐘也不停地立刻開始復興工作。德國人逃走後，跟踪而來的是專家和物資，依照準備好的計劃而開始復興工作。第一批計劃是以恢復住宅、學校、鐵路、農場和工業為其開始的步驟。全部的故事仍舊要講撤退和復員的史詩，講到這一運動的兩個階段（撤退和復員）的眼光遠大的計劃和社會的執行。舉幾個例子

也只能對這種深廣而英勇的努力，稍稍窺見其梗概而已。在他們收復失地後的九個月內，莫斯科南部被破壞了的煤礦又有戰前水準的生產了。列寧格勒的紅十月鋼鐵工廠，當德國人從以前的一個城市而當時却變成瓦礫堆的地方被逐出的六個月以後，就開始生產了。

在他們獲得解放的兩年以內，南部的生產中心在蘇聯經濟中又起着重大的作用了。德國人曾經毀壞了克利伏羅格（Krivoi Rog）鐵礦、德聶伯爾水力康拜因和頓巴斯鼓風爐，並淹沒了頓巴斯的煤礦。到一九四四年末，復興後的頓巴斯煤礦輸出了一百萬噸的煤，克利伏羅格鐵礦恢復了戰前產量的百分之四〇，而許多鼓風爐、鍊鋼做爐、旋轉磨機和焦煤搗礦機都又開始工作了。

被破壞區域的復興工作是按照超出當前復員任務以外的計劃並與這些區域的久遠發展相配合而進行的。雖然德國要賠償大量的貨物和勞工，蘇聯還要盡力獲得長期信用借款，這些借款將使它能藉機器和設備的大量輸入（尤其自美國輸入）以減輕其復興上的負累；但這種復興工作仍然是在蘇維埃經濟基礎上及用蘇聯自己所掌握的資源來進行的。

蘇聯需要多少時間來恢復戰時的破壞呢？戰爭對於在戰爭前夕已開始實現的經濟發展的前途，有些什麼影響呢？

要完全修復德人佔領區的損壞是需要一些時間的。商務部的蘇聯專家羅柏斯（E. C. Roberts）認為蘇聯要完全治愈它的創傷至少需時二十五年，而國民經濟在十年之內將恢復到一九三八年的水準。這個見解沒有估計到蘇維埃制度之偉大的復元力量，也沒有估計到後方各地的戰時生產擴張，蘇聯所掌握的廣大資源，以及蘇聯計劃化的偉大潛力。

按照日本投降後即公佈的蘇聯的計劃，戰時被破壞區域的經濟全部復元，將在一九五〇年完成。這項工作

被認為是一九四六年開始的新五年計劃的最重要的任務。

工業、農業和運輸業都要恢復起來，但不是要恢復到它們的戰前狀態，而是要依照最新的技術和利用戰時所得的經驗來恢復它們。其目的是要在被侵略者所破壞的工業中獲得更高的生產水準和生產效率。烏克蘭將再度成爲煤和鐵的巨大中心。甚至於在復興初期已部分恢復了的碾磨場，也要按照現代化的方法加以改建。烏拉爾東部的新工業中心將作爲蘇聯西部和南部迅速復興的初步基礎。同時，蘇聯的一切地區都要更進一步的發展起來，特別是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新蘇維埃共和國，和其他新的蘇維埃地區；在那些地方要想辦法把整個經濟提到更高的技術水準。

戰爭結束後五個月，斯大林確定一些更迫切的目標，即重建被破壞的區域，恢復工業和農業的戰前生產水準，並且在一九五〇年超過這一水準。他強調消費物品大量生產的必要，強調「適當地區有系統地減低」物價，以提高人民生活標準的必要，強調爲超過外國科學成就而大規模發展科學的必要。關於久遠的經濟目標，他反復申述戰前所決定的在十五年內趕上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期望。在這一時期裏，蘇聯要增加三倍於戰前的產量——斯大林說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保證國家沒有「任何意外的事件」。這就意味着生鐵的生產要提高到五千萬噸，鋼的生產到六千萬噸，煤到五萬萬噸，石油到六千萬噸。達到這樣一個水準的時候，蘇聯的生產將僅稍次於美國在一九四五年極爲膨脹的戰時產量了；不過石油的產量除外，這一項生產美國仍將跑在很前面。

寶貴的人力和時間都在戰爭中喪失了。但是蘇維埃體系却比以前更爲壯健，它具有迅速復興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對保衛和平講，蘇聯是處於一個特別優良的地位。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準備將來恢復平時的发展，並且循着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往前邁進。

第十一章 世界政治中的蘇聯

在戰爭期間，蘇聯在世界政治中起了決定的作用。由於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中出了壓倒性的主要力量，以及由於它對帝國主義壓迫向來持反對態度的結果，蘇聯在被解放的歐洲和殖民地國家中享有很大的政治威望。它的道德影響和政治影響已在各地民族中生長起來了。

從前是列強中無足輕重的分子，被他人盡可能地排斥於世界政治以外並被嚴格地孤立起來的蘇聯，在短短的幾年之內竟變成了一個公認的強國，以三強之一的身份起着全球性的作用了。若不同時擴大蘇聯參與國際關係的範圍，舊的、兩次大戰期間對蘇聯的包圍（納粹德國是這一包圍的產物，也是這一包圍的先鋒）是不可能打破的。沒有一個重要的和平問題是不受到蘇聯的影響和壓力的。

此外，由於軸心國的失敗和因戰爭而產生的政治變化的結果，蘇聯在歐洲和亞洲的地位是已經改進了。在歐洲大陸上，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在亞洲，從日本海到裏海，介於資本主義部分與社會主義部分之間的這一大大的「邊界」地區，不再是堅實的反蘇緩衝地帶了。在這些區域裏，政治關係變得很自由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列強在它們之中無論是在權力行使方面或是在思想影響方面，都不再享有優越的地位了。

蘇聯的新的世界地位，使得它與非社會主義國家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變成一切國際關係的樞紐，其重要性甚至還超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程度。那末蘇聯是不是擴張主義者呢？它是不是要把它的制度強加於其隣國呢？是不是像反動派所說的一樣，它的國策是要藉干涉他國內政和征服他國來伸展社會主義呢？大大增長了的蘇聯的權力，是不是將成爲決定戰爭或和平的力量呢？

一 蘇聯的外交政策

蘇聯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一種和平政策。它不能是另外的一種，因為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國內的反動和侵略勢力的源泉都隨着人對人的剝削的消除而不見了。在被敵人進攻的時候，蘇維埃制度就充分表現出它自己的有效而有力的防衛能力。它能採取必要的、預備的安全措施來對抗一種侵略力量。它能够反攻；它能够把戰爭帶回到侵略國的老家去；它能够充分發揮進攻與防守的戰略。它有着強有力的軍隊及以最新的技術和科學為基礎的偉大的軍事工業潛力。但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從它的開創、形成的階段，直到反軸心國的偉大愛國戰爭時期止——顯示出社會主義裏沒有形成侵略行爲的一切因素。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既無侵略行爲又無侵略性質的一個強國。

在過去，這種政策可以隨隨便便地歸之於它的軟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都感到疲憊不堪，而蘇聯却以世界兩個最大列強之一的姿態出現的時候，蘇聯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沒有改變。在戰爭以前，當集體安全制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宣告失敗的時候，斯大林就宣佈了蘇聯外交政策的以下幾個要點：

- (一) 我們擁護和平及加強與一切國家的商務關係……。
- (二) 我們堅持跟一切與蘇聯有共同邊界的國家維持和平、親密、友善的關係。
- (三) 我們主張援助成爲侵略者之犧牲品並爲其本國之獨立而戰爭的那些國家。
- (四) 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我們準備以雙倍的打擊來對付企圖侵入蘇聯邊疆的戰爭煽動者所加於我們的每一個打擊。

軸心國失敗後莫洛托夫對蘇聯情勢做第一次的全面檢討時，確定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如下：

爲了普遍的和平及國際商務關係的發展，蘇聯一向是把促進跟別國的和平相處與合作放在第一位。

只要我們還生在許多國家的體系中，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還沒有最後剷除，我們就不能鬆弛我們對於可能發生的、新的和平破壞者的警惕心，而鞏固和平列強間的合作，將像以前一樣的仍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歷史的紀錄證明了這些都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不僅是字面上的，而且是事實上的。要表明蘇聯和平政策之顯著的堅定性，我們只要回憶一下：本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在爲集體安全的奮鬥中，在全世界反對慕尼黑主義和綏靖政策的奮鬥中所演的領導作用，蘇聯在促成戰時同盟國大聯合中的主要作用，以及它爲鞏固和平而堅持三強團結等事實就夠了。對於戰後時期特別有意義的事情是這種外交政策是與蘇聯成長爲世界強國這一點相符合的，而且當社會主義愈來愈鞏固，蘇維埃國家愈來愈堅強的時候，這種政策就會變得更爲有效力了。

這種反法西斯的世界安全政策的堅定性，是從世界發展的現階段中蘇聯的基本國家利益中產生的。蘇聯的外交政策是首先而且是最先要保證當處於資本主義佔絕對優勢之世界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蘇聯佔有如此廣大的領土，又有着如此的地理位置，致使它的安全和利益是含有世界性的。單從保衛綿延的邊疆以免被侵略這一觀點上來說，蘇聯就得直接應付至少一打的與它接壤的國家，更不用說處於蘇聯與世界其餘部分間的交通線上而佔有戰略地位的那些國家了。此外，一切領域內的技術的發展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緊密的國際關係，使得蘇聯成爲每一個主要列強的政治上的鄰居了。

當蘇聯把外交政策集中於維持它與主要世界列強間的友善關係，並防止它們中間結成一種敵意的反蘇聯合時，它同時還採取了其他的步驟來保證歐洲和亞洲的當前的安全。蘇聯的外交政策決不掩蔽這種橫跨大陸的全

部邊境上的安全利益，所以它要強調與隣國維持友善關係的必要，以打破戰前組織反蘇警戒線的那種資本主義政策。德國和日本的失敗消滅了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兩個主要基地，雖然這兩大強權東山再起的危險決非已被消除。蘇聯力圖在世界的範圍上，特別是在跟英美的關係上，防阻幾個大的戰勝列強聯合起來利用已被割裂的德國和附庸的日本來反對它自己。同時，蘇聯對於隣邦的政策是在尋求共同的區域安全，以抗拒一種來自復興的德國或日本或任何別的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這點上，蘇聯現在的立場是跟第一次大戰後的立場完全不同的。在那時候，最迫切的需要是打敗反革命勢力和外國的干涉，儘可能快的克服國內的貧乏和衰弱，並且在敵意包圍邊界的戰鬥狀態中圖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擺在蘇聯面前的問題是要儘量發展在戰爭中產生的與其他和平列強的合作，防止自己被人排斥而不得參與世界大事的解決，而且要阻止新的對它有敵意的結合。在蘇聯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是採取孤立政策的；相反的，它的目的是要克服孤立於世界大事之外，而這種孤立形勢正是過去資本主義列強所要強加於它的。蘇聯在外交和世界政治一切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許多重要結果之一；這種作用是蘇聯的每一個意願都表示要加以維持的。

戰爭的結果，蘇聯也改善了它的戰略地位，收回了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因外國的干涉而被割去的許多領土，也恢復了從前的帝俄所有的一些重要的安全地位。在這一過程中，很明顯的，蘇聯政策的動機不是在於攫取或擴張領土的欲望，而主要的是在於安全的考慮和重新合併過去被分裂的民族人口的願望，那些民族人口是被從前因外國干涉的結果而劃定的人爲的反蘇疆界所分裂的。

這樣，過去硬從俄國分割出去的，在兩次大戰期間日益成爲德國省分的波羅的海三共和國，重新獲得了獨立，作爲蘇維埃共和國而再度加入蘇維埃聯邦了。蘇聯在波羅的海的安全地位因爲從東普魯士劃進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省而更加鞏固了，東普魯士還給了蘇聯一個全年開放的海港。列寧格勒區因恢復了一九四〇年的蘇芬邊界而得到更多的保障，由戰爭期間對列寧格勒的包圍一事上，就可以看出這一疆界的劃分是一種明顯的安全措置。蘇維埃在波羅的海的安全，由於芬蘭領土上的普羅卡勞 (Prokalan) 海軍根據地的割讓予蘇聯而更見增強。極北邊界的安全是因貝薩摩 (Petsamo) 區的歸還蘇聯而得到保障。雖然這些安全措施中包括一些芬蘭領土讓與蘇聯的事實，但是這裏並沒有干涉芬蘭的政治獨立的事實；而芬蘭却在其成爲一個獨立國家的短促歷史中，一直充當着一個反蘇的基地進行了兩次反蘇的戰爭。

像芬蘭一樣，波蘭也曾是帝俄的一部分，但是蘇聯政策的目的並不是想把從前帝俄時代的一切領土都再度合併過來。新的蘇波邊界只是把居住着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地方恢復到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版圖中去，而那些地方是戰前被帝國主義的波蘭政府從蘇聯方面分割出去的。同時，波蘭人仍舊保持着他們的獨立國家。這國家因自德國方面收回了傳統上屬於波蘭的土地而在西部可觀地擴大了。根據與捷克斯拉夫國所訂的條約，喀爾巴阡烏克蘭也變成了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其結果是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包含一切烏克蘭人民的單一國家。在一九四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被羅馬尼亞所併吞的比薩拉比亞的人民，跟他們的摩爾達維亞同胞一齊加入蘇聯，形成了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聯在遠東的安全也增強了，因爲它收回了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訂立了中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及旅順大連的協定。除去在歐洲和亞洲已經獲得的安全地位外，蘇聯還表示它要與別國共同管制博斯普魯斯 (Bosphorus)、達達尼爾 (Dardanelles)、蘇彝士和坦吉爾 (Tangier) 諸地方，以便保護其黑海邊界並獲得在地中海、紅海上與別國相等的進出便利。它又提議由它託治從前屬於義大利的殖民地，即地中海上的的里波利坦尼亞 (Tripolitania) 和紅海上的厄立特利亞 (Eritrea)。顯然地，這些以及其他的提議，用意都在防阻英國

或英美聯合對於在蘇聯的直接安全地帶內的一些地區的獨佔控制的鞏固。

這許多安全措施必須跟蘇聯對於世界安全制度的特別重視聯繫起來觀察才行，它在這一安全制度中是要與美國和英國分担充分的責任和領導的，甚至於，這些措施還得跟整個蘇聯外交政策聯繫起來加以觀察。安全政策和政治策略是不能分開的。每一個列強都有一種區域安全政策，爲的是要建立它自己的邊疆安全。但是每一個區域安全政策往往被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用來當作帝國主義侵入或侵略的工具，例如泛美體系或大戰結束時所計劃的西方布洛克即是。別的方面不談，外交政策的真實內容還表現於一個強國對於較弱小的國家的態度上，特別是對於它的隣國的態度上。外交政策的可靠試驗就是看它是鼓勵戰爭還是鼓勵和平；另外一個試驗是看它鼓勵反動和法西斯主義，還是鼓勵民主和進步。例如，與蘇聯相反的政策，可以見於兩次大戰期間由歐洲西方列強所建立和支持的整個反蘇「安全」制度中。反蘇警戒線的體制是以歐洲社會的封建勢力和最反動的勢力爲其基礎，也是以那些建立像希特勒德國之附庸國那樣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國家的份子爲其基礎的。在另一方面，戰後新興的對蘇聯友善的一些東歐國家是從解放運動中產生了；它們以企圖改造陳腐的社會組織的民主的反法西斯力量爲其基礎的。

從廣泛的、歷史的意義上說，對蘇聯最好的安全保障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環境，那就是說，一個社會主義佔優勢的世界。但是假如從這一個正確的歷史的推論，得出結論來說蘇聯能夠或者意欲蘇維埃化全世界，那是錯誤的。這種非難純然是毫無意義的；通常只是想利用它來作爲反蘇十字軍的一種煽動人心的武器。

蘇維埃制度是社會內部發展的產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它是不能從外面強加上去的。這是一種社會發展的法則，而蘇聯是首先體會到它的效力的一個國家。在蘇維埃政權的早期階段中，列寧和其他的人會表示一種信心，認爲歐洲更高度發展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有助於俄國的革命。但是這種未曾成爲事實的期

望，並沒有模糊了或代替了當世界其餘部分仍停留在資本主義階段上而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希望。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又加強另外一個同樣正確的社會發展法則，那就是各國間不平衡發展的法則；由於這法則的緣故，所以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各個國家能夠同時並存着——社會主義國家跟高度發展的或腐潰中的帝國主義列強，較小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殖民地或半獨立的民族，都同時並存着。有些人誤解了這一法則，他們圖表式地、靜止地來解釋這一法則，以為社會的發展和社會主義者與世界上資本主義部分間的關係或多或少是固定的。沒有什麼能比真理更進一步，因為不平衡的發展仍然是一種發展，而各國間的不平衡性本身，對歷史貢獻着一種極大的推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紅軍在歐洲、在中東的北部伊朗、以及在遠東的滿洲和韓北會部分地或全部地一共佔領了九個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它並沒有企圖硬把蘇維埃制度加在它們身上，這是一個事實。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野蠻的法西斯和各種各樣的反動集團的魔術，都不能抹殺它的。無論在歐洲或亞洲，蘇聯佔領政策的實質是在保證澈底解除敵人的武裝，消滅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同時鼓勵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以便循着進步的路線重建他們的國家。與此並進的，是蘇聯運用它的地位，面對着其他的戰勝列強來厲行完全解除敵國武裝並保護各解放民族的民主進步。蘇聯政策的力量，正在於它對民主力量之認識與鼓勵。莫洛托夫在總結德國失敗後蘇聯對歐洲的態度時說：

要保證正確地執行這個（克里米亞）宣言，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然而無疑地，雖然有着許多不愉快的結果，勝利結束的反法西斯戰爭，對於澄清歐洲的政治氣氛，對於給反法西斯力量開拓新的復興和發展的機會都給了多方面的幫助。

當人們主張以盟國聯合管制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作為防止這些國家侵略勢力之再起的必要措施時，莫洛托夫也強調「不要妨礙它們成為民主國家的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政策。關於已經轉向於民主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

國家，他強調了增強和促進民主原質的必要。論及新政權開始實行的一些基本的社會改革——如土地改革、主要工業國有化和八小時工作制——時，蘇聯外交部長說：

這就掘毀了反動的法西斯勢力之從前的力量，而刺激了這些國家內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發展……他們給予歐洲內部和外部的壯大民主運動的行伍以新的勇氣和信心。

這樣，無論是在政策宣言上或在實際行動上，蘇聯都不打算把社會主義硬施之於戰敗國或解放國。它充分地認識反法西斯鬥爭和解放戰爭的結果是什麼，各國內部的發展情況又如何；因而它要竭力促進民主的過程。但是，正如莫洛托夫所指出，反動派的議論說「大胆的民主改革大半是由於蘇聯的日漸增長的影響所致」，這完全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蘇聯確實是鼓勵了它們，但是一切改良，主要地、大半地還是民主運動本身的工作。

對於非社會主義各國國內的政治的這種態度，是蘇聯政策的一種很恰當的原則。如果以為蘇聯的存在，它的日益增長的力量，它更廣泛地參預世界政治等事實，不會影響到其他諸國發展的過程和速度，這樣的設想是錯誤的。但是這，主要地是由於蘇聯在擊敗或抗拒阻滯社會進步的反動勢力上的作用才覺察得出來，就像蘇聯在擊敗軸心國和在道義上及政治上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偉大貢獻上所表現的一樣。蘇聯在清除道路、促進世界進步，及在以身作則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性上，演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基本上，現在還是跟從前一樣，每一國家必須靠自己本身的努力向前邁進。

對於與它接壤的許多小國和半殖民地民族的態度，蘇聯就以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的姿態來行動，在它內部，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民族彼此和平共處着，正如剝削的消滅除了對非蘇維埃國家的侵略的根源一樣，它同時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了充分民族平等的基礎。蘇聯人民對於民族和種族的偏見就像對於資本主義剝削一樣的生疏。社會主義的勝利摧毀了阻滯蘇聯內部許多民族的自由發展的一切力量。作為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遺留的各

民族間的互不信任和猜疑，已經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被克服——被一種鼓勵以前被壓迫的落後民族之經濟文化的發展的蘇維埃積極政策所克服了。每一次五年計劃給予以前被壓迫民族發展其工業、集體農業、教育及其他社會工作的機會多於給予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其中包括大俄羅斯，在沙皇時代它是帝國的統治民族）的機會。每一個主要的民族有一個單獨的國家組織，有它自己的蘇維埃制度，並且享有完全自治的權利。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大戰結束時已有十六個共和國）各民族充分發揮其民族性，在劃分得很妥當的民族區域內享有高度的自治。

在蘇聯各民族中間存在着一种發展平均化的趨勢，這與成爲資本主義世界之特徵的不平衡性發展的傾向是不同的。在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甚至於在它們內部有很大的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可用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來概括，那就是「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成爲蘇維埃民主之特點的各民族的自由發展，是發生於社會主義經濟之同源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各民族間的統一和友愛，加上經濟的計劃性和集中性使蘇聯得免於受外部的倒退影響。同時，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多民族發展的複雜性，和大衆民主的高度發達等，給予蘇維埃制度以極大的堅韌性。它的統一和彈性在這次大戰期間，都已充分顯示出來了。

從蘇聯所包括的各民族之需要及進一步生長的觀點上看這些發展和戰時的變化，使得蘇維埃制度更爲複雜了。蘇聯內部各地區迅速的戰時擴張，更加速了中亞細亞與西伯利亞各民族的發展，而當時蘇維埃共和國在德國侵入的過程中遭到了嚴重的痛苦。至少，在復興的前一段時期裏，在戰爭期間發展起來的各共和國與各地方，一反戰前的情形，成爲西部和南部經濟復興的基礎。歐洲方面被割讓土地的收回，造成了民族人口之充分完整與這些相對落後地區之經濟發展的一些特殊問題。沿世界上最長疆界的安全問題之極大的多樣性，邊疆各民族在復興與友善合作中的許多共同利益，造成了外交關係中更複雜的情勢。

在戰爭時期擴大諸蘇維埃共和國對外關係方面的自主權的憲法上的改變，已經承認了諸共和國之新的需要，並指出每一蘇維埃共和國之更寬大的更自由的參與世界外交和文化經濟交流的趨勢。蘇維埃共和國自主權的提高，在國際關係中提供了一個新的因素。這在舊金山會議裏已經有了紀錄，在那次會議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蘇維埃共和國已經變成聯合國機構中的成員。這在諸蘇維埃共和國與其歐洲隣國維持友善關係及經濟合作的分別處理上，也可得到了證明。

蘇聯之贊成殖民地獨立和一國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是它自己的多民族制度的一個自然的結果，也是它國內實用的原則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種發現。正因為它是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示範，所以它常常是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以及一切民主的反帝國主義勢力的一大鼓勵。當出席聯合國舊金山會議的蘇聯代表團爭辯民族獨立的理由時，而自稱沒有殖民地野心的美國却支持英國反對民族獨立的意見，於是蘇聯的威信就更加提高了。蘇聯之參加託治制度，毫無問題的會有助於各民族自決的。

在殖民地範圍內，這種政策的實際應用是表現在蘇聯對於朝鮮和中國的政策上。日本失敗後，美國軍隊佔領了朝鮮南部，而紅軍佔領了北部。這個地方是位於對蘇聯有最迫切的安全利益的區域內，而它距離美國却是很遙遠的。相反於美國佔領軍在他們佔領區內所行的政策，蘇聯是立刻而且毫不遲疑地將日本軍隊解除武裝，遣送回國，解散日本的和傀儡的統治機構，而允許朝鮮的解放委員會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

在中國，蘇聯的政策是想在極為複雜的情勢中建立相互的安全。蘇聯與中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了一個三十年的友好同盟條約，爲的是共同對日作戰直到最後勝利爲止，並且共同設法使日本之再度侵犯和破壞和平的行爲成爲不可能。此外，關於中蘇兩國共有與共管中長鐵路、旅順和大連，又簽訂了一連串的補充協定，包括蘇聯在東北暫時駐軍、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自決權以及中國對東北和新疆的主權。關於中國在其全

部領土上的國家主權和對它不干涉的原則，從來沒有像在這些協定裏所規定的那麼完全而一致。在爲了共同的安全而需要中蘇兩國採取聯合措施對付日本的地方，如在東北的情形，中國的主權是很謹慎而清楚地提到的。

跟中國政府締結這些條約的事實，很清楚地發揮了蘇聯尊重充分獨立和嚴格不干涉原則的重要性。蘇聯並沒有給予共產黨領導的延安政權（在它存在的任何時期裏）以直接的幫助。（此處有略）蘇聯已經很清楚地規定了它的不干涉政策並充分承認中國的獨立。它讓中國人民自己去建立基於民主主義的國家統一，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個獨立的中國在亞洲充分發揮領導作用。

由一切方面來看，蘇聯的外交政策在鼓勵反法西斯的民主運動和殖民地解放運動上，是有效力的。然而，蘇聯通過蘇維埃制度之成就的實例，在勞工運動和民主運動方面盡了它最大的精神上的影響。凡此種種並不需要一個鼓動機關來加以登記。蘇聯在戰爭中的成就是最大的「鼓動」武器，這是可能想像得到的。社會主義超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世界進展的一個真實現象。

假如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當蘇聯只完成了它的第一次五年計劃時，資本主義世界內的失業聯結着生產力破壞和蘇聯經濟的不斷擴張與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之間的對比已經非常尖銳的話，那末今後數年內這種對比還要更爲加劇的。資本主義世界到了一定的時候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另一次經濟危機，那就是黨戰後的復原尚未在望，而美國經濟所壘積起的危機因素已比一九二九年還多的時候。在另一方面，隨着新工業區的戰時經濟的擴張和被佔領區的復興工作，蘇聯宣佈要在一九五〇年超過戰前的發展水準。這一種有力的對比必將有政治上的影響。

二 經濟的合作

假如蘇聯在世界政治中能盡較前更大的作用，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到它將比戰前更多的參加到世界經濟的關係中去。

蘇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之參加布里頓森林會議（當時蘇聯初次表示支持國際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計劃），就是表示它準備在戰後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中盡其積極的作用。蘇聯代表團對第一次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的貢獻和對舊金山安全會議的社會經濟組的貢獻，也給了同樣的證明。這跟兩次大戰期間強使蘇聯與國際政治和經濟關係相隔離的情形，恰好成一個對比。蘇聯和資本主義列強在世界範圍上的這種經濟合作的開始，是發生於戰爭時期，這是聯合國努力的一部分。戰後是否仍能建立起經濟的合作，主要地是要看維持和平的政治合作如何而定。

在戰前，蘇聯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和別的國家發生商務關係。它的對外貿易跟世界貿易量和蘇聯的生產水準比起來，常常是很微小的。在一九二五——一九三七年這一時期裏，蘇聯的輸入和輸出總計起來不多於世界貿易的百分之一·五。雖然在某一項工業品的輸入（如機器工具）為數很大，但是就全體來說，蘇聯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僅僅是一個不重要的因素。蘇聯的對外貿易從來沒有達到俄國革命以前的水準。

然而，我們不必把這種情形當作今後數年的範本看。蘇聯對外貿易的戰前情況，反映了暫時的因素，同時也反映了永久的因素。從基本上講，世界貿易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盡着不同的作用，而且這種不同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別當資本主義部份一直在經濟上佔着主導地位的時候。

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內，當對外貿易是表示着區域和國家間的分工的時候，它也成爲一種「河道」，通過這條「河道」，全世界的產品都被獨佔資本主義的一些領導國家收集去了，特別是被那些國家內的最強大的獨佔集團收集去了。資本的投放跟商品的輸出相輔而行，這種情形對經濟落後而較弱的國家起着加強經濟剝削的

作用。通過投資和貿易的路徑（二者都是由獨佔資本集團所控制的），大公司的控制權就伸展到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勢力範圍也被建立起來了；獨佔資本集團間和各民族獨佔集團間的鬥爭也進行起來了，還有諸如此類等等的情形。

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世界內，在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各自治區之間的貿易與投資却盡了完全不同的任務。這裏，產品的交換也表示着一種分工——例如像產棉區和產麥區的分工。但是這裏沒有這一民族剝削那一民族的問題，因為在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內不復存在着這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剝削。在社會主義各國間的投資和貿易，是起着使發展較高的和發展落後的各國經濟均衡化的作用；這樣，經濟發展較差的國家才能得到幫助而克服其歷史的缺陷。資本主義世界內阻礙貿易發展的那些壁壘和限制的形式，社會主義世界內是根本沒有的，因為這裏沒有為市場和勢力範圍的鬥爭。跟全蘇聯的計劃相配合，並且也跟各民族和各地方的計劃相配合的貿易和投資，盡着一切經濟部門之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同時，並為發展落後的民族，造成更高速度的發展，領導它們到同等的經濟地位上去。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這些活動和屬性上的基本區別，大體上決定了它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在本質上，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對於全世界經濟問題的政策，其目的不外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獨佔資本主義集團爭取較大份額的世界市場，爲了控制原料的來源，爲了擴張他們自己的公司利益，爲了改進他們的戰略地位以便進一步地達到這些目的。另一方面，蘇聯政策的本質是阻止獨佔資本侵入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中去，是保證社會主義不間斷地進化到共產主義，是建立爲實現這一計劃所必要的戰略上的防衛。

由於社會制度的根本區別，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和由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入，在蘇聯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同於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發生的作用的。蘇聯的工業不需要靠在國外發展市場來維持其生產力的充分利用。這

廣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要獲得工業生產力的最高度的擴張；它的生產力是永遠不能滿足不會飽和的社會主義市場，那就是說，永遠不能滿足增長中的人民的需求。在蘇聯經濟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的現階段中，這種或那種生產品隨時都可能發生相對的過剩，但這只是例外而不是定則。在蘇聯，輸出是爲了盡支付輸入之代價的職務，輸入的東西是國內不够用的原料和對蘇聯經濟有益的製成品。

在另一方面，蘇聯幾乎可以吸取無限量的輸入而不致擾亂它的經濟。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第一、一切人民的豐足的限度是被有用的物品量所規定的；輸入就補充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第二、蘇聯對外貿易是政府的獨佔事業，是社會主義計劃的整個體系中的一部分。外國貨一旦走進了蘇聯，它們就立即脫離了資本主義市場的一切法則而立即變成從屬於蘇聯有計劃分配體系的東西了。輸入的物品，從機器到鑿匙，都由政府按照整個經濟計劃來收購，然後跟蘇聯工業的產品一同投進分配體系中去。

這些便是支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部分間的商品交換的經濟法則的大概情形。但這並不是說兩部分間的對外貿易量在一切時期和一切環境下都必定保留在最小量上的。

資本主義的市場法則不復能在蘇聯領土內發生作用，在這點意義上講，社會主義的建立使蘇聯退出了世界市場。但是蘇聯從世界市場中脫離開來的結果，却不必是（即在兩次大戰期間亦然）蘇聯與世界其他部分間的商品交換的實際停止。在內戰以後極端艱難的復興時期中，當輸出不能完全免去時，蘇聯政府就藉商務協定鼓勵輸入，情願特許外國資本家來有限度地開發和控制蘇維埃共和國境內的天然資源，作爲償付輸入的代價。不過這些從來不會發展到一種任何嚴重的程度（註一）。

稍晚，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緊張時期，蘇聯經常努力跟資本主義各國政府締結協定並努力改進大量購買的信用條款。假如這些實際上沒有很多實現，那是因爲西方對蘇聯採取政治隔絕和經濟抵制的緣故。自然，這並

不阻礙蘇聯用它自己的資源來實行農業的工業化和機械化。不過這一過程如果有外國工業品的補充幫助，也許會更容易些。因了資本主義各國對蘇聯的經濟抵制，給蘇聯各民族造成了許多額外的困難。

對蘇貿易的實際停止有着加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聯邦準備機構裏的一位經濟專家亞力山大·麥先克期 (Alexander Gershenkron) 認為：

二十年代的大多數經濟問題可能比較容易地解決，假如俄國的解放沒有在世界貿易和資本活動的網中劈開一大裂口的話。過去的就算過去了，但是過去的錯誤却成了教育今天的課題。這些課題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是俄國必須結合於世界經濟中去。

作者並不在陳舊的反動的、干涉主義的意義上使用「結合」這個字眼。現在很普遍地相信蘇聯將不允許資本主義侵入社會主義經濟中去（甚至於連它在二十年代所已經允許過的那種有限度的侵入，也不允許），作為經濟交易的代價。麥氏的意思是說，假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跟蘇聯合作，戰後世界貿易和復興是不能順利進行的。他承認蘇聯也不會放棄政府的貿易獨佔，因為這是維持社會主義計劃所不可少的。

事實上，他看到資本主義工業能從蘇聯的貿易獨佔中獲得某些利益，這種利益的產生是因為在世界上只有蘇聯政府能够事先好好地計算它的需要，並分配它在一定時期內向國外購貨的定單。這樣，蘇聯的商業協定提供着任何其他商業協定所不能提供的一種穩定的因素。在某一限度內（雖非在量的意義上），蘇聯在資本主義

（註一）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八年十月，收到了二千四百件要求特許經營的申請書，但是只有一百七十八件是批准了，其中包括三十一件技術協助的協定。特許經營的協定包括六十八家企業，它們在一九二八年共有兩萬工人在工作。甚至於在新經濟政策的高峯時期（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大工業生產中私人資本的全部份額也不及百分之四。外國資本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全部工業資產中，總計也只有千分之五強。

國家內的購買行為可以比擬於戰時政府的定貨及平時政府的公共工程的預算，它對於一種以不穩定和無政府性為特點的經濟，提供了某一種穩定的因素。此外，在蘇聯，政府和生產者中間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政策和私人獨佔事業間可能發生的那些矛盾。蘇聯的貿易政策是很明確的——它能毫不含糊地被決定、陳述和實現出來。

對於蘇聯，對外貿易的擴張將有利於它的戰後復興工作及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對外貿易的領域內，它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在一定時期內獲得在性質上和品質上適合於其計劃所需要的最大的輸入。另外一個主要的問題是藉擴張輸出來籌劃政府應為那些輸入所償付的代價，這種部署也必須與整體性的計劃相配合的。為着這些，蘇聯就需要時間。現款支付和短期借款不允許它有時間來發展輸出以充分償付大量的輸入。

在過去，蘇聯在國外的收購使節團繼續跟個別的康采恩磋商契約，而這些契約大多數是短期的性質。但是現在的問題就完全兩樣了。當戰爭在歐洲將近結束時，蘇聯向美國政府請求數十萬萬美元的長期信用貸款，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發展一個相當規模的對外貿易。關於蘇聯履行其借款義務的誠意，美國是沒有提出什麼問題。政府貸款的擴張，需要一個包括為和平的長期合作的政治決定，如像在戰爭時期租借法案的通過是一種政治決定一樣。

很自然的，美國的資本家們，如同英國的一樣，是處於兩種恐懼之間，一方面恐懼日益接近的經濟危機的政治影響，一方面又恐懼蘇聯的正在增長中的世界影響——而這種影響，不管它們是否跟蘇聯進行大規模的貿易，無論如何是要增長的。職業的反蘇專家的政治考慮倒是很坦白的，然而粗魯的，他們要求美國不要氣度雍容地幫助蘇聯工業化，因為這將增加「布爾雪維主義」的力量和危險。因此，反蘇專家之一威廉·張伯倫 (William H. Chamberlain) 問道：「我們應不應該加強這樣一個國家的經濟，這個國家是高度軍事化

的，而且似乎是以取得類似對歐亞兩洲的霸權爲目的的？」

這種人直接在歐洲和亞洲的「邊疆」內的每一次民主運動中，在各民族的每一個獨立運動中發現了「赤色帝國主義」的不祥表現。社會民主主義派張伯倫所公開表示的態度，只是反映了許多大資本家心裏所存的想頭。但是，同時，後者也由於想擴大他們銷路的願望（特別是對頭等有信用的顧主擴大銷路）又由於對像英國那樣的足以在買賣上打擊他們的競敵們的恐懼，而動起心來。帝國主義集團裏的這些矛盾心理，對市場縮小和蘇聯影響的矛盾恐懼，以及個別獨立佔資本家這樣或那樣地自己決定自己的問題的自由行動——這些在決定是否對蘇聯擴大政府貸款上起着一定的作用。

和一些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可以決定貸款問題一事完全無關的，歐亞兩洲正在進行着的社會和政治的變化，有着增加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之經濟關係的趨勢。

這些區域內的蘇聯對外貿易，甚至在戰前即已有增加的趨勢，那時與蘇聯接隣的多數國家還都被反蘇政權統治着。當歐洲的解放國家除去了跟蘇聯合作的舊障礙之後，爲着安全和復興的共同政策，就代替了以前的敵意。經濟的合作變成了用一種民族發展的獨立政策來代替依附德國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亞洲同樣的，走向獨立的趨勢和蘇維埃亞洲在戰時的大大增強，可以及時有助於經濟合作的擴大。而且在蘇聯進行復興工作的時候，與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相並進的是蘇聯能够增進它的輸出（甚至包括生產手段的輸出）而不必變更它自己的發展計劃。

甚至在戰前，蘇聯即已存在着的一種農產品輸出逐漸減少而工業製成品及經過高度加工的產品之輸出日益增加的長期趨勢。工業化已經在根本上改變了蘇聯輸出的性質。在一九一三年農產品佔經濟總產量價值的百分之五八，佔出口量的百分之七四，其中大部分是穀物。一九三四年，農產品只佔蘇聯經濟的百分之二七，佔出口

量的百分之二六。看起來下一代的蘇聯甚至於還有可能變成一個輸入穀物的國家。(註二)

在輸出中也開始發見有生產財(即生產手段——譯者)了。在一九三七年的輸出中有農業機器、汽車和零件、紡織機、縫衣機、曳引機和電料等。主要的工業原料，如生鐵、煤和焦炭、石油、石棉、士敏土和肥皂等也都輸出了。大多數運到波羅的海諸國和東歐的這些輸出品。在數量上仍甚有限，而且在蘇聯生產中也只佔着很小的份額。但是事實是這樣的，這些東西的出口增加的趨勢已經是很明顯了，在戰後的時期裏將會更增加起來，雖然我們不能希望它們能代表蘇聯生產的大部分。

生產財的輸出和蘇聯技術的輸出，對中東許多隣國的工業化已經開始發生了作用，特別是對土耳其和伊朗。例如，在土耳其，全部紡織工廠已經由蘇聯的工業和技師設置起來了。在與隣邦維持友善關係的條件之下，不僅蘇聯的成就和一般政策(雖然這些都是最重要的)的影響，而且由蘇聯技術所給予的直接幫助，都將有增加的希望。東歐的許多開發的問題，包括半封建農業經濟的改革和走向大規模工業化的最初步驟，都與蘇聯在其自身發展中所會經解決的技術問題相類似的。與蘇維埃亞洲各國有關係的許多住居在邊疆區域的民族(從朝鮮到土耳其)，也面對着類似蘇聯民族所會解決過的那些開發問題。蘇維埃共和國的高度自治，更便於跟它們的非社會主義隣國進行更密切的合作。蘇維埃共和國現正與它們的隣國不僅締結外交條約，而且也締結包括全面經濟交換的協定。

關於這一點，蘇維埃遠東和中亞細亞的戰時發展，將鼓勵個別蘇維埃國家和地區與其亞洲隣國的對外貿易。

(註二) 在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穀物出口僅佔總出口量的百分之八，而一九一三年則佔百分之三九。在同一時

期裏，木材、石油和皮革等產品，佔輸出的百分之三八。金屬機器和一般設備在總出口量中所佔不足百分之四，雖然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七年金屬的出口加倍了，而機器和一般設備的出口增加了五倍。

廣佈於蘇維埃遠東的廣大地區，從貝加爾湖到海參崴，已經有由本地的燃料資源和軍用礦產所支持的高度發展的重工業，而且能够製造大量的產品，其中包括船隻、火車頭、機器工具、人造石油、土敏土和飛機引擎等。

烏茲貝克蘇維埃共和國是蘇維埃中亞細亞發展的典型。今天，它是位於「落後的」亞洲之中心的澈底現代化的國家，堪與西歐有相等人口而高度發達的國家（如瑞典）相比擬而毫不遜色。在一九三八年，它有多於德國所使用的曳引機和收割機。它的棉產量在世界上佔最高位。它不只生產棉花，它還有它自己的紡織工業、自己的商船隊、甜菜糖製鍊廠、機器麵粉廠、肥料工場、石油井及石油提煉廠、還有巨大的動力和灌溉工程等。它也有鍊鋼廠和五金製造等工廠的重工業基礎。一九四二年中，甚至在工業尚未進行其飛速的戰時發展以前，百分之七五的烏茲貝克的生產已經工業化了。從經濟上講，它是亞洲或非洲回教國中最強盛的一個國家。甚至在一九三九年，烏茲貝克斯坦的工業生產已超過了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總和，雖然這些國家的人口合計起來却比它大七倍。

當蘇聯衝破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硬加給它的孤立環境以後，它在邊疆地帶所起的偉大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與有關諸民族間的自由政治關係上，而且也表現在產品與觀念的交流上。主導的資本主義諸國不復能在世界上的一切非社會主義地區內取得支配的勢力。它們現在必須跟蘇聯競爭，而這種競爭不是如資本主義各國間所特有的經濟戰爭，而是基本的社會觀念和發展觀念上的競爭。它實質上是一種政策的競爭，特別是當我們想到社會主義制度內部是和諧的，而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是有衝突、有矛盾的時候；而這種競爭不再是進行於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對蘇維埃國家佔有極其優越的勢力）間而是進行於力量並不很均等的那些國家間的競爭。

美國的一位遠東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亞洲的情勢作如下的看法：

現在如此時髦的中國和亞洲其餘部分的工業化問題，我們應該根據工業化已不再等同於資本主義思想的不可動搖的

威信的事實來加以考慮。蘇聯工業生產的威信已因蘇聯工廠製造的武器所獲得的每一次勝利而增高了；這種威信還擴展到了蘇聯的生產制度和它所生產的物品上。在亞洲內部的邊疆地區內，我們可以看到愈來愈多的蘇聯工程師在受人諮詢，而從前那些地方受人諮詢的只有歐美的工程師。假如我們政治上是聰明的話，我們將希望蘇聯的工程師們在生產組織和生產管理以及機器設計和工廠佈置等問題上受人諮詢。我們可以親眼見到在廣大的地區上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部分地被接受了，蘇維埃制度的某一方面被採用了。

這種看法或者有一點誇張，特別是關於把蘇聯的方法轉移到半殖民地區域中去的觀念。民主的方法是殖民地解放運動所固有的，而且他們有辦法改進他們自己的形式去適合他們發展的特殊需要。但是無可置疑的，蘇聯的例子特別在那些關係密切的民族中喚起了極大的熱情。蘇聯能够在經濟上，依它自己的方法和按照其社會制度的性質和政策去幫助非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這種幫助，特別是因為蘇聯尊重其隣國的主權，想脫去半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之桎梏的那些國家，一定是很能接受的。

當歐陸由納粹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候，這種情形在歐洲尤為明顯。在歐洲，經濟力量的重新分配，變成爲防止德國帝國主義東山再起的中心安全問題之一。主要步驟之一是降低德國的工業潛力同時增加其他歐洲諸國的工業力量，尤其是那些在新民主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家。問題是十分複雜的，但是它因戰爭的毀壞和解放國家的枯竭，以及英美反對解放國家之根本的民主改良而更形複雜了。

蘇聯的經濟合作，特別是在缺乏西方列強的貸款和長期經濟援助的情形下，這種合作就立刻成爲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等國的重要因素了，甚至於對於以前軸心國的附庸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蘇聯和它的歐洲戰時盟國間的互助條約提供了戰後經濟交易最大可能的範圍，同時也提供了重建事業上的互助的基礎。不顧它自己在重建事業中的大量需要，蘇聯除聯合國救濟機關所供給的物資以外，還省下自己的穀物和其他食品來供給被解放各民族。它跟東歐諸國締結了新的商務協定，這些協定能够使它們

的工業再繼續生產下去。蘇聯東部的原料新產地的戰時發展，加上烏克蘭經濟的復興，更增加了蘇聯輸出原料換取製成品的能力。同時，與隣國關係的改進，使它利用多瑙河的天然運輸系統，這條河把出產許多有價值的原料的蘇聯黑海地區跟高度工業化的捷克以及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國聯結在一起。

除去它們急迫的經濟需要以外，東歐諸解放政權有充足的理由擴展它們與蘇聯的經濟關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裏，與蘇聯經濟交易的人爲的隔絕，曾經害及於它們的經濟，限制了它們本已很有限的貿易範圍，並使它們大半要依靠德人控制下的獨佔資本與卡特爾的慈悲而生存。例如，前捷克臨時政府的總理菲林格（Zdenek Fierlinger）就看到了跟蘇聯發展貿易關係是躲避卡特爾阻止勢力的一種方法，這些卡特爾在戰前就使得它本國的鋼業和煤業不能與外國競爭。另外一個重大的誘導力使弱小的國家要發展跟蘇聯的密切經濟關係，那就是它們盡可能地要避免捲進資本主義世界之不幸的經濟危機中去。蘇聯的經濟能够大大地給予這些小國以穩定的因素，而跟西方列強結成排他性的經濟關係，却只能使它們更深的陷入危機中去。

這並非暗示一定要成立一個在所謂蘇聯獨佔下的閉關的東歐經濟圈。這樣一種結局對蘇聯固然無益，對新民主諸國亦屬不利。多邊的貿易關係是比較有利的。蘇聯需要擴大它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交易，尤其是跟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的交易，因爲從這些國家它可以獲得機器和製成品。只有當東歐諸國同時發展它們與歐洲和世界各國的有利的經濟關係時，蘇聯跟東歐諸國的貿易擴張，也就能形成一種更廣大的商業循環了。無論從經濟上講或從政治上講，蘇聯沒有在東歐成立閉關的經濟圈的必要。很明顯的，這些國家不願犧牲它們基本的民主改革，以換取英美資本的借貸。但隔離絕不是它們自己所願意選擇的，而這種隔離只有西方諸國對它們採取政治和經濟的抵制（杯葛）手段時，才能硬加在它們身上。

第十二章 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

實際上在每一個國家中都有着政府加強干涉經濟的趨勢。這種干涉是採取許多的形式而且在極不相同的政治條件之下進行的。

假如「國家調節經濟」或如有時人們所稱的「國家計劃化」這一概念，一般地和抽象地被用來說明政府統制的一切制度和形式，而忽視某一國家在某一時間所流行的種種特殊情況的話，那末這個概念只能够造成極大的混亂。一種基本的區別必須立即予以劃分，這就是蘇聯的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兩種國家經濟統制的區別。

實行完全的國家管理和監督經濟的惟一國家就是蘇聯。這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化，只有在剝削階級已被剝奪和一切經濟部門已實行社會化的國家內才有可能。蘇聯的工人、集體農民、連同有訓練的各種職業人員和行政人員，通過他們的蘇維埃國家而掌握和監督全部生產經濟。資本主義國家所使用的政府干涉這一名詞，在蘇聯是毫無意義的。蘇維埃國家已不再是作為剝削階級工具的舊式國家，因而它就完全失去了為他們的利益而干涉經濟的那種職能。而且因為社會主義在工業和農業中已經得到完全的勝利，蘇維埃國家就沒有為反對任何階級而實行干涉的需要。它的實行調節、監督和支配都是為着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在全體人民中則已不再包括敵對的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化是蘇維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它，這種制度就不能存在。

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調節（或統制），不管它的某種措施是有助於這個或那個階級，它的基本特點總是在於主要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受觸犯。

這一點既是真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衝突依然存在，那就沒有可能實現近於

澈底統制或全部計劃化的制度。這當然不是說國家干涉的結果是每一件事情仍都跟干涉以前一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留在後面再來討論。但是當國家調節和統制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實行的時候——就是說假如不經過廢除資本主義的這種根本的革命改造的話，那末這就不是社會主義，這類統制的任何一種措施也不能當作社會主義的措施看。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名詞的意義就在於此，一般地說，它是表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實行國家調節統制和干涉的種種措施。

在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從軍事共產主義結束時的一九二一年到開始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一九二七年這一期間，蘇維埃政府會經鼓勵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當時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經營農業的農民還佔人口的極大多數，而社會主義的工業却還不甚發展。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措施，第一是徵收實物賦稅，這種稅制使農民有拿他的納稅以後的剩餘生產品到公共市場上去交易的自由；其次是把某些企業租讓給私人資本家去進行；第三是允許外國資本家來開發天然富源，以交換外國的製造品和機器。這是意味着資本主義有某種發展的自由，但是須受與農民結成同盟的無產階級國家的統制，而且仍然在進行對資本家的鬥爭。

這是國家資本主義，但並非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工人階級的政府統制着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利用它來建立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條件，同時也用來補充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工業之不足。蘇維埃政府有能力約束國家資本主義並規定它的發展的限度。階級鬥爭在當時是很尖銳的。但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工業畢竟得了勝利；五年計劃接連地實現，並且通過農業集體化而最後消滅了一切的階級剝削，在全蘇維埃經濟中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制度。

我們有了這些初步的認識之後，現在就能轉而研究關於鞏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擊敗在戰爭結束時即行抬頭的那些新反動勢力的一些主要問題。

一 自由主義的「兩難」

隨着軸心國的失敗而迅速展開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主義行動，造成了美國變成戰後世界上反動和侵略勢力的主要來源的危險。這種危險加上可怕的經濟危機的威脅，在美國的勞動階級和民主勢力面前提出了阻止這種反動的進軍和覓取反法西斯鬥爭的最有效的方法的責任。

對於這一運動的主要障礙之一，是「自由企業」這類主義和強迫世界其他部分接受「經濟自由」的十字軍征略所產生的一般的混亂觀念。在一方面，反動派把不利於獨佔資本家的每一種政府統制的措施，都稱之為走向「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走向政府對於個人的暴君統治的步驟。連英國工黨政府溫和的國有化的建議也被斥為「實行社會主義」，而蘇聯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措施，又被輕易地比作納粹獨裁制的實踐。在另一方面，東歐各國反法西斯政權所實行的基本的民主改革，即使在一些表示同情的人看來，也常常跟社會主義混為一談，而為了抵禦行將爆發的美國經濟危機所需要的一些最初步的政府統制方式，也被人們誣為走向法西斯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誣以何種罪名，則須視批評者的觀點和他要排斥的對象為何而定)。

當這些混亂觀念侵入勞動和民主運動的隊伍裏來的時候，其危害就更大；因為那些運動必須採取一切方法和利用每一條活動的道路去阻撓和抑止成為法西斯和侵略勢力之真實源泉的獨佔資本。而阻止托辣斯大王們把國家變成世界法西斯和侵略的根據地以及控制托辣斯活動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以對付他們為目的的那種國家干涉，而這樣的干涉只有靠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的影響和壓力，才能見諸事實。

法西斯政權代表着不祇在國家的政治活動方面，亦且在它的經濟生活方面的高度調節和統制。根據這一點，人們(甚至於反對獨佔資本的人們)往往得出一種膚淺的結論來，以為任何方式的國家干涉或節制都是走

向「全體主義」的步驟——這個垃圾箱式的名辭常常被人用來混淆兩種極端相反性質的概念：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雖然許多中等階層的自由主義者可以迷惑於這種混亂觀念，但實質上，這是一種反動的理論，因為它與現實不相符合，而且它具有蒙蔽下列事實的作用：即在沒有任何干涉的外衣之下，國家依然可以為獨佔資本的利益服務的。

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結束報告，是這種見解的典型例證；它對於獨佔資本的研究是任何政府機關所作的研究中最周密的一個。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要論題是說：經濟的權力集中於少數獨佔資本家之手，限制了自由。它的結論是：「大規模的集體企業（獨佔企業公司，托辣斯）在這裏（指美國——譯者按）還要保存下去；我們所必須做的決定，是規定這類企業的社會和經濟的責任，以便免除一切專權的危險。」有了這一規定，就不會發生爭執了。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規定獨佔企業的這種「社會和經濟的責任」，如何約束和統制獨佔企業。正是在這一關鍵問題上，該委員會無法從它自己所佈置的兩難境地脫逃出來。它畏避政府的干涉和統制，因為這將造成「政府統馭世人」（*regimentation of men by government*）的後果（實際上是托辣斯統馭世人）；在它看來，它是和獨佔資本統馭世人一樣可悲的。它持着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而把兩者都當作『自由之反對物』而一併加以拒絕。

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存着這一時期所流行的那種危險的混亂觀念，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極大的危險；並且由於它的宣佈反對社會主義——「不論是納粹型的或是共產型的」一律加以反對——使得混亂的觀念更加混亂了。不錯，即在這種一般的混亂之中，它也不得不承認一個重要的區別：「共產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私有財產概念之否定」（說得確當些，是生產手段的私有權之否定）。在另一方面，該委員會也瞭解「法西斯主義的概念是保存私有財產制的，但是只為社會的一部分人，而且是為不斷縮小的一部分人保存這種制度。」該委

員會不耐煩再進一步深入這一問題中去研究，即以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同樣代表「政府的專權」而一律加以排斥了！

其結果，臨經委的最後建議，即對於一個自由主義的委員會也是顯然不適當的。除了可供參考的豐富資料外，該委員會簡直無異沒有研究這個問題，因為它根本沒有得出實際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來。一個老教條又被羞答答地重新搬出來了：自由競爭必須當作經濟原則而繼續保存。在一處地方臨經委很溫和地譴責它自己說：「我們並不願意在我們的經濟進化過程中回復到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的狀態。」在別處地方它又承認：「產業組織的新形式使得競爭變成了一個非常難以維持的一種狀態，而美國的為人民爭取自由生活的理想，在經濟上組織代替人的地位以前，是不容易有成就的。」

臨經委被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恐懼（這兩種制度它都不予認可）所困擾，因而它在每一方面都陷於矛盾而不能自拔。因此必須承認，獨佔公司的組織這裏還要保存下去，所以自由競爭的時代是一件過去的東西。但是它不能從只有自由競爭能夠成爲自由社會的原則這一舊觀念裏解脫出來，而同時它又不得不承認獨佔資本的經濟統治約制着自由競爭的原則。該委員會發見獨佔資本的發展限制着自由這一事實是無可爭辯的，但同時它以「全體主義」的危險爲理由來反對不利於私人獨佔的政府統制措施。

這是一條死路。其結果只好放棄一切，只好在獨佔資本不斷增長的權力和由此產生的法西斯主義和侵略主義的威脅面前，表示完全束手。

歸根結蒂地說來，社會主義，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够解決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永遠消滅反動和戰爭的根源。這一點道理人們了解得愈透澈並且被愈廣大的社會所承認，那末抵抗和擊敗走向法西斯和戰爭的傾向，就愈容易。但是現在需要解答的迫切問題，是存在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的體制以內。我們不是要在

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在法西斯獨裁和無產階級政權之間，作一選擇。對於人民，問題是在如何阻止和擊敗法西斯勢力，如何防止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最反動而最有侵略性的部分來把國家變成一種反動和侵略的工具。

事實是最頑強的，誰也不能躲避事實。經濟權力集中的事實是擺在這裏，不論採取私人獨佔的形式或國家獨佔的形式。客觀的趨勢甚至於在向着更大的集中發展，而一般的傾向是走向政府統制的進一步擴展，國家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要倒轉這種趨勢，是徒然的。現在的問題是在防止爲着反動的目的，爲着在國內支持獨佔資本的地位或幫助它們在海外犧牲別的民族以實行擴張而來利用政府的統制和調節，同時要爭取機會利用現存的和增加的統制辦法來爲人民的利益而抑止獨佔資本家。勞工和民主勢力必須把國家機構看作一種工具（雖然不是唯一的工具），它們可以利用這一工具來阻撓和拘束獨佔資本家，來阻止和消滅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傾向。

在過去幾十年來發達起來的國家的經濟統制，並非資本主義獨佔的基本原因。固然不錯，政府的干涉能够促進、而且事實上確在促進產業集中的過程——不論是私人獨佔或政府獨佔。但是資本主義獨佔的首要原因是在依據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法則而前進的實際的生產集中和所有權集中；這種情形，不論在像美國那樣以自由競爭爲正式立國原則，或如英國那樣以有節制的競爭爲原則的國家，都是一樣的。高度的產業集中也能促進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因爲它使得用一道命令把全部產業或某一經濟部門置於國家直接統制之下，成爲可能的事。

正因爲獨佔資本主義本身具有這種可能性，所以美國的獨佔資本家要猛烈地反對政府掌握產業和其他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因爲非在法西斯制度之下國家機構操在他們手裏時，他們就沒有任何保障。即使在最發達的法西斯制度之下，在德國納粹統治的制度之下，國有的措施總是極力設法避免的。然而在納粹德國以及有限度地在英國和更低限度的在美國，獨佔資本家設法實施有利於他們的某種形式的國家干涉，以便強迫

實行在獨佔巨頭控制之下的經濟卡特爾化，並使它合法化。這種趨勢在經濟危機時期加速起來，在相對穩定時期則又鬆懈下去。但是這種趨勢是隨着經濟情況和世界政治的起落而發展的。

促使法西斯主義之發生的，不是政府的加強干涉經濟。問題是這種干涉是爲着什麼目的和誰的利益。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告訴我們，法西斯政權的產生，是在獨佔資本家跟國內其他最反動的政治勢力結成聯盟，而能於擊敗及壓服民主運動之後，建立他們對於政府機構的獨佔控制權的時候。勞工階級和民主勢力通過它們加強對政府的壓力和它們在政府裏的影響，能够阻止那些最反動的掠奪勢力的控制政權，在大規模動員民衆勢力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的條件之下，很有可能利用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去反對獨佔資本、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但是即在這樣一種政治危機到來以前，各種形式的反獨佔的政府行動，也可以靠民主聯合政權來實行。要以一般的和無意義的反對一切的國家干涉經濟爲名而拒絕這種行動的方針，那就只有先向托辣斯和法西斯主義投降。

戰時統制的經驗已經指示出來，即使在「私人企業」的原則支配一切的美國，政府的干涉經濟可以爲着某種國家的目的而建立一定程度的統制。投資、生產、原料、物價、工資和對外貿易都會受過政府的監督，國家的直接掌握產業和直接投資，大大地增加了戰時工業的生產力，特別是在獨佔本身不能增加生產力的那些工業中。通過租借的形式，大批的資本輸出到我們的同盟國裏去。政府建立各種各樣的機關去實行統制。這些機關都由大實業界的代表們所管理，而爲他們的利益而活動。然而這裏又證明（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恐慌時期所曾證明的一樣）政府能够實施統制，而且能够干涉經濟的各個方面，甚至於能够促使資本家按照一定的程序行事。

這種相對高度的統制，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之下——在戰爭時期，在準備戰爭或在經濟危機的時期，才見諸

事實，這是實在的。同樣實在的是，在和平時期的情形之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國內資本的削弱成正比，而且它可以隨特殊的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而採取反動的形式或民主的形式。因此，每一種國家干涉的措施，必須視一般的政治環境並從它的特殊目的的觀點來加以判斷。勞工階級和民主運動一般地和在一切情形之下都擁護國家干涉，其錯誤正與反對一切國家統制的措施是一樣的。

二 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政治反動勢力的抬頭，法西斯主義的傾向，是獨佔資本主義的一面。但同時從歷史進化的觀點看來，工業和金融的獨佔公司結構的擴展及其相伴而來的大規模政府干涉經濟的趨勢，却形成了完全否定獨佔資本主義的要素。

生產已經大部分變成了社會性的，而所有權却依然是私人的。驚人的生產集中包括着千百萬的工人和整個的工業部門，或許多的工業部門，是處在集中的技術過程的計劃化和集中的管制之下，而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基本上的無政府性却依然保存着。許多的工程師、技術家和管理人員，都受僱於一些大公司來管理某一工業的生產過程，而獨佔公司的結構，通過個別的所有權和不同的經濟部門而形成的公司結構，形成了一種複雜的控制網。全部的結構表現着以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所沒有的的一種組織程度。所有權已經大部分變成非個人的，它表現在散佈於各資本家集團和甚至於大批小股東們手上的證券和股票上，而比較少數的一羣資本家掌握着比較小的一部分資產，却掌握了實際的控制權。

在政府的所有權、產業國有化和各種國家統制的措施，在托辣斯化的經濟領域內發展起來的時候，獨佔資本家們自己也已承認，沒有政府的幫助，他們不再能管理他們龐大的公司組織。大獨佔公司的發達隨伴着不斷

加强的政府干涉，形成了國家統制獨佔事業及最後消除獨佔事業的一分客觀條件。這不僅從最後廢除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是重要的，而且從當前階段的反法西斯鬥爭的觀點說來，也同樣是重要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剝奪全部獨佔公司結構，是只有當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政治力量充分成熟，而且能夠不單為工人階級也為全體人民取得政權的時候，才能見諸事實。但是經驗也告訴我們，一個執行國家職務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的聯合政權，在社會主義到來以前能夠採取民主的統制措施來消除私人獨佔資本的中心勢力。

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已經把這種措施當作一種實際的和立即可能的發展途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前六個星期他所寫的「論可怕的災難及如何與之戰鬥」一本小冊子中，他指出革命的民主勢力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有效的國家統制的可能性，這就是說在沒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也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有這種可能性。

當時俄國還在作戰，它正遭受着運輸事業和全部經濟不斷破壞與瓦解的損失，同時也受到飢荒的威脅。在有目共睹的即將到來的災難之前，在沙皇推翻之後建立起來的共和政府表現着束手無策；而資本家們則正如列寧所說：是「從容地、一貫地對生產實行怠工（損毀、阻撓、妨礙、破壞），他們希望發生一次可怕的大災難，可以促成共和民主政權的崩潰，促成蘇維埃和工農聯合的崩潰，這樣就可便利帝制的復辟及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全部政權的恢復。」（見「列寧全集」第廿一卷上集）

在這種情境之下，列寧會攻擊政府未能採取國家統制資本家的措施作為保護民主的勝利和避免經濟崩潰的手段。當時他主張國家採取以下的辦法：統一全國銀行並實行銀行國有；實行辛迪卡或一切獨佔事業的國有；廢除商業機密（如商業合約、特許專利等）；政府強制工業家、僱主和商人組織卡特爾或辛迪卡；及強迫組織或統制消費者協會。

這些國家充分統制經濟的辦法並不是完全新的，因為其中一部分已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各參戰國採行了（雖然從未全部實行過）。這是一種建立完全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國家完全統制經濟——的計劃，但同時容許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存在。即在國有化的經濟部分內，列寧也不會倡議廢除私有權，因為依照他的計劃，企業的股票或證券是依舊保留在私人手裏的。國家是要依靠職工會的幫助來經營和管制企業，但尚不廢除私有財產；而那些被迫參加卡特爾的資本家，仍舊保有他們產業的所有權，不過他們必須在政府和職工會的統制之下來經營產業罷了。正如列寧所說，這樣一種計劃將不從任何一個業主手上奪取一文錢。可是它能擊敗反動而避免崩潰。

同時，列寧指出，這樣一個計劃的實現將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大步驟；不過這個計劃只有靠一個革命的民主政府才能實現，而他所說的革命的民主政府，就是一個工農聯盟所控制的政府。這裏列寧劃分了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傳統的社會民主派的想法和共產黨人的看法之間的區別。像英國工黨領袖們所主張的那樣所謂進化的社會主義，把資本家的國家所實行的國有化和公共工程看成社會主義的措施，認為這些措施本身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當然，列寧始終拒絕這種改良主義的見解，因為它跟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他在「論可怖的災難……」的小冊子中，時時強調他所建議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遵照革命的民主途徑來實行的徹底的民主措施。所以在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和美國所施行的國家統制辦法時，他指出這些統制是遵照反動官僚的途徑而從上面建立起來的，而他的主張則要遵照革命的民主途徑，包括通過職工會和民衆組織來實施統制。列寧這裏所說的不是托辣斯和其他獨佔事業的社會化（即社會共有——譯者），這只有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纔有可能；他所說的只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當牠已經削弱和枯竭而且不能應付危急的局面的時候，一個民主聯合政府所能採取的步驟。當時俄國是特處於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而這個革命又正在向着社會主義革命轉

變；列寧正是從這種意義上去觀察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在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國家內，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走向社會主義的進步。」

換句話說，他並不像社會民主派那樣的把國家資本主義當作最後解決辦法來主張，也不把它當作一種在資本主義內的過渡性的進化到社會主義的辦法來主張。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否則我們就會完全誤入歧途。從廣大的歷史意義上講，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是一種進步，因為它是表示生產大規模的社會化（並非指所有權），和通過國家的更集中的控制。如像列寧所解說的：「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之充分的物質的準備（他特別着重「物質的」一詞），是登入社會主義的一個門戶，是歷史梯子上的一檔梯級，在它和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另一梯級之間，是沒有中間梯級的。」這種見解是屬於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一般分析的，他把帝國主義解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但是在實際上，在一個特殊的國家和特殊的時期，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在它轉變為它的反對物以前，可以起一種反動的甚至於反動得很野蠻的作用，如像德國的情形一樣。所以列寧明確地提到一個問題：被那一個階級所控制和為誰的利益而實行控制？

「或者是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那末我們所得到的不是一個革命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反動的官僚國家，一個帝國主義的共和國；或者是為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利益，那末這就真真正實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以上所引各段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上集）

祇有當國家掌握在一個革命的民主聯合政府手裏，當國家雖然尚非社會主義的，但已不再為資本家所統治的時候，國家獨佔的資本主義才能够真真正實地變成進步的東西，變成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並且靠着這一表徵，才不成為資本家的獨佔。

這就是列寧那本著名的小冊子中的中心思想。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一個短時期中，

他所主張的這些辦法，從來不會被共和政府實行過（即使在一種革命的局勢之下），因為那個政府從來未曾變為革命的民主政府。當蘇維埃取得政權之後，這些國家統制的辦法才按照社會主義的途徑而澈底地實現出來。

然而列寧的這個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本身並不是一個終極的目的，而是當作一個民主勢力聯盟的工具來實現；這種概念充分地說明了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它幫助我們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把有利於獨佔資本和反動勢力的國家干涉，跟有利於全體人民而反對獨佔資本和反動勢力的政府干涉，劃分開來。它也幫助我們了解一個反法西斯的聯合政府所實行的類似國有化這種民主的國家統制的措施，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儘管它們是在替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造成新的有利的條件。

三 歐洲的新民主國家

在戰敗納粹德國之後，解放的歐洲開關了一個民主運動發展的新階段。開展中的廣大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運動，企圖通過基本的民主改革來鞏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這些民主改革將在那些解放國家中剷除法西斯主義的根源和開闢社會進步的道路。德國的投降和歐洲法西斯制度的政治失敗，本身不會提供制止反動勢力復辟的保證。只有每一國家內部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才能提供這種保證。

在解放後的中歐與東歐各國，立即出現了包括工人階級、農民、和民主的中間階層之聯合的反法西斯政權（雖然國與國間存在着許多的差異之點）。在這種在抗戰期間鑄鍊成的大聯合中，勞工階級的政黨一開始就演着領導的作用，在某些場合は演着唯一的領導作用。在不同的國家，大資本家與大地主的經濟和政治的作用，是按不同的程度而大大地削弱了；在有些國家內，竟瀕於完全消滅了。

這些已不是舊類型的資產階級政府，但也尚非社會主義的國家。先前東歐各國的政府，實質上是大地主和

大資本家的聯合統治；它們受到帝國主義列強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極大的支持。這些反動統治的內部基礎，因法西斯主義的失敗而大大地被削弱。德國和義大利的影響也被大大地摧毀了。在法西斯蒂條件被剷除而反抗運動及其武裝力量能把自己組織成爲新的統治的限度內，舊的官僚主義的反動國家機體也起了根本的變化。雖然舊的反動階級的某些部分在中東歐洲的某些國家內仍舊有人在做他們的代表，這些反動集團的影響，在某些國家內還依舊強大得很，但在大部分中東歐解放國家和過去的附庸國家內的聯合政府，却已不再爲舊的反動階級所控制。在大多數場合，在解放過程和戰後復興過程中既經自我改造了的工人階級、農民、和民主的中間階級諸黨派，形成了統治的聯合。

這些聯合政權不能而且不會企圖建立社會主義。但是它們確實企圖在它們的國家內完成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這種革命是要通過以消滅封建殘餘及獨佔資本的核心勢力爲目的的整套基本民主改革，才能完成；而這種種勢力曾經充當了戰前舊的反動統治以及戰時助紂爲虐的幫兇政府的社會基礎。在大部分的這些國家中，人民大眾的民主在它們歷史上第一次抬頭起來，而解放民主陣線的政府並不重視純粹形式方面的民主點綴，而這種形式民主常常用來掩蔽反動統治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是更有興趣於解放和發展大眾的民主，人民的創造能力，同時也有興趣於實行那些允許人民勢力充分發展的政治改革

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這些國家內，土地改革是消滅國內落後和倒退勢力及建立民主進步之基礎的一種根本的先決條件。就在這些國家內，很快地開始了一種澈底的土地改革，並且是袒護農民利益的土地改革。封建的地主階級是被消滅了；這樣就剷除了由來甚久的政治反動的根源。解放政府所實施的土地改革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國家的反動政府的有限度的土地改良根本不同。那種土地改良不僅在程度上很有限，而且把實施改良的全部重担都放在農民肩膀上；因爲依照那種改良法令，農民就得償付高度

膨脹的地價給地主，而其結果農民就負了一身的債，而從國家方面，他們却很少或者完全沒有得到幫助。大地主們在鄉村中，同時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依舊保持着他們的支配地位。

新的土地改革要徹底得多。所有大地主的土地，都分配給了農民（包括農業工人），農民的土地則不被侵犯。常常當作唯一的例外來辦理的，就是那些曾經參加解放鬥爭的地主可以保留他們的一部分產業，並獲得從他們手上取得的土地的賠償金。但是犯叛國或幫兇罪的大地主們的土地，則無償的加以沒收。農民領取土地所應付給國家的代價是他們能力所及的，而且給他們以很長的支付期限。但是土地改革並不止於土地的再分配。各解放政府負起了以生產手段（包括農業機器）供給農民的責任，並且鼓勵農民組織農業合作社，以便銷售農產品及購買農民需要的製造品。政府又施行低利貸款來保護農民，俾免受高利貸的剝削。

在許多國家內，土地改革在民主統治的最初幾個月內，就已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地位，並且也改變了鄉村中的舊的階級關係。例如在匈牙利，過去大地產制在全國範圍內佔着支配地位，可是土地改革的結果，大約四百萬英畝的地主土地被沒收而分配給了五十萬以上的農戶、農業工人及手工業者。平均約五英畝的那種中型農場現在最為普遍。在波蘭，大約有兩百萬人（包括家屬在內）直接得到了土地分配的好處。這樣猛烈的改革，不經過一種猛烈的政治鬥爭是不會實現的，而且只有通過民主政權的鞏固，才能順利地保持這些改革。這種改革是靠農民團體和農民委員會的幫助而實現的；改革的結果使大部分農民第一次捲入了政治生活。

雖然關於民主德國發展的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可是土地改革從消滅容克（Junker，普魯士貴族的稱呼——譯者）軍閥勢力的觀點看來，也是極端重要的。在波蘭共和國所接管的領土內，容克的產業是被剷除了。但是在德國境內保存着的大封建地產，僅次於托萊斯而成爲侵略的軍閥反動勢力之最重要的基礎；而這種封建大地產也應予以剷除。這樣的做法將不僅除去德國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而且也將幫助滿足農民的土地要

求和從鄰國被遷送回國的德國人土地要求。在一九四五年年底以前，這種改革已經在都林基亞(Thuringia)、薩克森尼(Saxony)、麥克倫堡(Mecklenburg)及布蘭敦堡(Brandenburg)等一切蘇聯佔領區內實行起來了。在這些省份內，大約有六百英畝以上的地產預備拿來分配。其中四百萬畝預備分給農業工人和農民。約有二百多萬英畝(其中包括大的畜牧場和種子農場)不能分割的，則歸國家或合作社來經營。

我們可以看到土地改革是一種老早過了期的民主步驟，又是為創造民主國家所絕對不可少的步驟。這種改革並無社會主義的意味，牠在性質上與很久以前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所實行的土地改革無甚區別。關於這一點，東歐各國所做的改革工作，甚至於比美國過去所做的更為徹底；美國南部保存許多半封建勞動形式的大墾殖場，至今依然存在。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土地改革的兩重結果。一方面牠剷除了民主主義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另一方面，靠着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對中小農民大眾的幫助，這種改革造成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不過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處在大眾的民主主義及工業、農業與國家間的一種新關係的條件之下的。由於政府的幫助農民和基本保存着農產品的自由買賣，這種土地改革就造成了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的基礎，而他們正是新的解放政權所代表的主要的階級力量。

關於工業、金融和原料資源，中東歐各國的新政權也採取了好些基本改革。那些改革也具有雙重目的：消滅法西斯反動的中心勢力及開闢民主建設與國家復興的道路。關於這方面的最重要的措施，是許多國家所實行的主要工業、礦山、運輸事業及銀行的國有化。正如對付大地產的情形相同，這方面的剝奪財產也只是由國家來沒收德國人的和幫兇們的財產。但是德國的侵入(在某些國家同時也是義大利的侵入)一些主要企業是這樣的精密，以致這些企業的沒收會有效地在東歐某些地域內消滅獨佔資本的主要核心。

然而剝奪不是應用於一切資本主義財產的一種普遍的步驟。它也並非在一切場合都不讓資本家通過共同所

有制來分享國家用這種方式取消的敵偽產業，也不是說某些國有企業不會爲着發展而租讓給私人經營。對於這些國家，國有化本身也不是完全新的辦法，它們在戰爭以前就會使用過這種辦法來建立一些國有的銀行、運輸事業和礦業。同時也可能在某些國有化的經濟部分內（假使不是在大部分內），私人掌握股東和證券是可以不受妨礙的，而且國家爲着吸收更多的開發資本，事實上還會鼓勵私人來購買政府的股票和公債。此外，跟國營和國有化的企業同時並存的，還有純粹私有的非托辣斯化的工商企業，土地的私有權，及或多或少自由的市場。整個地說，在國有企業和國家統制起着中心作用的一種混合經濟內，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依然繼續存在的。

這種發展狀況跟戰前歐洲的某些國家措施不相同的特點，不只是在現行國有化的範圍較大和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更大的重要性，使得國家能够更有效地來指揮國家的復興和開發。在這些國家中，主要的特點就在那些大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的影響業已大部分消滅的政權把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這些就是被人民大眾民主勢力的大聯合所統治的新民主國家；它們能够爲着全體人民的利益，按照真正民主的方式來實行國有化及其他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在這個過程中，就像在土地改革中一樣，人民大眾的力量是通過非常廣大的職工會、合作社及其他民衆團體而充分地參加進來了。

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因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依然成爲這些國家的特質；但是它也不是舊形式的資本主義，因爲工人階級在這裏起着領導的作用，而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又佔着優勢。這些是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達到極高水準的國家，而且民主制度第一次在東歐被建立起來了。這些國家的特徵就是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的民主聯合陣線中的領導作用。民主制度在許多的這些國家中不只是第一次被建立起來，而且是沒有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參加的。

假使說這種發展在東歐和中歐達到了極高的水準，那末在西歐它也成爲一種強有力的趨勢。可是這裏，獨佔資本雖被戰爭大大地削弱了，它却仍然有強固的基礎。而且，英美的干涉和幫助正在支持獨佔資本主義的結構而阻撓反法西斯的民主運動。假使譬如在法國，沒收敵僞財產的原則被實施起來的話，那末「二百家」中沒有一個大的托辣斯能够保得住。但是即使像義大利這樣一個國家，事情也不能永遠固定不變的。後退就表示走向反動，表示獨佔資本對國家的控制權力的充分恢復和類似法西斯統治的建立以代替民族解放陣線的政府。前進就表示走向東歐的道路，不過在這些國家內，獨佔資本發展的水準更高，因而在一個民主聯合政府統治之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會幾乎在一晝夜中造成一種龐大無比的產業國有化的結果；同時這裏的工人階級從最初就起着領導的作用。

正如東歐一樣，西歐工人階級政黨的政策重心也不放在建立社會主義上，而放在當前階段的問題上，即放在足以消滅反動和法西斯的中堅勢力並完成和鞏固對法西斯的勝利的根本民主改革上。有黨員一百萬以上而成爲法國最大政黨的法國共產黨的首領多列士 (Maurice Thorez)，曾說明解放陣線的國有化建議如下：

在這些建議中絕對沒有一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成分；這些都是在急進黨的綱領中提示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民主型的辦法。它們除了對付叛國者以外，並無剝奪的意思。它們也並不要創造新的地位或發展官僚政治。相反的，銀行、保險公司、礦山、電力廠和大冶鍊工廠之有效的國有化，將使統制機關的職員數目大爲減少。這種國有化辦法，也會促成企業組織、行政、管理等方法的合理化，並且可以騰出許多新的勞動力來。

多列士也指出法國的民主勢力不會接受一種冒牌的國有化綱領，一種「國有化的諷刺畫」，如像對於諾爾 (Nord) 和 E 德加萊 (Pas de Calais) 的礦山所實施的情形。這些礦山是些大托辣斯所控制的龐大的煤業和鋼業網的一部分，它們的國有化實際上是偏袒礦主而犧牲礦工和人民的措施。因爲那兒我們曾經所看到的事實，

是在極困難的條件之下，政府担负了經營那些礦山的責任，而礦主們却保證可以獲得根據戰前景氣最好年份來計算的優厚的利潤。礦主們很快地接受了這種辦法，因為他們深怕實行民主的國有化，後者會剝奪法西斯幫兇們的產業而把礦山的管理和經營也被包括到國有化範圍裏去。

假使說在法國，獨佔資本雖已大為削弱，但即在解放之後也還能保持它的地位，那末在戰後初期的英國，這種情形當然更是如此。可是歐洲情勢發展的一般趨勢，却也反映在英國；這裏戰後第一次選舉的結果是工黨在國會中形成了一個顯著的大多數。當這個政黨在政府裏掌握權力的時候，這政府已經把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準。工黨的綱領是主張更進一步擴展這些辦法，包括英格蘭銀行的國有、煤炭部煉鋼工業及運輸事業的國有等，作為復興英國經濟及阻止經濟衰落的手段。可是工黨的勝利固為英國與歐洲大陸的同一大眾趨勢之反映，而這一勝利的結果却未曾產生像東歐各國所存在的那樣一個人人民主聯合型的政府。戰爭期間羣衆性職工會的建立，曾經在職工運動的領導權中造成了一些重要的變動，這是不錯的；但是這至今還很少反映在工黨和工黨政府的領導權上，它還是一貫仍舊。傳統的機會主義及工黨領導核心的親帝國主義性（這一核心仍在心尋求跟尙極強大的獨佔資本和保守黨勢力結成同盟），是英國實現一種民主改革計劃的一個主要障礙；至於「建設社會主義」的龐大計劃是更談不到了。

這不祇反映在保守黨外交和殖民地政策的繼續執行上，亦且反映在工黨政府實施它的國內競選計劃的方式上。這可以拿它的第一個關於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的措施來做例證。就像法國的煤礦國有化一樣，工黨政府的這一措施是大大地有利於英格蘭銀行之鞏固的。一切情形大部分都和未國有化以前一樣，只是銀行的股票為國庫所掌握罷了。不僅對股票持有人的報價是依照那些最上層的金融界所提供的意見而予以「極公允的估價」，而且他們還可繼續取得二十餘年以前那樣的進款，並有國家做着担保。政府現在已有權指派英格蘭銀行的經理

和董事，並對該行發佈訓令，但是銀行的實在情況則仍如原先一模一樣，而舊的領導機構則須重新加以任命。在這種情景之下，大西洋兩岸的金融界領袖就覺得對於這一措施已很少可資批評。倫敦「經濟學者」對此引為極大的慰藉，它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並且給予回答道：

根本的問題依然存在。爲什麼政府認爲值得提出這樣一個法案來，在它裏面任何真實的本質都被如此小心地剷除掉呢？……人們必定會斷說這個法案只是擺在黨的主義的祭壇上的一種象徵的供品，它並不想在任何一點上接觸到現實的。它將造成很少傷害——至少是在現狀中……

然而反動派還是不能完全認爲滿意，因爲這種國有化措施儘管從民主的觀點看來是何等的欠缺，它終究揭供了結局將被一個更代表人民的政權轉變成一種有效的工具的可能性。在工黨領導的背後，站着一個民衆勢力的潛在的大聯合。這些勢力雖然是無組織的，並且是在工黨隊伍的外面和內部從事活動，可是他們却已促使工黨政府的選任爲可能；他們的壓力尙能在工黨政府的領導中，在它的政綱的性質中，造成重大的變化。工黨僅僅接受了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並且大部分是照老樣子在繼續處理事情。但是這樣的做法難能解決英國和英國人民的許多複雜的問題。在阻止英國經濟的衰落上，在宗主國和殖民地間關係之進步性的改變上，以及在外交政策方面堅決擺脫保守黨的立場的作爲上，——在這一一切方面未能做到任何值得重視的進步以前，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就該被向着社會主義邁進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改造成爲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

第十三章 世界的危機

在軸心國失敗以後的頭幾個月中，戰爭危險的新徵候又出現了。在多重的戰後問題的脅迫之下，勝利的聯盟表現了分裂的朕兆。諸大強國團結的原則，隨着英美兩國的傾向於反蘇的政治聯合而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我們回顧一下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就可以看出這次戰後世界局面的動盪而不穩定，是第一次全球衝突以來，世界資本主義所遭遇的根本危機之加劇的繼續。這個全部時期的顯著特點是蘇聯社會主義之繼續發展與穩定，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不穩定和不平衡，成爲一個顯著的對照。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沒有一個時候可能克服一次危機而同時不準備或暴露另一次危機，不論在經濟或在政治領域內都莫不如此。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我們是生活在一種經常危機的狀態中。這是一種整個體系的危機，它在某一個國家在某一時會因短期的相對穩定而緩和一下，但是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地加深了。全球的衝突並沒有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常危機給予最後的解決；但是它却大大地改變了使這一危機繼續生長和加深的各種條件。

這種危機的戰後形勢是由許多個別的危機和衝突混合而成的。作者在這本書裏所作的嘗試，是在說明構成現階段世界危機之輪廓的某些基本變化和傾向：有些是被這次戰爭加強了，有些是被它緩和了。這些變動現在還在進行中，它們本身刺激着進一步的變化，而某些變動是一開始就能被人察覺的。

尤其重要的，這是一個大變動和大衝突的時期，是企圖把世界拉往後退的那些勢力和努力把它導向前進的那些勢力間的尖銳鬥爭時期。這種鬥爭是同時沿着許多條路線並且在不同的平面上進行的，因而它表現爲多重

的形式。戰後的世界使一切過分單純化的或公式主義的嘗試變成毫無用處。

譬如說，把世界的危機解釋成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列強間的分裂，因而它暗示兩者之間要發生不可避免
的戰爭，——這樣解釋是比較得很簡單的。這種見解是迎合那些企圖形成一個新的軸心來反對蘇聯的人們的心
理；對於那些人，戰爭不可避免成爲他們準備戰爭的一個藉口。但是這種公式主義的畫圖並沒有寫出世界
發展的真相。過去希特勒所創造的軸心就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爭不可避免論之上的，然而它是失敗
了。軸心領袖們不會注意到獨佔資本主義根本的不統一和不穩定，和社會主義的統一和穩定。他們把他們自己
的、靠窒息許多民族而達到的暫時的優勢，錯看成世界未來的前途，他們却在自己的制度中表現着每一種倒退
的和腐敗的現象。

法西斯主義本身是極端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徵兆，同時又是一種特殊的國家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德國和
其他許多國家的獨佔資本想用暴力和犧牲人民來解決社會制度的內部矛盾。某些國家內法西斯黨的掌握政權遠
沒有能造成統一的資本主義反蘇陣線，倒反而加強了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衝突（各國
內部和各國之間的衝突）超過了統治階級建立反蘇共同陣線的傾向（甚至在那些反蘇理想家實現這一陣線以
前）。當戰爭最後爆發出來的時候，它在遠東方面是表現爲日本進攻一個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候補殖民地，而
在歐洲的戰爭最初階段，則表現爲資本主義列強自身間的衝突。這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不能控制的各種矛盾的
一種戲劇性的表現，也是它的反動政治家無能（實在是不可能）引導全世界的力量以實現一定的目標。

歷史的證據告訴我們，垂死的統治階級往往估高他們自己的力量而輕視他們的進步的敵人的力量。德國的
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就犯了這種錯誤。當他們敗亡的時候，戰勝的帝國主義者立即提供了同一盲目的新例
證，雖然戰爭提供了蘇維埃的偉大力量的證明，並且在許多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國家中激起了新民主的怒潮。

假使還需要補充的證據的話，那末這次戰爭已經指示出來，社會主義是作爲一個歷史發展的前進階段而被穩固地建立起來了。它的內在的力量縱然在最不利的條件之下也顯示它經得住最大的考驗。在這種最嚴格的考驗中，蘇維埃制度表現了無比的強固性和堅韌性。當斯大林在戰爭結束時，宣佈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比戰爭以前更強大了時，他毫不誇大地說出了現代歷史的一個最重大的事實。

社會主義提供了開所未開的一種穩固的社會形態，它具有用不盡的動力和高速度發展的能力，這種發展是沒有階級衝突而依照歷史演進的法則進行的。這些法則成爲有計劃的發展的實質，了解和精通這些法則已經創造了第一個真正爲人類的社會制度。當社會主義被人們只看作對於社會革命的一種激勵的和光輝的努力，看作巴黎公社式的「狂風驟雨」，這樣的日子已經老早過去了。社會主義已經是一種勝利的「狂風驟雨」，它不僅在開始的革命階段上是光輝的，而且在它演化成爲一個既成的社會制度並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環境中繼續前進這一事實上，它也是光輝的。

在過去二十五年間，蘇聯生活在一種對它敵視的環境中，外來的危險促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加速了社會主義的成長爲一個有效能的和堅強的有機體。在戰爭的壓迫之下，在未被侵略者佔領的廣大的蘇聯領土內，社會主義的建設甚至以更大的速度進行着，並且是適應着國防的需要而發展的。在戰爭以後也一樣，對於蘇聯的新的壓力遠不能懾服蘇聯的人民，反而提高了他們的決心，來加速復興，提高發展的速度，以及加強社會主義各民族團結。

戰後世界危機的來源不能從蘇聯身上去找，因爲它表現着一種顯著的穩定性，但也不能把它的來源歸諸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矛盾。蘇聯地位的強化固有加深資本主義內部根本危機的作用，但是這不是因爲想像中的蘇聯擴張主義的目的，而是因爲帝國主義列強從此更難以犧牲蘇聯來尋求危機的出路。當然某些政治家並不

放棄靠準備反蘇戰爭來解決日積月累的種種複雜問題的嘗試。他們的疏忽是由於對原子彈獨佔存着近視的信心而沒有注意到資本主義危機的實際深度，也沒有注意到蘇維埃制度的充分的潛在力。雖然這些努力在最初可以造成一種緩和內部矛盾——例如英美間的矛盾——的形象，但同時它們却加強了這些反蘇領袖們所希望用戰爭來消除的矛盾。

從比較繁榮的美國來觀察戰後的世界，會產生種種幻想和歪曲實際景物的。在戰爭中受害最小而從戰爭中獲利最大的美國，業已變成世界獨佔資本主義的主要靠山。但是它扮演起這一角色來的當兒，正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已被大大地削弱，而它的根本危機又已變成更加劇烈和更加普遍的時候。

今天整個歐洲正站在社會變革的十字路口。在德國，獨佔資本在大陸上的背脊骨已被摧毀了。在東歐，新民主各國已經在從政治生活中永遠消滅大地主大資本家的道路上採取了首要的重大步驟。在法國和義大利，獨佔資本主義已處於朝不保暮的境況中；它正在設法集合國內外的反動勢力來對抗那已經在這些國家內匯集起來的強大的勞工運動和反法西斯運動。西班牙這個歐洲法西斯政權的最後堡壘，已瀕於一次新的革命高潮的邊緣。在十年間兩次被奴役的希臘，亦已成爲怒濤洶湧的歐洲海洋中的一個火山島。

在整個的中東和亞洲，殖民地 and 半獨立諸民族已經在進行反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所有的殖民帝國的命運已經在動搖中。假如印度人民獲得了獨立，因而替英國工人階級消除了它的最大的障礙，並且使工人階級能够把真正的社會主義帶給英國的話，那末這真正成爲最精彩的歷史諷刺之一了。假如目前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够掃除幾千年來的封建殘餘而把中國從美國資本獨佔控制之下拯救出來的話，這對於美國工人階級也是同樣有利的。甚至於麥克阿瑟支持下的日本的寡頭統治，也因爲日本人民受民主潮流的激動而搖擺不定。

英帝國的衰落受了這次戰爭的更大的推動，本身就足夠造成一次世界的危機。像大英帝國那麼龐大的一個

集合體，在內部發生着急變，從各部遭受着打擊，若不進一步擾亂一切世界關係就難以達到這種高度的衰落階段。多少世紀來掌握世界威權的英國統治階級，今天却已處於向億萬豪富的美國求乞金元和政治支援的不光榮的地位，而它獻出了世界霸權和開放了它自己的不穩定的勢力範圍，以作報酬。但是一個帝國的讓與是不能夠在銀行界的錢櫃裏進行佈置的。

美國今天所要求加以穩定的，實際上是一個根本發生動搖而且被無數的內部衝突所分裂的世界資本主義。所有的大陸都必須得到生活的保障。假使世界的制度即使在舊的基礎上要恢復到近於資本主義穩定的程度，那末美國的經濟和軍事的力量就必須同時能支持十幾個主要國家的舊的統治階級。它必須或者設法去支持那些直接企圖阻止殖民地制度之崩潰的列強，或者它自己着手來負責這個任務。它必須在一切大陸上都表現得很積極，因為當前的危機是普遍於全世界的。它必須到處跟進步的社會勢力發生衝突。

反動統治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恢復，不多不少正是力量發展到頂點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要求。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担负着他們龐大的資本積累尋找有利的投資場所的這種日益困難的任務，並且努力把他們的獨佔公司組織伸展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去，他們不能夠長遠地忘記他們命運的歸趨。千百億的剩餘資本和原子彈的兵工廠都在他們的控制中。其中一件可以用來掃除一件無利潤的世界的「鬼怪」，而另外一件則可以用來在另一個大的戰時繁榮中至少部分地延緩迫近中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同時大部分世界則仍將遭受嚴重的生產不足。這裏就埋伏着和平的危機。在危機中的獨佔資本主義將會產生一個侵略者。但是現在正在加深的一般危機也會產生新的革命運動的爆發和高漲，以及民族和階級關係的澈底改變。在美國變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樞紐時，世界資本主義的範圍是變得更狹窄了，而且不斷地傾向於更有限度了。

在這個原子時代，運數的預言變得十分時新了；這裏無人有意思再來增加一個黯淡的預測。真實的是資本主

義所發揮的龐大的生產能力，正在不斷增進地被使用到日益擴大的破壞性的目的上去。可以利用到一個被戰爭所摧殘被貧乏所困擾的世界復興的事業上去的原子能，却以一種具有無限破壞力之武器的形式，第一次出現於世界。

然而在這科學普遍於全世界，並且在一切主要國家中有着均等化的趨勢的時期內，具有決定意義的不是大礮口徑，而是指揮武器的政治。美國的原子彈中所儲積着的破壞力，決比不上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運動的力量；這一制度是美國的前途，同時也是世界的前途。各國在這條大道上不論要經過什麼樣的階段，這一前進運動本身總是不能原子化的。由原子的分裂所造成的金屬體的變質，是與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變質並駕而齊進的。

譯者跋

我費了三個半月功夫譯完了這部書，這在我個人說來是一九四七年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自己引為非常欣幸的一件事，因為我把戰後世界學術文壇上一部可貴的名著介紹到本國讀者面前來了。

本書作者詹姆斯·艾倫 (James S. Allen) 是美國一位傑出的政論家、政治經濟的理論家、同時也是民主運動及勞工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之一。除本書外，他還著有「改造：為民主的戰鬥」 (Reconstruc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與「美國的黑人問題」 (The Negro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等書，然而這部書的學術價值無疑地是遠遠超過了艾倫氏的其他任何著作的。同時，他是美國「工人日報」的編輯，又是著名刊物如「政治月刊」 (Political Affairs)、「科學與社會」 (Science and Society) 等的經常撰稿人。此外，艾倫還是一個黑人——一個在黑人中不可多得的傑出作家。

本書的原名是「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 (World Monopoly and Peace)，但內容所討論的是二次大戰後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動向問題，為使大家易於明瞭本書內容計，故改為現名。正如原書名上所表明，這本書是根據世界獨佔資本的研究，去觀察世界和平的前途；同時又是從爭取世界和平的立場，去研究世界獨佔資本主義的結構、動向和前途的。

和平為什麼會受到威脅？世界為什麼會發生戰爭？

在這次世界大戰以前，大家都狂呼「法西斯就是戰爭」，法西斯是戰爭的縱火者。這是對的，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世界戰爭的根源是在法西斯。一九一四年時，世界上並沒有法西斯，但是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

爭的根源在那裏呢？艾倫在其序文裏寫着：「世界的動盪和戰爭是種根在獨佔資本主義之中。」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它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書作者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後者確定戰爭是帝國主義的隨伴；有了帝國主義，就必然會有戰爭。可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不是別的，却正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獨佔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它的經濟基礎。所以本書作者指出，當前世界的動盪和由此種動盪發展到極致而爆發的戰爭，是種根在獨佔資本主義之中的，這是千真萬確的話。世界上有了獨佔資本主義，就必然會有動盪和戰爭；因為獨佔資本主義是跟侵略主義和擴張主義分不開的，而侵略主義和擴張主義正是動盪和戰爭的原動力。

艾倫氏寫了整整九章書共約二百面的篇幅（從第一章到第九章，約佔全書四分之三），周詳而深入地剖析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獨佔資本主義；其結構、動態、政策以及它製造和鼓動戰爭的作用。同時，作者又根據豐富的具體事實，說明了各國獨佔資產階級如何通過卡特爾制度及其他國際獨佔資本的組織而互相勾結，掀風作浪，危害國家，擾亂和平的種種陰謀。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本書作者以銳利的筆調和正確的眼光，無情地揭露了美英等戰勝國家的獨佔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在戰爭結束時（及戰後）又在重復第一次大戰後的帝國主義舊把戲，爲着反蘇反人民的目的而不顧一切地在扶持和鼓勵被擊敗的帝國主義之復活；對德國如此，對日本尤其如此。在第一次大戰後，戰勝國絲毫沒有觸犯到德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獨佔資本的體制；倒反而通過道威斯、楊格等計劃而把德國帝國主義迅速重新武裝起來了。在這次戰爭後，艾倫氏無情地暴露了美英帝國主義對日本和德國如何拚命地在重復着歷史的錯誤。

但是榮居於世界資本主義首領地位的美國，其處理戰後世界問題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動機，却在代表它本國

過分膨脹的獨佔資本的要求而積極推行其擴張主義，推行其獨霸世界的帝國主義計劃。爲着揭露這一計劃，作者於本書第四、五兩章中解剖了美國獨佔資本在戰時戰後的發展情況及其趨勢之後，又在第八、九兩章中周密地揭露了美國擴張主義的內幕、企圖和動向。同時，他又對由美國擴張主義和大不列顛衰落所造成的英美矛盾，作了非常精密而深刻的分析（見第六、七兩章）。根據這種分析，可使讀者充分明瞭在今天反蘇叫囂和瘋狂準備戰爭的實際行動中，却又不可避免地會使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劇化起來。所以他說：「……把世界的危機解釋成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列強間的分裂，因而暗示兩者之間要發生不可避免的戰爭，……這種見解是迎合那些企圖形成一個新的軸心來反對蘇聯的人們的心理；對於那些人，戰爭不可避免成爲他們準備戰爭的一個藉口。但是這種公式的畫圖，並不寫照世界發展的真相。……」（見第十三章「世界的危機」）。

談到世界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時，作者提供了許多具體的事實，說明蘇聯經過這次戰爭的嚴酷考驗和戰後復興建設的計劃以及它在世界政治中所演的重大作用，同時他又着重地指出，那些迷信原子彈獨佔，妄圖藉反蘇戰爭的準備來解決自身種種複雜矛盾的近視份子們，却根本沒有覺察到資本主義本身危機的實際深度，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潛力，尤其沒有估計到全世界人民走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所以在最末展望世界前途時，作者指出說：「具有決定意義的不是大砲口徑，而是指揮武器的政治。美國的原子弹中所積蓄着的破壞力，決比不上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進運動的力量。這一制度是美國的前途，也是全世界的前途。」

這本書的學術價值，不祇在於理論觀點的正確和事實分析的深刻與周密，而尤其在於書中材料異乎尋常的豐富。這本書裏所採用的材料，不僅包括專門性質的書籍、論文、年鑑、手冊、以及研究報告，而且諸凡公私機關的有關文件、報刊新聞資料、國會裏的提案和報告、國會所通過的各種法案、總統語文、白宮訓令、各種專門委員會或代表團的調查報告、各種外交文件、國務院、司法部及海陸軍部的各項報告與計劃、聯邦準備局

和商務部的統計材料、乃至卡特爾合約和托辣斯內部來往的私人函件等等，可謂應有盡有，不勝枚舉。內容如此豐富的一本書，確實堪稱戰後世界一種難能可貴的名著了。

譯者學識簡陋，文筆拙劣，要翻譯這樣一本高度學術化的巨著而一無謬誤，當然是不敢自信的。這就有待於海內賢達不客氣的指正。

譯者識 一九四七年聖誕節前五日於香島。

資本主義的獨佔與戰爭

蘇·I. Kuzminov 著 吳清友譯

——評 James S. Allen 著「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

I. Kuzminov 是蘇聯著名經濟學家。這篇文章的本身就是一篇精湛的學術研究，一方面就原書給讀者提出了要點，一方面也加入了一些新材料。作者也批評了對新民主國家經濟性質的若干論點。本文原載一九四七年十月卅日出版的「布爾塞維克」雜誌。文中引用原書之處，和若干用語，都未及與譯本統一，附此一併說明。

把苦楚的重負帶給各民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告結束，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始了它自己的煽動新戰爭的難務。邱吉爾會是首先出來公開號召戰爭的一人。斯大林揭露了邱吉爾之後，當時就已着重指出邱吉爾「不是孤單的，——他不僅在英國，而且在美國也有其友人。」目前這些人積極化起來了並展開了新戰爭的廣泛宣傳。維辛斯基不久以前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辭中曾經說過：「由若干國家，首先是美國的軍國主義及擴張主義人士之努力於燃起戰爭精神病，愈益傳播開去而且越發具有威脅的性質。」

在帝國主義時代進行再分割世界的戰爭之煽動和準備中，資本主義的獨佔起着中心的作用。如果說，在準備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獨佔者們起了最積極的作用，那末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宣傳中，美國最大的企業，工業領導部門以及從華爾街出來的銀行和交易所的經理之代表們，起着最積極的作用。

詹姆斯·艾倫於一九四六年在紐約出版的「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一書之所以饒有趣味，是由於那裏曾經

企圖指明大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獨佔在準備和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及在煽動新世界大戰中的作用。作者在這裏吸收了大批而有興趣的材料。

X
X
X
X
X
X
X
X

本書的爲首三章闡述德國和日本獨佔之表徵（「德國和卡特爾」、「獨佔資本在戰敗的德國」、「財閥的帝國」）。作者寫道，德國的經濟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嚴重的損害。同時德國的獨佔在戰時不僅沒有受損，而且致富了。德國的失敗，也沒有觸動德國獨佔的實力。德國的大康采恩，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德國的重工業不僅保持了，而且在外國的，首先是美國的借款幫助之下，很快地現代化了。賠款應當用存於德國國內的馬克來支付，其結果是這些資財的大部份被重新投入德國的工業中去。除此之外，道威斯計劃預定賦予德國數達二萬萬美元的賠償借款；在這之後其他借款緊接而來。在通貨膨脹以後的時期，德國所支付的大部份賠款都是倚靠外國的借款，而不是倚靠它自己的資財。依據道威斯和楊格的兩次計劃，從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三一年七月胡佛發佈付款延期令時爲止，賠款的支付總額幾達一百一十萬萬馬克；但同一時期內，如德國的投資或外國給它的借款却幾達二百五十萬萬馬克。這些信用貸款的大部份是來自美國。德國曾是美國的最大債務人。除此之外，許多美國的獨佔對德國經濟進行了直接的投資。在大戰之後，美國的獨佔者們就這樣慷慨地餵養和哺育他們自己德國的同僚。

由於它自己在歐洲卡特爾中之稱霸以及外國獨佔者們幫助的結果，德國重工業及軍用工業的托辣斯不費力地逃避了凡爾賽和約的條款，後者之目的，是在阻礙德國重整軍備。例如克虜伯康采恩，通過歐洲鋼業卡特爾，就能在國外繼續軍事生產。克虜伯把自己的專利權和生產的祕密移交給在中立國的許多公司。克虜伯在荷蘭設立了西德留斯飛機製造廠，後者控制了替克虜伯工作的荷蘭的各公司。克虜伯跟瑞典的波福斯公司以及西

班牙的許多公司訂了合約。德國的獨佔者們終能把許多軍用製造廠甚至於遷移到國外去。福克飛機製造廠整個被遷移到荷蘭去，在瑞士曾經設立了德國道尼埃公司的分公司。而容克公司則在它自己的瑞典分公司企業中繼續製造飛機。英國的維克斯康采恩爲了調節一次有關專利權的糾紛，把在西班牙未埃斯地方的一個軋鋼廠讓渡給了克虜伯。德國的潛水艇製造在荷蘭繼續着。遠於一九二五年法本公司已經在輸出炸藥，這是根據參加被復活起來的炸藥卡特爾之程序而進行的。因此，英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重工業及軍用工業的大王們就伸出手來援助德國的獨佔者並把他們從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中挽救出來。

第一、各國獨佔的經濟利益之犬牙交錯，以及第二，把德國看作反對社會主義強國鬥爭中之前哨站，是英、法、美的此種蒙養和庇護德國獨佔者政策之基礎。作者是完全正確的。當他寫道：「從兩次大戰中間的二十年間，還有許多事情是值得學習的，過去促使德帝國主義恢復的那些基本力量，就在目前也沒有完全退出舞台。」

蒙養德帝國主義者們的政策，也帶給它的發起人以若干意外的、並不太愉快的果實。給德國獨佔者們援助的結果，使他們很快地復元、復興並鞏固了他們自己獨佔組織的力量以及在國內和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一九二六年德國的輸出已達到了戰前的水準，而在一九二九年則高出百分之三十四。到一九二九年，德國的獨佔已恢復了它自己的世界陣地並重新以對英、美獨佔最大和最危險的競爭者之姿態而出場。當時美國和英國的獨佔者們所給予德國獨佔者們的「援助」就這樣地變換了方向。德帝國主義重新把再分割世界的戰爭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它的貪慾現在已不以某些殖民地的佔有爲限了。德國的掠奪者，用希特勒派的口舌，宣佈奪取世界霸權的鬥爭。

作者引用描寫德國法西斯主義是德國獨佔資本之產物的廣泛資料。

法西斯主義者在德國的統治，同時意味了德國獨佔資本主義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關於強迫卡特爾化的著名命令，是希特勒派走向政權的第一步，這道命令成爲大獨佔者們吞併中小公司和企業的威力工具。在國家幫助之下，集中化和獨佔化過程進行的速度，甚至對德國來說，也是不平常的。獨佔和國家機關併合的強度過程與此並列地進行着。

法西斯制度確立之後立即創設的臨時最高經濟會議委員中，按照艾倫的用語，「就包括德國財政資本的大帝王」，獨佔幾構與國家機構混合的過程，在戰時已告完成，「當時希特勒的國家機構和托辣新制度的混合已經達到如此完備的程度，以致彼此幾乎不能劃分界線。」

操在德國獨佔者們手裏的國家機器，不僅成爲了對內進攻，而且也成爲了對外進攻的有力利器。艾倫寫道，在大戰之前，德國獨佔在世界舞台上的積極化，首先是循着鞏固它自己經濟和政治陣地的路線而進行，爲着這一點，也曾局部地利用了國際卡特爾。德國的獨佔者們在這裏比它自己的夥伴有了明顯的優勢，如艾倫所說「在以納粹制度爲代表的獨佔資本和政府機關之完全混合的情形下，德國的卡特爾主人們比他們英國和美國的勁敵掌握了巨大的優勢。」

不久以前還得到美國和英國貸款和信用的德國獨佔者們，鞏固起來並集合了力量，開始排擠他們自己昨日的「恩人」，並從後者方面接連地就近奪去世界市場上的陣地。德國的獨佔開始伸入到近東、中東、巴爾幹、南美、中國以及甚至美國去。如所周知，甚至就在戰時，德國人也廣泛地利用他們自己與美國獨佔的聯繫而損及其對手，關於這一點，美國有不少書籍、論文都已寫過了，而且出版了各種委員會的大批官方報告。但足以解析促醒美國獨佔者們與德國人妥協之動機的那些原因，却極少加以研究。常常斷言，美國的獨佔者們簡直是受德國卡特爾主人的欺騙。不言而喻，這並非如此。艾倫寫道，如果假定美國的獨佔者們單純是被他們自己較積

極的德國夥伴所「愚弄」，那對前者的觀察力，將是嚴重的低估。事實上美國的獨佔推行了確定的政策，而不僅是「單純商業」的政策。一切事情是在於「卡特爾合約是介於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在西方所推行的把德國造成反蘇前哨站的一般政策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豢養」德國掠奪者的政策，就於戰前時期已在特種形式上繼續了。當時它是「綏靖」侵略者的慕尼黑黑政策的一部分。顯出特徵的，是慕尼黑之後經過六個月，在杜塞爾道夫召集了英、德卡特爾會議。在會上曾經簽訂了英、德獨佔者們最密切合作的協定。這個會議是得到英國政府的通知與認可而舉行的。

但過了一些時候，德國獨佔者們的「和平進攻」已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慾。德國的獨佔者們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是意味着德國獨佔進一步的增長，經濟獨佔化水準的提高。戰爭導向國內生產集中化和資本集合化的新浪潮，它是大獨佔吞噬中、小公司的結果。但這個時候德國的獨佔在德國之外，在被佔領國家的領土上所施行的掠奪和搶劫，對它們的致富，具有更大的意義。德國的獨佔者們穿進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後衛。他們像蝗蟲一樣散佈到被佔領國的經濟上去，並利用五花八門的方法：從簡單的掠奪直到新會社和德國資本佔優勢的混合公司之設立，把這種經濟抓到自己的手裏去。

戰時德國獨佔之立致鉅富與增長，是它們搶劫活動的結果。一九三七年所創設的「日爾曼、戈林」康采恩，很快地變成了德國第三個大康采恩，把一百二十八個公司隸屬於自己完全的控制之下，以及歐洲國家其他二十八個公司隸屬於自己局部的控制之下。德國另一最大的康采恩是法本公司。在戰爭開始前，它併合了德國一百七十七個公司。在戰爭結束前，這個康采恩，控制了三百八十個德國公司，有五百個公司加入其國際組織；除此之外，許多別的公司，透過了二千種卡特爾合約，與法本公司相聯繫。戰時德國的獨佔也在歐洲各中

立國中加強了它自己的影響。

從這裏就可以了解，關於清算德國侵略基礎的德國卡特爾問題，具有何種巨大的意義。同時，艾倫寫道，不管在這一戰中帶給德國以空前的失敗，德國獨佔在西區的根據地並未被消滅。許多重工業及軍用工業企業，幾乎仍然未被觸動，在英美佔領區的全部工業所有權，仍然是在德國康采恩的手裏。除此之外，德國獨佔者們按照它們自己先驅者的經驗，把不少資本遷移到國外去。「吉爾戈委員會確定德國的資本牢固地埋藏在中立國以及戰時在德國統治之下的若干國家中，美國本身可能會是美國資產的逋逃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獨佔者們恰如他們的先驅者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對他們自己在英國和美國的同僚，寄予嚴正的希望。艾倫寫道：在吉爾戈委員會提供陳述的證人之一在德國投降的前夜，與若干處於領導地位的德國工業家，談過話。他聲稱：「這些領導者們希望以前會是他們卡特爾之夥伴的有勢力的英美朋友們，把他們從困難的狀況中挽救出來。」在艾倫的書中也引證了法本公司的領導者們的卓絕言詞，他們在質詢時聲稱：「一切的質詢與調查，——這都是短期間的現象，祇要把事情稍加調整，他們希望英美的朋友們會來援助他們。」他們確信「他們的朋友們會把此種調查告一段落，並按照他們的意見，會好好地對待他們，並幫助他們恢復自己的工業。」

在與德國西部佔領區的往後的事變，指明了這些希望並沒有落空。英美的獨佔者們抱着很大的決心，現在要來幫助他們自己德國的夥伴了。他們運用此種的佔領政策，是與同盟國對德國所共同通過的議決背道而馳，目前他們不僅對德國的獨佔，而且也對作為戰犯而站在被告欄內的獨戰者本身公開予以救助。

在德國工業中投下不少資財的美國和英國獨佔者們的私利，成爲此種政策的基礎。另一方面，現時德國也被美國的獨佔者們以及他們英國的同僚看作在反對「東方」，即是反對蘇聯及新民主各國鬥爭中的「西方」前哨站。

如艾倫這本書的第三章所標的「財閥的帝國」是闡述日本獨佔的特徵。作者指出：日本的經濟，是落在若干獨佔者的手裏。其中特別分出「四大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康采恩。艾倫寫道：這「四大家族」所掌握的控制權，超過如摩根、洛克菲勒、杜邦及梅隆那樣的美國大公司。在大戰之前，上面所指出日本的四個康采恩，控制了日本一切股份公司資本的百分之六十。全部製紙工業，全部煤炭開採和銅礦冶煉的大半，全部商船的一半，以及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如此類推。

艾倫寫道：日本的獨佔者們，在大戰之後，應用了關於他們自己「穩健」的神話，抗衡日本軍閥的侵略性。事實上，日本的獨佔者們也如德國的獨佔者們一樣，會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煽動者的前列，他們利用這次戰爭作為在國內和國外巨大的致富和空前掠奪的手段，與軍閥集團攜手並進。戰爭加速了日本集中化的過程。如果說在一九四〇年各種的合併和改組只觸動了二百十六個公司，資本總額達三十六億日圓，那末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此中過程就牽涉了一千三百五十四個公司，資本總額超過一百九十億日圓，獨佔者們利用戰爭的條件，以推行強迫卡特爾化，其結果使一萬二千家左右的小商人和工業家，沉沒下去。巨大的戰時超額利潤，以及在殖民地 and 被佔領領土上之掠奪，促進了獨佔者們的致富。其結果使日本的富豪們在戰爭中發財了；而獨佔組合的實力，有力地增長了。艾倫寫道：在大戰結束時，「四大家族」的資本，計達一百二十億日圓。這些康采恩控制了銀行存款及銀行資產，總數達一千一百十億日圓；有三百二十家工業公司也屬於他們。

依靠他自己增長起來的經濟實力，日本的獨佔者們逐漸地，然而牢固地把國家機構抓到自己的手裏。艾倫寫道：在大戰時期，發生了「日本獨佔者們駕於帝國之上的完全領導權確立的過程」此種過程是在與軍閥集團作某種鬥爭的條件下而進行，但財閥以完全的勝利者之姿態脫穎而出。顯出特徵的，是「軍事獨裁者」首相東條不得不同意把經濟的完全控制權賦予獨佔者們。對這曾經設立了一個所謂諮詢委員會，有七個大工業的權威

者參加，此種內部秘密的內閣，「諮詢」政府政策的一切問題。艾倫寫道：「政府沒有得到國內財閥此種特別機關的同意，什麼也不行不通。」武備省之成立，也具有不小的意義，形式上是以東條爲這一省的首領，而實際上它完全落在獨佔者們的手裏，並使他們有可能來控制軍用工業。艾倫寫道：這會是財閥的真正大勝利。

作者指出，日本的獨佔者們因日本失敗的結果所受到的損害，比德國的獨佔者們因德國的失敗和崩潰所受到的損害要少些；這件事首先可用美國獨佔資本之利益來解析，後者追求的目標是在保留帝國主義的日本，作爲反蘇的障壁。而此種目標，不僅不同意對日本獨佔的實力加以任何的限制，而且積極地要求保留和鞏固它。艾倫寫道：就在戰爭結束時，日本的獨佔者們很快地汲取了此種情況的一切好處，當時就已明白，日本很快將被擊潰，引它退出戰爭，並以此來預防蘇聯和美國的軍隊共同佔領日本。當時像在德國是推行共同佔領的政策，而對日本，美國預先就決定了它自己控制這一國家的問題。結果獨佔資本在日本的陣地，仍然幾乎未被觸動，不僅基本的經濟力，而且大部分政治權仍然留在他們的手裏，因爲財閥的最著名的代表，都已加入到日本的政府中去。麥克阿瑟所宣佈的「四大家族」的大股份公司之清算，預先放出以十年爲期的，按照官息計算的貸款，以代替公司的股份資本。同時宣佈政府爲「公衆」將持有財閥的股票。艾倫在這裏指出，根據日本的術語，「公衆」這個字意味着「公司」，在本場合是指美國的公司。「在等待最後決定時，財閥的政府應當成爲財閥股份資本的保持者，除了決定拆卸的軍用製造廠之外，一切製造廠仍然受着獨佔者們的管理。」

美國當局在日本政策中的許多事情，可用在戰前就會有過的日本資本和美國資本的密切交錯來解析。美國的製鋁公司透過它自己的加拿大公司之中介，掌握了日本住友康采恩製鋁公司股票百分之三十。「國際電話及電報公司」的分公司持有住友電力公司股票的百分之二十，並擁有選舉四分之一董事的權利。與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有聯繫的泰德德華特合衆石油公司，擁有三菱石油公司股票二百萬美元，直到偷襲珍珠港之前，還以石油

供給這個公司，如此類推。美國資本在日本的這些陣地，現時大大地擴充了。美國的公司企圖奪取日本財閥資本的極大部份。美國的和日本的獨佔資本之此種交錯，加強了美國獨佔者們對保留日本獨佔資本之興趣。

x x x x x x x x x x

艾倫這本書的第四章到第九章，是闡述美國和英國的獨佔之特徵，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相互鬥爭，美國獨佔者們走向世界統治的意圖。

美國是托辣斯的典型國家。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像在美國有這末多和這末大的公司。美國比法國更有權利稱爲「二百家」的國家。二百個美國最大的公司之資本，在大戰結束前，計達一千億美元左右。艾倫寫道：美國「是站在世界上最獨佔化的國家之前列」。「自由企業的国家，是控制金融、工業和貿易一切最重要部門的巨大托辣斯的国家。」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時期中，集中化和獨佔化的過程，在美國以最大的速度來進行。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七年，小企業的數目大大地減少了。大企業和大公司的意義，相當急劇地增長起來。作者寫道：例如在機器製造、橡膠及化學部門中，一九三七年，許多種出品的生產，已被集中到這樣的程度，四個最大的公司，在每一這些部門中，控制了全部出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作者以杜邦、洛克菲勒及梅隆三個「家族」集團爲例，指出極少數獨佔者在美國經濟中的統治作用。

生產的集中化，是獨佔及其影響加強增長的條件。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經濟恐慌，以及羅斯福「新政」時期所推行的政策，促進了這一點。作者寫道：「新政」促進了加強的卡特爾化。「美國商務部報道說：三千五百個大的以及一萬個以上的地方社團及商會之實力，是復興法案綱領的基本因素。」同時，調節工業及實業活動的所謂私人競爭法典，「事實上加快了小企業隸屬於工業及貿易某一部門之『領袖』之過程，——此

種過程，在恐慌時期就已表露出來了。」

戰爭給了集中化過程和獨佔進一步增長，以最有力的推動。首先被大獨佔者們所利用的軍用品定貨之暴富及超額利潤，促成了這一點。作者指出，從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部軍用品定貨單的百分之七十五由政府轉交給一百個最大的獨佔。艾倫指出：在戰時生產的五年內，工業公司所得到的利潤，於納稅之後，計還二百七十億美元以上。

我們對這還加上一點，在戰爭的五年內（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美國一切公司的利潤，在付稅之後計達四百二十三億美元，對比戰前五年內（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一百五十三億美元。根據商務部的統計資料，在戰爭的六年內（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美國一切公司的私人利潤，計達五百二十億美元。

同時，小企業及公司能够收受有利的軍用定貨單是很少的。一九四三年工人數目在五百以下的企業，只得陸軍定貨百分之十三，艦隊定貨百分之八，以及海軍委員會定貨百分之十一。小公司（工人數目達一百二十五人者）在戰爭時期仍然停留在一九四〇年的水準，而最小的則減縮了。艾倫寫道：「顯然的，小公司——它們越小，則這點越見準確，——從戰時經濟高漲中得到的好處比較不多。」「抑尤有進者，許多公司在落於它們份額的那種『貧乏的獵獲品』條件下，不能進過了。」

大企業與大公司進一步的擴大，以及小公司大批的破產，是戰爭的結果。一九四三年，在開採工業、製造工業及建築工業中，全部操業工人的百分之四十五，是落在工人數目在一千個以上的企業中內，對比一九三九年，則為百分之三十。同時，在五年內——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國約閉了五十萬個公司，或者佔一切商業公司的六分之一。美國的獨佔者們利用戰爭而致富，不僅是靠軍用的定貨，而且他靠他自己國內較弱小的競爭者之被大批的吞食。

就在戰前時期，尤其是在戰爭時期，美國的獨佔者們把政權之地方的及中央的機關抓到他們自己的手裏。戰時在國家事務上攫到了有力的陣地和嚴重的影響之後，美國的獨佔者在戰後不僅保持了，而且鞏固與擴大了此種陣地。戰後時期所發生的最大獨佔的代表者們公開地侵入到國家中央機構的最重要鍊環中去的過程，可以證明這一點。在杜魯門的政府中，哈里曼——最大的金融家之一，「白朗兄弟及哈里曼」公司的主席，佔着商務部長的職位；史奈德——聖路易的最大銀行家之一，佔着財政部長的職位；領導華爾街「狄龍·里物」銀行公司的詹姆斯·福萊斯特佔據陸軍部長的職位。陸軍部次長威廉·特萊勃少將，是同一公司的代表；薛敏頓——以前是最大的無線電公司——「埃密遜製造公司」的董事長，佔據空軍部長的職位。如華爾頓在「新共和」雜誌所寫，近來「統治杜魯門政府其餘機關的銀行家們，終能侵入到國會中去」。不僅侵入而已，而且完全地把它抓到自己的手裏，並以他們自己的反動和侵略對外政策的方針，指使它們。副國務卿現時是羅凡特——他是上面已經提過的「白朗兄弟及哈里曼」公司的夥伴，副國務卿蘇爾資曼，以前是紐約交易所的副經理；陶格拉斯——駐英的美國大使——他是美國互助保險公司管理處的主席，駐印大使格蘭第，是大輪船公司的董事長，駐波大使，是紐約的銀行家格里菲斯，如此類推。華爾頓寫道：「獨佔者們抓到了政府中的基本職位之後，伴來了「無情地革除曾經支持羅斯福『新政』，而在政府中佔着次要職位的官吏。」

獨佔者們在美國國家機構的統治地位，決定了美國內政和外交的反動性。此種政策在國內是工業、商業和金融界的大亨們放手行事所欲為。這個政策取消了現時不利於獨佔者們的戰時「調節」。這個政策向勞動者們的生活水準和權利進攻。由美國獨佔所指使的對外政策，這是無退制的擴張政策，這是奴化小國和大國的政策。這是準備軍事冒險的政策，這是反對蘇聯新民主各國的政策。華萊士在他自己的一篇演詞中說：「在共和黨人統治下，是華爾街治理美國。在現政府的條件下，華爾街準備治理世界。」

應當指出，艾倫在他自己的這本書中，對美國獨佔與國家機構合併的問題，沒有加以應有的分析，而且也沒有利用在美國報章上對這個問題所有的一切資料。後面這一點，對闡述美國獨佔的各章中，都可以這樣說。

在書中也曾引證了表徵英國獨佔發展和作用的若干統計資料。艾倫首先注意到英國生產集中化的水準。一九三五年，英國工業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五十二，是在工人數目五百以上的企業中工作着。一切銀行存款（英格蘭銀行除外）的百分之七十五。都屬於倫敦的「五大」銀行，這一事實證明銀行資本高度的集中。兩次大戰之間，獨佔化的過程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家支持獨佔者們在一九三五年所提出的經濟廣泛卡特爾化的綱領。

戰時英國的獨佔者們利用了國家的機器，以擴大自己的影響，並把全國的經濟隸屬於自己的影響之下。英國的獨佔者們公開地進行政府機構中關鍵陣地之掠奪。艾倫寫道：「到處都可以看到獨佔利益的領袖們，從內閣起，到各個經濟部門的控制職位止。獨佔在政府中的權力，受到國會的支持。後者在戰時變成了各公司代表的集合所。根據若干統計資料，在一九三五年所召集的國會中，統計了二百六十五位保守黨人，他如在各種公司中佔着五百十二個董事的位置。根據別的統計資料，國會的一百八十一位議員，佔着各個公司的七百七十五個董事的位置。」

艾倫寫道：獨佔資本從這些陣地出發，公開地爭取在經濟中自己影響進一步的擴充。在國家機器幫助之下，獨佔的主幹把強迫卡特爾化散佈到一切工業部門中去。與此相關聯，大批中小公司停止了自己的生存，結果英國「帶着更高度卡特爾化的經濟和獨佔控制的統一體系」跳出戰爭。

可是戰後在對外市場上，英國的獨佔資本不得不與更有威力的對手——美國的獨佔資本相衝突。艾倫寫道：英美之間在這一鬥爭中的優勢，是在後者方面。按它自己的經濟實力來說，遠在戰前美國在資

本主義各國中已執牛耳。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國全部工業品的百分之四十八，是落在美國的份額內。戰爭給了美國生產的增長以最有力的推動；在一九四四年比一九三九年，工業品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即是增加一倍多。艾倫寫道：戰後美國工業的實力，無疑地，佔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實力之一半多，可能甚至於佔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同時，在戰爭時期內，美國發生了工業上的某種技術之再裝備以及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同時，戰時美國工業的擴充，對它來說，把市場問題尖銳化了，把美國經濟的不穩性增加了，把前所未見的恐慌接近了。由於美國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佔着壓倒優勢的地位，所以美國的不穩定，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來說，是一種威脅。艾倫引證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的話，後者寫道：「遭受劇烈震盪的美國經濟，威脅了其餘世界的經濟均衡。處於週期蕭條狀況中的美國，可能傳染別的國家去，如果世界不能用任何方法把自己從此種影響之下孤立起來的話。」

爭取世界市場鬥爭的強化，美國的獨佔者們預見到了危機，重新把自己的視線朝向戰爭，作為它自己對外政策以及圖利事業的武器。難怪政府委員會所進行的一種經濟調查的作者們寫道：「從何處還可以期待到刺激？如果備戰和作戰是唯一的力量，它可以補償生產技術過程對勞動力減少的影響，那末不得做出一個結論，現代的經濟制度，只有在戰爭的條件之下才能保證幾乎充份的就業。」

展開了爭取世界市場之鬥爭的美國獨佔者們，同時展開了準備新的世界大戰的瘋狂宣傳，把美國的對外政策推到軍事冒險的道路上去，這是十分自然的。

如果美國獨佔的積極性，是在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中的比重之增長的背景上發展起來，那末英國獨佔的增長，是在工業停滯，英國逐漸沒落，以及它在世界經濟中的陣地之削弱的背景上來進行。此種過程遠在

戰前就已開始了。艾倫寫道：遠在前世紀的末葉，英國把它自己資本的大部份輸到國外去，英國益發變成了依靠國外投資之收入爲生的食利國家。國內工業在技術關係上越益落後。工業的停滯，歸結到出口貿易的減低，以及英國在世界市場上越益被更有力的競爭者——日本、德國和美國——從重要的陣地上排擠出去。

在戰爭時期，此種過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艾倫寫道：雖然生產的容量也增長起來，但生產基地現代化和擴充的過程，並沒有得到嚴正的發展。戰爭時期，美國的獨佔者們開始把它們自己美國的競爭者從世界市場上的重要陣地中排擠出去。從戰爭開始時起，英國的輸出按照價值來說，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多，而美國的輸出，則急激地增長起來。在這種關係上說，租借法案帶給美國的獨佔者們以嚴正的好處。在租借法案幫助之下，美國在世界市場上，而一部份甚至在英國的領土上爭取到了新的陣地。例如一九四二年美國對印度的輸出，對比一九三九年（包括租借法案在內）增加了九倍！遠在戰爭的前夜，在加拿大的製造工業中，全部投資的三分之一，是屬於美國的獨佔者們。在戰爭時期，此種相互關係向有利於美國人方面起了激劇的變化，因爲英國的資本家們被迫把自己加拿大的資產之三分之一以上出賣了。

因此，美國的獨佔者們在打擊了它們自己的英國競爭者之後，接連地奪取了它們的陣地。美國富豪們對世界市場的進攻，是在「自由貿易」，「自由進出市場」，「自由競爭」，以及「自由企業」的口號之下來進行的。作者寫道：各種「自由」的洪流，把美國獨佔綱領的擴張本質沖淡了，使容易破壞卡特爾的舊體系，並成立在美國領導之下的新體系。同時這些口號也反映出美國獨佔者駕於它們自己競爭者之上的優勢，以及放手行動的意圖。相反地，自覺到自己陣地相對削弱的英國獨佔者們，是在保護現存的卡特爾制度之口號下而出場。此種鬥爭，一方面反映出美國獨佔資本的行動之進攻的、侵略的性質；另一方面，在它自己較有力的競爭者壓迫之下被迫後退的英國獨佔資本之行動的防禦性質。「一百年來，慣於統治世界的英國執政階級，今天已處於

卑鄙的，向億兆富翁——美國——請求美元和政治的援助，而對此種援助的交換，它貢獻出它自己在世界霸權領域內的經驗，並使更加容易地接近它自己的領地，對於後者的保持，它現在已經沒有自信了。」

美國獨佔者們的貪慾，現在已不以某一個大陸為限，而想傳播到世界的一切大陸上去。美國的富豪們幻想世界的霸權。作者寫道：「在美國大公司管理處集會的大廳裏，起草成立世界的一點也不少——托辣斯之方案。」作者繼續指出，為着此種目的，美國的獨佔者們與國外的一切反動勢力聯盟，推行復活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企圖用各種方法鎮壓殖民地國家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煽動新的世界大戰。艾倫寫道：「美國獨佔者們的此種『幻想』，註定失效。在希特勒德國的廢墟上用大字母描出的此種夢想，是不能實現的，它雖用別的技巧和別的口號，然而追求着同一的目標。」

艾倫指出，在全世界上對抗帝國主義與反動的各民主勢力，增長和團結起來了。

在本書的最後兩章中，是闡述蘇聯，表出它的經濟制度之特徵，以及作為爭取各民族之和平與安全的戰士，在國際舞台上增長的作用。艾倫非常明顯地把沒有剝削者階級的蘇維埃國家與對掠奪戰爭、壓迫别的民族感到興趣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對立起來；後者的對外政策，是受富豪們的私利所鼓舞。作者在這幾章中描寫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指出它駕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上的優點。艾倫寫道，如戰爭所指明，「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發展的先進級段，堅實地鞏固起來了。它的內部實力，甚至於在最不利的條件之下，能够經得起任何種制度所受的最偉大的考驗。在這種考驗中，蘇維埃制度表現出無比的鞏固性，以及伸縮自如……社會主義擁有迄今未見的穩定性。在那裏蘊藏着不竭的原動力，並以飛快速度發展起來的能力……社會主義是勝利的閃擊，不僅在它最初的革命階段中，而且也在它的演進中光耀奪目，作為確定的社會制度，它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繼續發展起來。」

必須指出，艾倫這本書的脆弱方面和缺點。最嚴重的缺點，是作者提供的關於東歐及東南歐各國新民主經濟基礎問題的錯誤解析。

爲要表出新民主基礎的特徵，它創造了他自己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按照他的意見，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可能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也可能是進步的、民主的。他認爲必須「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干與獨佔和反動的利益，與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干與整個人民的利益，反對獨佔和反動之間加以區別。」

讀者已經猜到，艾倫是把新民主的經濟基礎作爲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在其「進步」和「民主」的形態上來規定。他在這種觀點之下，來考察新民主各國所推行的一切改革，工業國有化也包括在內，並把它們作爲國家資本主義程序的措施來評價。

顯然的，艾倫不覺得在他所想出的，好像是爲人民利益的推行的，「進步的」、「民主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這一概念中，包含多大的無稽，以及他對新民主經濟基礎的評價，如何曲解一切最重要的民主改革之性質。如果資本主義的獨佔一般地是意味着反動，那末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就是最反動的基礎。

列寧祇在一種意思上說到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而即是意味着在資本主義的框子內可能達到生產社會化最高階段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全的物質準備，這是它的傳達室，這是歷史梯子的這一級，這一級與稱爲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介的級次。」（「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八七頁。）

列寧着重指出，並屢次重複此種意思。而詹姆斯·艾倫引證列寧的話，硬說此種中介的級次是可能的——

這是「進步」的和「民主」的，這是高尚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

顯然的，艾倫認為在現有的革命民主政權條件下，獨佔資本主義的存在是可能的。他寫道：「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可能成爲真正進步的，它可能成爲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第一步，『它可能爲整個人民的福利』，只當『國家是在革命民主集團手裏的時候。』」換句話說，政權獨具一格的分配——政治的權力可以操在人民民主的手裏，同時在經濟領域內的全部權力，可以操在獨佔者們的手裏——是可能的。

此種情形，政權的此種分配，在實踐上可能有其地位，但只在很短促的中介時間內。因爲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擁有實際力量的獨佔，棄離此種政府，或者此種政府清算獨佔的政權。但在後面這種場合，將完成走向社會主義的真正的一步。列寧恰恰也着重指出革命民主的政府不能停留在半路上；拿到政權之後，它應當在經濟上清算獨佔資本的政權，推行銀行、托辣斯和辛狄加的國有化，對生產與分配，組織全面的管制。這些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且列寧一再地指出，「沒有走向社會主義，往前進是不可能的。」

艾倫寫道：在「臨頭的災難，以及如何與其作鬥爭」這一勞作中發揚起來的列寧的綱領，「會確立完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綱領」，這個綱領絲毫沒有改變財產的關係。不言而喻的，這是不正確的。列寧着重指出，「經濟生活的調節，如果認真實現它的話，同時需要銀行和辛狄加的國有化。」（「列寧全集」第二一卷，第一六八頁。）列寧指出，革命民主的政權，即是反對獨佔者的、堅決的、無情的、嚴峻的鬥爭。他着重指出，推行銀行、托辣斯和辛狄加的國有化，應當堅決摧毀剝削者們的抵抗，採取各種方法，直到沒收獨佔者們、經理們、管理處的委員們、大股東們的個人財產，並監禁怠工和延宕事情的進行者。列寧警告說，獨佔者們沒有搏鬥，是不會交出其陣地，並預先看到採取各種堅決手段鎮壓他們的抵抗之必要。「爲要做出某種嚴正的事情，必須從官僚制度轉到，而且真正革命地轉到民主制度，那是對煤油大王及股東們宣戰，下令沒收他們的財

產。對延宕煤油事業國有化者，對掩藏收入或帳目者，對生產怠工者，對不採取辦法提高生產者一概處以監禁。」（「列寧全集」第二一卷，第一七〇頁）

試問，反對獨佔者們的此種戰爭，與獨佔者們的政權及力量之保留，能够兩立麼？它與舊財產關係的完全保留能够兩立麼？自然，是不能够的。它意味着獨佔政權的破壞，並侵入到資本主義財產的領域內去，在它自己的發展中，不可免地一定歸結到獨佔政權之堅決的清算，以及在經濟中社會化成分的創立。

列寧直截了當地指出，他所預定的這些辦法，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要成爲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就是說不要害怕社會主義，而應當勇敢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去。新民主各國的經驗，明顯地證實列寧這個論點的真理。這些國家的經驗指明，反對反動力量的堅決鬥爭，不能夠半途而廢。取得了政權，革命的民主在經濟領域內勇敢地走向，而且不能不走向堅決改造的道路，以奠定這些國家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基礎。

日丹諾夫在若干共產黨代表的情報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過：「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捷克斯拉夫、匈牙利及阿爾巴尼亞等國產生的這種新民主政權，倚靠着廣大民衆的擁護，在極短一個時期便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派早已無力來作的種種進步民主改革辦法。由於土地改革辦法的實行，農民已經獲得土地，地主階級已被消滅。由於大工業和銀行國有辦法的實現，以及一切附敵賣國份子財產的被沒收，已使獨佔資本在這些國家裏的勢力根本破壞，以致廣大民衆免除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同時也奠定了全民國家所有制的基礎，就建立了新型的國家，即人民共和國，這裏政權屬於人民，大工業、運輸機關和銀行屬於國家，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各勞動階級聯盟是主導的力量。於是，這些國家中的人民。不僅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榨，而且已在奠定着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

獨佔者們在新民主各國經濟中，已經不起任何的作用，那裏任何國家獨佔資本主義都談不到。資本主義的成分存在着，但它不是主導的和決定性的，那裏是有作爲個別經濟成分看待的私人經濟資本主義及國家資本主義，但它們不是主導的和決定性的。人民民主各國的經濟，這是多種成分的經濟，可是社會化的成份在那裏起着主導的作用。施行了工業和銀行國有化之後，人民民主各國的政府，推行了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向社會主義道路完成了嚴正的一步。這幫助它們不僅清算內部反動的深刻基礎，而且也奠定了它們自己各國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推移的基礎，而艾倫害怕承認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這一事實，是枉然的。

艾倫這本書的基本部份是具有豐富的事實知識而寫成的，這裏的材料也從正確的立場加以分析。艾倫這本書的基本部份，是饒有極大的趣味並帶來無疑的好處，所指出的書中的這些缺點，是美中不足之憾事。

論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我在一九四五年所寫、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世界獨佔資本與和平』一書，是企圖分析由於戰爭所造成的世界基本關係的主要變遷。一般的估計很好地展示了過去兩年中所發生的種種事實。然而，許多大事已經顯示了該書關於東歐變遷的一部份，包含了不正確的估計。自從該書寫成以後，我所預見的新人民民主國家已經遠遠地超越了有限度的地平綫。每過一天，就變得更加明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革命以後，東歐人民國家表示了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二次主要的進步。

從歷史進步的觀點看去，拙作的這個部份幸好是不够充份的。除非加以改正，它可能變成瞭解東歐轉變之世界意義的障害，也可能變成關於西方國家發展之錯誤理論的泉源。所以，我歡迎最近在國外發表的，對拙作嚴格的和權威的批評，批評者在該文中詰難我對人民國家的估計，也提出了關於我處理國家資本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

一九四七年十月卅日出版的『布爾雪維克』雜誌第卅二期上，發表了該刊編輯委員之一庫茲敏諾夫的批評。批評者為俄國讀者逐節地撮述了該書。他特別側重該書討論到資本獨佔的作用與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關係的部份，以及他們作為新戰爭煽動者之當前作用的部份。

該刊以十四頁的篇幅登載這篇批評，最後兩頁注意到該書的弱點和缺點，這是有關第十二章『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的。

庫茲敏諾夫正確地指出該書最嚴重的缺點是在於處理新民主國家的經濟一點上。我也有同樣的結論。自從

該書出版以後，在大西洋的這邊成爲可以引用的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和更完全的情報，表示我的估計是不正確的。首先，該書對於人民國家在工業、銀行、運輸和礦產方面實行國家化之社會主義性質的估計，是弄得失敗了。此外，涉及這些問題的論點，引起了關於一般國家資本主義的若干錯誤的觀點。

一 關於新民主國家

新人民國家的建立表示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世界關係的基本改換。這些國家從獨佔資本的世界軌道上、從帝國主義的範圍裏撤退出來。作爲在戰時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一個自然結果，新民主國家的人民，在他們自己的方式中，符合於他們國家的特殊情況，正在擴大世界的社會主義的部門。雖然在他們戰後發展的形式和速度上各有許多不同，人民國家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在這些國家裏，優勢的地位已經獲得，以進行社會主義的轉變。

在拙作中，我着重說到許多的和革命的發展，但祇是在某一點上，就是：一個國有的、社會主義部門的建立，從這裏，整個經濟可以被領導到社會主義上去。把國有化的部門特別描述爲國家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也是對歷史變遷的低估。這個變化的顯著特點是它的社會主義的核心，這一點決定了轉變的本質和它的發展的方向。這是在拙作中主要的『刪節』，由此，所有別的一些錯誤就跟上來了。

這種錯誤的來源是什麼？庫茲敏諾夫認爲這是從『進步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上導致下來的。這種批評使我把全書的理論方面加以密切地檢查。

在該書的其餘部份中，我反對同樣的理論，譬如組織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以及通過卡特爾和世界托辣斯克服其固有的無政府狀態。我也反對有關『進步的』帝國主義理論，白勞德就是一個如此的主張者。資

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危機的概念，這兩個特點由於戰爭的結果正在同時深刻化，這是該書全面分析世界關係的基礎。美國帝國主義的新侵略作用，由此而起的戰爭和法西斯的危險，都清楚地敘述了。顯然地，從『進步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觀點上去估計戰後局勢，是不可能正確的，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關於『進步的』帝國主義，我指出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辭（中譯本一百廿六頁）。

然而，好像某些自相矛盾和混亂的成份爬進我的理論裏面去了。我沒有『創造』一個『進步的』獨佔資本主義的理論。但是，無論如何，這種理論的某些成份是出現在拙作中的。按照我的意見，這種自相矛盾是把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的轉變作一機械的比較所引起來的。

像一九一九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事件，開始了世界的新時代。創造了一個確實的先例、一個確實的典範的形式，所有後來的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他加以比較。論及這些大事的本質，是有許多共同點的，因為在此期間，革命過程的本質是向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論及特殊的道路和方式，許多的不同點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些大事的存在之下，常常容易沒有看見變化的本質，因為它所採取的方式是可能和典範的先例大不相同的。

這就是我對於東歐人民國家的研究上所發生的情形。主要的，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以及和農民的同盟之下，主導的社會主義的變遷是發生了，這和俄國的情形一樣。自然，革命表示了它自己和直接的先例或俄國革命的特殊情形是並不一致的，但是。關乎此者，整個先前的經驗，和這些國家是共同的，並且，從普遍的情形和每一個國家的傳統中，還引起不同點。他們的革命是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民族奴役之鬥爭的自然結果。當完全失掉信任的資產階級對敵合作者的政權在戰爭中失敗的時候，二次世界大戰的鬥爭產生了新形式的人民力量，人民解放委員會和人民陣綫，它又建立了新形式的政府，人民的國家。由於蘇聯，這些小國並不孤立。比起一九一

七年蘇維埃取得政權以後的俄國情形來，若干國家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甚至或許是更迅速地向前推行。

這些新的唯一的形式，人民國家的典型，是發生在東歐的特殊轉變的產物。雖然保留了資產階級國會式政府的若干相同點，它們表示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的力量，但和俄國所發生的相比，這是另外的方式。基本的變遷是走向社會主義，人民國家的內容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農民及其它人民階層的聯盟。趨向是更進一步地鞏固人民的力量和建立社會主義。

沒有全部地認清東歐變化的真正內容，我找出列寧在俄國革命以前六個星期所寫的著名的小冊子「論可怕的災難及如何與之戰鬥」，把國家資本主義綱領的基本理論，用來在理論上「解釋」人民國家的內容，認作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

自然，雖然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在他的綱領中並非不存在，列寧的政策並不是要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或之後，實行「完全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旦當革命的民主聯盟已經得到政權的時候，那是一個爲了要達到社會主義的政策。一旦完全明白了列寧的概念。它便啓發了東歐發展的真正方針。它不能用來辯護新民主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

正如戰爭到了終結，東歐資本家和地主的舊政府已被人民的政府所代替了，其中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是保持主導的。今天，當反對反動力量的鬥爭依然尖銳的時候。問題不祇是初期性的取得政權，而是鞏固已經得到的人民政權，增強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部門，強化已經表現在人民國家裏面的工人農民之間的聯盟，並且從事社會主義的發展。

沒有認清實際上已經發生的社會主義變遷，引起了另一個錯誤——在獨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有一個中間階段的概念。這個概念的牽涉是長遠的，影響到對於西方國家的獨佔資本主義的前景，以及對新民主國家

的估計。

實際上，從東歐所發生的事情上就看得出來，一個中間的階段是不存在的，祇有一個轉變的時期，在此期間，戰爭的力量以鬥爭來實現它。但是，一旦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政治的權力，轉變是走向社會主義，而不是某種『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國家。即使是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它們曾經是隸屬於國際獨佔資本，如國家資本主義還是佔優勢的，經濟中心部門就不能是民主的。祇要是國家獨佔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就依然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

國家資本主義表徵了國家控制的措施，在基本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所有權毫無變化。如果東歐國家在國家資本主義的模樣上來實現國有化，那就不能正確地說到一個基本的社會變化，一個社會主義的變化。因為外國獨佔者（他們曾經強固地鑽入這些國家，本國的資本家主要地是依賴他們的）甚至還能在國有企業中繼續搾取工人。這個國家就要把工人在國有工業中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交給資本家。這樣，這些國家就要完全保存在資本家手中，以大規模的國家控制來為獨佔者謀利。它們也還要保持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強國的奴隸地位。但是，在東歐所發生的情形却剛好相反。人民的政權建立起來了。國有化部門一開始就佔優勢地變成社會主義的，這是人民國家的主要經濟基礎。這個開始是用來結束人對人的搾取，從階級的和民族的壓迫中解放工人。用來結束國外吸吮剩餘價值和國家資源，這樣就結束了帝國主義的保護。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已經開始了。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反面。這是列寧所寫的含意：『社會主義不是別的，而是從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次一個步驟。』

有了國營化的部門，人民國家現在就能够從事建立經濟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也是經濟的最重要的一部。從這有利的一點上，人民國家就能够增強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盟，建立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堅固聯繫。國

營貿易現在也能擴展了，合作社可以和國家成立更密切的關係，社會計劃能夠開始了。

自然，如果在這些國家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被瞭解為人民國家所規定的，在小工業，貿易和農業中私有資本部門的管制，那麼國家資本主義在新民主國家裏所起的是一個次要的、雖然也還是重要的作用。其目標是為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全部計劃的利益而控制和領導私有資本部門。這不再是在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人民國家對資本主義部門採取國家管制的措施，包含它和使它成為附屬，削減它在經濟上的作用，終於是消滅它。社會主義是永久的成份，它將發展起來，直到它終於使整個經濟賦有這個特性。國家資本主義的成份是轉形期的，因為私有資本部門的本身是暫時的，是逐漸增多地被附屬於社會主義的部門。私有資本主義以及和它一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消失，是已經被走向社會主義的更進一步的發展所準備着了。

在資本主義部門中，私人的累積繼續着，雖然它是被人民國家所控制着的。但是，在它逐漸增多活動的一般環境中，阻止着資本主義的部門把固有的無政府狀態傳導給整個的經濟上去。在這個部門中的無政府狀態是固持着的，因為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可逃避的特點，但它是被人民國家駕馭着的，增長着的社會主義部門的計劃生產使之相形減色。在這些情形之下，和基本工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及國有貿易、國有金融事業的增長中的重量並列，國家控制可以用來使私人部門和總計劃配合，其方式是減少並包容其無政府狀態的因素。因此，就獲得了地位來排除危機和失業，在另一方面，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無論發展得多麼高，都不能克服資本主義典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它不能排除危機和大規模失業，這是資本主義經常循環的特點。

在農業方面，來得更複雜一些，這是在新民主國家之內『自由』市場和私人累積最豐饒的泉源。然而，人民國家關於市場的管制和社會主義部門增長中的重量，打開道路，克服了小規模農民生產的落後性，並且引領着農業轉化到社會主義的方向上去。農民生產合作表示了從私有農民農業到集體耕種的一種轉變形式。但

是，這些還祇能算是農業生產的一小部份，雖然它們都在增長中。土地的私有權還保持為一般的特點，農民向國家繳稅之後，還有私人累積。因為握有基本工業、運輸和銀行，人民國家便能直接幫助農民改良他的出產，便能廉價供應國家貸款，使農業現代化，用機器進行合作的生產，便能在富農犧牲之下，改良貧農和中農的地位，便能逐漸地以國家的和合作的貿易和銀行業務代替在農民中的私人貿易和貸款。

在東歐，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不祇是不正確的，而且對於那些打算阻止社會主義發展的份子倒是有用的。這些份子願意損毀國家的社會主義部門，他們用直接的和通過貿易的方式，在其中逐漸增長資本主義成份的作用。他們願意把國家企業拉回到資本主義上面來，爲了從前私有者的利益，把它轉化爲由國家經營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在這種方式中，他們終於希望把國有工業交還給外國獨佔者和本國的資本家。反動份子也打算完全控制小農的農業和合作社，把他們引向反對社會化的部門。在美國，對於這一點，更必要加以瞭解，因爲美國的獨佔資本家繼續他們的努力，以阻止新的社會主義進步，他們在新民主國家裏鼓勵資本家，支持企圖重返到資本主義道路上的政治派別，他們還用經濟的封鎖和原子彈的威脅。

由於已經論到了的這些理由，把「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認作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的概念，是難以置信了。這種理論甚至還能起一種反動的作用。這種理論還能歪曲我們關於反對獨佔及西方國家反動派的人民鬥爭這些問題的研究。

一一 關於西方國家

把東歐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當作是一個中間階段的理論，和主要的獨佔資本國家的同樣概念是有聯繫的。抽書關於這一部份有許多篇頁，暗示了「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在轉變爲社會主義之前，也可以屬

望於英國和美國。

關於英國，我正確地指出英國工黨政府的國有化措施是爲獨佔者的利益效力的，獨佔者繼續從國家得到工人在國有化部份中的剩餘價值。我寫道：『工黨僅僅接受了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並且大部份是照老樣子在繼續處理事情。』但是我又說：『在這一切方面未能做到任何值得重視的進步以前，帝國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就該被向着社會主義邁進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改造成爲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以解決英國人民的根本問題（中譯本第二百廿七頁）

問題並不是要把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轉化爲『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在這語氣上，這就可以被誤解爲意味着右翼工黨份子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言詞，而實際是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利益之中的。問題是找出從獨佔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特殊道路。真正的『進向社會主義』祇能由工人階級來進行，使它自己脫離反動的社會民主派的影響，和人民大眾的民主盟友在一起，得到決定性的國家地位，以貫徹社會主義的措施。

關於美國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引起了同樣的混亂。在一方面，我正確地指出國家的干涉是爲獨佔的利益效力的，在經濟中最廣大的干涉，祇能發生在戰爭、準備戰爭、或經濟危機的特殊情況中。但是，我又說：『同樣實在的是，在和平時期的情形之中，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國內資本的削弱成正比，而且它可以隨特殊的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而採取反動的形式或民主的形式。』（中譯本第二百十六頁）

這種說法的第一部份是正確的。第二部份就帶進到『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中間階段的概念上來了，因此是不正確的。沒有一個人民的政府，沒有根除獨佔者，國家獨本資本主義就不能轉化爲它的對立物，國有管制的措施既不能消滅這個制度的基本無政府狀態，也不能承擔真正的民主性質，一個社會主義的性質。

無疑的，在英美的特殊發展的過程，比起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或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歐來，是十分不同的。當然，在英美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也還有重要的不同點。但是，在這個時期中的任何真正變遷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並不是從獨佔資本主義到某種形式的『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雖然，在轉化已經開始之後和一個國家完全變成社會主義之前，一種『混合的』經濟是會存在一個時期的。

也很顯然，政治鬥爭的本身以及一般的情況（在這情況之下，政治鬥爭在國家權力的變化佔先的時期中繼續進行着），決定了人民國家的形式和轉向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在義大利和法國也能够看到，那裏國家權力的問題是提到議事日程上去了，政治危機的深度並不在它的本身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雖然事實上許多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被視爲必要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反動的，甚至當他們是在轉化的邊緣上了，它們也辦不了什麼事情足以改變那基本的政治特點。改變祇能由工人階級及其盟友轉移權力來導致起來，這是轉化到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沒有中間階段的。

在此時的美國，政治鬥爭的程度還沒有到達這麼一點，就是沒有到達該使一個人民國家提上議事日程的一點。問題是不同的。廣闊的人民運動正在發展中，來反對戰爭危機和反對反動派。這是一個反對戰爭販子和反對進入反動，人民大眾抵抗和防禦運動的開始。它的主要的意義是它的反對戰爭和反對法西斯的本質，在這些問題上，它和全世界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是有共同立場的。但是，在它現在的階段上，美國的人民運動既不是要在國家權力上，也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上，導致基本的變化。在反對戰爭和反動派的鬥爭中，人民運動將發展到這個方向上來。同時，被反對戰爭的運動所一致承認的綱領，是關於改變國內政策的，這種可以被適當地稱作改革的要求，還是沿着政府措施的路線上的，這些措施會即刻地有利於人民。

在這種情況中，當人民反對戰爭運動的發展有了極大重要性的時候，我想以下的事情必須加以避免，在一

方面，對於這些由人民運動能贏得的讓步和改革，採取否定的態度，在另一方面，對於參加在其中的基本力量，發生混亂。美國的人民運動能够變成一個嚴重的疆界，以阻止國內外獨佔資本的侵略性的追逐，這樣做，也會發展成向獨佔者的力量作有效挑戰的那種力量。這是它的偉大的意義。這種運動的發展以及如果是足有力量能够贏得的重要勝利，並不是意味着美國帝國主義能够推行一種進步的方針，也不是它要進入『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中間階段。人民運動應該被領導來反對獨佔資本和帝國主義。它現在所要求的從帝國主義政府而來的主要的『退讓』，能够終止走向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趨向。

在拙作中，我對於國有化問題的正式研究，提出了警告，那就是不願國家權力的內容和類型。我們已經看見，在每一個基本的社會轉變中，無論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俄國或今天的東歐，國有化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這並不是意味着無論什麼政府所從事的國有化的每一種措施，都是一種進步的行動。除開加速工業社會化過程的物質意義之外（此時，累積還是私有的），國有化的措施，在資本主義國家手裏比起在一個人民國家的手裏來，是起着很不同的作用的。

在國家依然保留的情形之下，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包括國有化，在實質上是反動的；因為這些措施導致獨佔資本與國家經常更密切的結合。在納粹德國，這種情形看得更清楚，這個國家在卡特爾主人、容克家族和統治機構之間到達了全部結合的尖端。日本，在獨佔者、保留半封建根基的軍閥，和包括天皇圈層在內的國家官僚機構之間，也發生過同樣程度的結合。這是一般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雖然，在一個比起另一國來，它還可以更進一步地向前進展。

在戰爭期間，獨佔與政府的結合到達了新的程度，不祇是在英國，而且還在本國（按指美國——譯者）。政府的戰爭工業和戰時的經濟管制，都是牢固地握在托辣斯的手中。取消管制也有所實行，主要的是看到戰

後獨佔者的利益上的。到了今天，雖然還有反動派一般地反對政府企業的叫喊，雖然他們對純粹的『自由企業』（因為害怕民主的管制）的不斷的稱頌，獨佔者還是通過對聯邦政府所有的大規模的管理和租用，保守牢固的控制。這些是獻身於戰爭準備的國家企業，像原子能工業，人造橡皮工業，和許多預備中的軍火工廠。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和戰時管制一樣，朝向再安置許多聯邦管制的趨向，這就會便利了新戰爭經濟的增長。

因此，對經濟實施更多的管制，或由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實施更多的國有化，都不會在它本身改變國家的性質。或轉移其政治的本質。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到達了相當高度的程度，但是，這並沒有改變反軸心戰爭的正義性質，也沒有使美國獨佔者有所進步。然而，它却擴充了獨佔與政府的結合，在戰爭結束以後，是甚至更進一步地完成了。這種更完密的結合，不能阻止但却產生了最反動的政治結果，全部的力量在國內和國外政策的境界內，現在正在逐漸增長地被感覺到了。

是一種特殊的國家干涉的措施呢，還是一種應由進步力量加以支持的國有化呢，這必須被決定於一種特殊措施所應起的作用，而不是決定於一般國有化的抽象的近似。在目前的情況中，這種由國家所實施的經濟措施，會優先地成爲準備戰爭的部份。

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着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物質條件。但祇是物質的條件。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政治本質還是反動的。反動必須用政治的手段加以鬥爭。政治鬥爭的成功準備了向社會主義的轉變，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新形式。

當我所說的許多點是清楚地在此作中敘述出來的時候，自相矛盾和混亂較早地指出了傾向於歪曲一般的前景。東歐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和『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中間階段的概念，是相互聯繫着的。兩個概念都是錯誤的。客觀地說，兩者對於那些創造『進步的』帝國主義或『民主主義的』獨佔資本主義理論

的人們，給予了某種援助和慰藉，這種理論會適合於隱藏帝國主義的反動的和侵略的本質。

如果即時加以改正，一個錯誤能夠變成提供一個利益，我們會在這個過程中達成更大的澄清。關於以上略事討論了的問題，還會有許多可說的。希望這些將鼓勵更進一步的討論。